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资料

JINDAISHI ZILIAO



JINDAISHI ZILIAO
近代史資料

ISBN 7-5004-4080-4



9 787500 440802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 7-5004-4080-4/K·603 定价：24.00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近代史资料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44183

443550

SA 340/0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史资料. 总 107 号/《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12
ISBN 7-5004-4080-4

I. 近… II. 近… III. 中国-近代史-史料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3010 号

主 编 李学通
责任编辑 卞修跃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刘建光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字 数 230 千字 印 数 1—2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王茂荫未刊稿选录	曹天生 点校 (1)
吴景濂自述年谱 (下) ... 吴叔班 记录 张树勇 整理	(19)
梁启超佚札	汤志钧 辑注 (91)
陈幹与王正廷《论地权书》暨秦树声跋	佟立容 (98)
胡适致胡近仁未刊书信二则考释	陆发春 (103)
原侵华日军 731 细菌部队队员筱塚良雄 证词资料	王希亮 译 (109)
侵华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山东省 受害者调查报告	杨玉林 刁乃莉 (134)
 口述史料	
抗战时期的国立八中追忆	徐成龙 (162)
张发奎回忆录选译	胡志伟 译注 (208)

王茂荫未刊稿选录

曹天生 点校

说明：王茂荫（1798—1865），安徽歙县人，35岁中进士，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先后任户部、兵部、吏部侍郎，其货币理论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有《王侍郎奏议》行世。

王茂荫是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我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有郭沫若、吴晗、谭彼岸、巫宝三等著名学者对王茂荫进行过研究，但他们所依据的主要材料仅限于《王侍郎奏议》和一些零星的散篇资料，研究又主要限于王茂荫的货币理论。自1995年起，笔者就开始系统搜集资料，数度到王茂荫的家乡安徽省歙县等地考察访问，王茂荫直系后裔王自燮先生等人将珍藏的有关王茂荫的未刊稿，包括遗文、往来函件、课稿等全部交与本人研究使用，笔者从中选出部分王茂荫未刊稿先行公开发表，以供学术界研究参考。

需作特别说明的是，根据王茂荫信函手迹对照，王茂荫后裔所保存下来的未刊稿，部分为王茂荫手写真迹，部分为抄件。未刊稿大部分标题为点校者所拟，缺字或辨别不清处均用□代替，一字一格，稿中已考证清楚之处，在文末作注；明显笔误之处直接加夹注正字，不再说明。

为钞不畅行请禁民用银折^①

为钞不畅行，请禁民用银专用钱钞并先博施济众以藉流通而裕国用事：洪旌我朝自开国以来，圣子神孙，继继承承休养生息，涵濡于二百余年之深，民间之生齿日繁，物产之精华渐耗，前以南服用兵，度支告匱，爰命举行钞法，此诚因时制宜，穷则必变之大道，中外臣民，所当顺承令，奉行不遑者也。如行已数年，卒未能畅行而无滞者，良由以钞与银并用，而钞不能人人皆有之故耳。夫物以相形而见绌，利以共有则争趋。银为国宝，等量齐观，无非取用于人，夫亦何轻而何重。第民间习用实银，骤以一币虚注银数，而谓与实银相等，其相似之下，究不能不分虚实于其间，而启人轻钞之见。且钞不能人人皆有，其有者虽非无因而得，而民不能尽察其故，以为人以钞而用于我，必以我之银钱货物，交易而后得，如其数以相酬，既以无利于己而不从，即如今半价可得，且减半价亦可得，及转而用之人，又减益思减，竟有欲得原减之利而不能。是以人不但以用钞为无利，且愈坚其轻钞之心，而相率不用。此数年来行钞所以徙辗转于民间交易之会者，职是故也。伏查前明洪武□年，造大明宝钞，自一贯而五百，下递一百，分为六等，有百文以下，始许用钱，其余不得以银钱货物交易，违者治罪之禁。我朝深厚仁泽，浹髓沦肌，屡下普免天下钱粮之诏。现在钞不畅行，势难中止，似宜仿前明行钞之法，禁民用银，使人舍钞别无所用，以一天下专于用钞之心，推列圣普免之恩，以钞博能，使人有钞必各资为用，以急天下争相行钞之念，既一旦急，而钞不畅行无滞者，无是理也。惟知矫世变俗，事属非常，小民之情，难与虑始，要必总揽全局，孰思

^① 原稿未注年月。该稿未注年月者，同此。

害处，诚能先下明诏，布告中外，俾天下智、愚、贤、不肖之伦咸晓然于斯时，所以不得不行钞之故。我皇上之与民更始，其良法美意实足开万世衣食之源，绝非一时之计，而又精其制作，严其章程，适多寡轻重之宜，循先后缓急之序，持之以一咸不变之心，示之以万全无弊之法，使人信其变通可久，咸有乐于用钞之心，将见禁止令行，翕然尚化，泉化之。权操于上，日日造作而无穷，富者之惠偏于民，人人欢欣而乐用，于以致我国家亿万年豫大亨之盛不难矣^①。

为查办废员张秉德盘踞书院折

奏为风闻废员盘踞书院，蚕食地方，并捐纳教职，品行卑污，吸食鸦片，恭折奏请严饬认真查办，以重文教，仰祈圣鉴事：窃维各省书院，原为培养人材而设，理宜选择品行端方，文名素著者主讲，以养士习文风，蒸蒸日上。岂容声名狼籍之人忝居师位，任意盘踞，以为养奸之地。亟闻山西介休县绵山书院已革太常寺少卿张秉德，自道光年主讲，今已十余载，该废员虽系进士出身，并无文望，且其一手一足，废已多年，从不为肄业生童改削文字，每月书院课文，非令学长代看，即徇私任意率列等第。该废员毫不顾忌物议异，但以攫食束修，并向地方官关说词讼，剥削乡里为事。遇事插弄里民兴讼，迨讼成后，向人明言伊为关说，包其讼能得胜，遂肆意从中渔利。若地方官平日不肖，则受其挟制，莫可如何。乡里小民，因官长方且畏其刁恶，明知受其黑弄，亦敢怒而不敢言。该废员排行第四，人呼之为张四虎。盖山西十年前有强盗名孙四虎者，以该废员张秉德之强横如盗，故从是名之也。每届书院应行更替之时，不肖地方官或被其

^① 下缺。

挟制，不敢乞请更替。或利其关说之事，非妄称其品学，留其蝉联，即捏称生童欲其主讲。甚或由该废员遣其爪牙，捏写诸生名字，为其悬留，该地方官遂为转求大吏，俾免更易他人。是以该废员在绵山书院盘踞十余年之久，竟以培养人材之区，为其私产矣。夫以书院为养老之地已不可，为养奸之地尤不可也。

又该废员之子张式琇，文理本不甚通，该废员为其夤缘入学，形同无赖，吸食鸦片，夜起昼眠。近以其父恃人之财，捐纳训导，指日即膺司铎。重（该）教官职分虽微，而多士悉资表率，所关匪细，似此等吸食鸦片，罪应纆首之徒，岂可滥测其中，致坏士风！亟既有所闻，相应据实具奏，请旨严飭认真查办，以重文教，伏祈圣鉴训示。谨奏。

请将刘子城察看或酌量调补片^①

再查给事中卞宝第折内，有风闻山西巡抚英桂才具平庸，防务极为疏懈。河东逼近豫疆，道员刘子城素闻疲玩，尤难恃以办防，求责成郑敦谨将该省防务详细查看等语。等到晋即与郑敦谨商议，据称前在山东、河南皆曾与该抚共事，知其操守素坚，好恶至正，用人皆极不够，现在防务尤为认真；询问刘子城则称尚未见过，现亦未闻劣迹。臣等思该抚之清素日著名，应请飭该抚将河东谨刘子城察看，如果才不胜任，或酌量调补之处，自行奏明办理。是否有当，伏祈圣鉴。谨附奏。

^① 原抄稿为“奏折底稿”，此标题为编者所拟。

王茂荫致友人^①

(咸丰八年十月)

启者：敝府处万山中，天险可守，又地僻粮少，无所可贪，故自古鲜见兵甲。乃今忽遭此难，若非大力救护，几于不可复回。自念生长其间，位至卿贰，于桑梓之地丝毫无补，每至中宵，愧恨不寐。窃综前后之所闻，推祸难之由致，因思贼之入徽，实青、石^②之人所招。青、石之招贼入徽，实徽勇之奸淫掳掠致之；而勇之所以如此，则以花会^③之人为之也。夫始借义练之名，以行其花会；继用义练之势，以行其勒捐。冒滥自由，贪残以逞，而人莫谁何者，潘炳照也。彼一庠生，非官长信之任之，胡以至此？岂非达^④误于前而沈^⑤复踵于后哉！今合郡之人，怨潘入骨，因并归怨于达与沈。其实平心而论，不独沈欲保徽，即达亦非欲祸徽，所以为潘愚者，由达专信门丁李琢堂、沈专信门生王芷庵也。达信李，而潘结李以通之；沈信汪，潘因结汪以通之。潘而祸魁，而此二人者则尤祸魁中之祸魁矣。三人不除，何以服人心而纾公愤？今闻李尚在徽，将谋充新府门丁，其人狡猾神通，设新府竟复用之，害将胡底？自上年屡上书黄寿翁，其时汪尚未出。但请必办潘李，并将义练局收捐之钱，严查勒交；滋事之勇，严惩酌减。因谓团练之法，贵在劝边界附近各村庄团结防守，断不宜用招募，招募之勇宜聚总处，日事

① 原稿标题为“遗札”，为王茂荫后人手抄稿。从内容看，是给朋友的一封信函，受信者，已不可考，当为徽州籍人。

② 青、石，是安徽省青阳县、石埭县。

③ 花会，是一种聚众赌博之集会，清道光年间从闽、粤流入徽州，其术类灯谜，以一赔三十之厚利诱人，堕其中者至死不悟，故又称花灯蛊。凡花会之人，名为练勇，实为赌徒，既不防守要隘，也不从事训练，终日四出奸淫掳掠。

④ 达，指徽州知府达秀。

⑤ 沈，指安徽学政沈祖懋。

训练，以为各路救应，不宜令之散出。乃寿翁听而不听，于捐项虽亦令查，于练勇竟置之不问。且属人告侍谓必如其意保徽，不能如其法办事，不用此勇，更将何用？若靠民人防守，贼至唯有磕头求命耳。呜呼，岂知今日练勇能招贼，而不能御贼，固有甚于磕头求命耶。倘听侍言或不至此，今日亡羊补牢，不得不更求阁下能好能恶，端赖仁人。此数人者实祸我徽，敢乞图之，恐其闻风逃脱，或反其意以诱致之。再不然即使不敢在徽境，亦稍以介〔解〕人恨也。无任翘切，伏维垂鉴。

谨又启：闻青、石人不得已而告于贼者六十余纸，所告八名潘炳照、吴玉富、汪芷庵三人为首，其次则江澳、徐廷鉴、曹思模、叶希杰、鲍宗轼。

变夫^①等行后，我拟移居东城玉清观，即任老五所办放粥处，以避西方之酬应。缘辞官虽已三月，而终日尚繁杂不可也。家信虽寄会馆不碍，当告知门役收存。我数日必打发人到西头一走也。科场案因第七名平林朱墨不符，御史参奏而起。至为难是柏中堂^②，别人可无事。宋老六尤可放心，倘家乡或因见有传集同考官询问之旨，遂生谣言，望为辨别，现问题已定，不用传他。唯不能遽行转里，须听案结后方好南归耳。又书。

王茂荫致家人^③

（咸丰八年十月十二日）

昨于初七日寄第廿五号安报，谅先送到。兹因变夫、诵芬^④

① 变夫，人名，为王茂荫家人或乡人，具体不详。

② 柏中堂，即柏葰（？—1859），道光进士，咸丰六年（1856）以户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后授文渊阁大学士。咸丰八年（1858）主持顺天乡试，因舞弊事获咎，次年处死，是为震惊朝野的“顺天科场案”。王茂荫信函中讲的就是这件事。

③ 原标题为“家书”。

④ 诵芬，人名，为王茂荫家人或乡人。

出京，特书数行，并将胡季临家信报本寄出，顺可以看。另寄季临信，即言存项未得对会（兑汇），倘度些急需，惟有在我暂移之说。弟等看如可行，即将此信全寄去；如不能行，即将我信留下，不寄可也。都中无他，惟科场闹事^①未了耳。此达。敬请母亲大人福安！并问诸弟全好！小春十二日椿年^②手书。

遗 折^③

（同治四年六月廿一日）

奏为臣病垂危，伏忱哀鸣，叩请天恩事。窃臣皖南下士，一介庸愚，遭遇圣明，滥添科第，由部曹转御史，洊擢卿贰，显荣已臻乎极，报效未尽末涓埃。自丁忧回籍以来，弱植渐形衰朽，比来一病，弥见颓唐，迄今益觉不支。自问万无生理，惟念受恩深重，当永铭诸子子孙孙，瞑目长辞，再矢报于生生世世。所有微臣依恋，感泣愚忱，谨缮遗折，叩请天恩，伏乞皇上圣鉴。同治四年六月 日。

日 记

（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至五月二十九日）

四月初二

寄骆秉章、瑛荣。捻扰商南，如汉中再有川匪，愈行棘手。骆派兵与陕省合击，瑛饬张守岱速剿布克坦，失利革留，仍责带兵。骆催牛树梅赴川，即令毛震寿赴陕。

四月初五

寄官文。严树森、英桂、瑛荣、孔广顺、张芾、郑元善。贼

① 科场闹事：即指咸丰八年顺天科场案。

② 椿年，王茂荫字。

③ 此折系王茂荫于同治四年六月廿一日口授，由家人记录而成。

已入陕，孔会杨飞熊等军夹击楚、豫边界要防，瑛扼河严守。

四月十一

寄官文。骆秉章、严树森、英桂、瑛、郑元善、孔广顺、张芾。传谕毛震寿，贼窜南山，川匪扰及南郑。道员周祖颐何未接仗？潼兵能否调回？何丙勋恐不□□□□□□□□□□，如再玩误，军法从事。骆即飭毛震寿带兵一千，绕赴汉中。

四月十七

寄托明阿、瑛、张芾、孔广顺、英桂。晋防吃重。英飭和昌、刘子城等严扼潼关，孔剿孝义等贼。如兵不足，托等添派。川震过宁，是州县已派萧积恭返剿，瑛飭汉中文武会击。

四月十八

寄官文：骆秉章、托名阿、瑛、严树森、郑元善、英桂、孔广顺。贼窜瑛安，孔移兵蓝田速剿。瑛严守省垣，张激团接应。郑即飭杨飞熊速赴陕，官等飭郧兵赴陕阳丰肃清。骆飭萧积恭往永宁速收汶山西防务，英妥筹。

四月十九

寄官文：胜保、托明阿、沈兆霖、瑛、郑元善、英桂、严树森、孔广顺、张芾。据奏贼偪省城，在大峪口乌兰都受伤，孔移蓝田，山阳、雒南二县危急。另股在商州白杨店等语。官等飭郧兵由襄樊驰剿，如尚有可调，派金国琛带汪胜，调精兵二三千赴陕。马得昭抵甘，选兵二三千赴陕，各路援兵均临。孔暂率黄河船抵归北岸。

四月二十日

寄托明阿、瑛、张芾、孔广顺、英桂。据王奏，经泽尚住陕，瑛即令商办理军务，邵精、江开如可用调营，权以巽《保关陕说》抄阅京师，派兵二千五百赴陕，托等商剿。

四月二十四日

寄官文：严树森、郑元善、托明阿、瑛、孔广顺、张芾、

英桂。陕省未见续报，各路援兵迅赴，郑催徐荣柱并往。英即出省驻扎，与徐继畲等布置。经已到川，谕令赴陕。

四月二十六日

寄托明阿、瑛荣、孔广顺、张芾、英桂。孔即截回蓝田窜匪。胜保太和布置粗定，即今赴陕。柯克僧欲薄惩，如再不得力，正法。

四月二十八日

寄托明阿、瑛荣、孔广顺、张芾。据王奏，史兆熊可用，一切查看办理。原折抄阅。

四月二十九日

寄官文：严树森、沈兆霖、骆秉章、托明阿、瑛荣、孔广顺、张芾。贼回窜蓝田，孔即返剿，托等严守省城蒲同一带。豫防官等与曾商于多隆阿、舒保二人中派一人入陕，请留曹树钟，不准行。回悻，善用之。

五月初二

寄瑛荣、张芾。有人奏，闫丕敏等弃陞有心，貽误商州。州牧曹熙锁送瑛荣古玩等物，孔节节逗留，致贼深入；王琢荃贪鄙，与韩奉华表里为奸。该抚近在同城何无觉察，即秉公查奏，孔免议。原折抄阅。

五月初八日

寄托明阿、瑛荣、孔广顺、张芾、英桂、郑元善。贼由渭南华州直逼潼关，汉回互斗，如回再勾合匪众，更棘手，瑛、张持平办理。令速陞笼络回民，孔暂军商剿回悻，张应整团借助。

五月十五日

寄托明阿、瑛荣、孔广顺、张芾、英桂、郑元善。贼扑潼关，已由小路赴陕州。陕中贼情如何，托等速奏。汉南贼窜青石关后，情形如何？闽乡、陕州与晋接界，英侦探前进。

补五月十一日

寄官文：严树森、沈兆霖、多隆阿、托明阿、瑛荣、孔广顺、张芾、英桂、郑元善。潼关严防回滋事，晓谕解散。援兵各路迅赴陕。

五月十六日

寄官文：多隆阿、托明阿、瑛荣、孔广顺、张芾、英桂。官等奏。今多隆阿已明谕，多暂办陕西军务，山阳、华阴是否贼据？多探确进扎，尤应屏蔽晋省，京兵已行。英探明咨，带兵官择要驻扎。何绍影等军，官文又饬相机进止。

五月十八日

寄托明阿、多隆阿、瑛荣、英桂、郑元善、孔广顺、张芾。仍防回窜，多隆阿沿河西上，从阆乡一带迎击，或派雷正綰赴陕，多应驻适中之地，以防北窜山阳踞匪。孔会同徐荣桂兜击成明京兵，英商布置豫之贼，即迎剿。马德（得）昭已折回泾州，托等催赴汉中。今毛震寿分剿曹口一带，回至遵化、渭安等县。张仍持平办理。

五月二十六日

寄骆秉章、多隆阿、瑛荣。多带兵起程，即饬雷正綰赴陕。多仍驻适中之地，扼防北路，与官等随时声气相通。川匪陷太平，骆派兵堵剿，催毛将汉中布置，即速赴西安，汉回互斗，持平办理。

五月二十九日

寄官文：骆秉章、托明阿、多隆阿、吴振轼、严树森、郑元善、英桂、瑛荣、孔广顺、张芾。山阳贼窜郧西，川匪入汉南。又，汉回互斗，官等巡饬金国琛赴郧，并饬颜朝德会剿。多催雷正綰驰赴商南，多由口前进，即赴秦中，陈大澧股逼枣阳，官等饬欧阳正墉迅攻川匪至黄官岭等处。托等催马得昭前往汉中，暂同邹学墉截剿，吴振轼即折回陕，与瑛筹办汉回事。张尚在仓头

镇查奏成明，仍驻蒲同一带，会英布置。

家训和遗言

（咸丰元年至咸丰十一年间）

（一）

我此番来京，因曾经记名御史，欲得补实，将胸中向来想说的话略行陈奏，坐以二年为期即行告归，既不想京察，亦不愿截取，并无贪恋名位之心。不意自上年来贼氛日炽，时事日艰。临难而避，实所深耻，遂立意不告归。孟子有言：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孟子在齐为客卿尚且如此，况我当大一统之时，通籍食禄已廿余年，而敢于军书旁午之时，作抽身而退之计乎！义无可逃，非忘初愿也。

祖母在堂，叔辈自然孝顺。但汝等须代我尽孝，以免我罪，才算得我的儿子。叔等在上，汝辈须恭敬，一切要遵教训。孝悌二字，是人家根本，失此二字，其家断不能昌。切勿因争多论寡，致失子侄之礼。莫看眼前吃亏，能吃亏是大便宜。此语一生守之用不尽。不独家庭宜然，凡与人交皆宜如此。而他日有分居时尤宜切记。

凡人坏品行损阴鹭，都只在财利上，故做人须从取舍上起。富与贵是人之所头章，所以从此说起也。此处得失利害关头，人心安得无动？惟当审之以义，安之以命。我命中有时，即不取非义，亦有。命里无时，即取尽非义，终归于无。看着当下取来虽见为有，不知非灾横祸出而消耗之必且过于所取，须以当下之不取为消将来之横祸，则此心自放得下。古云：请脯充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随之。当时时作此想，则自然不敢妄取。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有志者须极力持守，方可望将来有好日。恐此后汝辈家产请、家口多，衣食难度，遂至见利而不能思义，故切切言此，务各紧记为要。

以上系咸丰元年六月所书。

(二)

余以一介乡曲庸人，遭逢圣世，窃取科第，由户曹转御史，蒙上恩超擢太常少卿，一身之宠荣，至矣！自道光十五年来，叠沐覃恩，赠封祖父母^①、父母^②，伯祖父母^③、三四叔祖父母^④，一家之宠荣，亦至矣！现在逆贼肆乱，我国家列圣深仁厚泽，沦洽人心。今上圣明英武，篡发指日荡平。然在事诸臣多不足恃。自揣不能出力杀贼，万一或有他虞，惟有以身报国，诚知不足塞责，然才力有限，舍此则恐有辱国辱身之患，故不能作他想也。身后茫茫，惟听弟辈儿辈自行努力，以期光前裕后，亦复何言。然有恐以不言致误者，随笔略书于后。

此系咸丰三年五月所书。

(三)

六月初一^⑤又蒙恩擢太仆寺卿，益感惭无地矣！十一月又升侍郎^⑥，六年冬又逢覃恩三代，均请二品封典。今又忽来外夷之患，事出非常。身任侍郎，又奉命办团防事宜，要何所逃？惟有益坚此志而已。

以上系咸丰八年五月所书。

(四)

日后子孙非有安邦定国之才，不必出仕，只可读书应试，博取小功名而已。

戒色是第一义，万恶淫为首，汝辈似乎未犯，然当谨终身，

① 指王槐康及其夫人。

② 指王应矩及其夫人。

③ 系指王槐康之兄及其夫人。

④ 系指王槐康的两个弟弟及其夫人。

⑤ 咸丰三年六月初一日。

⑥ 咸丰三年十一月，王茂荫被补授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

且当垂示子孙。

祖父风水，我未经营妥当，祖母在堂，我未事奉送老，^①我之不孝大矣！此二大恨何时可补？天乎！天乎！

我之胞姐，仁孝性成，未嫁而歿。祖父、祖母尝为痛心，恒言必要做一风水合在身旁，以便子孙无忘祭祀。此愿切记不可忘。

行状不必做。我之行事，尔辈不得知，亦做不来，且天下自有公论，国史亦必有传，无庸作此无用物也！谨记。

方书五亲家^②处存有纹银乙千余两，本意坐为退归养老之资，身过则以此项作为四房子孙读书膏火之费。日后当买作淳安田，每年租息所入，凡我兄弟四房后人，自幼学发蒙，酌给若干；初学作文以至应小试、乡会试，各酌给若干。应俟日后看租息多少、读书子弟多少再定。

诸子都已成家，此后各自努力成人，我亦管不了许多。即我身在，儿辈不遵教训，亦属无益无知无爹。自责，志思我遗言，听好话，行好事，交好友，则如我在一般也。

我之遗累，只一少女。汝辈当留心访一中等人家，虽填房亦可，切勿存不填房之见。则年纪已大，便难访人家。祖母与汝母皆是填房，何为不可？惟人家要正派，郎才要学好。尽他身上所有，资送出门，便算完我心事。铺内^③有蓝田玉数十金，亦是坐此用的。

此愿已了，今更无累^④。八年加批。

(五)

我之人品，自问止算中等人，存心不敢做坏事，而未免存惧

① 此处系王茂荫用其儿辈称谓，祖父系指其父王应矩，祖母指其继母吴氏。

② 即王茂荫长子铭诏的岳丈方承浩。

③ 指北通州森盛茶庄，系王茂荫之祖父王槐康所创，延至清末。

④ 此八字为文头眉批。王茂荫小女，后适歙县西溪汪宗沂，号称癡癡进士，即徽州名画家汪采白之祖父。

天遭、畏人言之心。立意要想做好事，而实徒抱智术疏、才力薄之恨，非独经济不足言，即在宗族乡党间亦未有甚裨益。圣贤门墙固未望见，即理学诸先儒所言无所为而为善，无所畏而自不为恶，与夫敬事、慎言、明礼、达用，都无一毫功夫。倘他日有议从祀朱夫子及从祀乡贤者，儿等必力行阻止，告以我有遗言，断断不敢从命。我若入此中，必至愧死。儿辈若违此言，以大不孝论。

我自幼多病失学，舞勺后又自不好学，喜看杂书，致荒正业。弱冠后即日从事制义，于学问二字毫无根柢，动笔辄自惭。所存诗文、试贴都无足观，日后有将此等诗文混行刊刻者，以不孝论。

我之奏疏，词虽不文，然颇费苦心，于时事利弊实有切中要害处，存以垂示于孙，使知我居谏垣，蒙圣恩超擢，非自阿谀求荣中来。他日有人谏垣者，亦不必以利害之见存于心。能尽此心，自邀天鉴，可以望做好官。惟止可传家，不可传世。断断不宜刊刻，切切是囑。

刻书是我所恶，无论何人总要想著书传世，将来必有祖龙再出，一举而焚之也。^①

寿 父

（咸丰五年）

道光廿五年，七十寿。

咸丰五年，八十寿。

于乎！吾父今日，正届八旬。忆七旬在日，方杖履之随身，群奉觞以上寿，祝耄耄之递臻，倘今日而犹在，岂不披一品衣，

^① 此段未注明年月，行文亦非一气呵成，经考为咸丰八年（1858）七月至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开缺养病期间陆续撰写。

抱九仙骨，而共庆乎良辰。乃自古稀庆后，曾不三年，而遽为蓬岛之归真，使不肖等徒追慕夫色笑，终莫得而亲承。恨劬劳之欲报，而竟长为无怙之人。椎牛而祭，不如鸡豚之速存。在古昔之贤士，犹感风木以兴悲，而况不肖等之愚下，更将何以为心。

于乎！吾父正直聪明，超越比伦，生而为人，歿而为神。想在天之英爽，固将与山川兮等算，而永历夫千春。当兹诞降之吉日，必有群仙高会而来宾，献西池之果，开北海之樽，极上界之至乐，固迥异乎凡尘，而慈子之至爱，终无异乎平生。知时势之多难，定陟降而在庭，敬设筵几，敬介兕觥，虽难舞采以承颜，尚祈感格而来歆。念不肖茂荫、茂兰并远出而在京，不肖茂茹、茂蕙并近守夫家门，期报国以保家，用力济乎遭迍，苦才智之短浅，致备历夫艰辛。愿吾父默启而阴相之，以俾得所遵循，扫尘氛于旦夕，以永庆夫安平。

歙邑利弊各事宜

（咸丰八年）

一、请保富民。邑尚多殷实，近廿年以来，日就颓坏，不及前十分之一，其仅有存者，愿有以保全之，缘富户为地方元气，贫穷可藉以谋生，饥荒可劝以捐助，设被书吏讼棍更行陷害，并此失之，则邑民更不堪苦矣。

一、请恤商民。邑民十室九商，商必外出，家中惟存老弱。地方讼棍往往借端生事，肆为欺凌。或诱其年久分析之不肖亲房将伊田产盗卖，虚填契价，勒令取赎，否则强行管业；或诱其族邻以无据之账，挟同逼索，以便分肥。种种栽害难以枚举。商民仗身谋生，多属帮伙，非能殷富，外出既无能与较，暂归念将复出，自顾身家，亦不敢与较，隐忍含泪，不知凡几。愿有以护恤之。

一、请拿讼棍。地方人士自好者多非公不至，颜知敦尚品

诸。间有不肖之徒，平素结交吏役，勾串往来，遇富室有事，多方播弄，或搭台放火，或包揽把持，或招摇揽骗，或卖弄刀笔，情状甚多。愿访拿而办之。

一、请拿土棍。棍徒扰害乡里，设局诱赌。窝贼肆窃，遇事生风，借端讹诈，甚至强奸妇女，拦索财物，恃其凶狠，无所不至。良儒莫敢谁何，保约不敢举报，极为地方之害。牧马者先去害母，愿勤访而严拿之。

一、请革颓风。乡民聚族而居，此村与彼村之人，偶一二有揽隙，自所难免。乃或因某甲一人之事连及一村，遇有彼村负贩肩挑者过，或强留其人，或强留其担，勒令将某甲招来为伊泄恨，招之不来，则勒令取贖。此风出不多年，极为大害，将来恐酿巨案。愿先出示严禁，如有告发到案，必尽法痛惩，以革其弊。

一、请严挽各乡盗贼也。乡多聚族，外盗少而土贼多，本不难于缉捕。唯窝贼者，多系凶徒、土棍，小民不敢攫其锋。间或有捆贼送县者，吏役或以诬良恐吓而索诈之；有毆贼致毙者，吏役或反为招致尸亲控告而索诈之，以至贼风日甚。此种机谋，类多出于讼棍串通之所为，官或不察，遂为所卖。倘能出示晓谕，并令棍役告知，各乡里有能捆贼送究者，必嘉奖；有棍协同挽役拿贼者，必嘉赏；所有误毆匪致毙者勿论，则贼必敛戢矣。

一、请严禁残害厝坟也。歙邑卜葬为难，棍多浮厝于野，环以砖，覆以瓦，而开一门，以木为之。近日匪徒或揽其瓦，或窃其门，至别处卖钱，甚至有刨土坟以取物者。此等皆附近无赖小人，并非盗贼，图差地保容易查问。应情出示责成图保，遇有此种无棍，即行棍明拿究。谁无祖先，忍被残害暴露，此害能除，泽及枯骨，而子孙无不感戴矣。

一、请严禁尾滩拦索也。由水路初入歙境，地名尾滩，其滩高峻，船最难上。至此正极吃力，两岸无赖之徒，使穷民妇女以

小舟拦截于前，肆行强索。每船数百数千，相所载之轻重，必饱其欲乃去，在岸者坐而分肥。倘船户客商不给，稍有争论，则在岸无赖群起助虐。其祸匪轻，行旅病之。此害宜除。

一、请照例以办命案也。近时幕友专讲救生不救死，往往避重就轻，改案就例，以致杀人不抵，凶狠之徒，遂有止可打死人，不可人打死之说。民轻犯法，命案愈多。居官者名为不肯杀人，其实无数命案皆由此杀之也。惟愿于情真罪确者，照例正办，使凶徒知杀人者必死，则不敢轻打杀人，所以止解，实为造福之道。罪所应得，并非故人，岂得谓之残暴。

一、请用猛以警顽梗也。早南乡素有强悍之名，其实甚畏官长，并不敢如何。凡为重案下乡，乡民聚观，人山人海，官有所举动，则群然而哗哄，哄声雷动，似乎可骇，其实是看者多，助热闹者多，真顽梗者不过一二。平时须养一二力士（约可敌数十人者），到下乡时带去，遇有鼓噪，将为首者拿下，此威一行，从此到处无事矣。

以上十条，抚字之宜。

一、粮房户房征收册籍与板串宜清查也。地丁正款五万数千余两，此外浮银约有数万，而地方官不得其利，尽被书吏侵吞，宜将征收册吊入内署，按册上各户正则印用板串，必得切实可靠者一二人专司其事，庶板串不致处私出，而利可归于上，得此关键，则此缺自宽然有余。

一、税书宜饬按年造办推收进册也。民间买卖，税书必多方勒索，始将粮则推收，不遂其欲则不行。又不按年造册，以致板串与粮则不符，民间藉口不肯完纳，此风西北乡为盛。应出示严禁税书勒索延搁之弊，如有此情，即令民人指控。

一、粮差包甲使费之弊宜除也。邑西北乡水南乡春秋两季，粮差进图，或合一甲之欠户共凑钱若干给之，保其无事，谓之包甲。或各欠户按所欠粮数酌半给之，保其无事，谓之使费。小民之出钱

不少，而国家之课额常虚，亏课病民，实为大弊，应痛除之。

一、欠粮宜先惩稍多之户也。东南乡地方辽阔，离城远远，山僻村庄欠粮者多。前此地方官平时鞭长莫及，置之不问，及至催介紧急，则自行下乡，雷厉风行，各村地保税书早已闻风远避。既无从拿花户，遂至逢人辄拿，往往多系另星小户，而欠之多者转得逍遥事外，民益不服。应请下乡时到处先将地保、税书安顿，使不逃避。然而将税户单上，查其欠之最多户之稍大者，令其带领差役专拿此数人，伊必赶来上纳，由是以及其次，闻者知必将及己，自皆上纳，课渐清完，而民无可怨。

一、板串之费宜减也。从前未立板串时，每收粮附一张，止索大钱四文。自立板串，每张要大钱二十文，每户较前加至十倍。一钱以下者虽减半，然较前亦多五倍。通计每年板串钱有万余串，取民脂膏，以饱吏胥，在官并不能得。此事起自马明府秀儒，此公在任颇有政声，而此一事实为弊政。民间忍恨至今，能将此费裁减，以复其旧，则登时可以颂声遍野，而纳粮者亦必输将恐后矣。

一、税契之费宜减也。定例税契每两三分，近则收至库纹六分五厘，例外又索契尾，每张三四钱不等。费愈重而民间之契愈隐而不税。若能出示晓谕，大减其费，则民知好官不能常得，积年之契必纷涌投税。与其费重而税者少，不若费轻而税者多，此一事似可名利双收。

以上六条，催科之宜。

吴景濂自述年谱（下）

吴叔班 记录 张树勇 整理

民国二年（1913年），癸丑，四十一岁。

进步党于春季成立，此时各省正办参众两院选举。选举揭晓后，国民党当选议员几占五分三。袁政府大惧，于是在沪有暗杀宋教仁之事发生。此事发生后，国人对袁大为愤恨。刺客为应夔丞，逃之南京被获，交上海地方审判厅审判，供出系受袁世凯、赵秉钧主使，在沪主持之人为赵之秘书洪述祖，不久亦被获。予等在京接沪电后，当派党员四出在各旅馆搜查，在京金台旅馆查出一人〇〇〇，系由沪来京，与国务院赵秉钧往来最秘，断知此人与宋案极有关系，通知军警严拿。不意风声泄露，由京逃津，搭津浦车南下。因在金台旅馆，所留之行李、文电，有应夔丞致伊之电，内云：“事成受勋，先领数十万归沪。”益信此人为宋案中之一人。当通密电告知在沪孙、黄^①二先生，派人在南京侦查，果在火车上截获，解沪，并案办理。沪上审判厅厅长陈英年少有肝胆，对所获各犯，既悉此案为袁世凯、赵秉钧为主谋，依法总统在职时不受讯，遂出拘票传赵秉钧到案候讯，其胆量为人所推重。本党闻宋案发生，公推予及其他干事数人到府见袁，请袁严办此案。予向来到府时，袁即时出见，而此次到府，乃先让至客厅，派人讯问来意者数次，意是防范予等。最后袁始出见，

^① 即孙中山、黄兴。

其神气及语言大不如昔，言及刺客而退，推予见赵秉钧。赵神色自若，并述伊与宋交情甚厚，宋出京时伊尚赠川资三万元，今遭此变，殊深惋惜，敷□〔衍〕多时而散。据闻刺客已先后被获，又供出袁、赵为主谋。袁、赵恐在沪国民党孙、黄诸先生对此案不能恕置，恐不久有军事发生；又恐国会定四月八日开会后对此案大肆攻击，虽一面备战；又一面用钱贿赂两院国民党议员人拟议中成立的进步党，并唆使孙少候（名毓筠）等另组政党，名为政友会，专收买国民党两院议员，以减少国民党在两院议员人数。复派孙少候、林述庆等秘密见予，请予脱离国民党，以五十万元为用，其组党费另外筹给，予严词拒之。

又蒙古议员之选举，因外蒙已独立，内蒙各处亦多僻远不能就蒙古各地行使选举权，西藏亦然。拟由在京内外蒙古王公办理选举内外蒙古及西藏议员，此案临时参议院亦通过。政府派外蒙古王那彦图为选举外蒙古议员监督，派贡桑额尔布为内蒙古及西藏选举监督。选举前，政府对该监督二人以利诱之，所选出之议员，除蒙古及西藏人外，多散由袁指派。

国会未开会以前，国民党推张继为参议院候补议长，王正廷为候补副议长，推予为众议长。四月八日国会开会，参议院议员，国民党占三分之二以上，袁收买有限，故议长选举揭晓，各如本党所议。众议院国民党议员，议员初选举及在京受招待者亦在三分二以上。因为袁授意进步党，无论用钱多寡，政府均可拨给，并于金钱之外，可以诱以官吏，务必达到汤化龙为议长之目的。及选举揭晓，予之当选票数与汤之当选票数，照出席人数未过半数，均不能当选。众议院额数为五百九十五，过半数为二百九十八票，予得票二百九十六票，未过半散；汤得二百八十票，其余为废票。由此予与汤均为众议院议长候补者，再投票只许投予及汤。

国会开会之日——四月八日——为巴西首先承认中华民国之

日。其他各国则候众议院议长选出后再行承认。然予二人之选举，因政府收买议员未过半数，重开会时，进步党议员则不出席，故开会数次均流会。过十日开会成，而予与汤之票又不过半数。再延数日后，政府用款至一百八十万以上，始将议员名额收买足数。开会选举揭晓，汤化龙竟当选为众议院议长，岂不可羞哉！次日各国均承认中华民国。因争众议院议长选举，两党议员几成水火，开会时对于议题除争议外，不能表决一案。予心痛之，当约集本党及进步党重要议员各数人，汤君亦在内，在六国饭店聚宴，由予演说：“国人由前清末年望开国会以救国，如大旱之望云霓也。乃国会开会后，为众议院议长问题争至月余，国人对国会殊为失望。而国会开会对于议案，除争论外，又不能平心讨论。现国势危急若此，长久下去，不商定和衷共济办法，恐国人对国会将为唾弃矣！吾与君等于是皆为国会之罪人。政府人员不过一时而已，转眼变化何人，则不可知。且政府从中作祟，利用国会捣乱，将罪名加于国会身上，公等将何以对天下之人？吾等皆盼望宪政实行者，若国会议事不能进行，第一，宪法会无从开会；第二，重要议案不能议决，如是宪政何从实现？公等初志，当不及此。今拟捐弃前嫌，在法律上与诸公携手，共策国会进行，实国家之利也。而亦可免天下人之大笑。诸公以为何如？”乃进步党议员在座者，不省予言，表明绝对拥护政府。宴罢不欢而散。

汤化龙就议长职后，不数日，政府谓大借款案已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请众议院备案。咨文到院，由汤报告，议员大哗，咸谓：该借款大案，临时参议院表决请政府将用途提出后经审查认可，始能开议。经参议院毕会前，政府未将用途提出，是以此案搁浅，并未议决。政府来文说临时参议院通过，系何所根据？加系临时参议院通过，请政府将临时参议院复文送院，方能证明。况临时参议院秘密会议之文件俱在，并未通过，有议事录、速记

录，□□〔班〕可考。政府何敢捏造，蒙混本院，殊属非是。且国会对政府，议案而外，无备案成立，请议长将来文退回，请政府声明，此系责任问题，政府应当守法。乃汤化龙又谓此案诚由临时参议院退过，并由汤领衔退电证明政府文件是合理的，而非捏造。由于将该案当初到院秘密会议数次，及议决情形，照议事录、速记录所载详细叙出，报告众议院同人，及由于领衔通电全国，证明该借款实在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议员闻予报告，并闻当日之议事录与速记录，成瞭然该借款实在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此次政府来文，实系欺骗众议院，应表决将来文退回政府，请政府再负责任答复。表决大多数通过如上。乃汤化龙丧心病国，竟敢将多数议决之案，不执行送回政府，实为有议会国家所未有之新闻也。既由议院议决，请政府派员负责向本院说明，政府亦不派人。然实在情形，袁与英公使朱尔典已将借款成立，英国并将借款拨交袁，袁已用此款筹备国内战事，请灭革命势力，故对众议院议决悍然不顾。

又外蒙古独立，系由俄国主使。政府不急谋使外蒙取消独立，乃反受俄国政府利诱，与俄定盟，俄国承认中国对外请有宗主权，其他条件皆与国权领土损失极重。政府乃丧心误国，定此条件。照《约法》政府与外国定约，应得国会同意。政府乃将该约送院，请求同意。众议院接此案后，开会讨论，有识之士皆认该约误国，不能同意，但进步党议员竟受政府促使利诱，认为政府与俄国所定条约与国家有利。众议院开会争论多次，卒将该案不予同意。而政府悍然不顾，竟秘密与俄签约。言之至今痛心！

宋案发生后，国民党本部借湖广会馆开追悼宋遯初先生大会。是日到会者有数千人。所有该说，均由速记记录。政府派京兆尹王治馨代表赵秉钧总理蒞会。该员发言：“宋先生之暗杀案发生，总统疑为总理所为，总理疑为总统所为，其实总统、总理

均未与闻此事。刺客所供系属造谣，诸公不要见信。”次日，报纸载王之演说，对袁、对赵大加攻击，而袁、赵对王所发之演说亦恨之刺骨，后竟假借他案将王枪杀。

宋案发生，刺客供出袁、赵主谋，因是在沪之党人恨袁、赵不止，暗中预备二次革命，以江西、南京为起事地点。孙先生曾屡次派人到京，约予及国民党重要议员南下，共襄此举。予严词拒绝，以为应用政治方法解决，革命初成功，不可再举兵，靡乱国人。南中同志不以予说为然，并拟在本党内设秘密通信机关。予以本党本部专办国会议员各事，如秘密通信机关设到本部，则出政治范围之外，且在暴力之下，一旦检举，将何以善其后。故第二次革命，秘密通信机关不设于本部之内，另派人在东交民巷设立机关。京中侦探耳目众多，所有该机关内之行为，政府亦设法购买电报生，因此悉知往来电报情形。所以政府对于第二次举义情形，措置更易着手。而政府亦暗中派遣陆军及海军，严加防范，并设法在赣宁方面军事要人中，择其可以利诱者，以巨金诱之。未已，五月间，赣宁举兵，政府下令讨伐。不到一月，赣宁二方均遭失败。所有参加赣宁举义之党员，皆逃海外。北京之秘密机关，政府去查封时，办事人员已先逃走，而本部未受株连。

此时南北情形恐惶万状，而国会在京，不动声色，仍照常开会。

国会开会后，负约法重要责任，厥为由国会负约法赋足全责，由国会组织宪法委员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由两院推出宪法起草委员六十名，即每院三十名，公推参议院议员汤漪为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宪法起草委员会之地点设在天坛祈年殿内，所有起草委员会委员为两院一时之选。开会后，以宪法全部一时不能起草，及草起出，一时亦难议决。而国家现时之政府，照约法上仍为临时政府，总统亦为临时总统。若待全案议决，非数月所能成功，故公决先起宪法中之一部——大总统选举草案——以

便依宪法选出正式总统。故中华民国宪法中之一部分草案——大总统选举法——先由起草委员会提出草案，交宪法会议议决宣布。乃政府异想天开，不遵约法，竟由政府派出委员施愚等八人携政府公文来宪法起草委员会，要求出席。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依约法所载，制定宪法系国会专责，无政府派员参加之规定，拒绝公文不收，并请来人不准到会。来员无法而退。政府对宪法委员会因此更加愤恨。

袁氏派施愚、顾鳌、饶孟任、黎渊、方枢、程树德、孔昭焱、余荣昌等八人至宪法委员会出席，经起草委员会拒绝。既被拒绝，而袁干涉宪法之心未已，又派梁启超、周自齐、朱启钤等连日宴请宪法委员会委员于宣武门内中华饭店，疏通意见。各委员咸以草案既经二读会，无修改余地答之。连日不得要领，最后乃令汤化龙再从事疏通，并示以各省军民长官令条陈宪法意见电稿，谓疏通无效即发出。时汤化龙已密定破坏国会之计，受袁命后，谓已疏通无效，于是袁氏致各省军民长官令条陈宪法之有电、支电（见“宪法史”）拍发。第一次国会非法解散之事实实现，而议宪亦告停顿矣。各省军民长官干涉宪法电报、领衔者黎元洪。黎以武昌起义之人物，甘受袁氏之指使，可痛矣夫！

参议院议长张继，因涉请宁起事嫌疑，离开北京，参议院议长应另行改选。本党方面议决推王正廷为候补者，进步党推王家襄为候补者，而政友会议员由本党脱离之人，均暗中表示赞成王正廷，推举代表到本党本部说明此意。是日夜间，政府闻信大惧，突于选举议长之日——民国二年八月廿七日早七点钟前，派军警请捕参众两院本党议员八人，众议院议员褚辅成、刘愚格、常恒芳，参议院议员丁象请、朱念祖、赵世钰、张我华、高荫藻，并声言，仍再续行逮捕多人。予早起闻信，一而营救逮捕诸同志，一而探访逮捕原因，又一面通知未逮捕之同人，仍要出席两院，不必惶恐。因此原故，参议院本党同志存有戒心者多人，

不愿出席，故王家襄趁此机会窃得议长地位。据政府方面说逮捕议员原因，系安徽省长倪嗣冲电请政府指名逮捕，并请政府将被逮捕者解皖待讯。次日，即将被捕议员解之天津，羁押多日，先将刘恩格等二人释放，将褚辅成、赵世钰等六人解之蚌埠羁押。面倪嗣冲对被捕诸人表示好意，亦并无电请政府逮捕之事，“诸君在此，只好受点委屈”。其实情形，是进步党要得参议院议长，而议员人数不足半数，故唆使政府出此恶劣行为。面袁亦因总统选举会之议长以参议院议长充之，故愿进步党议员当选，以便指挥一切。袁与进步党目无法如此，实民国之不幸也。

此时内阁系熊希龄为总理，所有阁员皆袁之私人。袁对外言熊内阁系中华民国第一人才内阁。查熊于元年时为唐内阁^①之财政总长，系其同乡黄克强推荐。唐辞职后，熊亦解职，设法营求为热河都统。熊以文官作此无味之武官，其意何居？人皆言，热河为清室行宫重地，所藏宝物甚多，熊之此去，意在盗宝。后果不出人之所料，熊到热河后，窃出清廷行宫之宝物甚多，均以善价售于外国人。多财善贾，因此又运动袁为内阁总理。袁以赵秉钧为内阁总理多受国人指责，熊本巧宦容易驾驭，故亦乐用熊为总理。熊就职后，因卖热河宝物被人告发之案甚多。袁以所告之案示熊，熊畏袁依法举办，故处处迎合袁之意旨，不敢稍持己见。十一月四日，袁解散国民党，并将国民党议员投降于袁者，一齐取消。此件命令未发表前，袁先以人告熊盗宝之呈文交熊阅看，熊阅文件，正在惶悚之际，袁又以解散命令交熊副署，熊不敢发言，立即副署盖印而退。

赣宁之役起后，国会议员因嫌疑而被杀害者有数人：（一）江西议员徐秀钧（英国留学生），系江西都督李烈钧之代表，为

① 即唐绍仪 1912 年 3 月袁世凯窃得临时大总统后，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

总统府秘书，赣宁事起即被捕，解江西即枪决。（二）徐镜心，山东议员，谓其私藏炸弹蓄意暗杀，被捕后即枪决。（三）段世园，河南参议院议员，总统府秘书，谓其勾通白狼^①，被捕后即枪决。

大总统选举法于本年十月四日宣布。宣布后数日依法开总统选举会，袁世凯事前贿买议员，无微不至，民党议员决拒绝之。袁意如开会后不能当选，于选举前一日与其私党秘密计划，将北京军警化装为公民，于选举日，由西四牌楼起至宣武门外虎坊桥止，皆被假公民布满。而选举会在众议院，尤被假公民严密包围。民党议员事前不知，上午八点开会时到院见此情形，欲退不能，惟有挺身入院。进步党之议员在院内曾由袁氏派员招待。民党议员除饮茶外，外边送来点心亦被假公民抢去，人心大愤。延至十一点始足法定人数，开会投票，袁世凯比黎元洪票多，然均不足法定票数。依法以袁世凯、黎元洪二人决选。开票毕已下午八点钟矣！袁世凯票数足法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最可笑者，由议长正式宣布袁世凯当选时，不知何人将总电门关闭，全场黑暗，进步党议员大恐，以为有暗杀事发生，多人藏于桌下，俟灯复亮，喧哗始止。此议场内当日之情形也。而议场外，议场屋顶上国旗忽然倒下，经人扶起。然识者亦认为国家将从此多事矣。

总统被选，依法当到总统选举会宣誓就职。而袁世凯对国会议场存戒心，乃于十月十日在太和殿宣誓就职。将国会议员请至太和殿，指定一隅为议员座位，其他为来宾座位。是日天雨，满街国旗被雨淋湿，一致滴下水点。议者论袁在太和殿就职已存帝制思想，日后为帝之事，于今日已肇其端。而天雨国旗落泪，认

^① 白朗，河南宝丰县人，因其身材高瘦，腿长行快，故因其名谐音而“单号白狼”。为反对袁世凯军阀统治，1912年率领豫西一带农民发动武装起义。

为袁就职后，国民将受痛苦，故一齐作泪。此虽嬉言，而后来袁之行动果未出所料。袁既将总统骗取到手，于是与汤化龙、梁启超、林长民等，日夜筹划破坏国会之计。于是遂有十一月四日名为解散国民党，实为解散国会之命令发生。何以言之？大总统无解散国会权，袁知之，袁之私党汤化龙等亦知，如冒然解散国会，是大总统违法也。袁本奸雄，计不出此，乃托名解散国民党，向日国民党议员被袁收买，已早脱离国民党者，袁一律以国民党待之，于是遂将现在国民党议员，昔日已脱党而为政府党之议员，同视为国民党，一律追缴议员当选证书及徽章。于是两院所余议员不足半数，均为进步党、政友会、公民党之议员。袁派梁启超、汤化龙对彼等云：“诸君勿惶，政府一定将候补议员递补，再行开会。”袁政府实在不愿要国会，不过对彼等敷衍，国会从此消灭矣！

解散国民党命令系十一月四日之事，三号下午两院同人亦得确信，纷纷移住六国饭店。并来多人劝予一同移住，予谢之曰：“党中议员人数在数百名以上，势不能同住于六国饭店，予数[素]日为诸公推崇，临难苟免，何以对诸同志？诸君尽可暂避，勿恋予也。”是晚同志诸人走后，老妻夜间十一点钟忽生一子，乳名国生。次早与林子超^①晤面（林未住六国饭店），予告林云：“我于午膳后至国民党本部，候政府来人检查，免本部职员惶恐。”林颔之。中膳后，予至国民党本部，召集本党各部职员齐集于客厅，予告云：“今日不久政府将派军警来本党检查，诸君为本党职员，不必恐慌，有事我一人负责。”正说话间，而军警来数百名已将本党包围。领军警之长官见予于客厅，述其来意，予告彼等：“在此恭候，请诸君依大总统命令详细检查，吾与诸公平日无恩无怨，所检查各件请检查员盖章，以资证实。”

^① 林森，字子超

于是彼等分请各部检查，而将予于无形中监视矣。约下午三句钟，天微雨，忽来警察厅督察长杨钦三冒雨来见予：“闻议长被困在此，予对公素日钦佩，如有需予处愿效奔走之劳。”予谢之，乃对彼云：“本党人员均为雇用性质，请君转告诸同事勿刁难彼等，吾在此诸君将予之马车命之归家。并请君回厅对吴总监说老妻昨夜生子，今日吾家想一定去人检查，千万勿惊骇老妻及新生之子为感，并请将吾之行李命人送来。”杨一一诸之，骑马而去，未一时而归，谓予曰：“公所委托之件，均已办到，贵宅检查，已由总监派人命令军警不许进太太之闺房。马车送回，行李已带来，明日再来视君。”彼辞予而去。是日予居于国民党本部，行动悉被军警监视，亲友来探视者，均不许见。次日有日本友人多来见予，由军警领至客厅，予令传语谢其厚意而未见。第三日午膳后忽有总统府秘书张国淦声称奉总统命令来见予，予见之。张云：“总统不知公在国民党内被困，今晨阅报及闻赵秉钧说始知。对军警对待公之办法，总统甚不以为然，故派予携[倩]公同出国民党本部回家。”予谢总统厚意，并为张道之：“予在国民党被困，并非军警刁难，实以余为国民党副理事，于解散本党之时有责任在身。责任未分明以前，虽有总统厚意，不敢冒然回家，以资后累。先生可以先归，吾俟检查国民党事竣，办理清楚后再走。”张不久即去。予对军警检查员说：“诸君检查三日，本党有无作乱嫌疑，并此后本党所有欠外之款及所有家具如何安排，请明告之。”诸检查员云：“无附乱嫌疑，可为证明；贵党所有一切物件，一律没收。”予曰：“警察厅既没收本党所有物件，然本党对商店所欠各款无现款可以支付，是应传各商店来党，将欠款由警察厅归还，向彼等说明方了手续。”检查员以予办法为然，乃传各商店来，告知详情，所欠之款，与本党会计处账目相付[符]，均由警察厅日后补还。对检查员各样手续办理清楚，予电知家中派车来接。迨予抵家已下午六时矣！亲

友为予被困三日，咸来慰问。

予自遭国会解散后，闭户家居。袁对予行动，派探三人监视。监视员以张清忱为监视长。张与予系北大同学，予作临时参议院议长时，予派张为临时参议院守卫长，当国会成立，汤化龙又派张为众议院守卫长。因此，张虽奉袁命令监视，但对袁之报告书，对予念旧好，尚不作蔑良心之报告，表面尚与予虚为委蛇。袁又派予为总统府顾问，令赵秉钧将聘书送交予处。赵说：“万不可辞，免招袁之重嫉。”予诺之，声明不去总统府道谢。赵云：“袁并不盼君去道谢。每月薪金由张国淦送来。”在监视之下，不得不为之低首也。

赣宁之役后，袁派张国淦及赵秉钧迭次请予到府谈话。辞之不获，一日去见袁。袁接见，坐中只有赵一人。袁说：“莲翁，何久不到府来呢？吾派人请数次，又何故迟迟来见？”予答说：“总统事烦〔繁〕，不敢常来扰总统清神。”袁说：“莲翁视予与孙、黄孰亲，吾迭次派人送款，何以不接受？孙、黄由南汇款，何以接受？令予不解。”予答云：“孙、黄汇款，均系接济国民党本部，并非接济吾个人，吾接到汇款，即照数交国民党会计部，自有党以来，从未染指分文。是对孙、黄并未受款，可以证明。总统赠款，系赠予个人之私用，国家经济困难，不敢以个人私用上累总统，望总统原谅下情。”袁又说：“此次赣宁之乱，国民党在赣宁地方滥杀反对党，南方人均目国民党为乱党。今国民党本部在北京，何所恃，不怕反对党来报复，仍然高揭国民党旗帜？”袁说此话时，声色俱厉，二目凶光外射。予自识袁以来，见袁如此凶暴为第一次。予笑对袁曰：“国民党的人在南方滥杀人，均系国民党党员行动，非国民党本部所主使。今国民党本部在京何所恃？是所恃者乃以北京为首善之区，在大总统指挥之下，若有人滥杀国民党员，则法律何在？大总统在首善之区不能保护人民安全，恐总统威严亦因之坠地矣。想大总统对国民党

作乱之人虽然愤恨，而对国民党本部不参加作乱安分之议员，当然以法律保障之也。”袁闻予言大笑。袁又说：“此后盼莲翁为予帮忙。”予答之：“在法律范围内，情愿为总统帮忙。”彼此晤谈多时而散。

本年冬底，袁派梁启超为司法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汤、梁二人所以仇视国会者，以此二人久欲作国务员，又知声名狼籍，如总统提出国会请求同意时，必遭国会否决。故欲达作阁员目的，不去国会则不能达其素愿。今目的虽达，而为国人所鄙笑。梁任司法，首先恢复笞刑，可以逢迎袁之意旨者，无事不作，不顾舆论如何也。

袁世凯就总统后，恐孙、黄等先生在日得日人之助，遂派孙宝琦、李盛铎赴日，以满蒙五铁路建筑权许日：（一）开原至海龙；（二）四平街至洮南；（三）长春至洮南；（四）洮南至承德；（五）海龙至吉林。以不助党人为交换条件。

国会解散后（十一月四日），袁即组织政治会议，委员由各省长官选派，总统派八人，于十二月开会。议决遣散国会残余议员，及议决修改约法机关。次年二月政治会议议决停办地方自治，三月议决解散各省省议会。约法会议成立之后，此会即解散。

民国三年（1914年），甲寅，四十二岁。

是年三月十八日，袁设修改约法机关，称为约法会议，派孙毓筠为约法会议议长，约法会议之议员共五十七人，皆由袁指派其私党充之，会议地点设于团城。不数月而将旧约法改为袁氏一人独有之新约法。依新约法产生参政院，以黎元洪为院长，参政人员皆由各省依袁意旨选派之。自是所有政权由总统一人独揽。

此时国务院改为政事堂，向呈国务总理之文件政呈总统。袁以徐世昌为国务卿。并仿清都察院设立肃政厅，又设平政院。北

京官制亦照元年所议决者，多半修改。原有阁员，亦更换多人。京外各省都督，有功国家、为众望所归者，袁多嫉之，因此调黎元洪来京，为参谋部总长兼参政院院长，以段芝贵为湖北都督。云南都督黎元洪调京充经界局局长，调贵州都督唐继尧继之。贵州都督以刘显世充之。直隶都督冯国璋调江苏都督，以内务部总长赵秉钧充直隶都督。吉林都督陈昭常去职，以孟恩远充之。如此类者，不可胜计。内外各要员，皆用袁之私人，或无大名望而易受指挥者。嗣各省都督名义取消，一律改成为将军；民政长名义取消，一律改为巡按使；观察使改为道尹。袁之行径渐渐专制，虽自己改造之法律亦不欲遵守，帝制之说，渐渐见于报纸。始而美国顾问古德诺给袁上书，谓中国不宜共和，应称帝制；日本顾问有贺长雄继之，而各国公使中，英国公使朱尔典尤极鼓吹帝制。袁初表而上未应许，其子袁克定及袁左右私人极力主张，先用文字发表中国不宜共和论说，在报纸宣传以试探民意；继则京内外各大员不赞成帝制者，分别撤换。于是有在京设立筹安会之说，专为劝袁称帝机关。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为发〔起〕人，专勾结甘心为帝制效〔劳〕奔走者，尽人其中。曾记有一孙少候（毓筠）派同学某君二人，说奉孙命来约予入筹安会，并说孙拟来见，请定见而日期。予对入会之事力拒之（以同学原故，不便面斥其非），定次日请孙来谈。届期孙如约而来，力劝予入筹安会，不可坚执已见，将来皇帝登位，均封爵位，并有大数金钱接济等语。予对孙曰：“筹安会应否设立，袁应否称帝，不必谈也。吾所对君声明者，予在京久困，为侦骑所监视，公等功成，能顾念友谊，放予平安回乡，予感厚意多矣。与君共富贵之事，予不愿作，请君亦不必相强”等语。孙闻予言，不欢而去。

予在京出人被侦探监视，深感不便，至友劝予“应降志作狎邪游，日日留连花酒之间，侦探对袁报告无别事可记，仅此花

酒新闻，渐渐袁对公之侦察自能撤去。”甚以其言为然。因日与同乡齐照岩^①、王恩溥、徐敬宜^②及王佐卿等数人，日日外城去玩，在饭馆吃饭，在小班喝茶，不顾声名狼藉，故意引大家顾视，如此者九个月。袁接侦察报告，日日如此，遂将侦察者撤销。

此时蔡锷在京被监视甚严，蔡终日寄迹于花酒之间以自晦，其常往来处为小凤仙。袁称帝前，一日蔡大宴客，征妓陪酒甚多，酒半，蔡称腹痛，遂逃出京，迳赴云南。后于民国四年云南起义讨袁，易帜。

张耀曾于其弟丧葬之日，监视较疏，乘间出京赴日。

此时，国民党孙先生、黄先生及其他重要人员均在日，纠合势力，计划讨袁，候袁称帝，在国内举兵讨之。此时，孙黄两先生在东京分国民党为二：孙先生派称为中华革命党，即现今国民党前身；黄先生派称为欧事研究会，即现今政学会之前身也。两方皆有函致予（此时各国邮政在中国者，尚未由中国收回，故密信均由日本邮局递交，不受政府检查），予劝两方仍合作，不可将国民党分裂。而两方各走极端，不纳予言。

此时谷君九峰（钟秀）在沪，承云南唐、蔡之接济，创办《中华新报》，专为反对帝制机关，为民党在沪之第一报。主持报事者，除九峰外，尚有陕西李君龙门，及张君季鸾等襄助之。

欧战于本年秋发生，袁不知趁此时机与协约国（即英法）联合，收回中国所损失之权利，乃竟亟亟谋称帝制。以英、法、俄、德、奥等国正在战争中，无暇东顾，袁乃派陆宗輿为驻日公使，对袁称帝事请日本谅解助袁。日本始而敷衍，继于民国四年一月十八日向袁提出了廿一条，要袁承认，至五月七日提出最后

① 齐耀珊，字照岩，吉林伊通人。1914年3月任约法会议议员、参议院参政。

② 徐鼎霖，字敬宜，吉林省吉林县人。1914年任参议院参政、约法会议议员。

通牒。丧权辱国，重要条件，限袁于四十八小时承认，以承认袁之帝制为交换条件。袁于五月九日完全承认二十一条。另有专书，故不赘。

民三筹安全成立后，未尝公开开会。九月一日参政院开会，袁在京组织各省代表团，利用旅京人士组织请愿团体，赴总统府请愿，总统派员出席，请参政院审查，征求民意。参政院议决召集国民会议解决政体。而梁士诒等以为缓而不便，另议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其所谓代表均由各省军民长官指定，费用出自政府，在各省投票，推袁氏为皇帝，委托参政院为总代表。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开会，至会之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全数赞成帝制，立即公上推戴书，并呈上各省推戴电文。袁氏故作逊让，另行推戴。参政院又呈第二次推戴书，袁氏申令接受。十三日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派兵监视其行动。大封劝进功臣为五等爵（公、候、伯、子、男），各省将军与焉。设立大典筹备处，朱启钤购办龙衣朝服，修理宫殿，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定一月一日登极。

先是蔡锷出京后，迳赴云南，此时云南将军唐继尧对袁称帝赞否尚持观望态度。蔡到滇后，唐反对帝制之心始决。遂于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出兵，通电讨袁，称为护国军。先联贵州将军刘显世一致，然后出兵入川。此时，四川将军陈宦，袁遣陈赴川，偕带重兵，并派曹錕军队随赴四川，以防事变。护国军兴，全国反袁之势为之一振。袁不顾一切，仍于五年一月一日登极，改称大皇帝。

民国四年（1915年），乙卯，四十三岁。

袁称帝前，袁之部下徐世昌、段祺瑞等均辞职，而冯国璋坐镇江南，表面对袁恭顺，骨子里与讨袁军联合。未几，吕公望独立浙江，陕西亦继起独立。梁启超勾结岑春萱，原拟在两广独

立，而广东将军龙济光不赞成岑、梁，广西陆荣廷亦然。岑春萱不得已乃在广东肇庆府设立军务院，以梁启超为秘书长。然讨袁军对岑、梁均不联合。滇军驻粤者，由李烈钧统率之，驱逐龙济光出粤，而陆荣廷在广西亦称独立。各省讨袁军除肇庆军务院外，一致推戴唐绍仪为总代表，对日外交尤深亲密。日本政府派青木中将驻沪为总代表，与唐联络。凡各省讨袁往返密商电报，皆由各省日本领事馆转递。然日本内阁密议，对中国内地十八省讨袁军队皆与援助，而对东三省则拟乘机攫取政权。此种消息，系中山先生、张蓉西（名耀曾）先生等在日本探得，大生惶恐。而此时奉天东边辑安县县长与党人宣布独立，恐日人借端启衅。孙先生等遂派人至京请予赴大连，秘密将辑安独立取消，并将党人撤回沪上。予此时在京，监视人员方撤，闻信后（此是民五的事）即请日友神田正雄先生保护出京赴津，到津后即将家眷移津住日租界荣街十四号，于民国五年四月九日移于天津。此时进步党梁善济亦奉其党令出京反袁，梁要求与予同住，为国、进两党驻津讨袁之秘密机关，予允之。予在津发表“致袁去国书”，而袁则下令通缉予。因此予在津又不得不借重日人之保护。

予赴大连之先，与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及驻津总领事协商，请其派人保护至大连。予托词赴大连为召集东三省议员赴沪开会。予至大连下船时，大连长官到船上去接，居于辽东旅馆。询予来意，予以召集东北国会议员赴沪开会为词。彼派文武两人居于旅馆保护予，而暗中含监视之意。此时为予翻译者陈容甫及韩达奎二君。此外尚有王君一人，亦通日语。此人曾为北洋狱官，随张蓉【西】潜逃赴日。予乃密派其赴辑安将其独立取消，并将县长王济辉（贵州人）及党人偕同来连。一面召集东北国会议员来连，与之暗商赴沪事宜。而取消辑安独立之事，先颇召同党之反对，继将内幕为之说明，始均无后言。

袁氏称帝后，各省纷纷独立讨袁。袁见人心已去，帝制不能久维，故于三月廿二日取消帝制，仍称总统，以为和缓各省计划。暗嘱冯国璋在南京召开各省会议（独立省分亦在内），因各独立省提出袁退位问题，会议无结果而散。陈宦在四川亦拥兵独立，通电到京，袁阅后几乎晕倒。由此称病，于民国五年六月六号而死。闻其死有被某国医生所毒云。

予由大连偕陈、韩二君赴沪，寓法租界明德里卅一号。沪上设有议员通信处，以为国会议员集会之机关。予在沪，同唐少川、张溥权〔泉〕^①晤日本青木中将（张为译者）。青木对予谈：“如公能在东北举兵讨袁，予能电商鄙国参谋本部援助一切，并无条件酬报。”予曰：“吾系文人，又无军队，在东北起兵讨袁非从新编练军队不可，所需款项甚巨，练兵地点不免与奉当局冲突。”青木说：“如公欲办，吾想鄙国参谋本部如何困难均能援助。姑先去电相商，俟回电后，吾二人再行核计。”予唯唯而通。嗣因海军事，唐请予赴浙协商。予赴杭，往返约一星期回沪。唐对予言：“青木说参谋本部亦有回电，能借南满租界练兵，练兵器械与款均由日本借给。张如听调遣则留之，不听则去之。此电报予阅后，盼公回沪磋商后再复青木。今公对此电报意见如何。”予说：“公为中国老外交家，对此电报当生如何感想？吾恐币重言甘，天下岂有如此等便利之事与我等乎？今当委曲设辞以谢其厚意。对青木及参谋本部之盛情，不可令其不欢也。”当携〔偕〕同唐去访青木，青木出参谋本部来电相示，并问予如何答复，并要求派员至旅顺与关东都督接洽。予说：“军事组织，以人为重，吾非军人，现需军人相助，须求军事中之朋友襄理，俟予内部组织稍有头绪，再未细商。请公先回电贵国参谋本部致谢。”谈毕而退。

^① 既唐绍仪，字少川；张继，字溥泉。

予为此事苦思焦虑，不得善法解决，乃至民国五年六月六日袁氏死信电报到沪，予闻之大喜。当驰赴唐处一面谋袁死后对黎继任后如何对付；又一面说袁已死，无须起兵再讨，东北练兵之事应即作罢，对日厚意请青木代为致电感谢。

护国军兴后，四〔五〕年春间，奉天廿七师师长张作霖忽然来京，予于陈兴亚欢迎席上与张晤面，张约次日来寓见访。次日张如约面至，予询其来京之意。彼云：“到京看看各方情形，并言当初悔为人所利用，今如有机会，原重造事业，深望公为指教，并愿披诚相谈，但予之住处耳目众多，公不便过访，有事相商可请王左青转达双方意见。”会谈多时，欣然而去。又次日，予约王左青来寓，告以张过访情形，并嘱其访张，乘便询察真象，再定以后谈话方针。王既访张，乘便密询张对时局意见，是否仍抱当初袁称帝时通电之主张（于袁称帝前曾通电袁，关以外有反对帝制者，愿以兵讨之；关以内有反对帝制者，愿效前驱等语）。张对王秘密表示：“此次来京，系考察各方情形，当初之电不过门面语，此后有可以为国家出力者，不甘落人后，贻天下笑，但此事关系秘密，愿莲公示我方针”等语。予闻王言，仍不敢信张之言，予对袁之真意不敢表示。经王往返多次，力言可以有利于张者，莫如设法出兵讨袁。予使王对张，以王之〔个〕人意见，说国人大势所趋，南北反对袁，渐趋一致，张如能趁此机会与南北各方携手，亦时势造英雄之好机会也。试以此种话探询张，看其如何答复，观其语言态度是否真确。张对王云：“你所说之话，予甚表赞成，不知吴先生有此意乎？”王云：“吾尚未与吴先生详谈，因不知公之意，故不须与之详谈也。”张云：“请你对吴先生谈谈，看吴先生如何助我成功？”王许与予谈后再报命。王于二日后又与张谈：“谓吴先生闻公之意，甚加佩服，其如何办法，请公定其方略，吴先生可加以意见。”因此，往返磋商办法，允于回奉后

与冯阁臣^①合作，联名致电袁，愿出兵援川。如袁许其出兵，兵行至北京即拥兵讨袁，变生肘腋，大局指挥可定。张虑奉军到京后无饷，予允设法接济。张果如此作去，则护国之举，起于西南，收于东北，可以天下爱国之士一致联合，平定国家大局，日后张在政治上地位必可一日千里，不只得东三省地盘而已也。张氏异常赞同，商量以后办法，又多次请王佐卿随伊出关，以督进行，并商量予出京在津策应。乃张到奉后为其秘书袁金铠将所定之计划破坏殆尽！以为出兵之举殊属冒险，不若就地将奉天将军段芝贵驱逐，起而代之，拥有奉天地盘，坐视国内成败，较为便利。张纳袁说，立悔由王传达与予所定之计划。袁并诱张以复辟之举。予此时已到津，王派人将内情函告与予，问予有无转圜之法。予此时与进步党合作讨袁世凯，袁金铠为进步党员，谋之于梁善济，可否派进步党党员与袁金铠有交情者赴奉，以资转圜袁金铠之意见。由梁推举进步党之参议院议员李素先生去奉见袁金铠，劝其与国内讨袁派一致行动。袁金铠大不以为然，且约李素与张谋面。袁金铠当张面要求李素加入复辟同盟者，以威胁之。李怵张威，不得已签字加入复辟同盟，当夜即出奉天返津。回津述说在奉情形，尤为惶恐不安。王佐卿在奉因此暴病，在南海医院静静，不到一月气愤而亡。是亦袁称帝时代国内讨袁史中一段趣事也。

民國五年（1916年），丙辰，四十四岁

贛宁之役失败后，党中孙、黄诸公均驻日本，谋乘机再讨袁。此时孙先生立中华革命党，即今国民党之前身；黄克强先生立欧事研究会，即政学系之前身。本党不能再如旧日团结，前已

^① 冯德麟，字麟阁，辽宁海城人。为陆军28师师长，拥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三等男爵。

言之。兹为讨袁事，孙黄两先生均莅沪，而各标党帜，仍如在日。予与唐少川先生对孙黄两先生皆为好友，论现在党籍，既不在中华革命党，亦不在欧事研究会。予与唐先生主张，应将旧日国民党重新团结，加以严密组织，重振旗鼓，以谋再起，不可自行崩溃。予与唐商之双方，均不认可。当在黄浦江边某外国饭店赁房数间，从团结旧日国民党议员入手，非旧日国民党议员能与合作者，亦请其参加。组织多日，旧日党员既有多数，商之孙黄两先生，将旧日国民党招牌挂出，至于如何组织，愿听孙黄两先生之主张及党员多数意见，公决后再定党纲，以资共守。而孙黄两先生坚持不以为然，而议员多数赞成予之主张。予与唐耗数月精神付于流水，可为一叹！使旧日国民党不能复兴，此为真正原因。而现在国民党名称虽同，而党纲与前党迥不相同，此为一般国民党人所共知者也。

孙洪伊者，前进步党众议员〔院〕议员，袁称帝时来沪，发表反对帝制言论，极为激烈，渐与孙先生接近，时人以小孙派称之。彼创毁党造党之说，拟联合反对帝制各方面人，造一大党。昔日之党籍，不再计较，其言持之有故，听者亦为动容。但倒袁是国人应分，而政党系各政治家对国家、对社会、对外交各有特殊之见解，不能冶为一炉。故一时合作则可，而合为一党则不能也。小孙派脱离进步党，创立民友会，表面与中山派合作之处甚多，与后日成立之政学会，两方极不相容也。

汤化龙亦进步党之干员，因讨袁脱离进步党，与梁启超合作，名为政治研究会，其政治上之主张与日后政学会多相提携。袁死后，予因国会议员回京，对于党事召集旧日本党同人开会讨论十次以上，以为用国民党之旧称，孙、黄既不同意，如前所述，而旧日国民党议员多数愿旧日同志仍在一齐合作，不得已暂称为益友社。益友社之范围，包括孙、黄及予与唐三派，合而为一。主持社事者，除予以外，推褚辅成、王正廷、张继为常务委

员。其余仍按国民党组织，设各部及主要干事。此时孙中山派与小孙派合作，而政学系又与小孙派相反对，而两派又同在益友社内，因此，不免稍有意见。于是政学派之领袖李根源、张耀曾、谷钟秀等，对予表示不离开益友社，但彼等要求不与小孙派往返，否则虽不脱开益友社，而自己另组一个政团，请予原谅之。双方坚持，予无法，遂不得不听其另组政团。彼所组织之政团名之曰政学会，所拥之党魁非黄克强，乃前清末年老官僚岑春煊也。此事未发表以前，黄已声【明】加入益友社，且对益友社补助党费。

张伯烈等，民初时名在进步党，及进步党成立后，张等脱离进步党，称为老共和党。此时老共和党之议员名称未改。

江天铎亦为进步党议员，孙润宇系国民党议员，彼等联合称为共和建设讨论会。此外尚有改称政团名称者，以其在议会内无特殊势力，故不表出。以前所述各政团，系袁死后国会到京开会政党大概变化之情形也。

袁氏死后，黎元洪依法以副总统继承大总统，段祺瑞以拥有北洋实力故为内阁总理。黎大总统派人赴沪，密以唐绍仪为外交总长，孙洪伊为内务总长，张耀曾为司法总长，以农商总长征予之同意，予以谷钟秀讨袁在沪办报，劳苦功高，故推谷为农商部总长，自谢不敏。汤梁二氏以入阁无望，梁派门人黄旭初赴京，秘密运动段不恢复国会。海军闻不恢复国会事，以立法无机关主持，约法等于具文，因联合全国海军发表宣言：（一）拥护约法，（二）恢复国会。如中央内阁不纳其言，则海军与中央脱离关系，以讨毁法之祸首。此项海军宣言后，段祺瑞闻之大恐，不得已而从海军之请，下令召集国会，于五年八月一日在北京开会，以海军宿将程璧光为海军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司令。段对国会因此更加仇视。梁启超即不得入阁，遂来京与段联合，专作仇视国会之举。

本年八月一日国会在京开会，予患疝气，而汤化龙因事稽[稽]留湖北，未出席。众议员同人，于袁氏解散国会后，对汤充为教育部总长事甚为不满。此次国会恢复，汤又迟迟不来，因于开会之日表决举予为临时议长，多数通过。派人来予寓，促予出席就职。予对来者同人说：“汤尚未辞职，现在请假，依院法可以副议长代理，不能另举临时议长，此事与院法似有出人，予实难从命就职，请将此意转达同人，并由院中秘书厅促汤速来京。”本院秘书长来见予，予亦以上意告之，请其促汤速归。旋汤不出十日回京，此段风潮始息。

予在卧病期内，黎派秘书黎少平（系予之同学）来述总统之意，请予为湖北省长。总统并云商之总理，总理尤为同意，如予同意即发表等语。段亦派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来予寓，亦述此意，盼予同意。两院湖北议员均主张予同意。予对各方来访者，均谢之，自称才力不胜重任，俟病愈后再商。不久湖北督军王占元亦派参谋长来京欢迎，予亦谢之。此次推予为湖北省长之原因，可分述之如下：（一）总统及湖北同人之意，以王占元盘踞湖北，总统之力量无可如何，表面欢迎予为省长，而其实则欲予与王占元相争，为湖北人吐气。（二）段祺瑞以予在京拥有国会多数同志，为其眼中钉，肉中刺，无法去之，今畀之以不甚爱惜之省长，则可在国会中去一大敌，而省长又为内阁所管辖，彼时去就，可以一令以决之，故亟亟欲予去鄂。（三）湖北督军王占元在鄂虽属专横，而表而对予欢迎，而骨子里以予为文人，赤手空拳，何能与军阀相抗争。表面之欢迎，可以得总统、总理及予之欢，而实则不过尔尔！因此党中同人尤不赞成予之外就，以致在京党中无人主持。

予病愈后，见黎总统，将其内幕揭穿而谈，黎闻言为之忸怩。及赴院与段晤面，谢段厚意，段仍促予同意，并说：“以总理之力为公帮忙，望公为国宣劳。”予笑对段曰：“予为议员，

专攻法律，现在各省军人专权，省长权限久为督军所霸占，公能将省长遗失之权收回，仍归省长管辖，予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此事公不必问我去否，只欲自问能否收回省长遗失之权柄，方有商量之余地。”彼无言以对。予并说：“各省政治纷乱已久，公柄国政，应力图振作，不可久任军人专横。倘能如此，某愿为公助之。”言毕而去。

黎元洪以副总统依法继任大总统，所遗副总统之缺，应由国会组织总统选举会再行补选。未选举之前，须将经过分次叙述。段为内阁总理，与黎总统极不相能，内务总长孙洪伊在内阁会议时，又每每与段冲突。唐绍仪为外交总长乃总统之意，段又惮唐之声望在其上，故对唐亦不满意。唐来北方就职，到津下船，住利顺德饭店。段暗派人至该饭店，见唐面加侮辱，且令其私报馆对唐尤加毁谤。天津地方官不加禁止。唐受此意外侮辱，遂决意辞职，不赴北京，即行归沪。因此国会同人对段大为不满。孙洪伊遂唱〔倡〕联冯倒段之说，派人赴沪见孙、唐二公，力主联冯。孙唐两先生感其说，亦以联冯为得计，并派人来京，要求益友社同人一致进行。大意谓众议院不久改选，国民党各省支部既未设立，而国民党同志又均在野，将来众议院选举，如无大有力者为其后援，于选举必大受影响。今孙洪伊主张冯国璋加入国民党，而国民党对冯以副总统报之，实为便利。故由孙先生派胡汉民，并约唐少川赴宁；在京益友社派张继到宁，与唐、胡二先生对冯一致协商。于是双方协议结果，所定之条件：（一）冯国璋加入国民党。（二）将来众议院改选时，冯国璋当以人力物力极力协助。（三）现在京之国民党员不受酬报，一致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双方签字。及选举副总统前，冯国璋派人来京接洽，由益友社将南京协定条件对全社同志宣布，大多数同意（然有一部分政学会之议员拟举岑春煊）。而段派则反对此举。段派在议会内无力，而平日与段联合之研究系又为冯国璋所吸收，不以反对

冯为然。总此数因，冯国璋遂骗得副总统到手。而冯、段因此益为交恶，但对唐、胡、张三先生在宁所签之字，冯亦不履行之。军人无信，令人生叹！

唐辞外交总长后，黎以伍廷芳继之。段以孙洪伊在内阁，极不相容，不数月，孙遂被段排出内阁，而辞内务总长矣。

民国六年（1917年），丁巳，四十五岁

本年春德国潜水艇政策日益迫急，击沉美国商舰“路易亚纳”，非交战团体之妇孺死伤甚多。美国国人大动公愤，总统威尔逊徇国人之意，对德始而绝交，警告德国，而德国不悛，仍用潜水艇战略。美国遂对之宣战。未宣战之前，驻华美使芮恩施于某日下午请王正廷到美使馆谈话。据王正廷【向】益友社报告：“美国希望中国加入协约，对德先绝交，绝交后再宣战。中国既加入协约国，中国对协约国以往所损失权利，可趁此机会收回，美国愿从中斡旋，并可担保。请王将此意先向贵党（益友党）说明，如贵党赞成后，并盼由贵党派人分向贵国总统及贵国内阁说明此意，请贵国政府与议会方面一致进行。”王将此意报告本党后，由本党推予、王正廷、褚辅成、张继四人分向总统及内阁接洽。次日午前予等先向总统陈述对德绝交之意，并将美公使意见说明。黎总统闻言，甚不赞成，后复讨论许久，其意始为明瞭。彼乃谓：“如总理赞成，国会并能同意，予当不为反对。”次赴国务院见段总理，陈述如在总统府之言。段闻言反对甚力，并说：“绝交后，德国绝不能采纳中国劝告，势必出于宣战。中国弱国，焉有对德宣战之力？”予等曰：“中国加入协约国，宣战虽无力，而绝德国在中国活动，亦足减其势力。且因此可将国家多年损失之权利，可以由此收回，实为一绝好机会。如总理赞成此举，可先派人与美国及各协约国之公使说明此后中国对德方针，盼各公使斡旋，可使中国所损失之权柄，担保日后收回。如

协约国各公使能有切实之声明，为将来收回权利之担保者，则政府可提出绝交案送国会通过后，一方对德严重劝告及宣布绝交；一方向协约国各公使再提出正式要求，战后偿还中国已失之权利。如协约国各公使有正式公文声复，则政府作宣战之预备。且各协约国亦明知中国国力不能派兵至欧洲助战，如吾国对协约国要求协助战费、器械，中国亦可借此练兵，将所练成之兵再运赴欧洲助战。一举而数利兼备，无便于此者，请总理不要过虑。”段又虑国会对伊多次反对者，恐提出绝交案不能通过。予等担保谓：“此事为国家大计，国会同仁为拥护国家权利起见，绝不能对总理所提之案不与通过，吾等可为担保。”谈数小时，反复讨论，段意为动，乃说：“吾与各阁员再行讨论后，然后再行通知诸位如何办法。”

隔二日，段约予等赴院再谈，声明内阁愿意提出绝交之文，请诸位帮忙。绝交文书先到众议院，投票表决，出席议员五百人以上，不同意者只十数名而已，几乎可谓全场一致。参议院亦将此案通过。政府对两院同意绝交案后，一方筹划与各协约国公使接洽办法；一方忧虑将来提出宣战案后，恐两院不能如今日之易通过；且外省督军如冯国璋、张勋等，亦皆反对对德事件，将来更难措手，邀予等至国务院协商日后对付办法。予说：“冯、张皆为国家重镇，其反对此事原因，或者因不明真象所致。总理应将此事经过及将来此事办好，国家既可在协约国占有地步，又可藉此收回措失之权利。^①想冯、张二公如明瞭内情，或者不致再有反对之行为。”段虑去人游说，恐冯、张携有成见，不易说入。予说：“吾为国家，此事以个人资格自备资斧，赴南京、徐州一行，不敢说有成效，或者误会为之一减。”段闻予言，甚为钦佩，早日成行。予遂于数日后先赴南京，承冯招待，以其府中

^① 此处疑有脱漏。

西花厅为予下榻之处。在南京住五日，每日晚膳后冯来予住处倾谈，往往至夜半后始去。（因日间予在南京有他处应酬，故不得与冯详谈）。初谈时，冯对段大加批评，对之甚不满意，及闻予谈对德事件，极为诧异予为段来南京作说客，笑谓予曰：“吾弟向来反对段某，与余意见甚为相同，何今日对德事件反助段来游说兄耶？”予答曰：“兄知其一，不知其二。予反对段为国家，今日赞成对德事件，亦为国家，现在及将来计，故不得不与段暂为合作。如段反对对德之事，则弟为国家计，不能不反对段，以倒其内阁。今日段之对德，系从弟等之主张，不是弟等服从段之主张，此点不可不知。其经过已为兄详细谈之，何反有此误会耶？且吾国家所失之权利，不有此等机会，何从收回？弟等对德完全为国家，非为段也。今日段赞成弟等之主张，故弟实为国家帮忙，非为段帮忙也。如段假此对德事件另有他项作用，则国家所损失之权利既不可收回，专为段某一人树势力，则弟等今日之赞成，将来难免反对。愿兄留意弟所谈话之程次，以作将来之应付。且弟今日来谒吾兄，因请吾兄对此案赞同；但赞同之后，尤请兄监视其后发生他项变动。”冯闻言立悟，连称是是而曰：“老弟所虑，甚为深远。吾此后先赞成绝交，并预备设法监视其后，将来有变动时，吾必赴北京一行也。吾弟可多在南京盘桓数日。”并问予再到何处，予对之曰：“到徐州见张绍轩（即张勋）。”

予向不识张绍轩，冯闻予赴徐州，拟派员护送，予一笑谢之。未动身之前，致电张，谓定于某日搭某次车赴徐，晋谒左右。张复电欢迎。予至徐州时，张派其统领张文生（字兴五）在站候迎，导予至某旅馆暂住。张文生对予说：“绍轩大帅派予倾驾，因大帅有客，未能到部，甚为抱歉。”予笑谢张大帅派人欢迎，并为张统领道其劳驾，甚为谢谢。同时有徐州众议院议员王茂才闻予来，亦来站欢迎。是晚宿于旅社。次早，由张统领陪

予至张绍轩督军处。彼此初次晤面，各致客气。张大帅说：“久闻先生大名，今肯过徐见教，甚幸。吾于清末在贵省驻扎多年，至今怀想旧游，尚存萦念。”予答曰：“督军在奉驻扎时，吾正在北京大学堂读书。日后回奉，奉人对督军尚有去奉之思。久闻大名，恨无机会早来拜谒。今由南京来徐，专诚拜聆教育，甚望督军彼此开诚畅谈，实为荣幸。”张说：“吾是武人，既不明政治，又不谙法律，闻公在京领袖议会，实为钦佩。今不弃过我，亦愿披诚指导。近日来有衍圣公在徐，为宪法孔教事，请予相助。予一介武夫，对宗教吾不明白。今吾设宴为公迎风，并约衍圣公作陪，并请就便对衍圣公详为解释宪法上对于宗教之意义。公初次来徐，徐为中国重镇，古迹甚多，望多住数日，将各处古迹一一游览。且公在京甚忙，不能久居徐州，如有见教之处，请于饭后详谈，勿存客气。”午间张备宴欢迎予，坐间有衍圣公及王茂才，并有万秘书长作陪，甚盛设也。饭后，张留衍圣公与予谈孔教事。予对衍圣公曰：“孔圣人为吾中国万世之师表，其道德、学问、文章可谓冠绝古今。但孔子系政治家、教育家、哲学家，而非宗教家。何也？盖世界所有之宗教皆有一种不可改动之仪规，人其教者，必须遵守其规章，不可改变。而孔夫子则不若是也。宪法为国人五族所共守，若定孔子为国教，则不信孔教者，则不能谓之为中国人。如中国人不守中国宪法，又失其为国民之地位。所以各国皆是信教自由，其义如此。不定孔子为国教，非小视孔子，乃尊孔子也。如定孔子为国教，则不信者必起反对之心。数千年后怕孔子遭人反对，岂非定法者之错误乎”等语。衍圣公亦无言可驳予。张大帅在旁对衍圣公曰：“汝对我说的滔滔不断，而我一窍不懂。今吴先生对汝所言，何不加以辩驳？且予闻吴先生所言，实觉宪法会议顾虑周到，望以后勿为此事对予多加纠缠。”衍圣公旋辞去。

于坐中无他客时，予对张始讲北京政府及国会对德绝交经

过，予一一为之详述，并征其意见。张闻予言而曰：“吾闻人云，公对内阁素反对，今闻君言，何以对段反加拥护？吾对这事意见，不赞成绝交宣战各事。议会既将绝交案通过，吾反对段，不是反对议会，此后应当如何，请公为我一一指陈。”予曰：“吾对段之反对，因段主张与议会不合，故反对。今对德是国家百年大计，吾国受各国之侵略，如无有相当机会，仅凭国力，无日可以收回所损失之权利。如今加入协约国，所损失之权利可以有收回之望。为拥护国家权利起见，故对段放弃旧日对段之意见，实于国家前途有莫大之利益。再进一步言之，请督军切为注意者，此次对德之事，予等为国家奔走，非为段奔走，此一点要分别清楚。如段此后于对德之事发生变化，则吾为拥护国家权利，不能不再反对段。请公于此最后点一并注意。”张曰：“内幕甚复杂，吾不知内幕，故率直言之。今闻先生说对德事件，吾可表示第一步赞成。果如先生所说，日后再有变化，吾则作第二步反对，此随诸君之后。此事可如上所谈，作为结论，不再另发议论。下午吾仍派张兴武同阁下赴云龙山，古迹甚多，可供游览，并派吾之大□供公乘坐。”予谢之未用。晚间张兴武设宴。

次日张兴武请予阅操。午餐仍由张督军设宴。第三日予辞谢两张，约王议员同归北京。

由宁、徐归京后，即晚与王正廷、褚辅成、张继诸君晤面，报告在宁、在徐之经过，颇为顺利。不知北京近日内情如何。据王等谈：“公出京后，梁启超恰于是时来京，以宣而不战，借端借款练兵，制服国内民党为主旨。如此作去可以名利兼收，并可实行政治独裁，段颇颺其言，正与梁筹商对议会如何提出宣战办法。此信传出后，总统及国会同人均为震惊，极盼公回京商量抵制之法。”予说：“吾今已回京，可先至国务院探段之真意。彼之为人，刚愎质直，真象容易洩漏。果如传言所云，此后再定对

付方针。而大旨不外对伊提出宣战案不与通过。”诸君颇以予言为然。

次日予约王、褚、张三君同予至国务院见段，述明予在宁、徐之经过，两方闻予言后，皆对总理有相当之谅解，惟盼总理于未提出宣战案以前，先将宣战后如何对德作战种种办法，对国会、对各省有一种明白表示。如总理对德宣战之事完全为借机收回国家所丧失主权，此心为国无私，国人皆能赞助。未知吾出京后已有十日，在此十日内，总理是否已将对德宣战拟有成案？段说：“成案尚未拟出，惟对德宣战，中国不练新军，无有实力；若练新兵，中国财政不足，非借款不可。现在中国不过对协约国际作出一种声势。因为无兵无力，质言之，虽宣战，亦与不宣战相同。而借款练兵，又须相当时日，且国会能否承认借款，亦是一种大问题。”予等说：“借款练兵，所练之兵若纯为对德宣战而用，不含对内作用，则国会当能体谅总理意思，对借款案可以加以援助。但总理应当将如何练兵，练兵需用若干款项，所借之款如何专用在练兵上。总理既谈到此种问题，可谓深谋远虑，盼同时将各案作成草案，先与各方讨论，然后再随宣战案一同送议会议决。如宣而不战，又要练兵，又要借款，恐国人不明总理真意，不免发生疑虑。甚盼总理将上述各问题一一有切实表示。不然统将宣战案送之议会，而议会势必问总理如何宣战，彼时势必发生枝节。”段曰：“吾对各案仓卒不能提出，如果对我发生疑虑，是国会对我不见信任，则吾对国会大为失望矣。盼诸公对议会为我切实声明。”予等曰：“吾等对总理所谈之话，亦甚剴切，且此事当初发动是在吾等，总理既纳吾等之言而提出对德绝交。绝交之案，又对总理大多数同意，是政府与国会并无隔阂之处。此时所虑者，总理误听人言，不免发生幻想，将来对德宣战案不免生出暗礁矣。”段闻予等之说，色为之变，予等辞出。

予等辞出国各院，乃赴总统府见黎总统，问段总理对德宣战

案曾否对总统有所商承。总统答曰不知。又问梁启超为段划策，总统有所闻乎？总统曰：“曾有人来传言，但确否不知。”予等乃请总统以后对德宣战事留意。言毕遂辞去。

段闻予等之说，亦甚虑将宣战案提出众议院不能通过，于是在国务院开茶话会召请议员茶话。两院议员对段与梁所秘商之事亦有所闻，开茶话会时，对段所表示对德宣而不战之事颇不以为然。于是段见议员多数情形，甚为窘急，密派其弟子靳翼青^①将军与予等磋商对德宣战之事。靳所发表之言论，仍与段之政策不相上下，往反协商多次，不得头绪。此时，南京冯副总统派宪兵司令陈雪暄（调元）来京，表面为斡旋此事，而骨子里为调查真实情形。陈与靳表面合作，周旋各党派之间，斡旋此事。因段仍坚持对德宣而不战之政策，所以各党派对段亦不让步。此时国会正开宪法会议，讨论地方制度章。梁暗从段召集各省督军来京会议，以宪法所定地方制度不合各省现在情形为词，来京干涉宪法会议，而骨子则为对德宣战。以各省实力威胁国会。于是各省督军纷纷来京。督军团大放议论干涉宪法。国会同人对此亦为愤恨，抱定对宪法地方制度章绝不受外力干涉，为之让步。而督军团在北京开会，本非自动团结，乃受政府之指使。于是对发表通电领衔之人，凡稍有知识者，均不愿冒此大不韪，互相推让，不愿领衔。放结果以孟恩远领衔。予与孟为多年老友，阅其领衔电报，往见之，问：“四哥，对宪法你懂得么？为何来领衔？”孟说：“那个王八旦不认识宪字，他们不领衔，教我领衔，我就领衔，我懂得什么是宪法？况且此电报为你们议员林长民所作。”言罢哈哈大笑。予闻言，亦为之绝倒而去。督军团对宪法之干涉既无效果，而对德宣战又不欲与闻，著名督军如冯国璋、李纯、

^① 靳云鹏，号翼青，山东济宁人。袁世凯死后属皖系，位列段祺瑞“四大金刚”之首。

阎锡山等暗自出京而去，留京者不过数人而已，仍为政府奔走对德宣战案。于是不顾国会意旨如何，过信梁某之言，悍然不顾，乃将对德宣战案提出众议院。又开茶话会一次，仍无结果。汤与梁本系一党，又夙附合段。彼时汤为众议院议长，竟将对德宣战案列入议事日程。而众议院议员白逾桓等受德公使之运动，竟作根本反对宣战言论，与大众反对此案之主旨毫不相同。开会前一日，段与督军团及秘书长徐树铮等密谋，将北京军警改穿便衣，号为“公民团”，聚有数千人，由西四牌楼至城外虎坊桥，将众议院包围，准议员入内，不准外出。而议员对此情形至为愤怒，开会时，议员请议长用电话请国务总理出席质问。段竟来院。议员又一方面令众议院守卫用武装看守，不准假公民团闯入。段到众议院出席，当由议员质问：“国务总理是否尚有能力维持北京秩序？何以公民团竟冒然将议会围困，而政府置之不问。”段答云：“予归国务院，即下令驱散该团。”议员说：“请你在众议院下令，命军警驱逐公民团，否则彼此均在众议院困守，彼此均不得出院。”段受严重质问，不得已众议院即刻下令调步军统领马步队、警察厅侦缉队，即刻将所有假公民团驱逐竟〔净〕尽。总统府闻信，并派消防队一营来院。移时三方所派军队一齐出动，马步队用杆子，消防队用机〔唧〕桶〔筒〕，均尽力驱逐假公民团。彼时领假公民团之某将军、与带队军官彼此均系熟人，不便面对，乃向城墙抱头而立，被马步队之杆子击打无数下，又被消防队之机〔唧〕桶〔筒〕浇湿，如落汤之鸡。不久，假公民团鼠窜而逃。假公民团既散，段祺瑞亦离院。众议院照常开会。由某君提出：“对德宣战案为本院所赞同，但须俟政府改组后再行议决。”多数议员以某君所提之案请议长用投票法表决——蓝白票，赞成者白票。表决结果，多数通过某议员所提议，对德宣战案遂于无形中停止。而段之内阁既为众议院所不信任，总统次日据众议院复文，遂将段祺瑞国务总理免职矣！而各省督

军团因段免职，亦皆出京，段亦来津。以外交总长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

段免职后，继任国务总理之选，黎初欲推荐王士珍（聘卿），先对国会同人征求意见，众皆赞成。黎请王至府，而王不去。黎亲身至王宅访王，王辞以病不见。黎又派员赴王宅，与王说总统想借重王，王坚持不就，往返磋商五六日，又不能再延，遂征求李经羲同意，黎遂提出李为国务总理于众议院，请求同意。众议院多数同意，参议院亦同意。段祺瑞免职后，赴津与徐世昌及梁启超、汤化龙等与段派督军等，在津组织参谋处，以徐为大元帅，对北京政府大加攻击；一面又约张勋来津，密谋复辟，双管齐下，声势甚赫。北京大为震动，因此李经羲不敢就国务总理职，而正式国务总理遂行虚悬。

五月廿八日众议院开常会，副议长陈国祥主席。开会后报告汤化龙议长辞职。此时汤正在津参谋处。议员闻其报告，大为愤慨，对汤辞职表决，大多数通过汤之辞职。此时副议长对汤辞职案表决后，即拟退席，议员等恐陈退席后议会无人主持，众议院将无形搁浅，遂将议场门封闭，并要求陈不准退席，取出选举票，选举议长。陈不得已复席，以本日即投票选举议长议题付表决，多数通过。遂取选举票，依院法分散与各议员。议员投票毕，举出监票员开票。在场议员三百数十人，予被选为众议院议长，仅差七票未能全场一致。开票后，大众欢迎予立时就职。予赴演台，对诸同仁先发表意见：“予于国会多难时间，承诸位见爱，大多数票选予为本院议长，予对诸君厚爱，不胜感慨。今日国会之危急，可谓至矣！诸君举予之意，必以予能担负救济重责。予能否担负全恃诸君能否与予从此合作下去。如能，时局总[纵]有困难，予随诸君之后，亦能挽救。若不能，将以此重大责任仅令个人负担，予诚惶诚恐，无此挽救能力。故予今日是否就职，不必问予，要问诸君能否与予合作到底。”众大喊云：

“请议长就职，以后虽赴汤蹈火，必随议长合作到底，请议长速就职，不必顾虑。”鼓掌之声雷震。于是陈退席，予就席。

次日与黎总统晤面，黎为予道贺，并云：“时局艰难若此，吾兄为议长，彼此可望合作，庶乎有挽救时局之希望。”予云：“余受命于艰难时期，对国家危局不得不勉副同仁之期望，就此重任。吾与总统多年共事，望总统抱定坚忍不拔之主义，应付难局。予虽不才，敢竭微诚，以随总统之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彼此抱定救国卫法之至义，彼等虽凶顽不化，最后胜利仍归吾辈。今与总统约，总统抱尽总统应尽之责任，予抱尽议长应尽之责任，如遭不幸，为国而死，决不屈服彼辈。将来后人，以吾等为国而死，必能为吾等铸铜像，以为永久纪念，作后人之典型。总统以为何如？”总统云：“只能如此，吾不退后，皆坚持到底。”彼此欢谈许久而散。

不意段将张勋诱至天津，扬言进兵北京，威逼总统，解散国会，谣言日盛。政学会及研究系各派议员劝总统勿听予言，速将国会解散，免同受害。两系议员且有多人提出辞职书于两院，以张声势。黎为利害所动，遂以两系议员之言为然。两系议员又云：“议员如能全体辞职，总统不用解散，则国会自然解散，比总统解散更妙。”黎益惑其说。日夕约各派议员至府，劝其辞职。于六月八日晚膳后，黎又请各派重要议员，至总统府会议，而以王士珍为总招待。议员未到齐以前，先由王述总统召集来府会议之原因，并言：“徐、段、张之势力甚大，诸君必须辞职，如国会尚在，此事必不得解决。将来彼等晋京，君等必遭受惨祸，不如事先辞职，免招意外。”议员闻其言，均愤恨不已，咸鄙王之为人，不与理论。约夜间八时，被请议员到齐，总统在居仁堂接见。未开言之前，总统面色极为忸怩，首述：“诸君非辞职不能解此危局，吾不愿诸君受祸患，故劝诸君辞职。否则予被迫，予必解散国会”等语。议员推予答复其言。予曰：“总统在

约法上无解散国会之权，今总统公然以解散国会威胁议员，不顾违背约法，总统自问，在法律上将来能否免国人之裁判乎？吾辈为议员，只知在法律上立论。为法律所不许者，无论有何种势力，皆所不顾。总统能为总统者，为有势者所推举乎？抑为议员依法所选举乎？且总统之立脚，在法律之上乎？抑在有势力之上乎？今为自己利害，一切不顾，则总统在法律上亦负有违法之责任。不知自责，反来威吓守法之议员，窃为总统之羞也。在总统听无识之人鼓〔蛊〕惑，以为国会消灭，总统地位即可稳固。依吾等观之，今日无国会，明日总统即被驱逐。吾辈不识人，误举屈伏势力之人为总统，吾辈对国民实为抱歉。总统既不知守法，愿如何便如何可耳，何必与吾等相商？吾等不愿与不知守法之总统再谈救国卫法之事。今日之事，两言可决：总统知守法，虽受逼迫，不敢解散国会；总统不知守法，腴颜屈服势力，则由总统自为之。言尽于此，请总统自决。”

有韩玉辰（达斋）者，发言为总统辩论（韩为参议院议员兼总统府秘书）。参议院议员汤漪君立叱之而说：“韩君今日发言系以何种资格发言，如以议员资格发言，韩君不要忘了约法，如以秘书资格发言，此时系总统与两院议员会议，总统府秘书无列席资格，请韩君退席。”韩君面赤而退。同时并有多数议员对总统加以指责。黎亦无有力之言论。至夜三时而散。临散时，予对黎曰：“吾等回去，静候总统解散命令。此后如总统仍抱解散国会主义，则请总统不必再召集吾等会议。昔日袁世凯如彼专横，尚不敢违犯约法公然解散国会。不意总统为民国首义之人，不顾约法，屈服势力，以求保全自己地位，如此卑鄙，殊失首义人之资格，不胜为总统惋惜！”黎闻予言，更为而赤忸怩。

又次日，予即检点国会重要文件，命秘书分科登记，携至六国饭店。予亦移至该饭店来住，议员来住者为数亦夥。来至六国饭店之前，予与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先生晤面，问总统如违法解

散国会，则总理能否违法副署。伍说：“吾为创造民国之一分子，约法为民国根本大法，总统如解散国会，吾决不副署，吾亦从此辞职矣！”

六月十二日，黎元洪违法下解散国会令，伍廷芳辞职。黎元洪特任步军统领江朝宗为代理国务总理。江氏为无识之军人，不知法律为何物，贪慕虚荣，竟徇黎之私意，违法副署，并以代理国务总理资格下令北京军警，在东西车站及各处严加搜查，不准放予及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出京。

黎下令后，派其秘书黎澍至六国饭店见予，并送予以聘书，请予为总统府高等顾问及洋壹千元。黎澍为予北大同学，予笑谓之曰：“吾不想黎总统昏庸至此，约法未赋与总统解散国会权，黎岂不知？以袁世凯为人之专横尚不敢违法公然解散国会，而以藉口取消国民党，令国会无形消灭。乃黎元洪为保全自己地位，竟敢违法行此！在彼之思想，盖以解散国会，必得对方之谅解，可以保全其现在之地位。不知国会今天解散，转眼黎之地位即行摇动。今复派老同学送予聘书及钱，岂非笑话。请兄将聘书及钱均交回黎总统，并请将予之言告之，请彼即速预备开步走。请兄速回交差，改日再见。”黎澍于是将聘书洋钱抱头鼠窜出去。

次日，江朝宗派侦探一人住六国饭店，侦察予及同人之行动。王正廷同予住于一室，夜间商酌，由王先设法赴津，如能平安抵津后，再来电话通知。至依计而行，次晨三点钟由东便门出城赴通州，到通后乘船赴津，两日后始平安到津，来电话报告平安。予于六月十九日早三点钟，正大雨倾盆，乘轿〔轿〕车由汇文书院携妹丈张子仁赴通州。到通州住协和医学校，由学校主事人代为雇船赴津，并派学生六名随予来津，沿途谎言暑假率学生赴津旅行。两日抵津，寓于德义楼。予先于夜八点钟正晚餐，出六国饭店告侍者：“如太太来六国饭店，可请太太照料屋内各种东西，住此可也。”予抵津来电话，内子始派予之侍者及予之

秘书等，携行李来津。至津后租英租界球场道安裕里口外六号为住宅。

此时张勋之兵渐由徐州移于津京之间，风声鹤唳。黎觉自己地位难保矣！七月一日张勋在北京复辟，拥请废帝溥仪；大发上谕，大封与闻复辟各方面人。黎元洪避人东交民巷某使馆。是日午间，张继（字溥泉）来见予，谓段芝泉（棋瑞）派范静生、刘霖生二人来见张氏，谓彼二人奉段命拟见予、蔡子民及张溥泉三人，国家遭此大变，宜放弃旧日间隙，同心协力，共讨复辟。如在北方失败，段愿与诸君同行南下，共图后举。未知能否与其合作，请张氏将此言对予先容，请予定时约范、刘二氏一同晤面。予闻言大喜，对段此举极端赞成，请张约范、刘二公，定一地点，予再约蔡，共同协商。张约范、刘，予去德义楼约蔡，午后二时在予宅晤谈。届时范、刘及蔡同来，当协商与段携手，共讨复辟事宜。并对范、刘二君表示，如北方讨复辟事失败，南方已派海容、海筹两军舰北来，吾等同段南下。此后对国家，站于一条战线上，可以长期携手。范、刘闻予等之说，极端满意，并云即归回复段氏，及约二日后午间仍在予宅会晤。届时下午二时，范未至，仅刘来，乃告予等说，段之主张合作，梁启超、汤化龙二人极端反对，不赞成与国民党合作，劝段取消原意。段已纳其言。同时予等及许静仁（世英）、张敬舆（名绍曾）皆反对梁、汤之说，而主张大合作，但段受彼等之蛊惑不纳予等之言。现段已赴小站誓师。范静生愧对诸君，嘱予代为致歉。刘将段言述毕而去。予与张、蔡二公，甚恨段受梁、汤之蛊惑，误国甚大。段氏从此不能与国民党合作，造成护法之役。多年纷争，十数省大受糜乱，梁、汤之罪，不容诛矣！

正谈话时，接上海孙中山及唐少川两公来电，嘱予速去沪，将津事交蔡、张二公办理。予接电后，即派人至太古行购船票，于七月三日搭顺天丸去上海，于七月七日至沪，寓万国议员通信

处。即往见唐少川，据唐云：“中山先生已于六号乘海琛赴粤，留汪精卫在□〔沪〕接洽，电兄速来申原因，乃为与海军定约事件。此次国会解散后，海军由各方面接洽，第一舰及其他各军舰已有十数只，愿同合作。惟海军主张有三事：（1）护约法，（2）护国会，（3）拥护合法总统。与中山意见不合，调停结果，此事取决于国会。而国会现在又不能开会，惟与两院议长协商妥协后，方能签字去粤。现在沪仅有参议院副议长，故望先生早来，解决此事。明日下午在孙中山先生宅开会。此中内幕，莲公不可不知。现已派海容、海筹二舰赴津，接黎总统南下。”后又述段讨复辟事面散。

次日在中山先生宅集合海军要人，协商海军南下事宜。海军代表发言：“海军所主张三事，为此次护法之根本条件，不能修改。中山先生在沪时，所主张的一切办法，与海军所主张不同。现吴议长南下，是否吴议长之主张与中山先生相同？”予闻言起面言曰：“吾昨日到沪，中山先生已先一日赴粤矣！未及与孙先生晤面，彼如何主张吾不得而知，请海军诸公详细谈之，使予明白，然后可以详细答复。”汪精卫曰：“孙先生临行时，嘱吾为代表陈述意见。孙先生此次出来护法，以国会意见为意见，绝无自己主张在内。现在吴议长已至沪，王副议长亦在座，请两议长发表意见，以便与发起护法诸公共同讨论。”予言：“予之意思，以护法为主点，凡在法律范围内者，国会愿与诸公共同进行。不合法律者，则不敢为之。国家多难如此，诸公皆首造民国之人，能发起护法，吾等实为感谢。而护法非有实力不可，海军创此伟图，尤为公正合法，吾等对海军诸公表明态度，景濂绝以法律追随诸公之后，违法之事则不敢作。想王议长对予言当能表有同情，面诸君亦必赞成予等之说也。”王儒堂表示予之意见即彼之意见，不再发表意见。海军代表起立质问予：“吴议长之说，吾等极为佩服，若依所说，极愿签字，但有强迫公以违法行动者，

公能始终拒绝乎？望公有以声明之。”予答曰：“予为议会代表，只知守法，法以外不敢闻命，虽有强迫，决不服从。”汪精卫又说：“吴议长之说，孙先生决能尊重，请诸公不要再为迟疑。”海军代表遂决定签字。即由予与王正廷、唐少川、汪精卫等同海军代表签字。

海军代表有海军总长程璧光、海军司令林保绥〔葆懌〕及○○○，签毕，遂商磋由沪赴粤日期。闻海军第一舰队海容、海筹到烟台后被段祺瑞收买。派闽人史○○赴烟台劝说，后亦无效。由沪赴粤共计军舰十个〔艘〕。唐少川、汪精卫等均乘之去粤。予以船小，畏风晕船，乃搭日船諏访丸。同船者有王正廷、李协和、戴传贤等十余人。予等起程较海军舰晚七日，而同时到粤。

予未赴粤之前，闻北京段祺瑞讨复辟军已战胜，张勋逃往荷兰使馆，黎亦在某国公使馆。北京秩序由段担负维持，而元首无人，段与黎又极不相能，不愿请黎复位，段派专员赴南京请冯国璋以副总统资格来京，依约法上大总统选举法，请冯继黎代行大总统职权。冯闻予有赴粤之说，先派南京造币厂长某君赴沪劝予不必去粤，并为予送洋三千元。予对某君说：“冯如不去北京，在南京召集国会开会，予可不赴粤。冯如去北京，则如人瓮中，将来必有后悔之日。冯、段既不相能已久，今段急，故派人迎冯，请冯不可为段所愚。望君将予言代达，所送之款并不敢受。”某君云：“我人微言轻，吾不敢对冯直陈，可否请议长另派员赴南京与冯而商。”予允之，当派众议院议员李有忱同某君赴宁，转达吾意。予派人去宁之议，王正廷君亦同意。隔二日，冯复派边守靖来沪，仍劝予不必去粤。予当邀边在王正廷宅开会，请边恳切劝冯，不可为段愚弄，贸然迳赴北京。冯如不去北京，吾与王等同人缓行赴粤。边亦以予等所说为然，乃即日回宁，并约“如冯能听忠告，彼必来电报。”乃边回宁后，冯不听

予等劝说，迨自赴京，与段合作。予与王等遂搭船赴粤矣！

张勋在荷兰使馆，段困之甚急。张说：“吾之复辟，段祺瑞首先签字，今狐埋狐掘，如再逼吾，吾将签字簿用照像机拍印，宣告国人。”段闻言大恐，遂纵张勋从荷兰使馆出京。

段之讨复辟，人皆知之，而段与张勋勾结复辟，国人知者甚鲜。此事为张勋秘书长万公〔绳〕栻对予所言。段之阴险反复，误国卖友，可为痛哭！此事关系甚重，不能不补记于此。

予乘漱访丸赴粤，途中致电粤督军陈炯明、省长朱庆澜，告其吾等赴粤。予到香港时，朱派专员二人持函到港欢迎。予等在港住一日，闻海军于某日到粤黄□〔埔〕，予等另搭别船同日到粤黄埔。到黄埔时，中山先生亦早在黄埔居住。粤中大吏如陈炯明、朱庆澜来黄埔欢迎，并设欢迎盛宴。即夜同王、李协和等赴广州。李协和约予住其司令部，在广州农事实验场。次日粤中老友欧阳荣之闻予来，为借广州大巷口烟游楼二楼为予驻粤办公之地。王正廷住广州男青年会。予隔日去拜谒陈、朱二当局，并谢其到黄埔欢迎之厚意，并谢陈先有电报欢迎予等到粤开会。予对陈谈及：“督军去电欢迎予等来粤开会，予等已到粤，此后如何进行，仍盼大力协助。”陈闻言，唯唯不谈究竟，并对予之送迎执礼甚恭。虚伪之气，现于表面，予心中为之浩叹。粤中省议会正议长谢已元先生来谈：“吾候诸君来粤久矣！粤当局陈公，所以去电欢迎议长等来粤原故，系因广东番摊开赌原故，粤中断赌已久，番摊之开，表面为筹军饷，实在粤督另得酬谢费二百万元，省长六十万元，省议会议长四十万元，吾意从此赴南洋，不愿在粤与陈督共事。故于去粤之先，不得不将此中经过为议长一述之。”予闻之爽然！

予既知陈督内幕，因对陈督益加详密侦察。隔数日，广州各民众团体在东园外欢迎国会、海军、中山先生到粤大会。是日天雨，到会者有八九万人之多。陈、朱二当局亦到场。观陈对孙先

生之态度，非常冷淡，益信谢已元所言不虚。予不通粤语，请黄君某翻译予之演说。开会约三四小时而散。李协和演说大意谓：“吾等今日在粤开会，谁使之，皆北方人不知爱国，故北方政局紊乱，法律无效，国会□□〔解散〕，皆由北方人造出罪孽”等语。

予答辩大意谓：“予名吴景濂，众议院议长，系东北奉天人，为纯粹北方爱国者。李君刚才说北方人不知爱国等语，予代表北方人说，绝对不敢接受此言。诸君细想北方握有政权者，段祺瑞为安徽人；近日张勋复辟，倾复国体，而张氏为李君同乡，江西人也。朱启钤为贵州人，梁士诒是广东人，施愚四川人，其他各部总长多数为南方人。昔日大总统袁世凯是北方人，而广东人在北京开会欢迎袁，说他是广东省东莞县人，系袁督师之后。可见袁完全是广东人，不是北方人。你们南方人不能在南方管教他们，而令彼等至北方作孽，搅得北方政治昏暗已极。而首先受害者，为北方人。北方人抱一肚子委屈，无从说起，今李君反说北方人所作之事，此非颠倒事实乎？故予于答辞中，不得不首先辩明”等语。台下鼓掌之声不绝，并口呼“袁世凯不是广东人……”

李闻予言，面赤，并对予道歉，予付之一笑。于护法声中，忽有南北之说，可见国人对南北意见不能消除，亦国家前途之隐忧也。明达如李协和君，而竟有此种言论，可为一叹！予到广州，两院同人于数日内亦到有百数名。中山先生派人设招待所二处：一为长堤海珠酒店，一为迴龙社。所来之同人，多半在此二处居住。借广东省议会为开会地址。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公议合两院议员组织国会非常会议，两院议员皆为国会非常会议议员。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法，由二院同人起草，起草后议决公布之。推予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同组织一秘书厅，以为国会非常会议办公机关。公议组织军政府，为护法行政总机关。军政府组织

用合议制抑用单一制，是时颇有争论。结果，采用单一制。孙中山先生欲为军政府之大元帅，然海军方面首倡反对，滇桂方面亦不同意。调停之说，于大元帅之下，设三元帅，以为大元帅之副。于是于某月某日开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会，选举孙文为大元帅，又选海军领袖程璧光、桂军领袖陆荣廷、滇军领袖唐继尧为三元帅。

中山先生当选后，于某月某日由黄埔来省城，到国会非常会议会所就职。国会非常会议制定大元帅印及大元帅证书，由予代表送与大元帅。大元帅当即宣誓就职，并摄影以为纪念。

军政府暂假黄埔设立，军政府所有各部部长经中山先生选择多日。初中山先生由黄埔来省住西濠酒店，约予为内政部长，王正廷为外交部长，恳说再三，予与王君咸辞谢之，于是聘任予为军政府高等顾问。此时各部长：（1）唐绍仪外交部长，（2）伍廷芳财政部长，（3）孙洪伊内政部长，（4）程璧光海军部长，（5）张开儒为陆军部长，（6）胡汉民为司法部长，（7）汪精卫为秘书长。各部长发表后，仅陆军部长张开儒一人就职，其余诸君均未就职。其故因三元帅选出后，（一）海军元帅程璧光以当初海军南下，在上海签定协约时，所定条件与现在所行不相符合，坚不承认，将证书及元帅印即时璧回。（二）陆荣廷对国会派人送元帅证书及印不与招待，并将证书印璧回。（三）议会派议员代表赴云南送与唐继尧元帅证书及印，唐对去员欢迎备至，亲接出四十里，招待尤为情义并至；但对元帅证书与印，以海军程、桂军陆既不接受，故亦不接受。以此重大原因，广西督军陈炯明系陆荣廷代表，陆既反对中山为大元帅，故陈炯明于中山在议会宣誓就职时，不亲到场，并不来贺。因此各方面情势，军政府遂孤立无助，所以唐、伍、胡、汪四君，亦为势所迫不能就职。中山不得已以章太炎为秘书长，而章氏素有疯子之称，本为文人，不明政治，在军政府与秘书厅各职员亦颇有意见不合。中

山先生于国会派员赴滇时，因派章太炎代表赴滇，实为驱章于大元帅府，以免其再为捣乱。

张开儒为云南陆军师长，率滇军一师人住广州，以有武力故就职。但其武力，薄弱，陈炳焜蔑视之。张之秘书长崔文藻对军政府颇为尽力，迹近招摇。某日崔在西濠酒店请客，为陈派兵捕去，解到督军署即与枪决。因此军政府与督军署两下极不相能。予尽力为之调停，迄无效果。

中山先生以军政府设立于黄埔，往来省城甚不便利，某日率卫队将广州城外四门土场占领之，遂迁大元帅军政府于此。因此陈对中山益为歧视。广东旧有江防司令兵舰数十只，某日，中山先生将江防司令兵舰占领数只，于夜间十二点后，中山先生在军舰率领参军多人，开炮攻打督军署（在观音山），炮数十枚，声震城廓，人心惶惶。陈督在观音山虽有要塞炮台，恐人民受炮火之灾，未还一炮。

次日天明，程璧光约予为孙、陈调和，予同乘海军舰至四门土场与中山晤面，问中山有调和意否？中山曰：“吾与其信，而彼不复，故以炮击之。如彼为予赔礼，则予亦愿和平了解。”予与程又到督军署与陈晤面，陈云：“彼无故以炮击我，我并未还炮，吾何能为之赔礼？”吾等劝陈“为地方和平起见，请派一代表到大元帅府，彼此情意疏通，可免地方糜烂。”陈允之，遂派员至军政府道述复信迟慢原因。

陆荣廷本系中央特任两广巡阅使兼广东督军。其中年时代在南宁及武鸣居住。广东督军之事，陆委派陈炳焜摄行职权，遇有重要事件，须请陆示，始能办理。中山同予等在广东护法，陈炳焜不为助力者，系承陆之命令而为。陆虽对护法不表明态度，然对护法举动亦不积极反对。其在南宁时，予曾迭次派议员赴南宁说陆，陆不肯表明态度，对护法事置之不谈。段祺瑞在中央，以陆表面虽不助护法党人，然陆并不用兵将党人驱逐，段深恨之。

湖南为两广门户，段首先将谭延闿免督军职，撤消两广之门户，始而任命张敬尧，继而任命傅良佐为湖南督军。陆闻信，亦大感威胁。此时湖南陵零镇守使刘建藩宣布独立，段祺瑞又免陆荣廷两广巡阅使及两广督军之职。陆闻命更为愤怒！昔日广东护法方面迭次请陆响应，而陆均置之不理，今闻段命，乃密电驻广州护法各方重要人物，刻日来梧州与陆会谈；陆亦由南宁刻日到梧州。予亦被邀，陆并电陈炯明派专兵舰并派陆军数十名护予至梧。予至梧时，各方要人亦均到梧，陆于次日早亦到梧。陆到后欢宴各方来人。宴后派其秘书长崔香甫专约予及胡汉民，与陆秘密会议。会议中最要事件即商榷出兵湖南，决定派谭皓明为总司令，并因陈炯明在广东与护法方面不甚融洽，撤伊回桂，参赞谭皓明之军务，以广州镇守使莫荣新继陈之后任。并助国会每月经费一万元。世所请梧州会议者，其重要事件即如此。

梧州会议后，予回广州。据言吾去桂后，中山又用炮再击陈炯明。莫荣新就督军职后，亲至中山元帅府，陈述此后合作之意见。

陈炯明时代，广东省长为朱庆澜（子桥）。省长所管辖省防军有一百卅营。护法酝酿之前，陈炯明借口军政统一，将省长之省防军拨一百一十营归督军管辖，留二十营为省长卫队。朱受陈这愚弄如此，久后明白徒唤奈何！其所留二十营卫队，司令一缺，予劝朱请陈炯明充之。陈为广东辛亥起义时广东首任都督，今屈就省署司令亦不得已也。然有大义存焉，朱与陈亦皆密契于无形。陈就职后，予劝朱曰：“君在粤为省长，在此时局之下决不能久，以前多数军队已为桂系拘去，所余残余二十营，不如送与粤之志士，为造将来复兴之基础。今君去粤亦可留一大纪念。”朱甚以予言为然。遂拟定去粤，并于未去之先，以二十营人付与陈炯明，其饷需由予与莫督协商。陈炯明率军队驻扎汕头，每月由粤督军署拨给二十营之饷。不意未开拔以前，又被李

协和抢去五营，陈与李大起冲突。予之会计科长欧阳荣之系粤之护沙统领，甘愿陈李两方面不起冲突，以彼之军队尽数拨陈炯明。陈炯明率此二十营赴汕尾驻扎。蒋中正为陈之作战上校参谋，在汕尾昼夜训练，卒成精旅。日后不出三年，陈炯明始用此兵占福建漳州，继用此兵恢复广州，消灭陆荣廷桂系在粤之势力，并用此兵占领南宁、武鸣，将陆氏在两广之势力一概消灭，迎中山先生由沪回粤（此民国十年事也），建成伟大之事业，皆始于此。

莫荣新就粤职之初，对中山先生尚为恭顺，后经杨永泰等之调唆，渐歧视军政府，与陈炳焜情形相同。中山对之大愤，于某日夜间中山又用大炮攻打观音山督军署，此时伍廷芳、唐绍仪已来粤，尚未就军政府部长之职。中山先生炮打莫氏之次日，陈炳焜、伍、唐及予均出面为孙莫二氏调停。莫氏受调停，派专员至军政府道歉。然两造已极不相容矣。

国会在粤，仅中山先生对议员发给一个月津贴，每人一百元洋，次月即无有。然议员诸君嘱予设法接济。予商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允之，而其会计廖仲恺口惠而实不至。次月予商之于广州地方审判厅厅长陈英，借其解中央之司法款。陈对予说：“将此款借与君则可，君借与非常会议则不可。”乃借三万元发给议员，每人仍一百元。第三月由会计科长欧阳荣之在市面上借洋二万余元，发给议员。为议员津贴事，予如坐针毡。后与中山先生详细讨论军政府、国会、海军三项经费，议定非有底款不能支持。因想广东盐款每月解中央甚巨，若将盐款除去关余借款方面外，尽数扣留，每月有数十万元之多，足可支持此种局面。当与盐务稽查所英人商议，英人请英国领事出面反抗。军政府不允，非扣留不可。后调停结果，英人要求将扣留之款有确实用途清单，经英方认可方准扣留，并要求盐运使由广东公正巨绅推举出人担任之。当议定每月扣留盐款，军政府五万，国会十七万，海

军十五万，地方省政府七万。由唐少川推举参议员李茂之（粤人）担任盐运使，所收盐款依明单支配，不准任意拨付。此协定经中英两方面签字实行。国会有此经费，遂决定召多数议员来粤开宪法会议。

朱庆澜将卫队交陈炯明后，遂大宴宾客告辞离粤。朱离粤时，经费支绌，赖有商会会长陈廉伯接济五万元，始克启行。继朱之后者，为李耀汉。李为人接近桂系而兼通北京段祺瑞，以无实权，故均漠视之。

民国七年（1918年），戊午，四十六岁

梧州会议，既决定由两广出师援湘，以谭浩明为援湘总司令，以程潜为前敌司令，遂誓师出兵。傅良佐在湘，闻风先逃。月余时间，前敌军队已占领岳州。武汉震动，湖北督军王占元闻信恐惶，欲去武汉。鄂西镇守使黎天才亦举义旗响应。段祺瑞在北京得信更为丧胆。于是派龙济光密赴广东扰乱，广东江防军舰近百只，如数为龙济光收买，开出广州以后，并勾结香山陆军统领袁带在香山独立，并分兵在广南阳江肆扰，此地驻防军林虎彪水面逃，莫荣新在广州闻信大震。遂求护法军李烈钧带滇军赴阳江督战，并恳求海军总长程璧光派海军追击江防兵舰。海陆军出发所需开拔费，莫荣新不能如数付给，海陆军因此迟迟不行。广东财政厅长曾彦（桂人，参议院议员）知非常会议秘书厅有存款，向予商借五万元。予因事急，不能开会，然大义所在，遂负责拨付曾彦五万元，以济其急。滇军至阳江大胜，龙逃。江防司令部潜逃之军舰，悉被海军拘围。惟有保民军舰，系旧海军改造者，为铁甲船，逃赴雷州。程璧光派其姪程耀烜率队追之，至雷州将保民船获得。夜间保民船乘防守松懈，逃入东京湾。袁带军队不久亦为李烈钧军队歼灭而逃。总之，广州军事，即援湘军事，节节胜利，正护法军发展之期。

不意广州于二月廿六日发生一大惨案——海军总长程璧光为护法元勋，在下午八点卅分钟于海珠码头为刺客暗杀——使护法军正在发展时期而遭此惨变。最令人遗憾者，始终未将刺客拘获，令程公含冤地下！至今思之令人痛心！

程被害详情，另有专籍不赘。然于此变发生后未久，援湘军队又无故溃败，言之令人一叹！原程潜湘人也，虽为国民党而隶于政学会者，对护法之事，不甚赞成。向日对陆荣廷事甚为奔走。此次为援湘司令，其用意别有所在。岳州为程潜率兵占领，程潜即屯兵岳州不再北上。程遂去电谭浩明，要求发表伊为湖南省长。谭不以为然，复电斥之。程得复电大愤，因对其所率部下说：“王占元率北方大队来攻，吾辈之力，不能对抗，应回长沙，免徒牺牲。”乃拔队连夜回长沙。抵长沙后见谭则云：“此军甚多，迟来则为所祸。总司令亦应率兵而退，迟则不堪设想！”谭闻言不加考察连夜奔退。在湘南某地渡湘水时，兵士争渡之，甚至将湘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挤至桥下，落水而死。过桥后，察点人数，始知刘建藩落水而亡！护法局面遭此挫折，为之一变。

程潜退出岳州三日后，吾友白逾恒由鄂西黎天才处返湘，至岳州，见空城一座，并无北兵一人。渠述程当日退兵情形，及谭闻程言张遑逃走之情形，为之扼腕不置！

盐余截留之事，既经协定，国会方面，每月得此巨款，公决在广东召集合法国会，开宪法会议，将宪法议决。此议决定后，因派议员分赴沪、津、京三处设总招待处。来粤议员，路过三处者，发给川资，并通信分告各省议员，请其照议决日期来粤，并召集两院旧日得力职员来粤。将广东议会会场，略加改造；并于广州大沙头旧工程局改为众议院院秘书厅。其南有官房一所，改造为参议秘书厅，未及三月，来粤议员已过半数以上。参议院开会，举林森（子超）为议长，王正廷仍为副议长；众议院举褚

辅成为副议长。两院足法定人数后，将非常会议停止。国会于是在粤正式开会矣！但开宪法会议，出席议员仍不足法定人数，不得已议决照院法开会，凡一个月未出席者除名，以候补议员补充之。于是又设法召集各省候补议员出席。惟候补议员来粤者，须有同乡议员三人证明，方能补缺。于是未出二月，已足宪法人数矣——两院共约七百五十人以上。于某日开第一次宪法会议。于开会时，林子超请予为主席，当发现假议员一人，系汉人冒充西藏议员，乃奉北京政府命令来粤，调查国会在粤开会情形。予于开会时见假议员某君，乃冒西藏议员某人之名，该人到粤后，秘书厅以该员系旧议员之名，未加考查，即将议员之徽章发给，故该人得以出席。然予对两院议员认识最多，曾记某君于张勋复辟时，中流弹而死，何以又能来粤出席？当即派秘书，并携同来粤西藏议员某君，向该人质问，该人不能解答，即欲逃走。因秘书将情形报告，予即派守卫将该人扣留，并将情形报告大会。公决即由守卫处派穆中和巡官，至该人居处，会同地方警察检查，检出与北京政府通信函件甚多。伊供称系奉北京政府派来者，遂将冒名假议员某人送立法院审讯，依法办理。

此时到粤议员之党派如左：

（一）中山先生派议员在照霞楼开会，因称为照霞楼派议员，小孙派即（孙伯兰）亦附于此。

（二）予与王正廷及褚辅成派议员在褚寓开会，因称为褚寓派议员（即北京之益友社派）。

（三）政学会派议员在石行会馆开会，因称为石行会馆派议员。

三派议员，各在上所开会之地点开会。照霞楼派一百余人；褚寓派五百余人，政学会派议员百数人而已。其他尚有极少数议员不属于此三派者，然若与某派接近，则于开会时，至某派之开会地点。

北京政府闻信，大生惶恐，时时设法以破坏之。然冯、段二人交恶，极不相能。段派组织安福国会，本为选段为总统之预备，因冯国璋反对，段派多握有安福国会之实权，而亦不敢举段为总统。于是冯、段二人相约共同下野，另举徐世昌为安福国会非法总统。冯、段于是均去职。然段祺瑞不甘心，乃向日本借巨款练兵（如参战借款、军械借款、森林借款等等），自称为督办。

广州军政府中山先生当选为大元帅后，除陆军部长张开儒就职外，其余各部长如伍廷芳、唐绍仪、胡汉民等均不就职，而程璧光又遭暗害。陆荣廷虽对援湘用兵，而亦不就军政府之范围。军政府在广州，孤立无助，一事不能举办。此时伍、唐二公已到粤，然以环境关系，仍难就职。长此下去，势将瓦解。伍、唐二公因与胡汉民、汪精卫协商，将军政府改组为合议制，添加人数，以厚势力。谋之于予，予说中山为护法首义之人，军政府如改组，应先得中山先生的赞成，然后再议草案。于是伍、唐、胡、汪等，在海珠海军办事处起改组草案，改大元帅制为总裁制；总裁七人，由七人中举一人为主席，其余六人分担各部要务。草案起成后，由伍、唐、胡、汪送呈中山先生核阅，经中山先生批准，交非常会议，议决改组。伍、唐、胡、汪将中山所批之原草案，请予阅看后，择期开会。予将原草案留在予处，以便与各方议员协商。乃中山派议员，不悉内幕情形，谓予创议改组军政府，有意驱逐中山先生出粤之嫌疑。于是中山派议员纷起反对。予以伍、唐等所交之草案，令彼等阅看，议论始为安靖。然不谅予之苦衷，仍在愤恨，谓予不应当为之开会，真冤哉枉哉！协商多日，始拟定七人为总裁：（一）孙文，（二）伍廷芳，（三）陆荣廷，（四）唐绍仪，（五）唐继尧，（六）林葆懌，（七）岑春煊。

开会之前，予接匿名信不下百封，皆系恫吓之词，咸谓如予

开会改组，皆对予大不利。于是议员诸君，先议决以守卫四人携枪随出入，为予护卫，免遭不测。开会之日，并派守卫严行监视旁听人。开会结果，改组案与伍、唐、胡、汪原定之草案，不相出入。所选出之总裁亦如原拟。选出后，岑春煊由沪来粤，孙、伍、唐、林已在粤，惟陆荣廷在桂，派莫荣新代表，唐继尧派王伯群代表，均就职。就职之日，岑氏得票最多，为主席；中山先生于就职次日赴沪，派胡汉民为代表。

国会开会后，军政府的态度暧昧不明，以军政府主席岑春煊对北方有暗行勾结之行为，对岑不满，于是不用正式公文与军政府往还，以表示不承认之意。

北方冯、段交恶，安福国会不举段氏为总统，而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徐定国庆日就职。岑春煊于十月六日在军政府宴请国会议长及各方军政要人，席间岑演说：“徐世昌将于十号就职，军政府在粤，应有表示，惟军政府至今国会尚未承认，如何表示，应当大家研究，诸君以为何如？”在座无一人答复者。岑又对予说：“公与林君为国会代表，军政府之地位，至今尚未承认，将何以处之？”予正容对岑说：“国会盼军政府诸公将护法旗帜显明久矣！今先不必问国会是否承认军政府，先问军政府对徐世昌十号就职是否承认？如国会对军政府承认，而军政府对徐世昌不表显明态度，则国会对军政府大失望矣！今主席顾虑之点，应当反躬自问，如军政府能与国会行动一致，则国会承认军政府并非难事。今问主席及各总裁对徐世昌十号就职态度，请先表明。”岑答曰：“徐世昌十号如就职，军政府必下令讨伐之；国会能否付军政府讨伐之权，望诸公明以告我。”予曰：“主席及诸总裁于徐就职之日，能下令讨伐，不生变化，则国会可以提前（在十号前）承认军政府。”岑曰：“如徐就职，吾必讨伐；如食言，吾决去粤，不再恋位。”大家闻之鼓掌。予曰：“在座诸公闻岑主席之话，当必佩服，吾定于八日开会，必将岑主席与军政府之

态度说明，请国会即日承认军政府。如岑主席失言，则神明共鉴。”于是岑立而言曰：“如吾失言，则吾不属于人类矣！”（原因——政学会在北京，为岑与徐、段勾结，徐、段谓岑至今国会尚未承认，无力转圜西南大局，不愿与岑勾结。而陆荣廷以谭浩明败兵回桂，又不欲再出兵。在粤各方均知岑受桂系胁制，如今岑奋发，或者护法前途转机亦未可知。故席散后，各要人均同吾到秘书厅，研究岑能否践言。护法前途能否发展，在此一举。）不意十月八日国会开会，多数承认军政府。即日将承认案咨送军政府。乃岑将承认咨文骗到手后，政学会要人冷御秋（名遁）为内政部长，张群为岑之副官长，彼二人力劝岑不可于十日下讨伐令，岑谓：“吾已宣言，岂能自食其言乎？”彼二人仍力劝之，劝岑于九日称病。原定国庆日国会议员与军政府各总裁在军政府开庆祝会，届时议员多人已到军政府，而岑氏装病不出，并嘱冷御秋代表道歉。

予年于十月九日下午已闻岑为政学会之冷、张二氏所包围，宁可失言而不发讨伐令。及期岑又装病，所以讨伐令未得发表。予在国庆庆祝会演说两小时以上，力述岑之非。回秘书厅后，大病三月。而岑从此亦称病不见客，对北方之勾结日甚矣。因此之故，遂有南北议和之举。南方议和总代表为唐绍仪，北方总代表为朱启钤。

南北委派议和代表之前，国会两院议员既足宪法会议之人数，遂在粤开宪法会议，以继续北京宪法会议之草案。而关于宪法中之最扼要者，为地方制度一章。在北京会议时，政府反对地方制度，所以召集督军团及对宪法会议。黎元洪怵于督军团反张勋之威迫，故有非法解散国会之举，致使两院同人在粤树立护法之义帜。此次在粤开宪法会议，仍继续在北京之前案。宪法会议同人之本旨，原冀在粤将宪法议决宣布，以了法律上所负之责任；又一方以应国人希望宪法成立之愿望。

自民国二年开宪法会议以来，宪法起草委员会所起关于宪法地方草案，取分权制。袁世凯当时力加反对，所以唆使各省都督，由黎元洪领衔，干涉宪法。袁死，段祺瑞当政，又以地方制度与中央不便，召集督军团至京，干涉宪法。嗣黎元洪违法解散国会，所以有粤护法之举。此次在粤开宪法会议，同人仍本初衷，继续奋斗。能在粤将宪法制度〔定〕，必须将地方制度草案照原案通过，在宪法会议同人为国为法，奔走牺牲，可告无罪于国人。同人抱此主义来粤集会者甚多。苟无中途变化，原抱目的不难达到。于是开会之后，仍推起草委员将天坛草案地方制度一章重加整理。乃北京徐世昌等闻此信，大起恐慌，于是勾结政学会来粤议员，设法破坏。

查七年九月廿八日开议至十二月十三日共开会若干次，将北京所审议未宪地方制度案，继续审议竣事。以审议完毕之地方制度案，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起草委员六十人，在职者不及半数，乃补选众议员廿一人，参议员十五人），历时一月，由委员会会议决。初本拟一方起草地方制度条文，一方继续开宪法二读会，讨论从前北京未议决之条文。乃因南北政府经国际要求与人民呼吁，请开和议于上海。于是议员星散，以为和议成，则法律问题可以解决，不必在粤议宪也。故地方制度条文，虽经委员会草定而不能报告大会。和议开幕，宪法会议遂为之停顿。

民国八年（1919年），己未，四十七岁

宪法会议在粤制宪，因南北政府双方开对等和议，国会遂因之停顿，同人等深为痛心！八年之夏，复感外交之刺激，内政之纷乱，非宪法制定，不足解决时局。乃由同人再三集议，立大志愿，发宏愿，鼓足勇气，决于最短期间完成宪法，以博最后之光荣。费尽千辛万苦，始于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再开宪法会议于广州。开议之始，亲丧不给假，有病者扶病出席，所以开议两月，

通过若干条文，成绩甚为可观。

乃现居军政府要职少数之议员，谓宪法若成，与彼等对北方政府交换条件、盘踞地盘等等私图不利，遂冒不韪，乃于九年一月六日宪法会议，议事日程为地方制度第十一条至第廿二条，议长接议事日程第十一条第一项开议，讨论终局后表决，结果，出席人数五百九十二人，起立者四百六十四人，已足四分三以上，可决。然以议员徐兰墅提起拟议，要求反证表决，韩玉辰要求用投票表决。公决先行反证表决。反证表决结果一百四十三人，不足四分之一。证明前此表决已是四分之三以上，可决。已届延会时间，遂宣告延会。一月八日宪法会议，议事日程为地方制度第十一条第二项至第廿二条。忽有参议院议员沈钧儒、杨永泰等十六人，众议院议员徐兰墅、陈鸿钧等十六人，谓六日反证表决后，有人再提起疑议，要求重新表决。并以八日议事日程，明列第二项，相率不出席，以示抵制，希望推翻六日表决。

九年一月十一日陈鸿钧等捏造事实，通电全国，同人隐忍，未与申辩。复由林、褚两议长设宴劝告，伍廷芳驰书劝告，然均无效。其详见于吴宗慈《中华宪法史》前篇，宪法会议宣布破坏制宪者之通电。

先是徐世昌于民国七年十月十号就职前，岑春煊骗取国会承认军政府，于徐就职日不下令讨伐，对国会既失信用，而对护法中坚分子亦失信仰。因此国会于民八在粤尽力召集同人来粤开宪法会议，对军政府与北政府往还，取监视态度。岑春煊与徐世昌暗中勾结，国会促其出令讨伐，现不能作到，又恐岑、徐二氏阴谋有不利护法之举，故对二氏往来行为，国会密派员一人驻在北京侦察，以观两方行动，用水线电报通知在粤国会方面。国会接得此项电报，除在报纸宣布外，并开会质问军政府，因此军政府与国会益不相安。北方政府，对在粤国会益加仇视，于是在北京设立经济调查委员会，专收买在粤国会议员，以破坏国会在粤开

会。始而议员受其笼络者尚属少数，继而广东方面，国会于盐款所得之经费又形拮据，不能按时发给，议员因旅费艰难，又被暗中勾结，入经济调查会者渐行增多。于是议员不知自爱者，每月来往京粤之间，实繁有徒。而主持正义者，颇将议员感动，所以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终能在粤将宪法会议开成。京粤两当局，对国会开宪法会议，更加设法破坏。而其中为之穿插拉拢者，政学会议员多数为之奔走。所以于开南北和平会议以来，议员始而借口奔走粤沪，继而以宪法地方制度问题，有卅二人不出席，使议宪为之停顿，数年之心血，为少数图谋权利之分子所破坏，可为痛哭！

唐绍仪为广东方面和平会议之总代表，其在军政府所领之财政部一席，由伍总裁廷芳兼领。军政府经费不足，广东盐余与其方办有成效，而对于关余，又拟进行截留。于是推荐刘公使（前曾在英充公使）赴北京，向公使团交涉截留粤海关关余，交涉三数月，得公使团之谅解，准许粤军政府截留关余。每年约数百万之巨。截留之款，归伍廷芳代理财政部长管理。

湖南督军傅良佐，北政府以其无能，易以张敬尧，并派经略使曾锷，令其部下师长吴佩孚率第三师及三混成旅，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第二混成旅萧耀南，第三混成旅张福来，均由吴佩孚统率之，赴湘征粤。军行至湖南衡州，王承斌等劝吴曰：“天气入霉，再行前进，北方政府接济断绝，南军来攻，势必溃败，不如暂驻军衡州，以观时变。”吴韪其说，遂屯兵岳州不进，并派专员赴广东军政府接洽。北军不南进，南军不北攻，以衡州为鸿沟，各守疆域。以此，两方使者，往来不绝。王承斌为予弟子，派专员以衡州刻王船山全书相赠。吴佩孚与王氏闲时则请师学画竹。吴、王二人，后以画竹成名。

北方政府因吴军与广东军政府往还，对吴益为仇视。所有吴军军饷，不衡衡时发给。而吴之军队在岳，益为困顿。其后吴军

北还，由广东军政府支毫洋六十万元始能成行。所以吴氏军队至北方后，与段开战，主张徐总统去位，其根即潜于此。

上海南北和平会议，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和平条件，重要之点：（一）徐世昌降为临时大总统。（二）第一届国会由粤迁京，开大总统选举会，选举正式大总统。（三）南北军队另定名额，不在额内者，均遣散，开赴边地屯垦。其他另记。北方徐世昌闻信，大为震动，即日将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撤退，南北和平会议由此停顿。

收买赴广东议员之谋日亟，不久徐又派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王揖唐赴沪为北方代表。派王赴沪，徐有两种作用：（一）灭段派在安福国会之势力。（二）派王在沪住爱俪园，对议和延宕，可专就近收买赴粤议员。于是北方收买赴粤议员，在北京有经济调查会，此会之总裁为王迺斌。爱俪园为收买议员机关之领袖为王揖唐。北方对在粤议员与在粤之岑派密商，将经济来源断绝，使各议员在粤不能生活，岑派果行此策。国会系由盐款接济。于是岑春煊将经手盐款之李茂之撤换，委其私人刘某为盐运使，令其对国会经费不发。如此支持，已近三月矣！国会议员生活大成问题。国会在粤，除民意援助外，尚有驻粤海军、驻粤滇军、驻漳粤军。军政府断国会经费以前，先将海军收买，海军不为国会援助。在漳粤军，路远不能为力。仗义直言，只有驻粤之滇军。此时滇军司令病亡。本应由滇唐继尧派将，而岑春煊唆使其私党粤督军莫荣新委其私人李根源为总司令。而唐继尧命令李烈钧为滇军总司令之命令已到，乃李根源不与交待，仍自居为滇军总司令。滇军反对之，李氏乃连夜专车由韶关来省，求莫荣新援以兵力。莫乃派桂军第一师长李善斋带兵解决李烈钧之兵力。李师长为人颇明大体，闻命后派人密告李烈钧。李烈钧闻信，仓猝集其在省之兵约二千余人出省城。李师长再后督师相送，不加畏迫，送至百里外，并派专人告李烈钧曰：“至此以外，非吾辖地，请

公缓缓前行，前途保重。”李师长回省向莫荣新报告曰：“追李不及而返。”莫并派另师追李，李军在北江数次遇莫军，人民皆助李军，而莫军震李军之威，亦未交绥而退。

李烈钧居北江数月，以李根源借莫荣新势力，夺去滇军，然卒率滇军朱培德一师入湘，嘱朱师驻湘西，静待滇唐督后命。李则赴滇与唐接洽。民国九年秋，李率朱师由湘西入重庆，所谓滇军易将风潮。至此国会不能居粤，护法局而为之中变，可叹也矣！

护卫国会之海军为利所诱，滇军为势所迫。国会在粤，数月之久，无生活费维持，因与伍廷芳议谋，将国会移出广州，请伍公亦随一同出粤，伍公允合作，惟俟机以行耳。

民国九年（1920年），庚申，四十八岁

国会宪法会议因政学会议员不出席，即行停顿；上海南北和议，亦因条件不合停止。广东军政府岑春煊等，又仇视驻粤国会，断绝经费。海军既为收买，滇军人又被强夺。国会在粤极无存在之余地，势不能坐听军政府将国会消灭，不得不另筹奋斗之路。前与伍公协谋，双方意见相同。于是计划如何离粤，最后决定离粤后由香港赴云南，由云南赴四川重庆。此计定后，乃缓缓布置。先遣内子率长女孟班、次子吴权急速离粤（大约在三月）。

一面与参议院议长林森、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与重要同志议员协商前定计划，均意见相同，待时分数拨出粤，公议予当先行，伍公继之，林、褚又继之。于四月某日予离粤赴港，不数日均依计划而行，并在港粤各报纸发表宣言，并请粤商人，凡与国会有来往者请来港，以便与两院庶务科清算账目。在粤所留两院议员，仅政学系数十人而已。三年在粤护法成绩，为军政唐当局摧残，未告成功，半途出粤，言之可为痛恨！

从此至国会离粤后，滇军在北江与桂军之战事，遂因之而起。海军护法，因中途改变方针，内部亦发生暗潮，不能团结如初。国会两院同人到港后，有主张到沪后再赴云南，有主张由港即赴云南。云南唐督来电欢迎国会到滇，但国会经费，须自己筹备，因云南无力供给。商之伍总裁，由关余款项拨出一部份，作议员赴滇之用。而常年经费，伍又不能将关余尽数供给国会。因此赴滇问题，人数遂因经费原故，不能踊跃。先派一部份议员去滇，其余到沪再商。

赴滇之行，两院以褚副议长为领袖，予与林议长同赴沪，筹备去行之计算。在港居住二十余日，予同林议长及伍总裁与两院同人离港赴沪。

予抵沪时，唐少川、易次乾、卢信公至码头欢迎，设宴为之迎风。餐后，唐约予至孙中山先生宅晤谈。予与孙先生相别约近二年，彼此叙别后怀想，甚为欢洽。

孙先生出所作《孙文学说》、《建国大纲》之原稿相示。并说明作书宗旨及要点。复问予在粤有何著作否？予答曰：“无。惟于暇时读司马迁《史记》及《大学》，略有所得，可为先生约略言之。人咸谓司马迁仅长于史才，不通达政治。予读迁史，实钦佩司马迁为汉以来之有数政治家，惟后人读史爱其作史之文章，将其政治材料忽过，此大可惜也。”孙先生曰：“何以见司马迁通达政治。”予曰：“读高祖世纪，一言将其所以成功写出。读项羽世纪，一言将其所以失败写出。非政治通达，何得到此地步？高祖世纪曰：‘豁达大度’一语，读史者咸谓写高祖之度量，不知高祖一生成功，即在此四字上。高祖以亭长起身，随其创业者文有萧何、武有樊哙而已！看韩信、张良、黥布、彭越、陈平，皆项羽之臣，高祖能择而重用之，不以其为项羽之臣而疑忌之。高祖成功，在此数人身上。非高祖豁达大度，何能若此！读项羽世纪，项羽有韩信等诸人，舍商不用，仅一范增，尚

不听其计划。人有功当赏者，不赏，反加疑忌。太史公谓其为人刻薄寡恩，此项羽之所以败也。太史公能将刘、项成败重要一点，用一言写出，非通达政治大家，何能如此？吾辈从先生游多年，而至今日尚未成功者，愿先生与景濂等熟读迁史。庶将来或有成功之一日也。”

孙先生颇以预言为是。彼又述：“《孙文学说》大意‘重知’字。《大禹谟》云：‘非知之维艰，行之维艰。’自古重行不重知，其说甚非。今改正重知，凡行不能彻底者，皆由‘知’不能彻底。吾人应当着重‘知’字，此吾之学说，专以‘知’为主点。”予说：“先生学说所论，重‘知’甚是。但古人讲学着重‘知’字之处，见于《大学》一书，其论甚详。《大学》开宗明义，有提出‘知’字，令人注意。如在大学三纲领之下，首先提出‘知止’二字，以为提纲挈领。此下定、静、安、虑、得，皆由知止而起，如不知所止，则定、静、安、虑、得无从着手，即不能行是也。又恐人读此篇，不明其义，复紧接提出‘知所先后’，以教人着重‘知’字。可见古人讲学，亦是着重‘知’字。《大学》一书，为中国儒者必读之书，但多于‘知’字忽略，故于定、静、安、虑、得之功夫，不知着手之处，甚可叹也！今先生重为提出，甚佩卓见。先生学说出版后，学者读之，当得益处不少。古今所见略同，甚为佩服佩服。”欢谈数小时而散。

予抵沪后，即筹划两院议员，一方面由沪赴滇，由此赴重庆；一方面直接由沪赴重庆。无论如何动身，旅费及维持费，均为必要。当由予与林议长向孙、伍、唐诸位先生磋商十余次，始定办法。已赴滇之议员可由滇直接赴渝，在沪议员可迳赴重庆，不必再去滇，以免周折。其经费均由伍先生携沪之关余款内拨付，每人发给三百元。在沪是美商隆茂船，由沪直航重庆。因隆茂船之航行线，向由宜昌赴重庆，此次到沪修理船，故得乘便包

雇其船。决议后，一方通知云南两院同人，一方电商四川督军吕超、省长杨庶堪，得吕、杨之复电欢迎。予同林议长及两院议员遂定于九月七日由沪启行（九月十一日，长女孟班赴法留学）。

此时北政府靳云鹏为内阁总理，湖北督军为王占元。王闻予等搭隆茂船过汉口，电北京内总理，请示是否截留。靳复电由王主持，中央不为过问。王亦默然。予等行之汉口，有友在王占元处供差，来船上告此消息。最奇怪者当隆茂船抵汉口，夜间停泊，适有英国长江水师提督船赴万县巡阅，是夜亦停泊在予船之旁。王占元等讹传予等所乘之船，有英国水师提督亲身乘船，来为保护，益不敢正视。

船行至夔门，有护法军总司令蓝天蔚及王天纵率队排列两岸来欢迎。蓝、王率军官到船上表示欢迎之意。船主为开香槟酒以饮欢迎来员，停泊约二小时始启碇。后二日船至万县，有住万县基督教会领袖英人数名，持名片上船谒见予及林议长，诣见之下，申述来见之意，谓“万县向由滇军驻守，今滇军调走，易以川军，其司令官为张冲，自接防以后，军队骚扰居民，人避其祸，纷往教堂避难，教堂地方过小，何能容下避难人民，商船均停泊，不能运货，民怨沸腾。两院议长路过此地，两岸船均停，能否到重庆后，请军事当局更换良好军队来此。吾为外国人，来中国甚久，不忍睹中国人民受苦，故上船申述下情”云云。

林议长通英文译其语告予，吾二人答英代表说：“诸君厚爱中国人民，甚为感谢，吾等至重庆后，必将君等意思转达军事当局。能否调换军队，则非吾等所知也。”英人谈毕而去。中国军队无纪律，荼毒人民，可为浩叹！

至重庆之日，驻该地军民长官及商民各团体，约有数千人到码头来欢迎。为予等及议员等并备有招待所数处，以为下榻之处。予与林议长及两院职员等均住商会。商会会场规模宏大，能容数百人开会。惟秋瘟方过，尚有余瘟可怖，满街绿豆苍蝇飞

鸣，令人望而生畏。此时四川战争正炽，吕超及杨庶堪已由成都败至重庆。驻重庆客军，向有滇军、黔军。滇军已调走到叙府，由滇军总司令赵又新统率。黔军驻重庆，由王文华统率。反对吕超及杨庶堪之川军以刘湘为主帅，以熊克武副之。刘、熊之军队，高揭反对滇、黔客军之旗帜，并驱逐勾结客军之吕、杨。滇军在叙府为刘军所败，系赵又新之团长杨森倒戈所致。杨系川人，在滇讲武堂毕业，受唐知遇者。此次刘、熊派人勾结杨森倒戈，故赵之军队在叙府大败，赵因败而被害。此时，正褚副议长辅成率去滇之两院议员，由滇赴川，行至叙府，适川、滇两军大战之时。两方将领，均与国会无怨，双方派人雇船送褚赴渝。褚离叙府次日，赵即被害。褚率两院同人，由叙府赴渝，途中遇匪将船上輜重行李均解至岸上。褚副议长所载〔戴〕之草帽已穿数孔，而人未受伤，亦云幸矣！土匪问褚曰：“诸位是作什么的？”褚曰：“吾们是国会议员护法的，有护法大旗及两院守卫。”土匪闻言，即向褚等抱拳道歉而曰：“对不住，诸位为护法、为国家奔走，来到云南，吾兄弟不知，殊为失礼。”移至岸上之物，复运回船上。见船上有一滇军制服之兵士而曰：“此云南狗也，为吾川人之敌，应即毙之。”牵之上岸，用枪毙之。于此可见川滇人民，互相仇视甚深！然尤可叹者，吾等护法奔走万里，不能令人民了解，而反得土匪之致敬，岂非一大怪事乎！

褚等至渝，将此情形为予详述之。予等到重庆三日后褚等即由滇到此。

在渝军、民、农、商、党机关，于某日假商会礼堂设宴欢迎到渝同人，军事仓遑之时，地主如此盛大厚意，良可感也。并为予及林议长择张家花园为下榻之地。因张家花园距城十余里，往返均须有兵接送，予以其烦谢之，仍与褚副议长居于商会，林议长则往往焉。连日地方各方面之私人宴请者尤多。此时，黔军已拟定全师【开】拔出渝，不与川军开战。惟王文华事前并未通

知，全军拔出后，城内空虚，大为震动，幸有李烈钧调其驻浮屠关军队入重庆城坐镇，人心始定。

某日，有旧友川人吴玉章，改装来渝，见予及林、褚两议长谓：“奉刘、熊派予来见几位议长，请议长速率两院同人离渝，以有两院同入住渝不便率军来攻，故盼诸公速离甚切。”予等见川军内部之纷扰，无力为之说合统一，如不离渝，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乃面允吴玉章，于筹出离渝川资后，即行离渝。请其复刘、熊二公，派人通知厚意。

吴玉章去后，予等即筹款，承杨庶堪省长借洋三万元，而内中有二万元不能取现，幸有商会会长相助，始能支用。恰于此隆茂船来渝，仍雇原船，作离渝之预备。以军事秘密关系，又不能将离渝之内幕为之宣布。内有江西及直隶省议员十数名，反对离渝，将川资领去，仍不动身。一面与李部长烈钧密商，国会两院同人上船后，朱培德师即开拔。两院同人于十月十四日上船，李部长于是日上午出重庆城，其旅长卢梓材启行稍缓，行至南门，与敌军相遇被害。

十月十五日刘、熊两军入重庆，此时黔军总参议袁祖铭，被王文华派人追逐过江落荒而逃，予在船上望见，派人救其上船。十四日夜晚于卢旅长被害，其参谋长某君徒屣到船上求见。袁与此君，偕予等三人为之备船票，载与同归上海。

隆茂船于十六日早离渝，此时只能到宜昌，不能由宜昌到上海。予同林、褚至宜昌时，有人报告：王占元命宜昌镇守使将有不利予及林议长之举。劝予同林离开议员群，先搭船而行，予等趣其言。遂密搭怡和船至汉口，船上无有舱位，住外人船员房间。至汉口日租界迺行旅馆暂住。此时予与林偕仆一人，两人仅有钱十三元，在旅馆吃饭后，林到宁绍轮船公司取头等舱票，夜间乘该船启行。是日午间行至中途，船上账房来收三人票价，予告以到上海公馆去取，付名片一纸，问明住址。适此时予有在奉

天友人孙君炽五，安徽人，在船上相遇，来舱访予。一小时后，账房先生手持洋一百元，两位议长及仆人船票，孙先生已代付船资，并以洋一百元转赠，恐直接相赠，拒而不受。然因予在窘中，故受之。到沪予还款，孙君坚不受。林议长至九江下船，稍住数日，亦来沪。

予到沪，休息一日，即分别往见中山先生及唐、伍两先生，叙述离渝本末，并请指示此后进行方针。予离沪月余，中国两江巡阅使李纯在此期内被刺。而黔督刘显世于近日内被王文华派其部下卢某人黔将刘驱逐。查王文华为刘显世姊之子，在黔师范学校读书未毕业，其舅既授以兵权，使其统率黔军人川，并以其女姪妻之。王为黔军总司令，声势赫赫，乃趁其舅不备，派其部下，取而代之，可谓人伦之大变矣！无怪刘显世旧部袁祖铭派人在沪将王于一品香刺杀之（王文华为滇督驻粤军政府代表，为王伯群之弟）。

黔变未久，滇变旋生。唐继尧又为某部下驱逐去滇，来香港。而驻漳州之陈炯明又率驻漳州之粤军，由漳入汕，由汕入粤，将陆荣廷部下莫荣新等所率之桂军，全行驱逐出粤。而陈炯明亦率军进驻广州，来电欢迎孙、伍、唐及国会等回粤。此数月间长江及西南局势之变化，风起云涌，令人不可捉摸，又令人不可思议。

在沪孙先生于某日设宴，约予及林、褚、唐少川、伍廷芳，尚有唐继尧代表王伯群，与孙洪伊兼国会重要议员二十余人。名为予等由川到沪接风，实为筹划以后应付大局之办法。饭后孙先生报告彼在沪之数月工作。自谓“已与段祺瑞合作，并有张作霖在内。此系段、张投降于吾，诸君不可不知。且以为何如”？予曰：“先生与段、张合作，已成事实，不能加以讨论。但不知段、张两人对先生所主张者系服从，抑尚有协商修改之余地？因违法之事，段氏倡之，张氏助之，数年糜烂，成此局面，今后合

作，如不在主义上着眼，恐将来仍有破裂之日，此不可不加以防也。”孙说：“段、张既能与吾合作，不会对吾主义反对，不可过虑。但看吾辈用什么方法作去。”予曰：“先生对此局面如何作法，请说明。”孙说：“陈炯明下广州后，吾等回粤，不可再用军政府名义，孙伯兰有意见，请其提出讨论。”伯兰之意大致如下：“此次回粤，不再用军政府名义，应由国会组织总统选举会，举孙先生为非常大总统。以此名义号召国人，较用军政府为正。请国会诸君对吾之主张，加以讨论。”林、褚两君推予答复。予云：“以下吾之所说，系吾个人之意见，非国会全体之意见，因不开会时，不能提出全体意见。吾对伯兰先生之主张，不敢赞成，因孙先生之声望，不必假借区区非常总统名义，已足以号召国人。徐世昌为非常总统，吾人反对之，今国会再举非常总统，岂非令彼方反唇相讥，始以大义号召全国，而以利终之。不但不足增孙先生之声望，反是为孙先生之污点。我等意见，此次孙先生率吾等回粤，速将军政府重新整顿，将广西陆系扫灭后，即由孙先生号令在粤护法各军，海陆并发，不出数月，武汉可下，完全占得。武汉如得，长江上下游震动，可以传檄而定。即在武汉召开国会，组织正式选举会，选举孙先生为正式大总统，即在法律上取得合法地位。然后以正式总统名义，再出兵北伐，不数月北京可以归服，岂不较非常总统名义为光明正大乎？鄙人等大概意见如是，如孙先生与在座诸君以为然，再提出详细办法，决定实行。”在座诸同人，闻予言均默以为然，恐孙先生不赞成，不敢发出议论。孙先生主张孙伯兰之说，谓予说为迂缓，不甚赞成。孙伯兰视孙先生之意思，对其主张欢迎，更噉噉力持其说，而反攻击予等为议长不能统率议员一致服从孙先生，致令两院议员忽南忽北，甚以为羞。孙先生因就孙伯兰之说，谓“两院议长对议员如何纠正，此后甚以为虑。此次回粤，应由两院议长对忽南忽北之议员，加以裁判，免使大局受该辈影响”

等语。予曰：“景濂等不敏，议长对议员为平等地位，不是党之总裁，行政界之总、会办，对部下可以进退。孙先生周游世界各国，国会议员，未有议长可以命令者也。如先生与伯兰之主张，吾等不才，不敢奉命。”孙先生说：“如依你之主张，对议员不能裁判，吾辈要此议员为何用？不如改护法为革命较为便利。”予曰：“先生主张护法停止，系一时，抑系此后永久的？如系一时的，尚可以言之，如系永久的，则先生可说，而吾等为议长，则不能说。且以护法号召，而中途停止，天下人其如我何！”此时，唐少川插言说：“法为天下之公器，吾辈不护法，若他方面有力者，假护法之名，号召全国，吾辈又何以御之。”其言含意甚重，全座默然。反复讨论，至夜半，不能得结论而散。

次早胡汉民来予寓，予将起床，胡就予床而言曰：“昨晚之会议，唐少川曰：‘吾辈不护法，若有大力者，假护法名义，吾辈将何以御之。’其说因何面发，是否闻有风说？吾兄与唐至契，能知其底蕴否？”吾说：“吾回沪后与唐晤面数次，未闻其提出此事。昨夜闻唐说，吾亦甚为差[讹]异，其内容如何不知。吾兄为唐之同乡，知唐之底系[细]，较予为深，愿此后如有所闻，便中相告。”胡于政治经验最深，故对唐说深加注意。其后直系果与国会联合，借护法之名，收拾残局。唐言于数年前，不幸而中，可叹矣哉！

某日林议长来予寓过访，次说奉孙先生命，劝予入党，入孙先生中华革命党（即现今之国民党），并以党证书见示。予对林说：“吾自辛亥从孙先生游，改为国民党后，又与孙先生在一党共事，吾于中国国民党以外，不曾入第二个党。今孙先生组织中华革命党，闻不日仍为中国国民党，此予所极端赞成者，闻有数点，极盼孙先生采纳众议修改。修改之点如下：（一）凡政党皆有一定之政纲，自党魁起至党员止，皆服从此政纲，站在一条政纲线上。地位虽有党魁、党员之分，而服从党义，不以地位而

变。今孙先生所组之党，首条即说：凡入党之党员，均服从先生。而对党员服从党之领袖，各国政党皆然。今不说服从党纲，而先说服从先生，万一孙先生百年之后，党员又去服从何人？此时不定明白，将来必生困难，有服从偶像之时代，此应修政者一。（二）此下修改之点尚多，惟以第一点为扼要。大哥（指林先生）与吾为多年患难之交，请将吾之苦中〔衷〕转达先生。甚盼先生能鉴予之苦中〔衷〕，将入党书加以改正。”林说：“吾服从先生多年，对孙先生之是非，不敢妄谈末议，兄之所谈，于吾心亦甚戚戚然。吾必将兄之意转达先生，视先生如何答复。”言毕而去。

次日林又奉孙命来约予过谈，孙见予曰：“君之言，予超尽数见告。但君非吾之党员，不能修改吾之党书。君入党后，吾必设法采纳君之意见，将入党书改正。”孙先生主张以党员资格更改党书，而吾之主张先修改入党书，而后入党。何以言之，因入党后，必须服从先生，无发言之余地。因此意见相左，入党问题为之搁浅，林子超兄甚为惋惜。

陈炯明（字竞存）于九年冬规服〔复〕广州后，来电欢迎孙先生及国会去粤。孙先生在其邸又开茶会，召予等至会，盼予等同去粤，而又责予等对议员严加管束。予随先生去粤，为吾之本愿；但对议员如何管束，非吾之职责所能为。如必迫我为之，我深知才力不及，只可缓行赴粤。予先将众议院文卷交褚副议长携带广州，吾暂留沪养病。盖孙先生如此主张，乃是怨予不赞成选举非常总统之意，故以此相难。予缓行为俟孙先生意见缓和，则可再去。吾从孙先生游多年，避免正面冲突与嫌疑。临行十数日，又在唐少川寓开茶会，唐受孙先生指示，其论调与孙相同。予与唐私交最深，不愿语言发生意见，仍以在沪养病为词，缓同去粤。迨及彼等起行，予并亲至船上送行。

孙、唐至粤后约月余，军政府由孙、唐（唐继尧）、唐（少

川）、伍联德来电，约予回粤主持议会。林、褚等亦来电约予回粤。适予患目疾，又以粤中因选举事，孙先生党徒对两院议员有非礼行动，而陈炯明与唐继尧亦反对选举，予因种种原因，不愿去粤受各方面牵制而发生意外之冲突。遂复电以患目疾为辞，俟病愈后，再行去粤。

民国十年（1921年），辛酉，四十九岁

两院同人在广州开正式会议人数不足，故开非常会议。大约于二月开非常选举中山先生为非常总统，以二百余票当选。予在沪闻友人来信云：未选举之前，国会两院议员有一部分人不表赞同，于某日在东园地方有暴徒数十人，对反对选举议员加以侮辱，打至头破血出，幸有驻东园陈炯明军队来场保护，始行解围。受伤最重者，首推白逾桓，抬至医院，医治月余始痊。此时，陈炯明及唐继尧等对选举极不赞成，但叹无可如何而已！因此原因，在粤议员有许多不出席选举会。中山先生当选非常总统后，对陈炯明竟生恶感。此时，中山非常总统政府任命陈炯明为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粤中兵权及财权集于陈氏一人之身，因此易召众嫉。陈氏率粤军攻下南宁，并将陆荣廷之武鸣巢穴一扫而空之。陆派军人均逃往香港。旋师之际，关心时局者，为孙、陈调解。孙中山亲迎陈炯明至梧州。二人见面，旧嫌顿失。于是彼此商定中山先生以非常总统名义，率其自己军队驻广西桂林。省政及筹划军需粮饷等事，由陈炯明负责。但中山先生左右之人，仍不满意陈炯明，日造诽谤以中伤之。而中山先生对陈渐渐由疑生戒，由戒生设法铲除之心。孙、陈日后破裂，实积于此，容另述之。

广州选举风潮已过，选举事亦过。予在沪目疾已愈，本想去粤，以答孙先生及褚、伍、唐诸公见召之盛意。嗣闻孙、陈内幕，渐起破裂，不愿参与两方之事。因此，广州之行又为停顿。

闷居上海，无聊已极。因生计关系，谋交易事业，以外行赔累不堪。对生活大感困难。

民国十一年（1922年），壬戌，五十岁

是年夏历腊月十二月初十日（十一年一月十日）晚膳，同老妻共餐，炉烟倒出满屋，开窗令烟外散，对面房脊上，有枭鸟长鸣而去，予闻声甚恶之，恐老母在籍发生重病，甚忧，遂不进食。次晨未起床，接镜仲胞弟由奉天兴城来电报报丧：“先母已于十日晚病故。”（民国十一年一月十日）闻讣痛哭，长嚎不已！自思在外多年，为国未成，违离老母，今母病未能侍药，母亡未能视殓，痛哉！继思回籍奔丧办法，又以与张作霖政治主张多年冲突，张数设法不利于予，今如冒然回籍，是否危险，则不敢知。经友人等为予筹划，劝予缓行，先请予嘱老妻率子模回籍奔丧。而老妻适患心脏病始愈，德医柏大夫坚称不可劳动。予力说：“中国父母之丧，不可不回籍奔丧，力请大夫备药。”彼乃备百日之药。予在沪设先母灵位而祭。于旧历十二月廿左右接门生王孝伯师长由沈阳来电，内称：“予奉曹重三命至奉，始闻太师母逝世。见张雨亭，彼云：‘如奔丧回籍，请由大连过奉，与彼晤面为盼。’”予接此电后，甚不以张所说为然，因复王电请转张，内述：“奔丧回籍，不能过奉，请转知张雨帅鉴谅。”电去后，未接复电。

旧历正月十五前后，接命弟信谓先母发丧，已择二月初，并将讣闻发出。予阅讣闻，甚不以为然。但以讣闻发出，无法追回。遂决定于先母发丧前，回籍奔丧，不顾一切利害面行。遂于正月廿后，由沪搭沪宁车，转津浦车北上，至津住一夜，次日搭京奉车回籍。予抵家，抚先母之棺，痛哭不已！亲友闻予回籍，以吊先母之丧而视予。予自先父丧后至今，不回籍已十三年矣。仲弟发讣闻，只限于兴城，远道亲友均未发出。二月初，先母发

引，暂停东关天齐庙。

先母发引后，予守制家居，外省亲友有不知先母已发丧，仍间有来兴吊问者。此时，奉天张雨亭巡阅使与直隶曹重三巡阅使，以梁燕孙内阁总理事，为吴佩孚所反对。吴自与段祺瑞（直皖战争）打战获胜之后，气焰万丈。曹与张本是儿女姻亲。因直皖战事后，徐世昌用梁士诒（字燕孙）为内阁总理。梁夙携〔挟〕奉以自重，对曹、吴不免有抑视之意。因此，吴遂对梁内阁不满意，张又受梁及其部下叶玉虎（恭绰）之蛊惑，对吴亦不满意。积久生出嫌疑，遂将酿成战争。未战以前，曹重三派王孝伯（承斌，廿三师师长）及其弟曹锐（直隶省长）数次赴奉，请张顾全姻亲及友谊上关系，不要以梁、吴二人意见将张、曹旧日交情破裂。而张受蛊惑已深，不纳来使之言，主张坚决用兵。于是王、曹【二】人徒劳往返。张遂日夜调兵入关（山海关）。北京城内有奉军，约有一师，由张景惠率领。新入关之兵，皆驻军粮城以东，气势甚盛。

先母之丧满百日之时，由北京来国会议员数名，约予在北方主持护法事业。伊等并谓：“在京议员，一方联合曹重三，一方连合张雨亭。无论谁胜，皆利于我等。”在家留餐，搭晚车赴奉。

予在家守制过百日后，因直奉战事日内即起，在家多住，势必道路不通，将困居家乡。遂同老妻搭京奉车至津。至津车站，即有梁燕孙总理派人持名刺及请贴约予晚餐。予同老妻至息游别墅，老妻以旅居不便，遂至陈文显家住。晚膳时梁派人派车来接至梁寓。座中有叶恭绰及交通系国会议员数人。予与梁由袁称帝后未见已数年矣！相见寒暄后，梁于是请予及叶至密室相谈。梁问：“莲老自奉来，直奉战争谁胜谁负，已有见否？”予曰：“予此次在家守制，未晋省城。敝县偏僻，往来又无要人。军事极关秘密，岂局外人所能知？”梁再请无忌惮之谈话，彼此不可丝毫

客气。予以主人情殷，遂就所知，无忌惮相告：“奉军比直军，器械人数为多，雨帅又亲身出来指导，从此方面看，气势甚盛。但全军无统一计划，所驻各军之轻重点，又皆倒置，战事不易收效。关于奉军战略与其战策，亦不甚妥。关于战略，奉军当联川湘。川湘出兵，则吴佩孚之后路摇动。今不出此，反与粤军联合，待粤军到达北方，两方战事早已解决矣。对于战策，奉军亦甚疏忽。北京地方甚为重要，而命张景惠（字叙五）守之，请问张是否吴之敌手？如张军在前方摇动，则后方军事必受其影响。闻秘密消息，河南督军赵周人（名倜）有与奉合作之说。直隶方面已派冯玉祥率陕军驻豫以防之。若赵周人（名倜）之军队无奉军之援助，则赵岂是冯之敌手？奉军应拨劲旅驻徐，庶能与驻豫之赵军连络。今不出此，实为可惜。吾之所谈，乃书生之意见。现在张雨帅尚未进关，若奉直战争能和缓，乃奉天之福。殊望燕翁设法调解，不可因欲保全自己地位，使奉军立遭惨败。”梁闻予言，大为恚沮面言曰：“在于〔予〕现在，无法调停战事。”叶玉虎（系吾之同学）曰：“老同学之言，非也，不明军事。吾曾求外人明军事者考察战事，均云直隶必败。老同学与奉天不合作，发生诅咒之言。”吾曰：“叶老同学，吾所言，乃就理上面言，非诅咒奉天。雨帅将入关，不日即将开火，直隶乃大平原，不出两星期即可解决，可观吾等所言之是非。”吾又对梁言曰：“湖南代表杨仲恒赴奉月余，未得见张帅一面。其赴奉之意，乃表示与奉合作，今废然而返。”梁曰：“公何以知之？”吾曰：“杨为吾之旧友，在息游别墅相遇，略谈而知大概。”谈至结论，梁以无力挽回战事。餐后回旅社。

友人张敬舆、边洁卿过访，在旅馆屋内静候。久别乍逢，欢谈甚洽。张在去夏直皖战争后，曾于庐山通电全国，主张和平救国。此时，直奉开战在即，予问张有无救济办法，彼云无之。谈数时而去。

数日后，张作霖进关，驻军粮城。北京奉军由张景惠统帅。驻长辛店之直军，由吴佩孚统帅。奉军开赴长辛店与直军交战，直军为奉军所败，几不支，又无兵可调，正在危急间，陕军师长胡景翼（字笠僧），率军至长辛店，陕军有众六大队，与奉军战，一鼓作气，将奉军驱回北京。胡又率队进逼，张叙五率奉军由北京向京东方面溃败。而奉军第一线溃败后，在中路奉军，由张作相、张学良、郭茂臣（松龄）等统帅。直军由王承斌帅之。王以一师之众，将奉军数师围困，奉军不能溃围而走。奉将韩麟春（充陆军处处长）由军粮城见张雨帅，请设法救出被困之奉军。韩奉命赴战线设法将奉军继续救出。

直军廿六师在小站由曹錕率领，被奉军悉数缴械。奉军自闻北京及中路败耗，张作霖遂由军粮城率兵到滦，以滦河桥为凭险之具。奉军中路溃败之兵退守山海关，王孝伯（承斌）率师退之，奉军出关。王师至奉天绥中县前所，面一日内奉吴佩孚三电，令其不准再进。吴为全军总司令，王为前敌总司令，受吴节制，故不能不遵吴之电令。奉军于是提出与直议和于秦皇岛英国兵舰上。奉派张学良，直派王承斌，会商议和条件。划山海关为守，关以东属奉，关以西为直之境界。热、察、绥三特别区均归直系。当时议和情形大概如此。

吴佩孚战胜后来天津，闻予在津，请张敬舆约予到车站谈话。张敬舆与边洁卿同来见予，予对之言曰：“吴向为徐世昌高等封疆大吏，吾等在南方目徐氏总统为非法，故揭护法旗帜，以对徐为号召。今吴态度未明，吾二人见面，无法谈话。请两兄对吴说，于态度表明后，吾二人再面谈。”张、边二人闻言而去见吴，述予之言。

吴佩孚闻张之所言面言曰：“吴莲伯要我表明态度，予上有长官，须回保与曹巡阅使商酌。如能对徐表明态度，再来专车接莲伯至保面谈。但莲伯现在所主张，虽不能见而，亦愿知大概，

以便对曹言。请敬輿再至旅社见莲伯，将其所主张开单说明，以便携与曹巡阅使相商。”

张同边又来予之旅社，述吴旨。予请伊等次日来取。此时，南方护法议员闻予在天津，亦多有来予处者，如罗经生、易次乾、卢信公、吕复（剑秋）、王箴三等。夜间当召集彼等来旅社协商，当开出吾等所主张，而望曹、吴能实行者，共有十二条，详列如下：

（一）拥护约法。（二）拥护国会。（三）去徐世昌。此三者为根本条件，而不可改者。其他如（四）组织特别法庭，裁判黎元洪违法解散国会。（五）召集全国南北重要元老，在北京开国是会议。此外条件如裁兵等等，另见吴宗慈著《中华民国宪法史》第一卷。

予将所拟各条交张，请张交吴。吴携回保定与曹重三。不日即来电与直隶省长曹锐，预备专车，并专电予，请予与张、边等同赴保定。予接电后通知在北京住之前参议院院长王家襄，约其同去。王允当专车到长辛店后，开至北京接伊。遂于次日予同张敬輿等赴保。王家襄由京同去。夜半至保，先由招待人员导人招待处休息。吴佩孚即派参谋持片请予及张敬輿、边洁卿，先过其处谈商，而王家襄不与焉。予至彼处，吴迎予于院中，彼此携手入室，此为予与吴初次见面，彼此互道相慕之意。谈次，吴子玉云：“予与王孝伯为换谱之弟兄，先生为孝伯之老师，即吾之老师。此番谈话，千万完全为国事，不必客气。”予曰：“予与参议院院长王家襄同来，何先生只请予来，而不见王乎？”吴曰：“王家襄居于北京，未从事护法事业，今谈护法继续事业，恐王洩言，故吾先与先生单独谈话。”予曰：“前次予之意见，已开一手折，请敬輿兄交总司令转交曹巡阅使，不知对吾所陈之手折有何意见？徐世昌自作非法总统以来，不必问其对全国如何，就其对北将领而说，以先直皖战争，此次直奉战争，皆由伊一手造

成。今直奉战争以后，徐仍在北京高作总统，君与曹巡阅使将何以对付之。故就全国大局论，就北方局面论，第一着，非去徐不能安定。总司令当以吾说为然。”吴说：“先生所说甚是。予与曹巡阅使对此事已下决心，但如何办法则尚未想出。”予说：“中国数年糜乱，皆由法律无效所致，予等在南方护法，即为此点。故法律问题若能解决，则徐氏之地位，系非法选出，自然迎刃而解。故今日办法，仍要在北方树护法之旗帜。要知揭出护法旗帜，不但数年护法问题可以解决，则公等与曹巡阅使所处之困难，亦可解决。”吴说：“甚是甚是。如何揭出护法旗帜，则请先生全权办理。”吾曰：“既以揭出护法旗帜为然，予拟在天津先假直隶省议会会场及会址，设立第一届国会筹备处，由予通电全国，号召第一届国会议员来津开会。并将筹办情形由予密电西南护法团体，使之响应。公与曹巡阅使，能借我直隶省议会地址否？”吴曰：“能。”予又曰：“此次回津后，即发通电，在直隶省议会设立筹备处。公等接吾电报，请联合直系各省军民人员复电响应。并就予之通电，再为通电全国，令北京军警对徐不加保护，请其即日出都。”吴说：“请徐出都，吾可由保通电话，令其走。先生所开手折前三点之问题，已经解决。此下问题仍要商量办理：（一）黎总统复位问题。如就是先生主张，先设特别法庭，审判黎之违法解散国会，则北京元首无人，何人主持政府？”予曰：“北京正式总统未选出以前，先组织委员会，全国如曹巡阅使，如阁下，如孙中山、云南唐继尧、唐少川、伍秩庸，均请其为委员，由各委员中举一委员长，执行委员会事务。即由委员会组织特别法庭，如黎无罪，则请黎复位；如伊有罪，则请国会正式开会选举总统。法律森严，此后再无有元首敢作非法之事。昔日一千六百六十余年，英国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战争十六年十个月之久，结果英王伏法。所以英国国会权高于一切，除去雌不能变雄，雄不能变雌，余则国会之力，皆可

作到。今次护法，若能将法律地位巩固，则可与英国国会媲美，则公之英名不朽矣！”吴说：“先生所说甚是，但是滞碍难行，仍以黎复位较易办理。”吾曰：“今日此事，在君等握军权有实力者之意见为如何便如何耳！商之于吾，吾虽不承认，然以难强吾之主张请公等服从。总统之外，内阁问题、其他问题，又如何？”吴说：“内阁总理吾拟请颜惠庆为之，先生以为何如？”吾说：“颜惠庆在非法时代，北方政府作外交总长多年。对法律主张，从不敢提一字，恐非大器。与其请颜惠庆为总理，不如请张敬舆为是（吴与张为姻亲，对张又不赞成其为人，故对予说为默然）。内阁总理问题，今日亦不易解决。其他安福政府在北京数年，借东邻之外债，如军械借款、参战借款、森林借款，种种不法行为甚多。吾等国会至京后，如不过问，则无以对国人。若过问，势必酿起很大风潮，公在外能为援助乎？”吴曰：“能。”谈至此已（下缺）

梁启超佚札

汤志钧 辑注

说明：《饮冰室合集》收录梁启超的函札不多，《梁任公年谱长编》和中华书局收藏的梁启超《给孩子们的书》中收存了一些和近代史事及梁启超思想、生平有关的重要素材，但他散佚的书信还是不少。1983年至1984年，我在日本讲学时，曾将在日本发现的梁启超佚札等，写了《梁启超佚札辑存》和《梁启超及其同人邮件往来检查》，收入《乘桴新获》一书，也只是“东鳞西爪”。1991年春，我应邀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在丘菽园家属保存的大量函札、文稿中，发现有梁启超写给丘菽园等人的信五件。这些信写在日本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筹办和自立军起义前后，极有价值。由于原信无月日，缺信封，用代号、隐语，经参照其他文献，酌予注释，今摘录如下，供大家研究参考。

一、梁启超致丘菽园书

叔子兄长：久不得书，相思如痼。十日前奉一长笺，比想已达。雪、藻^①两君把臂时快何如耶？近商河大业，望勿口金，至

① 雪，徐勤，字君勉，号雪厂，广东三水人。邑庠生，康有为弟子。甲午战后，上海设立强学会，康有为调徐勤来沪，任《强学报》主编。后任澳门《知新报》撰述，又在上海《时务报》发表《中国除害论》抨击封建专制，遭到张之洞、梁鼎芬攻击。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任日本横滨大同学校中文教习。政变后，跟随康有为策划“勤王”活动，曾去新加坡，光绪二十六年三月初返粤。“只求速起义师，以救皇上，而图自立。”七月，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徐勤在海外继续演说保皇。藻，郑藻如。

为盼。藻公所言东归安全社，诚可算南荒民间一大问题。兄对此问题，果有何意见乎？藻公欲以学校为吸力，是一大妙法，兄想能助之。前书请兄及林君^①书名为高等学校董事，想必乐赏成。此校之目的，全在收集内地志士，养成完全无缺专门人才（海外所设，其子弟多志在买办者，万难得人才，故非振内地不可）。而内地率皆寒上，不可无以养之，故经费不贲，拟集得四万金，则基础稍定矣。顷在滨，仅得一万，其余则欲求之于各埠，望兄在坡提倡之，今将缘簿寄上--册，因开办匆促，每处所请之□□事，未得回信，故缘簿中只有发起人姓名，到坡时望兄自签之可也。既已为昆弟交，一切不复用客套，伏维察亮。此请大安。名心叩。八月一日。

藻□雪函望代交去，文庆兄并此致意，不另。

按：此信言东京高等大同学校筹款事，查此校筹议于光绪二十五年八月，信中称：“顷在滨”，则梁启超时在日本。查梁启超是在十一月赴美，此函末署“八月一日”，应写于光绪二十五年，末署“名心叩”，审视笔迹，系梁氏手笔。

二、梁启超致某人书

□兄^②鉴：数月不得书，今踪迹何在耶？北般岛之店^③，已开张否？所布置若何？子刚^④非常之才也，智若^⑤亦沉毅可共大

① 林君，林文庆，字梦琴，祖籍福建海澄。祖父南来槟榔屿，迁居新加坡。林文庆和丘菽园当时都受康有为思想影响，倾向改革。

② 此处有破损，似为“尚兄”。

③ 北般岛之店，“北般岛”地名，“店”，似指保皇会分会。

④ 子刚，梁子刚，梁炳光字。

⑤ 智若，张智若，字学璩，宝安人，康有为弟子。据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梁启超《上南海先生书》谓派徐勤等回粤，与梁子刚、张智若协同主持粤会。

事，两君皆极望兄之归，从事于俾期麦作内改寄军。今之学者，约已言其概，兄谓何如？蒞田商务情形，弟在此查得一二，更不胜歆慕，实不可失也。兄必宜一归图之，可引英杜美菲之战^①，言大国之不足畏。今我九龙何以不能敌之，因官兵之掣我肘也。若我能握一省之主权，以全省之力敌彼，未有不能拒者。我民不从此下手，终不能成，徒为人糜烂而已。大约本此立论，推波助澜，必有以鼓动之矣。能得此地之权，万事易易也。即般岛之事，亦宜在此募集伙伴也。兄谓何如？匆匆不具。名心叩。正月十五日。

席儒^②之性好义而稍偏，兄所知也。今高等学校^③事棘手甚多，南中如有捐款，望直寄犬养^④，以接济然眉之急。不然，恐只能为外人笑矣。兄但会此意，弟不欲多言。又及。

又，弟此间筹款可得十万左右，买货之事，弟能任之，但运货入内，则责在兄等矣。乞多以书来，并以书缴属保皇会同人。

按：此信提到高等学校，指光绪二十五年，梁启超与旅日华侨设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又言“此间筹款可得十万左右”，“此间”指檀香山，梁启超于是年底去美，函末署“正月十五日”，应发于光绪二十六年。又，本函未具名，从笔迹和末署“名心叩”来看，与梁启超这时写给别人的信一致，如现存日本

① 美菲之战，1898年，菲律宾反对西班牙殖民战争即将胜利，美国以支持菲律宾独立为名，乘机发动美西战争，西班牙将菲律宾转让于美。次年2月，美国向菲律宾发动进攻，遭坚决反抗。1901年，以阿奎纳多（Emilio Aguinaldo）为首的政府向美军投降，个别地区仍反抗，直至1903年。

② 席儒，郑席儒，旅日华侨，曾助梁启超等办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

③ 高等学校，即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④ 犬养，即犬养毅，日本众议院议员，参加组织东亚会，任横滨大同学校校长。

三、梁启超致丘菼园书

② 仓海，丘逢甲，字仙根，号蛰仙，别号仓海君。台湾彰化人。光绪进士，官工部主事。甲午战后，曾督办团练，与台湾士民抵制日本。兵败后回广东，工诗，有《岭云海日楼诗钞》。

□已代寄。仓海有意乎？望兄更敦促之。柴微非常之才，其所需望兄供之。白种人之中，非无同志者，弟在此已见数人，弟意谓当创一西字报于香港，发表圣德及帝党之政策，以引动白人之热心者，此事舍文庆^①外，似无人能任。兄试请于文庆如何？弟欲游南美，然恐中原事急，太元去，不能速归，故尚未定也。望君金玉，秋水屡穿，幸勿吝兹区区，并请以书来奖励梁荫南、钟求贤、黄绍经、张福如诸君，幸幸。二月十三日，名心叩。由檀岛。

按：此信未具名，从字体看，系梁启超笔迹。末署“二月十三日，名心叩，檀岛”。查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五年冬由日本赴英，次年春夏，居檀香山，则此信应写于光绪二十六年。惜字多漫漶，不易辨认。

四、梁启超致丘菽园书

叔子有道：锡兰首途，九日而抵澳洲西境，逢迎到处，不让檀岛，真可见海外人心之足恃，益使我自惭惧勿克胜也。详情在南海函，属觉顿^②抄寄尊处，不复缕缕。此中事，其机关转折甚慢，在舟十日，登岸后所闻新闻，无以□□□者，殊使人闷杀。惟粤岭向颇多事，不知与吾党有何关涉，怅望深深也。望赏以书界我，以壮行色，但寄雪梨可也。弟在此两来复即行。匆匆报告，敬问起居。名心叩，西十月廿六日。

按：此信未具名，系梁启超笔迹。首谓“锡兰首途，九日而抵澳洲。”查梁启超《三十自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急抵

① 文庆，林文庆。

② 觉顿，汤霁，广西人，康有为弟子。

沪，方思有所效，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发，唐、林、李、蔡、黎、傅先后就义^①，公私皆不获有所救。留沪十日，遂去适香港，既而渡南洋，谒南海，遂道印度，渡澳洲，应彼中维新会之招也。”此信末署“西十月廿八”，当夏历九月初六日，应撰于是年。

五、梁启超《上康有为书》

再稟者：闻廉颇不满上意，雪^②则攻其粗才。又有言其不止此。尝谓所得之款，岂尽东人之支用，吾两人□□当分其半。前时电澳汇五百金，为解救之事，后闻被拿之说，实为虚传，则竟成^③

此人觉^④亦言之如此，然雪、镜、湘^⑤、默，岂皆妄与人大款，或攻者乱造谣也。人好恶不一，而此等粗人必多小过（又性粗，好□□□），□□□李续宾，^⑥文宗^⑦批其折曰：声色货利皆武人小节，不必深求（将折发李），李觉折痛哭，力战三胜，至三河而死。文宗真有驭将之方，仆于此人未之识（亦未之见），其人勇锐甚。今正月敢独出名，电请救上。铁君^⑧称其毁

① 唐，唐才常；林，林锡珪；李，李炳寰；蔡，蔡钟浩；黎，黎科；傅，傅慈祥。均于1900年自立军起义时死难。

② 雪，徐勤，见前。

③ 下缺。以上为梁启超笔迹，下面为康有为批。

④ 觉，汤觉顿，见前。

⑤ 雪、镜、湘，雪，见上；镜，王觉任；湘，叶湘南，即叶觉迈。三人均为康有为门人。

⑥ 李续宾，字迪庵，湖南湘乡人。咸丰三年，随曾国藩办团练，屡与太平军作战。曾任浙江布政使。攻占九江后，授巡抚衔，旋率湘军主力攻陷安徽潜山、桐城。在三河镇与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鏖战死。

⑦ 文宗，爱新觉罗·奕訢，清朝咸丰皇帝庙号。

⑧ 铁君，梁铁君，广东人，康有为门人，曾随康出亡。

文昌庙被捉，（通梧州人多恶之），且累铁去篮埠，然其勇而好事，见些等人血气极勇，实可用，其以罪人必多，其小过嗜欲此等，其气粗壮必败事，然其勇敢不畏死难，则今日可用之裨将才也。人必有长短小谨者，不大立，但因才而笼使之，则天雄马头亦药笼所必蓄也。同门之大敝，向来讲学陈义高而尚规过其治，成为风气，未免吹毛求疵，相攻太甚。仆向无此等风气，于各人之来也，皆容而察之，其确乃教诲之。今日办事，又欲各知其病，而皆以为公则无他也。即如觉言亦出自港中传闻，仆尚未信，当作细查。因觉亦非目见也。即如谦东今尚有信来，而以为叛孙矣（其不悦，亦见君力^①书）。

按：此信残损，前段为梁启超笔迹，称“再稟者”，宜为梁氏上康有为书；后面为康有为笔迹，似为康有为看到梁氏之信后批语，写于光绪二十六年。

^① 君立，梁启田。

陈幹与王正廷《论土地权书》暨秦树声跋

佟立容

2002年是青岛接收80周年。当年取下日本旗换上中国旗，曾经让多少中国人扬眉吐气、兴奋无比，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盛事。陈幹乃躬遇其事并为之付出过艰辛努力、为成功接收青岛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人物之一。

陈幹，山东昌邑人。民国以还，终日奔走，及鲁案细目协定开议，山东绅商公推陈氏出当交涉之冲。1922年9月5日黎元洪总统任命陈幹先生为鲁案第一部委员，在此之前他已经涉及此案。“当中日会议时，陈氏对山东之种种权利问题誓死力争，不少退让。即如中日间之海底线不为日人所据，关系陈氏力争者不少。故论者谓：青岛之接收，陈氏亦居功焉。”（参见班鹏志著《青岛接收写真》）通过认真调查、详细了解，陈幹发现在中日谈判第二十次会议录中载有徐东藩擅与日人商定的“将土地改为永远租借”之语。为此，是年8月16日在与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王正廷同车赴济南的路上，他对把青岛改为“永远租借”表示不满。他说：“日本人1914年与中国签定的租期为十年，今已转瞬八年，为期将满，父老含痛茹辛所盼者即在此时”，“现言收回，为何却改为租期50年，以至于永远租借？”身为委员长的王正廷却竟然说：“租者不能永租，买者可以永租。只要买就是人家的既得权，改为‘永租’较之还好一些”。言外之意，日本人只要在中国买了房产，就有既得权，也就有了土地权。

陈幹先生针对这种鬻土卖宗的谬论，拿起论文这把犀利的匕首，写出了一篇喻理清晰，令人折服的檄文。谨照录于次：

论土地权（致王儒堂）

谨按青岛完全为中国土地，故意人在青岛时，名之谓租借。租借者非其有之谓也。故该条约中亦一再声言，地方主权仍属中国，此当年之事。就最近者言，中日青岛交涉，根据华府条约。华府条约关于青岛事统称之谓德国旧租借地，故见于正约者十一、附约者五，会议记录中之协定条件者三。关于土地神圣，并无有含糊字样，今谓其既得权带有土地性，此我之所大不解。以粗理而言，今日本根据该国原有之宣言并华府条约交还青岛，而青岛土地竟为该国之私有，附以土地所有权，试问该国交还者何事？无乃太滑稽耶！盖既得权者，既得商业之谓也，绝不能带有土地性质。故青岛俗谚，只有买地皮、买房子，而绝无有买土地之说！即以条约而论，开章明义，谓之德国旧租借地。日人将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此案大纲已全盘揭出，吾等即遵守此数字精神，以了此事可也。再此事争点，彼谓既得权中含有土地，吾等谓既得权中绝无土地。彼引用会议记录中之协定条件第十一条，将其上段言“本条约第二十三条中所用‘合法职业’字样，不得解释为列入农业，及中国法律所禁止，或按照中外条约所不准外人经营之营业”，含糊抛开，只言其末节。此项定义应知其并不妨碍本条约第二十五条所规定之盐场问题，或关于按照本条约第二十四条所应决定之既得权之任何问题者，包括商业之谓也，并未规定任何问题中尚有土地。按“土地”二字，条约中只有一次提及，正约第五条：“日本政府担任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内所有公产，包括土地、房舍、工程及一切设置等项，无论前属德国官厅所有或日本管有期内官厅所购置建造者，全部移交中国政府。”除此之外，并未见有“土地”字样。今谓“土

地”亦在其商人既得权内，诚不知何所据。如谓该商人所买即有既得权，试问所卖者何人。抑私人乎？抑政府乎？如谓私人，不能牵入国际交涉；如谓政府，德政府乎？日政府乎？所卖之地抑德国之地乎？抑日本之地乎？如云青岛为德国地，“租借”二字从何说起？如云青岛为日本地，日本何由交还？如云青岛完全为中国地，夫人谁得而卖之？故此事关于既得权是否含有土地性之争执，应先从此处注意。

在此篇短论中，陈幹首先旗帜鲜明地阐明自己所持的观点和态度，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提出“青岛完全为中国土地、‘既得权’中绝不含有土地权”的论点，并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论证问题，使对方不得所趁，为最后解决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陈幹先生首先从正面做了论证：首先，“谨按：青岛完全为中国土地，故德人在青岛时，名之谓租借，租借者非其有之谓也。”其次，“盖既得权者，既得商业之谓也，绝不能带有土地性质。故青岛俗谚，只有买地皮、买房子，面绝无买土地之说！”第三，华府条约正约第五条规定“日本政府担任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内所有公产，包括土地、房舍、工程及一切设置等项，无论前属德国官厅所有，或日本管有期内官厅所购置建造者，全部移交中国政府。”

从这些论据，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无论从公理上、民俗上、国际条约上，王正廷的观点都是极端错误的。

接着，陈幹先生又从反面做了论证：第一，“青岛土地竟为该商人之私有，附以土地所有权，试问该国交还者何事？”第二，“如谓该商人所买即有既得权，试问所卖者何人？抑私人乎？抑政府乎？如谓私人，不能牵入国际交涉；如谓政府，德政府乎？日政府乎？所卖之地抑德国之地乎？抑日本之地乎？如云

青岛为德国之地，‘租借’二字从何说起？如云青岛为日本之地，日本何由交还？如云青岛为德国之地，‘租借’二字从何说起？如云青岛为日本之地，日本何由交还？如云青岛完全为中国地，夫人谁得而卖之？”

陈幹先生的多方分析层层论证，无可辩驳地证明：既得权中绝无土地！青岛完全为中国的土地！但是，在中日会议中，日人委员长小幡酉吉却说，“中国既已答应‘永远租借’，为何又要改变？”陈幹委员答曰：“外人买地，只能曰‘地皮’而不能曰‘地’；台湾、香港、九龙由敝国割弃给贵国及英国，领土主权完全付与，较之青岛租借则截然不同”。小幡知理亏不语。陈幹先生为求共识，连日通电各方，吁请声援。日后将《与王正廷论土地权书》付与秦树声先生，请其书写中堂，秦先生为陈幹先生的爱国精神所感动，撰写了精辟的跋文，给予陈幹高度的评价（此碑现存于昌邑市博物馆）。亦抄附于次：

《鲁案与王正廷论土地权书》跋

吾国病尊俎久矣。听於杪，故能闻未及；视於新，故能见未形；思於濬，故能知未始。近世有几人哉？青岛隩区，馆轂山海，苍鹅在运，铁壮石关。萍转东滨，舳舻大去，属以邻言。漾复故物，奸条谪画。沌沌豚豚，谓食肉者寝皮肉，牯糠而及米。主者怵于晚视，怒于噬脐。陈君明侯，喟冯为义，惩商於之六里；驰凿石之百函，箴縻假之间，局关键之表，卒割原象，无荐豕地，曹沫登坛，仲连解俎，烈士哉。固始秦树声并志。

秦树声（1861—1962）字宥横，号乖庵，出生于河南固始南乡秦家一耕读家庭。四岁入斋读书，十四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三十五岁为进士，1903年中经济科进士，因言：“朝纲废弛，大臣昏庸，招权纳贿……”引起两宫动容，被贬至云南，

任曲靖知府，后为云南知府。1912年（五十一岁）国民政府任其为河南提学使，不应，后移居北京。清史馆聘任总纂《地理志》，晨出暮归，十年无间，三易志稿，直至成书。1926年（六十五岁）卒于哮喘病。遗著有《南北史》、《唐书》、《刑法令》、《乖庵文录》、《清地理志》、《西洋史》、《续修河南新志》等（参见《固始文史资料》）。

在跋文中，秦树声用了大量的隐喻和典故，对近代史上东西方列强藉不平等条约为辞，步步侵逼，肆意霸占中国领土的野心与阴谋予以揭露，对中国历年外交失利任人宰割、青岛先后为德国及日本藉占的历史深表痛心，对当时主持鲁案交涉的王正廷等畏惧日人压力、忍辱退让的行径进行了鞭挞。而对陈幹在办理鲁案时坚持原则、为国力争，与各方斡旋、向各界呼吁，齐力制止出卖国权的正义行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誉其为如古代曹沫、鲁仲连一样的爱国烈士。

胡适致胡近仁未刊书信二则考释

陆发春

在胡适大量存世的文献档案资料中，胡适致友朋论学、论世书信的学术价值日益凸显。我们由已刊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中华书局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耿云志主编，黄山书社版）、《胡适书信集》（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等文献资料的引用情况作检索，此类文献已成为新时期胡适及相关人物研究的主要学术佐证。恰如论者所指出的：“作为史料，书信的价值有时不但超过公开发表的文章和档案材料，甚至在特定情况下还可能超过本人的日记。写给别人看的所谓名人日记，其不可信甚明，即使对无意外传的日记，也要作分析，未可全信。”^①

在胡适大量的往来书信中，给族叔胡近仁的信，自有此价值所在。胡近仁，亦字堇人，行名祥木，号樾禅，又号晓耘（筠），松臣，胡适的族叔。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入邑庠，三十一年乙巳科试补为廪生。撰有《石鹤舫传》及大量旧诗文，曾撰有《读顾颉刚先生论古史书以后》等文，参与二十年代的古史辨论战。编纂有《上川明经胡氏宗谱》、《新安柯氏宗谱》、《绩溪县志》，并参与安徽省志的《舆地志》、《艺文志》等纂修。胡近仁年长胡适四岁，在胡适九年的家乡教育中，胡近仁与胡适成为最为密切的朋友。胡适去上海求学及留学美国后，

^① 唐振常：《为〈吴虞集〉出版说几句话》。

家信大都由胡近仁为胡母解读，或由其代撰，在一些家事的处理上，胡近仁可归于胡适“此意但可为足下道，不足为外人言也”^①一类的密友。胡适曾称胡近仁为“一族之才士，一乡之领袖”，“我们三十多年的老朋友，什么话不可说？”^②

1985年，胡近仁先生后人捐献出胡适致胡近仁书信手稿37封，对学术界了解胡适的家庭状况及早期思想殊有帮助。随着《胡适全集》的编纂，胡适的一些手稿书信相继浮出，兹录下胡适早期致胡近仁书信二封，略加考释，亦求证于方家。

其 一

禪祥老叔大人道席。瀕行去国，曾上一书，想已达览。适此行对于家庭抱歉殊深。惟家二兄爱弟甚殷，期望弥切，故对于适之去国，异常欣慰。当适去国时，家兄特乞假南来，与适一诀。穷途万里，得此稍慰羁怀。七月十二日去国，八月七日抵美国境，中秋日抵绮色佳城，计日三十三昼夜，计程三万余里，适当地球之半。此间晨兴之时，正吾祖国人士酣眠之候。此间之夜，祖国方日出耳！乘风之志于今始遂，但不识神山采药效果如何？又不知丁令归来，能不兴城郭人民之叹否？！念之恍然。此行携有古籍千三百卷，惟苦暇日无多，不能细细研读。甚恐他日学殖荒落，有手生荆棘之惧也。自适远行后，家慈不深见责否？乡里有何新消息？便中乞赐书示知。附上信封二个，可用此信封托人带至上海，托汪裕太号程云翁转寄交适可直达也。海天故人，引领翘望，以望于老叔者，惟此一纸之鱼书，想老叔必不令我失所希冀也！

① 胡适致胡近仁信，1918年5月2日。详见拙编《胡适家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4月版，下略。

② 胡适致胡近仁信，1928年7月24日。

草草奉闻。即祝令闻昭著。顺颂双安。不一。侄适再拜。重九。

考注：（一）此信未直接署年月日，由信的内容及“重九”落款推算，应为1910年10月11日。此信中胡适所言离国去美日期，均为旧历。即：“七月十二”为1910年8月16日。抵美日期“八月七日”即1910年9月10日。到绮色佳康奈尔大学日期“中秋日”即1910年9月18日（星期日）。

（二）胡适信中明言“此行携有古籍千三百卷”。于此可了解胡适留美时期，虽着力于西学的接受，却于中国传统学术并不放弃。先后撰有《读〈老子〉“三十辐共一毂”》、《读墨子》、《读〈公孙龙子〉》、《〈诗经〉言字解》、《读管子》、《读论语》、《孔子名学》、《吾我篇》、《尔汝篇》、《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等文，陟评“古文家治经不足取”，论述“训诂之学”、“校勘之学”等得失。其博士论文以中国古代哲学进化历程为主题，即“先秦名学史”，似与胡适的藏书不无关系。

（三）胡适把去国留美学习，喻之为去“神山采药”，目的的乞医国良方。查该时期前后家书和日记，均有佐证。而胡母冯顺弟，多次在由胡近仁代撰的家书中，教诲胡适：“汝此次出洋，乃汝昔年所愿望者，今一旦如愿以偿，余心中甚为欣幸。从此上进有阶，将来可望出人头地。但一切费用皆出自国家，则国家培植汝等甚为深厚，汝当努力向学，以期将来回国为国家有用之材，庶上不负国家培植之恩，下有以慰合家期望之厚也。”^①

其二

近叔有道。今日得汪榕章转寄手书，藉悉一切。老叔爱我无己，令我得此闻事，感谢感谢！宾兴一说，竟是笑话。适虽贫，

^① 胡母致胡适函，1910年。

然何致出此下策。考试之举，又非官府申送，又非国家定例，何能领宾兴之款。且适与县城章、胡诸绅，已有宿怨，叔所素知，今岂可再令此种小人笑我为贫鄙无耻哉？！已有书致仁里程玉樾君（字春度），托其代为取消此说，并声明非出鄙意，并以附闻。

适有生以来，习遭坎坷[坷]。四岁失父，遂成□□路，十余年来，幸有一母一兄提携育养，以有今日。十余年来，心中、目中、梦魂中，亦惟有此二人而已。其他戚属，但恨为伦理所羁，否则，适且唾弃之不暇，更安能顾□之耶？且适在此数月，甘旨之事，尚来有分文，彼独何心而遽及于此。岂国家津贴，士子之金钱，而可以为养活废民、游于民蠹、国□之用哉？！每一念及，令人恨之。嗟夫，樾叔定知我握管时愤愤之状也。诸事想大忙，偶有暇晷，望以书来。不一。侄适□。辛亥正月廿五日。

注：（一）此信日期应为1911年2月23日。由信的内容看，关于胡适赴美留学事，家乡多有流言。“宾兴”一词源于《周礼》，后世地方官员设宴招待应举之士，称“宾兴”。胡适赴美，考取的是1910年第二批清华学校“留美赔款官费生”，即美国利用中国庚子赔款尚余部分的所谓“退还”款，资送中国学子赴美学习。胡适赴美以前，在上海有一段非常落泊的时期。离开中国公学后，1910年2月去华童公学教小学国文课等，借以糊口生存。胡适1910年6月30日致信母亲“儿前此所以不读书而为糊口之计者，实为养亲之故，而比年以来，穷年所得，无论儿不敢妄费一钱，终不能上供甘旨，下蓄妻孥，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不我与，儿亦□□老矣。既不能努力学问，又不能顾贍身家，此真所谓‘肚皮跌□斗，两头皆落空’者是也。”

（二）由胡适信中可以看出，胡适与绩溪章、胡等县城富贵之家存有很深芥蒂。自胡适父亲胡传死后，上庄胡适家族渐近衰落，1910年6月30日胡适禀母亲信中明确讲道：“且吾家家声

衰微极矣，振兴之责惟在儿辈。而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且此次如果被取，一切费用皆由国家出之。闻官费甚宽，每年可节省二、三百金。则出洋一事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可无忧，岂非一举两得乎！”胡适虽然去了美国，但考试和赴美成行，均得力于绩溪乡友许怡荪、程乐亭及胡节甫等帮助和资助，而故乡养亲之资难有着落，他人穷志不短，更不愿在故乡招摇而引起城中章、胡家族有“宿怨”的“小人”鄙笑。

（三）胡适信中提到的绩溪仁里村程春度（玉墀）为胡适密友之一。胡适《藏晖室日记》庚戌正月初六日：“作函致橘丈、子勤、怡荪、绍庭、乐亭、春度、季沆、士范”。其中“春度”不知何人？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收有胡适致春度信二封。耿云志、欧阳哲生两位先生编辑时，作注释“胡适同乡同学，姓氏、生平不详”^①。此封信则可以补正。

（四）胡适于信中说：“十余年来，幸有一母一兄提携育养，以有今日。十余年来，心中、目中、梦魂中，亦惟有此二人而已。”胡适母冯顺弟对胡适的教养及影响，可参看胡适《四十自述》及《胡适口述自传》，不作赘语。此处胡适所提的“一兄”系指胡适的二哥胡洪雅（1877—1919），又名胡觉，字嗣柜，号绍之，为胡适同父异母兄弟，早年上海梅溪学堂和南洋公学读过书。胡适去上海求新学，胡绍之出过力。而鼓动和支持胡适去参加赴美留学考试的，正是胡绍之。“二兄自京中来函言，此次六月京中举行留学美国之考试，被取者留在京中肄业馆预备半年或一年，即行送至美国留学，儿思此次机会甚好，不可错过

^①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①。胡绍之陪胡适由上海坐船赴京，托熟人找关系使胡适在京城安心复习功课迎考。胡适赴美前夕，胡绍之特意由东北赶到沪上，为胡适送行。胡适《去国行》诗曰：“木叶去故枝，游子将远离，故人与昆弟，送我至江湄。执手一为别，惨怆不能辞，从此万里役，况复十年归。”胡适在日记和信中多次提道，母亲和二哥胡绍之对他的恩情和帮助。胡绍之亦对弟弟胡适寄予厚望，“江干握别，情深难割。顾念此行于吾弟前途有莫大之幸福，则又翻然自慰……万望从此矢志向上，专心力学，以收桑榆之效。”^②

① 胡适致母亲信，1910年6月30日。

② 胡绍之致胡适信，1910年。

原侵华日军 731 细菌部队 队员筱塚良雄证词资料

王希亮 译

第一部 筱塚良雄在 731 部队细菌战被害国家 赔偿诉讼法庭上的陈述书

时间：2000 年 11 月 15 日

地点：东京地方法庭 1 楼 103 号法庭

一、开头语

从 1939 年开始，我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期间一直服役在 731 部队，作为该部队的一员，使用各种残虐手段杀害和伤害了许多中国人。我所属的 731 部队是开发和制造细菌武器、实施细菌战的秘密部队。731 部队本部设在中国哈尔滨市郊的平房。在这里，我参与了大批量生产细菌和跳蚤的细菌武器的开发和制造，另外，对囚禁在部队监狱里作为实验材料的中国人，进行了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再就是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细菌战。

我作为 731 部队的一员，犯下了令人憎恨的非人道的战争罪行。

日本战败第二年的 1946 年 2 月，我在辽宁省通化市参加了反动的通化暴动事件而被捕，经过几个月的监狱生活后，我加入

东北人民解放军辽宁独立三师^①，1949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同年10月，新中国在北京诞生。之后，我进入属于解放军编制的天津军医大学，从事细菌学系的工作。这期间，我对周围的中国人一直隐瞒原731部队队员的身份，也中断了包括同父母在内的日本的一切联系。因为人们都知道，731部队所犯下的残虐罪行是日军战争罪行中最残暴的，作为731部队队员不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事实。可是，我在人民解放军里的工作，都同从731部队获得的有关医学方面的知识相关联，逐而渐之，引起人们的疑问，怀疑我是否在731部队工作过。1952年，我的731部队队员的身份暴露，被中国当局逮捕，先后关押在河北永宁县和北京市中级法院，最后，关押在辽宁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关押战犯的抚顺战犯管理所，给予了我自觉认识所犯罪行的残虐性的机会，经过冷静的思考和反复的反省，使我认识到自己魔鬼般的残暴罪行，这是用语言难以表述的痛苦过程。

刚入战犯管理所时，我只是承认被731部队杀害、伤害的被害者的痛苦和呻吟是真实的。可是，对被害者而言，执行命令实施残暴行为的人，实际上就是直接的加害者。基于这种认识的深化，使我开始而对被害者的痛苦，从被害者的角度来考虑一切。这样，我的心回归人性，认识到自己作为731部队队员所犯下的罪行，并全面交了自己的罪行，还在战犯管理所里详细、全而地写下了自己所犯战争罪行的自供书，诚心地向731部队的牺牲者和中国人民谢罪。

1956年7月，由于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对我免于起诉释放，同年8月回到日本。1957年，从中国释放的战犯回国后成

^① 1945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相继挺进东北，仍使用原来番号。当年11月，统一组建“东北人民自治军”，12月末，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但民众仍习惯称之八路军。此时尚没有正式改称解放军。

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中归联），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们，从人道的立场出发反省自己的罪行，为反对侵略战争、坚持和平和日中友好做出贡献。回国后，我把中归联的志向刻在心上，走过了战后 40 余年的时光，我的立脚点就是站在日本侵略战争的牺牲者的立场上，彻底反省作为 731 部队队员所犯下的罪行，绝不能允许日本再度走向侵略战争的道路。所以，我始终致力于 731 部队战争犯罪历史事实的证言活动。

此次，我向审理中国人细菌战被害的细菌战审判的法官，在法庭宣读我的证言，我作为原 731 部队队员，陈述有关细菌战犯罪行为真实事实。

以下，我按着时间顺序陈述，另外，直到今天我仍记忆鲜明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下的多份自供书，其中的大部分在一些书籍中掲載，请法官务必结合这些内容一阅。还有，关于部队的名称，严密地说，“关东军给水部队”和“731 部队”是不同时期的称谓，为方便起见，在这份陈述书中统称 731 部队。

二、参加 731 部队的经过

1. 出生千叶县、被 731 部队劝诱

我于 1923 年 11 月出生在千叶县，1939 年春（15 岁），我在千叶县实业学校读书时，受当时称作“石井部队”的 731 部队的劝诱而志愿入队。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是千叶县人，所以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征集队员，因而许多千叶县的人参加了这支部队。我是在本校高年级学生的劝说下、背着父母加入的，经过形式上的考试，合格后被批准入队。

2. 30 名少年队员在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所集中

1939 年 4 月 1 日，接到去东京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所报到的指示，当时所址在东京牛込区户山町，该地还设有济生会医

院和陆军医院。防疫研究所从军医学校的通用门进去，进这个门后越往里走人就越来越少，防疫研究所在最里面，单独设有警卫所，到这里后必须止步，待里面的人出来确认我们的身份后方可领入。

当时，包括我在内的 30 人都集中在防疫研究所，年龄同我相仿。

防疫研究所本馆是二层钢筋水泥建筑，办公室、食堂和会堂另设在别处。出警卫所沿道路面上，有陆军户山学校、军乐队、体育学校等。道路的下方有练兵场、幼年学校（或骑兵学校）。

我们是以军医学校勤杂人员的身份，住在近处的清源寺的仓库里。

3. 在防疫研究所同石井部队长初次见面

进防疫研究所的数日后，我见到了时为大佐的石井四郎部队长，听说他当时兼任军医学校的教官和防疫研究所的负责人。现在还记得他当时说过的话，石井一边看着我们，一边对身边的副官指示说，“他们中有些人脸色不好，要认真地再做一次身体检查，还不要忘记做寄生虫检查”。石井对我们说，“你们是石井部队的少年队员，好好学习能够进大学，哈尔滨是个好地方，出发的时间以后通知，（趁着）在东京可以逛逛街，吃些好东西”。当时石井留着胡子，有学者风度，给我的印象像个奇怪的医生。

我们在防疫研究所学习了石井式滤水机的滤过管检定实验，以及普通琼脂培养基的制作方法，又同其他部门的人员共同学习了中国语。我当时想，部队长是军医，那一定不是很辛苦、很费力的工作。

三、加入 731 部队少年队

（1939 年 5 月）

1. 731 部队是秘密部队

在防疫研究所接受教育一个多月后，除留下 1 人外，29 人开赴哈尔滨郊外平房的 731 部队本部。我们是乘关釜联络船到釜山，然后乘火车经朝鲜半岛北上，1939 年 5 月 12 日到达中国东北的哈尔滨。去平房前先在 731 部队的吉林街分室落脚，在这里领到附有照片的身份证，标志我们已经正式成为 731 部队的少年队员。当天，由迎接我们的内务班长（军曹）带领，乘汽车进入距哈尔滨约 20 公里的平房 731 部队本部。这里是一眼望不尽的平原，但给人感觉这里曾是农家，因为周围还留有被破坏的民房以及耕地等。

进入 731 部队本部，第一眼醒目的是，在入口处立有“未经关东军司令官许可，任何人禁止入内”的告示，但是，没有部队番号的牌匾。

731 部队的占地以口字形的建筑物（称口号栋）为中心，周围挖有壕沟并设有铁丝网，铁丝网在晚上通电，接近它十分危险。我们到后的第二天，就深刻的觉查到这是一支秘密部队。首先，由部队配属的宪兵进行军机保护法和陆军刑法的教育，现在还能记得的是，“这里是被指定的特别军事地域”，“日本军队的飞机也不准在上空飞行”，“不准看、不准问、不准说，这是本部队的铁则”，“（部队）设有保护机密队，未经允许不得登上口号栋”，“不得逃跑，如有逃跑者以阵前叛逃罪处刑”等等。我当时感到有些奇怪，因为部队长石井四郎是军医，部队多是由大学出来的医生组成，就连下士官也是卫生兵，那么，这么严肃地强调保密究竟是为为什么呢。同时，我也意识到越是秘密，越是难做的事情。此后，我们在连续不断的工作中，终于了解到 731 部队实际是从事细菌战的部队，是开发细菌武器，制造大量细菌和进行人体实验的部队。而入队当初对这些一概不知。

2. 平房设施概要和少年队所受的教育

少年队到达平房部队本部时一号栋、二号栋、口号栋以及动

物班、航空班已经建成，宿舍正在建设中。最初，我们是在一栋一楼左侧诊疗班的房间设置内务班。在我们来之前，已有了一个少年队，他们称作前期少年队，住在一栋一楼右侧的房间。我们到平房时因前期少年队发生了伤寒进行隔离，所以，对我们称作后期少年队。内务班的班长住在二楼，军医和研究者从城里坐巴士或开车来上班，他们着军官服、扎领带、佩肩章。

少年队的教育主要是学习防疫给水的任务、消毒法、灭菌法、人体构造学、血清学以及细菌学等，讲义每次都收回，笔记也不准记。在进行毒物教育时，让我们直视注射硝酸番木鳖硷或青酸钾铝、砒霜等后痉挛、死亡的样子，谁闭眼睛鞭子就会落在头上。细菌实习的时候，如果使用死亡菌怕我们精神不集中，所以常常使用生（活）菌。这样，少年队接受了基础的教育，在实际工作中也担当了角色，受命做各种工作（后述）。

3. 1941年7月少年队解散，编入柄泽班

我从1939年5月进入731部队以来，一直是少年队的队员。1941年7月，正是关东军举行特殊演习（称作关特演）之时，因少年队的人数减少，少年队宣布解散，队员被配属到各班。我被分配到第四部第一课的柄泽班，负责化学武器的处理和管理，增发25日元的危险补贴。柄泽班的主要任务是制造细菌。

四、诺门汗事件中实施了细菌战

1. 诺门汗事件当时生产了大量细菌

1939年5月，我到达哈尔滨时，日军军事进攻苏联的诺门汗事件已经爆发，到达哈尔滨不久的6月，我参加了山口班细菌榴散弹X型沟槽的防锈作业。山口班是制造细菌弹和散布器的班，后来，我从山口班员嘴里听说这些榴散弹在诺门汗事件中使用了。7月，诺门汗事件的影响在731部队里也有了迹象，在部

队到处都能看到着军装、戴钢盔、佩军刀的人，恰好是在这个时候，部队开始大批量的生产细菌，我们少年队也被动员参与了细菌的生产。当时部队的各研究室生产各种不同的细菌，比如，江岛班生产赤痢菌，田部井班生产伤寒和副伤寒菌。我们少年班负责细菌培植和采集细菌用具的准备以及到各班当帮手，另外还负责把培养细菌使用的菌株运送到各培养基班。至于诺门汗事件中使用了什么样的细菌，又是如何制造的，我不太清楚。可是，菌株是在试管里培养的，每个铁筐里放入 60 瓶，我从运送菌株的数量推断，生产的伤寒、副伤寒、赤痢菌等，每天平均当在 3 公斤以上。

2. 向诺门汗前线搬运细菌

731 部队参与诺门汗事件，是把细菌装入石油罐里运到前线（实施细菌战）。事先在无菌室里将细菌装入灭菌的石油罐里，我曾亲眼见过这样的作业。就是把细菌放进蛋白胨的空瓶里，内中有稀释的肉汤类调整液（蛋白胨、肉精、食盐中加入氢离子的调整液），然后装进薄铁石油罐里，石油罐盖用焊锡密封，再装入木箱，外包草席、草绳，运往前线。细菌搬运作业是由下士官率少年队员进行，我参加过一次从平房 731 部队本部向诺门汗前线运送石油罐细菌的作业。从哈尔滨乘到海拉尔的夜班火车，装细菌的木箱放在车厢连接处，由我们轮流看管，在海拉尔下车后用卡车运到将军庙。就这样，我们在下士官带领下把细菌运到诺门汗的最前线。我到了将军庙后立即返回，少年队中有两人会开车，就参加了细菌战实行部队，后来听他们说，细菌是洒入哈拉哈河的上游。我因为参加了向诺门汗前线运送细菌，以后论功行赏获得了从军徽章和代金卷（内部使用的钱币）。

五、增殖跳蚤（1940 年）

从 1940 年 5 月开始，少年队员们几乎都归田中技术员直接

指挥，被动员生产跳蚤。田中筱田班（昆虫班）在口号栋三楼的暗室进行作业，暗室里摆放着同石油罐大小相当的罐子，里面放有带壳的小麦，再把装在笼子里的黑老鼠放进去，老鼠就成了跳蚤的寄生体。

暗室的湿度超过 70%，体感温度超过 40 度，暗室作业者一律裸身着白装，里面的臭味和高温使人只能坚持 30 到 40 分钟。我的工作是观察罐中是否有死去的老鼠，如果发现死老鼠，就用活老鼠取代。这年的 8 月末，开始在暗室里把小麦中的跳蚤分离，先抓走老鼠，再把小麦和跳蚤放进西洋式的陶瓷浴缸里，这个浴缸很大，大人进去都很宽裕，浴缸的底部有一个洞，里面放有玻璃制的容器，浴缸的一侧点着红灯，跳蚤的习性是向暗处跑，再一边用小棍搅拌麦麸子，一边用干燥机送风，这样，跳蚤就钻进容器里，形成一个团状。

大量生产的跳蚤利用 731 部队航空班的飞机运到南京。

六、731 部队远征华中地区和派遣新京（1940 年）

1940 年 7 月间，731 部队向中国华中地区派遣了远征队。各种器材如高压灭菌器、干热灭菌机、克霍锅（以德国细菌学家克霍命名的锅）、玻璃器皿、材料、药品等各种器材以及部队人员都是利用 731 部队的专用铁路线登火车运往南京。1940 年 9 月，新京（今长春）流行鼠疫，从当月到 10 月，石井部队派人去了新京，我是其中之一。在新京受命捕捉老鼠，抓到老鼠后调查是否有鼠疫菌的存在。

七、利用石井式培养箱大批量生产细菌（1940—1943 年）

使用石井式培养箱大批量生产细菌是在口号栋一楼进行的。我们称口号栋的前面是三号栋，后面的是五号栋，三、五栋的设备是共用的，各栋里有材料室、材料准备室、玻璃器皿洗刷室和

10 坪左右用玻璃封闭的无菌室^①，以及孵化室、大型高压灭菌机（10 台）、溶解培养基的溶解锅、冷却槽等。

搬运培养箱时，从高压灭菌机到冷却槽间有轨道，到无菌室或孵化室用链条传送带。在三栋的一楼还有制造蒸馏水的蒸馏装置和值班室。大批量细菌的生产都是利用石井式培养箱增殖出来的，所谓“用普通琼脂培养基增殖共性、烈性菌”就是利用这种培养箱培养出来的。我参加的大批量生产的伤寒、副伤寒、赤痢菌、霍乱菌、鼠疫菌、脱脾疽菌等都是使用石井式培养箱，它的本体和部件都使用抗锈性强的轻金属制成。

下面，说明使用石井式培养箱制造细菌的过程：

1. 首先组装石井式培养箱，在本体（培养箱）内放入中箱（细菌培养盘），中箱和本体间有插口连接，再用木棍类控制固定，不使其浮动。

2. 从溶解锅里用分注罐向培养箱里分注 3% 普通琼脂培养液（1% 蛋白胨、1% 肉精、0.5% 食盐、3% 琼脂、水等），然后在排列的中箱里放上绒布、容器，盖子上蒙防水罩。一箱注入量在 8 升左右。

3. 将注入培养基的培养箱用台车运进高压灭菌机，以 15 磅的压力、11 度的温度进行 15 分钟灭菌。

4. 灭菌后运至冷却槽，用水冷却、凝固琼脂培养液。

5. 冷却后，将培养箱用传送带运进无菌室，进行细菌的培植。因为内是真空，拔除固定物后空气流入，取出中箱，用培植棒将菌株涂抹在培养基面上。这项工作由两人一组进行。

6. 植入菌株的培养箱用传送带送进孵化室，根据菌类的不同，培养的时间有别，大体是 20 小时左右。一般是在下午植入菌株，第二天上午提取细菌。

① 坪为日本面积计量单位，1 坪约等于 3.3 平方米。

7. 细菌提取作业仍在无菌室进行，二人一组，一人拿提取棒刮剥，台子上放置宽口的蛋白胨空瓶，另一人用采集竹勺将分离出来的细菌装入空瓶内。

以上就是用石井培养箱生产细菌的大体过程。如果部队的设备全部开动，可使1000个石井式培养箱投入运转，全过程30个小时可生产10公斤以上的病原细菌。

为了监视细菌的培植和采集，柄泽班长或副班长等军官也进入无菌室，培植的时候，监督如何快速和确保在培养基上培植细菌时无杂菌，为了最少限度的避免杂菌的混入，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涂抹。采集的时候，一直由柄泽班长亲自秤量。在培养基上大批量生产的细菌多有透明感，看上去很干净。鼠疫菌就像纳豆一样能拉出丝^①，赤痢菌有黄瓜的气味，提取霍乱菌时沙沙作响，只是脱脾疽菌有些浑浊。

以上作业十分危险，作业结束后必须进甲酚浴池。但仍有不适应者感染上细菌，因感染死亡的队员也不少，同我一起到平房的少年队员中就有感染死亡者。

八、大批量生产细菌时期和生产细菌的种类

(1940年—1943年)

我经历的大批量生产细菌时期和生产细菌的种类，除前述1939年的情况外，概述如下。

1. 从1940年7月始的11个月期间，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

2. 1941年5月，大批量生产了鼠疫菌和脱脾疽菌。同年7月到9月，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

3. 1942年4月5日，大批量生产了脱脾疽菌和鼠疫菌。同年6月，大批量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和霍乱菌。

^① 纳豆是日本喜欢吃的用大豆制作的发酵物，拌以酱油混在米饭中吃。

九、大批量生产细菌和实施细菌战

大批量生产细菌的时候，同伴们都说“作命”、“检验”等略语。“作命”是“关东军作战命令”的简称，“检验”就是把细菌投入使用以检验细菌战的威力。我就亲身接受过“关作命第××号”。几乎所有从事细菌生产的队员都知道大批量生产细菌的作战命令。在采集细菌时班长总要指示“让杂菌小小的”，队员们都晓得如果混入杂菌，菌苗就不能使用。但是这些细菌送到那里？如何使用？一直到最后上司们也没有讲。可是，731部队利用石井式培养箱生产细菌，用飞机投向中国，或者在地面散布，使中国人染上疫病造成大量死亡的目的，下级队员们还是清楚的。大批量生产的细菌除了由三谷班干燥一部分外，都送往南京等华中地区。

十、关于实验材料“马路大”和人体实验

我最初听说“马路大”这个词是在入731部队少年队不久的1939年6月。夜里见到车灯光和听到响声，于是，内务班长说，“不准去走廊，都回到屋里，这是在搬运‘马路大’”^①这是第一次听说“马路大”。以后，我们渐渐知道了“马路大”是关押在部队监狱里作为“实验材料”使用的人。这以后的数日，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来队，石井部队长命令少年队列队欢迎，植田经过我们面前时，没看我们一眼就径直去了特别班。

有一天上操时，上面通知禁止在口号栋的屋顶进行，从屋顶可以看到口号栋院子里的人，但我们注意观察没有发现什么。

后来有几次在屋顶上操时，发现了戴着脚镣的一位金发俄罗斯女人和孩子以及中国人。

^① “马路大”在日语中的原意是“圆木”。

我所在的柄泽班归属第一课，是以试验细菌毒性为名义从事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的部门。在口号栋里还有七栋、八栋两所建筑，是关押中国爱国者的监狱，又是以人体实验这种残忍的方式屠杀他们的场所，内中还设有解剖室。这些人是日本特务机关、宪兵队作为“特别处理”的对象押送到731部队的。据我了解，七栋的二楼关押着女性，一楼是监视被实验者的看守室。我们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的目的是，检验我们制造的细菌的杀伤力程度，以及同疫苗的作用关系等，这一切都是利用活生生的人作实验品，并进行活体解剖，来检验结果。我们使用的疫苗是731部队自己开发的冻干疫苗（也有译作封闭疫苗）和外国制的疫苗。我参与的最初实验是果血进行抗体价测定，然后注射疫苗通过血液测定抗体价，但为了对比有一人不注射疫苗，另5人被注射了菌数不等的鼠疫菌。

十一、关于活体解剖

我是在1942年11月末，第一次参加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使用的是鼠疫菌。我参与活体解剖的第一位对象是中国人男性，直到今天我还记忆清楚，这个人是由我采的血，是没有注射疫苗的那个人，这位中国人男性给人的感觉是头脑清晰、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我当时看了他一眼，他闭着眼睛，如果是被鼠疫感染的人脸色和身体会发黑。这个人裸体被放在担架上，由特别班运送到解剖室。在解剖台上他已睡过去，班副军医命令我先清洗，我就用水龙头冲洗这个人的身体，再用刷子刷洗，因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体解剖，我的手、脚都慢吞吞的，特别是刷洗面部时，我迟迟疑疑没有动手，一旁的课长手持解剖刀示意我“快、快”，我这才用刷子开始刷洗躺在解剖台上、闭着眼睛的这个人，这个情节至今我还记得。

班副军医用听诊器听听这个人的心音，听诊器一离开这个人

的胸部，解剖就开始了。我负责把解剖后摘除下的脏器放入容器里，用准备好的培养基进行涂抹作业。

就这样，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杀害了 5 名中国人，在解剖第三名被害者后，班长说，“喂，你好不容易一个人（敢）靠前啦”。活体解剖同时由几个班进行，晚上，回到宿舍的浴池后，队员们就开始交谈，“喂，你们今天撂倒几‘根’？”，“我们两‘根’”。为什么说‘根’呢？，因为七栋、八栋关押的人都称作“马路大”，‘根’数就是活体解剖的人数。活体解剖被杀害者的尸体，丢进特别设置的高烟筒焚烧炉里烧毁，连骨灰也不会留下。

和我同在第四部第一课的一位同僚，是一起来平房的千叶少年队的朋友，他在大批量生产细菌时感染了鼠疫，我当时以为他被送进了医院，其实他是被特别班收容，后来，他也被活体解剖了，这次解剖同我也有关系。

十二、不能掩盖 731 部队的战争犯罪，为了不再度发动战争，必须把 731 部队的事实传讲下去

我愚钝地服从、执行上司的命令，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所以，作为战争犯罪实行者的我负有责任。1952 年，我因为是 731 部队队员被新中国逮捕，从日本战败到被逮捕的过程已在开头语里说明。我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四年的拘禁时间里，同其他被拘禁者一样，当初是持对抗态度的。我以为，自己作为 731 部队队员犯下了残虐的罪行，一定会被当作战犯处死。可是，中国战犯管理所的先生们对我们日本人战犯，是抱着“恨其罪而不恨其人”的态度，给予温情的待遇，允许开展文艺、体育活动，还有许多书，给我们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这样，经过充分的反省和热情的指导，把我从小学开始接受的美化战争、把战争正当化的屁道理一个个地剥得体无完肤，随着（犯罪）事实的不断鲜

明，惭愧的心情涌满胸膛，终于认识到我的行为是作为人类绝对不能容忍的犯罪。

1956年7月，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对我免于起诉，于是，我返回了日本。战犯管理所使我从鬼变成人，是我的新生之地。日本政府自战后以来，对以731部队为中心的细菌战部队的组织建制、细菌生产、人体实验、细菌战等实际活动一概隐瞒，而且持续到今天。日本不认真地反省侵略战争，但这些事实还是暴露出来。

我对自己所犯下的731部队的战争犯罪，终生负有向全世界传达的责任，从这个理念出发，我在这里向法院证言731部队的真实。

第二部 筱塚良雄向731部队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 诉讼法庭提交的“自己罪行”

一、平时杀人的罪行

1. 进行人体实验杀害中国爱国者的罪行

1) 我于1939年5月12日侵入中国，在哈尔滨郊外的平房原关东军给水部队（731部队）特别班和该队第四课第一班柄泽班充当雇员，同柄泽班技术员宇野诚一起受课长铃木启之少佐的命令，以实验人体防御能力和（细菌）毒性为目的，于1942年10月中旬，在实施实验的第一天对5名中国爱国者（囚禁在731部队特别班）进行采血和测定免疫价，翌日对其中的4名中国爱国者注射了四种鼠疫菌预防液（加温疫苗、混合疫苗、生菌疫苗和冻干疫苗），一周后再次注射。人体实验的一个月后，又向5名中国爱国者各注射了1cc含有0.05毫克的鼠疫菌液。经过这次注射，使5名中国爱国者患上严重的鼠疫，其中3人杀害

之，另外 2 人提供给诊疗部做人体实验也予以杀害。

这次实验是我同宇野诚共同杀害了 5 名中国爱国者，通过杀害这些人检验了大批量生产细菌的毒性，并将毒性增强的资料交给铃木启之课长。

2) 1943 年 1 月中旬，我同宇野诚对监禁在特别班的 2 名中国爱国者各注射了 1cc 含有 0.03 毫克鼠疫菌的菌液，使其患上严重的鼠疫病，约三天后将 2 人杀害，用以检定大批量生产细菌的毒性。

1943 年 12 月初，我在伪满州医科大学神经病科做技术员时，一位患早发性痴呆的中国人男性石氏（18 岁）在这里住院，因看护不良两足患二度冻伤，我为学习截肢技术，由护士大津三好帮忙，在夜间不注射麻药的情况下秘密将石氏的两脚截掉，第二天石氏因失血过多死亡。

二、制造细菌武器的罪行

1. 制造用于杀害中国人民的细菌武器的罪行

1) 培养用于杀害中国人民的跳蚤的罪行

1940 年 5 月初到 6 月初，为培养杀害中国人民的跳蚤，我同 18 名少年队员在田中班技术员田中的指挥下清洗石油罐，然后在罐内放入少量小麦和装人老鼠的笼子，约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给老鼠喂胡萝卜，并把死老鼠剔除，换上活鼠。我每天负责 10 个石油罐，能培养 70cc 跳蚤。同年 6 月初，在技术员田中指挥下同 15 名少年队员一起，将培养的 900cc 跳蚤和从动物班领到的 2000 只老鼠搬运到飞往南京的飞机。

2) 制造用于杀害中国人民的细菌的罪行

(1) 1940 年 7 月初旬到 11 月初旬期间，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参加了长春的鼠疫防疫，由关东军给水部队（加茂部队）临时编成，川岛清大佐为总指挥，包括少年队员计 120 人参加。其罪行加下：

1940年7月初旬到8月下旬，在一大队神崎中队负责采集霍乱菌、副伤寒菌的技术员今野信次的指挥下，我同30名队员一起培植细菌。每天与两个人共同在40个培养箱里培植细菌，每箱可提取约三公斤霍乱菌的鼠疫菌。

从1940年8月下旬开始，约有二周时间在本部的材料班从事细菌生产。约有一周时间受小林松藏少尉的命令，同材料班加藤嘉之和三谷班的河合美人一起制造运输细菌需要的干冰。此后约一周时间在军曹前川富治的指挥下，同十几人一起准备1000个培养箱所需要的材料。每天我一个人要制作培植细菌需要的棉棒200根、以及准备采集细菌用的竹勺、容器、蛋白胨空瓶的灭菌等，这些都是为了保障能顺利采集杀害中国人民的细菌。

1940年9月初，在第二大队长铃木启之少佐命令下，同材料班的其他三人在研究室里把10公斤的伤寒菌苗装进蛋白胨瓶中，分成两个木箱（内有铁皮），装入干冰，然后密封，搬运到翌日飞往南京的飞机上。

1940年9月初到11月初（期间约有一个月时间在长春），在技术员今野信次指挥下，在本部菌株班同其他4人制造培养细菌用的3%普通琼脂，每天需完成能提供1000个培养箱使用的数量，此外，还要进行器皿、器材的灭菌消毒，以保障大批量细菌生产的需要。

通过大批量细菌的生产，合计生产了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脱脾疽菌、鼠疫菌等27?公斤左右（?原文如此），用航空班的飞机运到中国的南京和华中地区，关东军给水部队本部（加茂部队）还组成了由大尉柄泽十三夫率领的远征队进入华中地区，实施细菌战谋略，杀害华中地区的中国人民。

（2）1941年5月初开始，约20天的时间里，受第四部第一课柄泽班班长柄泽十三夫大尉的命令，我与18名少年队员接受三谷班（细菌干燥班）生产脱脾疽菌的任务，在军曹今井信次

的指挥下，二人一组在无菌室里培植脱脾疽菌，一天培植 25 箱细菌，大约生产了脱脾疽菌和鼠疫菌 700 克左右。另外，期间约有 9 公斤脱脾疽菌和鼠疫菌运到第四部三谷班，由三谷班进行细菌干燥。

(3) 1941 年 7 月初到 9 月初，在柄泽十三夫班长命令下，同 30 名队员在无菌室生产伤寒和副伤寒菌，由军曹今井信次直接指挥，二人一组，一天负责 50 个培养箱，期间我采集了约 3 公斤左右的细菌。全员总计生产伤寒、副伤寒、霍乱等细菌 70 公斤，用航空班的飞机运到南京，用于杀害中国人民。

(4) 1941 年 8 月中旬到 9 月初，受班长柄泽的命令，接受大连卫生研究所交付的生产鼠疫菌的任务，由今井信次军曹指挥，我同 30 名队员参加，二人一组，每天培植 50 个培养箱，期间我共采集了约 6 公斤鼠疫菌，全员计生产约 70 公斤，由柄泽班的人员轮流公出送到大连卫生研究所。

(5) 1941 年 12 月初开始，受班长柄泽的命令，约 10 天时间在技术员宇野诚指挥下，在研究室同其他二人制造培植细菌用的试管，一天制造 50 支，供给无菌室，期间共制造了约 500 支鼠疫菌株试管，我个人完成 250 支。

(6) 1942 年 4 月初到 5 月初，受班长柄泽的命令，在接受三谷班生产脱脾疽菌和鼠疫菌的任务时，由技术员宇野诚指挥，我同其他三人在无菌室生产菌株，一天生产 75 株，供给无菌室。期间共生产了 2250 株（其中我生产了 750 株），这些菌株可生产约 33 公斤脱脾疽菌和鼠疫菌，由三谷班进行干燥，用于杀害中国人民。

(7) 1942 年 6 月中旬到 9 月中旬（期间有一个月回国休假），受柄泽班长命令，在技术员宇野诚指挥下，同其他 5 人在研究室生产菌株，一天需保证 300 个培养箱使用，菌株种类有伤寒、副伤寒、霍乱等，每天、每种各 150 株，提供给无菌室

(期间我生产了 1800 株)。在这个期间，共生产伤寒、副伤寒、霍乱菌约 140 公斤，先后用飞机运到南京地区，用于杀害中国人民。

(8) 1941 年 8 月中旬，受柄泽班长命令，30 名队员在生产航空班试验所需的 800 克鼠伤寒菌期间，在今井信次军曹指挥下，我参与了培养箱培植细菌的工作，二人一组，负责 10 个箱，我个人采集了大约 70 克细菌。生产的 800 克菌液装进石油罐里，班长命令我和另一人把罐子搬运到航空班。后来，这些细菌被航空班洒在哈尔滨市郊的蔬菜洗涤场所，因此，在哈尔滨市流行于伤寒，使中国人民陷入痛苦之中。而 731 部队和哈尔滨陆军医院却散布说，“在哈尔滨蔬菜洗涤场所流行的伤寒是苏联的细菌战阴谋”。

2. 生产杀害外蒙和苏联人民细菌武器的罪行

1) 生产杀害外蒙和苏联人民细菌武器的罪行。1939 年 7 年初到 8 月下旬，以培养基班班长早川清少佐为总指挥对诺门汗实施细菌战阴谋之时，少年队参与了大批量生产细菌的作业。我在技术员宇野信次的指挥下（宇野属于小林队的无菌室），在无菌室培植细菌，二人一组，每天需培植 30 箱。期间我采集了大约 1 公斤细菌。然后受命将大批量生产的细菌搬运到将军庙、海拉尔等地，在诺门汗事件中使用。

2) 制造杀害外蒙和苏联人民的细菌散榴弹的罪行。1939 年 6 月中旬，山口班班长、技师山口指挥 6 名队员生产杀害外蒙和苏联人民的细菌散榴弹，我也参与其中，受山口班军曹笛木指挥，同其他二人在直径 0.5 公分、长 1.5 公分的铁片上锯出 X 型槽，然后涂上防锈剂，3 人共干了 3 天，生产了约 2000 片弹片。制造的细菌散榴弹由山口班在诺门汗前线用野炮发射使用，杀害外蒙和苏联人民。

三、搬运细菌武器的罪行

1. 1939 年 8 月下旬，奉第一队长小林松藏少尉命令，在田部班同三名队员制造 2 个石油罐，用于装载每 cc 含有 30 毫克伤寒菌的菌液，第二天，同其他 2 人将细菌罐押运到伪兴安省的将军庙，交给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石井部队）碓（常重）挺身队的难波准尉，这些细菌被碓挺身队投入到哈拉哈河中，实施了细菌战。

2. 1941 年 10 月初，受第四部第一课柄泽班班长柄泽十三夫命令，我同另一人将装在 5000cc 试管里的鼠疫菌计 10 公斤送到大连市霞町大连卫生研究所，交给该所技师仓内。

四、参加人体实验的罪行

1941 年 5 月初，山口班在航空队附近，由课长碓常重、班长、技师山口指挥进行细菌弹爆破人体实验，在杀害中国人爱国者之前，受柄泽班长命令，我同少年队员 5 人，另有山口班员 6 人携带灭菌罐先进入实验现场，灭菌罐中装有培养基 200 枚，其中，3% 普通琼脂培养基和远藤氏培养基各百枚。在山口技师的指挥下，我们挖了 12 个坑埋入木桩，用来捆绑被监禁在 731 部队里、用于细菌弹爆破实验的中国人爱国者。当 731 部队的宪兵曹长田坂具隆等 5 人押解中国人爱国者乘有棚汽车到达现场后，田坂命令我和柄泽班的 5 个人归队。这样，可能有 12 名中国人爱国者被捆绑在我们埋设的木桩上杀害。

五、制造用于人体实验的预防注射液的罪行

1940 年 9 月初，受铃木启之少佐命令，在菌株班制造鼠疫和冻干疫苗时，由技术员今野信次直接指挥，我与另外 2 人把 50000cc 的鼠疫菌液制成注射液，然后同 6 个人一起把注射液分

注入 50cc 的注射瓶里，计完成 2000 个注射瓶。这些装有鼠疫菌的注射液由部队的医务室向住在附近的中国人居民做实验性注射，结果被注射者发生了强烈反映，有 2 人因此死去。其它注射液送到长春，在长春防疫鼠疫时使用，给许多中国人带来灾难。

六、进行细菌战演习的罪行

1940 年 7 月初，为进行细菌喷雾式抛洒实验，在中队长宫崎凉臣的指挥下，我与 12 名队员带着装有培养基的灭菌罐，在距本部西北 3 公里左右的地方，每人各将 50 枚培养基散布在地面。当航空班的飞机从空中洒下大肠菌时，将培养基的盖揭开，结束后再封盖带回队里。翌日计算培养基中的细菌数量。通过这项实验，获得了大批量生产细菌、用于杀害中国人民的数据。

七、协助细菌战研究的罪行

1941 年 12 月到 1943 年 3 月末，受柄泽班长命令，由技术员宇野诚指挥，我同另外 2 人进行器材的洗净、消毒、灭菌研究，以及饲养实验动物，制造实验用的培养基等。期间还进行了鼠疫菌的封闭测定，为大批量生产细菌和研究培养条件提供资料。又进行了生菌数量的计算，提供大批量生产细菌的生存菌数的资料。另通过实验动物的毒性实验，检定大批量生产细菌的毒性。此外，还在技术员宇野诚的协助下，进行了脱脾疽菌的动物实验。这些实验和研究都是为了顺利地大批量的生产细菌。

八、参加轧杀中国人民的罪行

1942 年 6 月初，731 部队运输班班员增田驾车从平房去番町，我当时坐在车上，汽车以 70 公里的速度行驶，在到达番坊前约 2 公里处撞到一位农民模样的老人，老人被冲击力撞倒在地后就一动不动了，我们一行人若无其事的逃离现场。

九、伤害中国人民的罪行

1. 1940 年 5 月中旬，我为部队的动物班管理马匹时，骑马到哈尔滨郊外的铃木组处，马闯进中国工人的驻地，踢伤一位 35 岁男工的面部，造成脑震荡和鼻出血倒在地上，我只是做了应急处理后就逃离现场。

2. 1944 年 2 月初，我在伪满州医科大学神经科诊断室作技术员时，为学习腰椎穿刺技术，对住在该院的中国病人王某做了腰椎穿刺，王某是患寄生虫病，却以精神异常收在神经科，我在操作时因技术不良，穿刺针在患者的脊髓腔内折断，王氏因此不得不到外科做大手术，给其带来极大的痛苦。

3. 1944 年 10 月初，我在黑河神武屯受驻守在这里的关东军 54 师团山形联队（1215 部队）一大队三中队三光山监视哨哨长、见习士官酒井原的命令，在该哨一等兵、翻译、伍长佐藤义雄的直接指挥下，同另 2 人换着中国人的服装，潜伏在距三光山约 5 公里处准备逮捕中国人受国者（当时称中国人密侦），晚 8 时左右，发现一位中国人（名字、年龄不详）走在前面，于是从后面发出恫吓声，那位中国人就向前跑，佐藤用手枪发射，我也开了枪，结果在地上发现有一些血迹，中国人去向不明。

十、逮捕拷问中国人民的罪行

1. 1944 年 8 月初，我在黑河神武屯受驻守在这里的关东军 54 师团山形联队（1215 部队）一大队三中队三光山监视哨哨长、见习士官酒井原的命令，在伍长佐义雄的直接指挥下，同另 2 人换着中国人服装，潜伏在三光山附近准备逮捕中国人爱国者（当时称中国人密侦）。夜 11 时左右，将经过的 2 名中国人逮捕押到分所，从凌晨 2 时开始，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对这 2 名中国人用皮带拷打逼问，两名中国人全身肿胀，不能步行，我也参

加了拷问。第二天把二人押送到神武屯宪兵队（两名中国人的姓名不详，一人22岁左右，一人45岁左右）。

2. 1944年9月下旬，受驻守在黑河神武屯的关东军54师团山形联队（1215部队）一大队三中队三光山监视哨的派遣，潜伏抓捕中国农民，哨长酒井原用皮带殴打两名中国人时，我担当该哨的一等翻译。被酒井拷问的中国农民中有一人（35岁左右，名字不详）混身红肿，行走不便，第二天放其回家。^①

十一、强奸罪行^②

1. 1943年12月初，我在伪满州医科大学神经科做技术员时，将轻病室的女患者马某（22岁）强奸。

2. 1943年，在满州奉天大西街奉天同善堂医院，将病理实验室的女化验员季某（19岁）强奸。当时我是该院的技术员。

3. 1945年8月初，我在关东军125师团军医部当兵长，驻守在遣化市胜利街，有一位中国人王某在师团部做佣人，他的妹妹（23岁）被我强奸。

十二、殴打中国人的罪行

1. 1944年7月中旬，我在黑河神武屯，受驻守在这里的关东军54师团山形联队（1215部队）一大队三中队三光山监视哨哨长、见习士官酒井原的命令，同6名士兵一起对三光山附近的村落进行不法户口调查，我是二等兵翻译，在调查时以出示身份证拖延为由，将一名中国男人捆绑殴打，直至面部红肿。

2. 1944年10月中旬，我任关东军驻神武屯第54师团山形联队（1215部队）一大队三中队一等兵翻译，奉中队长佐藤正

^① 以上是自供人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时的认罪书内容，另有6页遗失。

^② 以下是自供人自撰的《杀戮工厂》的一部分。

命令，在松田军曹指挥下夜间潜伏在外抓捕中国爱国者。夜 9 时左右，我在神武屯车站附近检查一位中国农民（25 岁左右）的身份证，以其动作迟缓为由将他殴打四次，以至面部红肿。

3. 1942 年 12 月初，我在 731 部队任雇员，同 3 名士兵一起乘马车从哈尔滨中央大街到南岗秋林，到达目的地后嫌车费贵，将车夫殴打一顿后，一个钱也没给扬长而去。

4. 1945 年 5 月中旬，我在 731 部队教育队任上等兵，同 2 名士兵乘马车从哈尔滨地段街到南岗关东军医院，到达目的地后嫌车费过高，三人一起动手殴打车夫的头部、腰部和腿部，使其不能行走，然后一个钱不给一走了之。

5. 1945 年 8 月初，我在通化关东军 125 师团军医部当兵长，从通化市龙泉街乘马车去车站，到站后仍以车费高为由将车夫毒打，车夫面部红肿，随后依旧是不付一个钱走之。

6. 1941 年 8 月中旬，我为 731 部队第一课柄泽班雇员，在一次夜间警戒行动时，有报告发现烟火（当时称作“狼烟”），遂于凌晨二时左右对距本队 3 公里处的中国人村落搜查，并用枪托殴打了一位 45 岁左右的中国男人，理由是他没能痛痛快快地出示身份证，被打的中国人一时不能行走。

十三、祸害中国人的罪行

1. 1940 年 10 月初，我为 731 部队临时编成的新京鼠疫防疫队病原检索班的雇员，在新京顺天町附近发现有 6 座中国人坟墓，我同 3 名班员将棺槨破坏，用穿刺针在尸体上乱扎乱戳，然后离去。

2. 1940 年 10 月，我参加 731 部队临时编成的新京鼠疫防疫队病原检索班，受班长神崎知大尉的命令，怀疑居住在新京大马路附近的三户中国人家有鼠疫患者，于是我同 3 名班员以捕鼠为由进入民户，不顾他们的反对就施放了甲醛瓦斯，使邻近的 70

多名中国人呼吸困难。随后，又在他们的家具上洒上浓浓的漂白粉，在服装上洒上煤酚，大约有三十几件服装因此不能穿用。

十四、放火罪行

1940年10月中旬，我在参加731部队临时编成的新京鼠疫防疫队病原检索班期间，防疫队建设班人员奉石井四郎的命令，在新京白菊町附近的家畜医院放火，点起火后我受班长神崎知大尉的指示，以捕鼠为由也同建设班的人员在院内洒石油，这所属于中国人财产的家畜医院因此被烧毁。

十五、使役中国人的罪行

1. 1944年10月中旬，在我任关东军驻神武屯第54师团山形联队（1215部队）一大队三中队一等兵翻译期间，奉中队长佐藤正的命令，征用了37名中国劳工对神武屯附近的坦克壕、交通壕、战壕等进行加固或改建，劳工是通过伪县公署征集的，前后十天左右，我也参与其中。

2. 1945年7月初，奉关东军125师团医部畜长伊藤的命令，将居住在辑安县城制材工厂附近的军医部高级部员及家属的行李物品运到通化市龙泉街，时为上等兵的我和另外2人负责。但我们不愿意出力，就强征了中国农民的三辆马车把货物从制材工厂运到辑安车站。到通化后也是征用通化市江东区三名农民的马车，最后把货物从通化车站运到东昌区龙泉街。

3. 1945年6月初，在四平军人会馆（以下缺页）……准备对收容在同学善堂的儿童进行超音波疫苗的人体实验，以检验其效力。由凑技师担任技术指导，他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的技师，时在奉天铁西俘虏收容所从事研究。我按照他的指示潜入同善堂医院，准备秘密实行人体实验，但因为凑技师转岗没有实现目的，四天后接到归队的命令返回了通化。

以上，我作为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弟，但从幼时就在军国主义思想意识的支配下，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卖了民族利益，成为帝国主义的爪牙，在资产阶级和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下，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愚钝、疯狂思想意识的无赖，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供述人 田村良雄^①

1954 年 9 月 8 日

于抚顺

^① 筱塚良雄当时的名字。

侵华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 山东省受害者调查报告

杨玉林 刁乃莉

编者按：“特别输送”是中国学者用来翻译日语中“特移扱”的专用词语。其背后隐藏着的是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人体解剖、人体细菌武器试验等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极端罪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中国人、苏联人、朝鲜人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深重苦难。简而言之，“特别输送”是侵华期间分布于中国各地的日本宪兵队、宪兵支队或分遣队，按照关东军司令长官秉承以日本昭和天皇为最高统帅的日本军部的授意而发布的血腥命令，在中国各地抓捕中、苏、朝等国抗日志士及一般平民，经过审讯或不经审讯而强加罪名后，秘密押送移交给731细菌部队用作人体解剖、人体细菌试验的，在731细菌部队建立后至194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这一期间形成并在日本侵华军队中普遍实施而又十分秘密的一项罪恶制度。1998年底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52份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特别输送”秘密档，2001年9月吉林省档案馆也向社会公布了80卷400余件涉及277名被“特别输送”至731部队以供细菌实验的人员的档案，为人们在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揭开侵华日军这一罪恶制度的黑幕，提供了强有力的档案基础。本刊曾于总103号、总104号连载了杨玉林、刁乃莉提供的《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案例调查》。本篇是两位作者依据“特别输送”秘密档案为线

索，对山东省十位受害者进一步调查的成果，对这些受害者生平故乡、被捕情形、遗属生活等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报道，从一个侧面对当年侵华日军残酷迫害中国人民的罪恶进行了揭露。其中国恩章、刘文斗、董殿全、段凤楼四位人物虽于前篇《案例调查》中有所涉及，但在本篇中调查者走访更为全面，调查所得亦较详细，可与前篇互相补充。今特于本刊掲載，以为研究日本侵华史、侵华日军暴行史的学者参考。

自从1998年底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52份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秘密档案以来，我们根据这些档案的线索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调查，目的是寻找细菌战“特别输送”被害人的遗属、遗物和其他实证材料，探询这些被害人的生活轨迹，了解他们的家人的遭遇和现状。由于这些被害人的被捕地绝大多数都在黑龙江省地域之内，我们在第一阶段主要在黑龙江省的有关地区进行调查，结果找到了10个被害者家庭和大量丰富生动的实证资料（已有相关报告和论文发表）。但是，还有大部分被害者的遗属或线索在黑龙江省的被捕地无迹可寻。鉴于这些受害人大多数是山东移民，我们又在第二阶段转赴山东省，进行跨省的追踪调查，结果又有很多的发现和收获。

我们于2001年8月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山东省进行调查，范围主要集中在胶东半岛的烟台、威海和青岛地区，先后走访了栖霞、招远、莱州、龙口、莱阳、乳山、莱西、胶州、即墨、平度等市县，以及荷泽地区的郓城和聊城地区的高唐等地。此次调查共找到董宪度、国恩章、季兴田、张汝成、刘文斗、董殿全、段凤楼、任殿曾、李怀显、李福林等10个受害者的家庭。除了受害者遗属的访问录音和照片之外，我们还发现了很多与受害者家族有关的家谱、祠堂、故居、墓地、墓碑等实物资料。出乎意

料的是，此次在山东调查得到的材料比我们在黑龙江省本地找到的还要详细。这大概与山东人的生活习惯和历史传统有关。山东人习惯于家族聚居，除非迫不得已远迁他乡，一般从不离开自己的祖居地，而且大都有保存和续写家谱的传统。在我们走过的许多地方，往往是一个村子里只有一两个姓氏，大家彼此都是同族或本家。在一些村子里，与我们要找的受害人同辈甚至同名的人相当多。这些恐怕是我们在山东的调查收获颇丰的一个重要原因。

下而，对此次调查发现的 10 位受害者的有关情况做一概要介绍

一、胶东抗日根据地的年轻共产党员姜宪度

黑龙江省档案馆“特别输送”档案等 63 号记载：姜宪度，时年 26 岁，原籍山东省招远县洼子村，1940 年在招远县冯河加入八路军胶东第五旅第十四团一营二连当战士，来东北之前担任山东战时后方委员会胶东联合办事处西海区助理（中共党员）。1944 年 1 月 15 日，姜宪度以探亲为名从大连过海来到伪满洲国的“新京”长春，1 月 23 日在日本关东宪兵队教习队附近侦察日军军情时被捕。审讯后新京宪兵队认为该人“共产主义思想浓厚，态度强硬、很难悔改，且无利用价值”，于 2 月 29 日上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建议将姜宪度“特别输送”。^①但在档案中未见“特移”指令。不过，在“新京宪兵队”呈报给关东宪兵司令部的姜宪度审讯报告上面，有手写的红色眉批“姜宪度，特移”等字样。在 1950 年代国政府审讯日本宪兵队战犯的口供

^① 见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档案第 63 号《新京宪兵队关于审讯原山东战时后方委员会胶东联合办事处西海区助理姜宪度的情况报告》（1944 年 2 月 29 日）。

记录中，有新京宪兵分队庶务班长坂根觉次郎和分队长藤原广之进等人供述，曾将“中共某县助理员稚宪度”、“中国共产党员稚某”于1944年3月“送到哈尔滨石井部队去供做细菌实验”。^①这里的“稚”字与“綦”字发音相近，一定是翻译当中或日本人记忆当中的错误。因为在被捕和“特移”的时间（1944年1月底被捕、同年2月29日提出“特移”报告）以及被害人的身份和逮捕、审讯过程等方面，档案记载与日本战犯的供述都互相吻合。所以，毫无疑问，“稚宪度”就是綦宪度，綦宪度已经被“特别输送”到731部队。

2001年8月3日，我们在山东省招远县洼子村找到了綦宪度的堂弟、79岁的綦宪瑞老人。由于綦宪瑞与綦宪度从小一起长大，而且年龄相仿，后来又因为綦宪度被捕而受过牵连，所以他对綦宪度其人其事有很详尽的了解。通过綦宪瑞，我们又了解到，綦宪度有兄弟三人：大哥綦宪忠，弟弟綦宪浩，还有两个妹妹綦宪秀和綦宪志，他们都在解放后去北京定居。根据綦宪瑞提供的模糊线索，我们于2002年2月到北京寻访。最后在北京市公安局户籍处的协助下，通过微机查询找到了綦宪秀和綦宪志。通过对綦宪瑞和綦宪秀、綦宪志姐妹的访问，綦宪度的故事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綦宪度家本是洼子村的大户人家，可以说是家道殷实、人丁兴旺。綦宪度的父亲綦宏顺继承祖业，在北京东珠市口经营“鼎义泰”绸缎庄。我们在綦宪瑞家的西邻看到了綦宪度出生、长大的四合院，虽然已经破败，但从宽敞的院落和雕饰精美的青砖瓦房，仍依稀可见当年的规模和阔绰。綦宪度的母亲姓王，所以他的别名“王子俊”必是取自母姓。綦宪瑞说，“你要说綦宪

^① 中央档案馆等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6—128页。

度的别名叫王子俊，那是他姥娘家的姓，他妈妈姓王。以前我们这改名的很多，参加工作了都喜欢改个名。” 綦宪度自幼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在招远县唯一的一所中学毕业，之后就去北京学做生意，在北京珠市口“德兴源”毛皮商店做店员。但仅两三年之后，他又回到老家结婚成家。当时正逢胶东地区抗日战争闹得轰轰烈烈之时，綦宪度回到家就开始到处宣传抗日，后来又参加了八路军，常年在外不归。用綦宪瑞的话来说，綦宪度抗日“最坚决了，媳妇去找他也不回家，就是一个心地抗日，说是非打倒日本鬼子不行，结果他媳妇连个孩子也没给他生，后来改嫁到别的村去了。”至于綦宪度究竟在抗日队伍里做什么工作，家里人并不清楚，但知道他肯定是个干部。綦宪瑞说：“他现在要活着肯定到中央去了”。^①另外，綦宪度的大哥綦宪忠也参加过抗日，当过乡上的教育助理。

由于特殊的原因，綦宪瑞对綦宪度被捕前后的情况知之甚多。原来，綦宪瑞在1940年前后去了东北，在哈尔滨市道里十道街1号一家粮米杂货铺当伙计。1944年1月24日，旧历甲申年的除夕之夜（档案记载綦宪度于1944年1月23日在长春被捕），日本宪兵突然闯入店中，将正在与同伴们守夜打牌的綦宪瑞抓走，并押解到道里斜文街哈尔滨宪兵队本部。在审问过程中，日本宪兵队的头目数次打电话核实綦宪瑞的身份，最后在一张纸上写了“山东省招远县洼子村，綦宪瑞，当年21岁，”这与綦宪瑞的真实情况丝毫不差。由于綦宪瑞到东北以后用的是假名“齐贤瑞”和假的岁数（25岁）、原籍（山东掖县），因而他一口咬定自己不是綦宪瑞，在一个中国翻译的说合下他被放了回来。后来他从到长春去的一个老乡口中得知，綦宪度在快过年时

^① 根据笔者访问綦宪瑞的录音材料，以下各部分当中使用和引用的采访资料均根据各相关证人的访问录音整理材料，不再一一加注。

从山东来到东北，投奔在长春做买卖的岳父孙某，夜里到日本宪兵队附近去“溜达”时被宪兵队发现抓住。实际上他必定是奉命利用关系潜入东北搜集日军情报。当时中国抗日战争已开始进入反攻阶段，山东解放区确曾大批向东北派遣秘密情报人员，以便为收复东北做准备。详情有待于查阅中共山东解放区的有关档案。

蔡宪瑞说，准是蔡宪度被抓以后挺刑不过把他咬了出来，因为蔡宪度的亲弟弟蔡宪浩当时也在哈尔滨当伙计，旧历新年之前回老家结婚，蔡宪度肯定是通过蔡宪浩了解到他的情况。而且不光他一个人受牵连，蔡宪度的岳父孙某和蔡氏兄弟的一个本家叔叔蔡宏雁（亦在长春）都被抓了进去。孙某因为家里用很多钱疏通关系，很快就被释放。那位本家叔叔却无辜被关押审讯拷打了数月之久，释放以后已被折磨成了一个废人，双眼因反复灌辣椒水而失明，回家不久就死了。实际上，蔡宪瑞不一定是蔡宪度“咬出来”的，蔡宪度的岳父孙某和那位本家叔叔都可能在拷打之下说出蔡家在东北的另一个成员蔡宪瑞。据蔡家人听出狱以后的蔡宏雁说，蔡宪度在日本宪兵队里的表现是很坚决的，一直在喊“共产党万岁”。日本“新京宪兵队”在审讯报告中说蔡宪度“在审讯过程中屡屡发狂、欣然殉道”，恰好证实蔡宏雁所说不虚。

蔡宪度被捕以后再无消息，蔡宪瑞说，有人传言他被日本人用绞肉机给绞了。这种说法倒是同被送到细菌部队做细菌实验的真实结局暗相吻合。无论如何，蔡宪度毫无疑问是为了民族独立而壮烈牺牲在日军细菌魔窟里的抗日烈士。但是，由于下落不明，当地政府对蔡宪度本人和他的家人都没有任何说法和结论，一位年轻的抗日战士和共产党员就这样在日军细菌部队的魔窟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蔡宪度的兄弟姐妹先后移居北京，都是去投奔父亲蔡宏顺。

綦宏顺解放后不久去世，綦宪忠、綦宪浩都继承父业，在北京的商业部门工作，但这兄弟俩已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先后去世，他们的儿女仍在北京居住。綦宪秀和綦宪志姐妹俩也年事已高。綦宪秀 1928 年生，现住北京新街口，丈夫杨寿堂也是招远县洼子村人，夫妻俩均早已退休，与两个儿子生活在一起。綦宪志现改名綦淑荣，1930 年生，现住北京朝阳区延静里。姐妹俩一提起二哥綦宪度，都止不住痛哭流涕。綦宪志说：“提起二哥我就非常伤心，非常难过，心里像刀绞一样。他是最优秀的哥哥，是一心一意抗日干革命的，是被日本帝国主义残害致死的，是革命烈士。我身体不好，一提起哥哥来就血压升高，几天都平静不下来。”

二、少小离家的国恩章

黑龙江省档案馆所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国恩意，别名国高，因“苏谍”安鸿勋^①“供述”，1941 年 8 月 11 日将其逮捕。国恩章当年 32 岁，独身，原籍山东省掖县过西村，原籍地有父亲国登文、母任氏和弟弟国恩周。1926 年来东北，曾入苏联境内做工，被捕时在虎林县虎头村明远春饭店当厨师。系 1934 年在苏联境内时被发展为秘密情报人员，“长年累月进行谍报工作，对日满军危害极大”。1941 年 8 月 27 日，日本关东宪兵司令部指令将国恩章“特别输送”。^②

我们在黑龙江省内调查时，在国恩章的被捕地虎林市，找到

① 安鸿勋亦在 52 份档案之内，笔者已经在黑龙江省虎林县找到其家人，详情请见《中国近代史资料》第 103 号笔者发表的调查报告。

② 见黑龙江省档案馆编《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一书关于国恩章的记载，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出版；关于以下其他被害人的档案情况，除该书未收入的内容单独做注以外，其余不再一一加注。

了他工作过的明远春饭店店主杨明久的家人。杨明久本人已于1980年去世，杨明久的妻子、1911年出生的邓文红老人不仅健在，而且头脑清楚。她说很熟悉国恩章，记得他比她大一岁，属狗的，是山东掖县过西村的老乡，在明远春饭店“跑堂”，30多岁的时候被日本人抓走以后再没回来。而且在这之前，国恩章就曾经因为贩卖呢子大衣被日本宪兵队抓过，后来被放了回来，“被打得够呛”。邓文红还肯定地说，国恩章来东北以后再也没回山东老家，而且一直是独身一人。邓文红老人的回忆与档案的记载完全一致，证明国恩章实有其人。但是，要寻找国恩章的家人，只有到他的山东原籍才有可能。

2001年8月4日，我们到了国恩章的老家，即山东省莱州市（原掖县）的过西村。国姓是过西村的大姓，共有200多户，现在“恩”字辈的人仍有很多，我们碰到的第一个姓国的人就是“恩”字辈的。该村的现任村长、支部书记等很多干部都是国氏家族的人，听说我们寻找国恩章的家人，都非常热情地帮忙。经过了解，得知国恩章的直系亲属已经不在村里居住，我们在村里只找到了国恩章的族侄、75岁的国绍博，只有他比较了解国恩章家的情况。

国绍博说，他不知道国恩章这个名字，但对国登文夫妇和国恩周等人却非常熟悉。他只知道国登文的大儿子小名叫“高”，十七八岁的时候就离家去了东北，一去再也没有回来，他根本就没见过这个人。这个小名“高”说明了“别名国高”的来历；而国恩章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1926年左右，这两点都与档案记载相一致。国绍博1927年才出生，当然不会见过国恩章。

国绍博说，国登文年轻的时候抽过大烟，所以把家里弄的什么都没有。他的老伴是高密县人，两人共生有5个儿子2个女儿，日子过得很穷，一家人经常靠要饭过日子。因为穷，老大国恩章才在很小的时候就去闯关东。后来家里人听说这个人没有

了，好像是“让日本人给踢蹬了”，就是被日本人害死了。

国登文的二儿子就是档案中记载的国恩周，国绍博说他的名字叫“双”。老三、老四的名字不详。老五国恩成与国绍博同岁，所以也很熟悉。国恩章的四个兄弟解放前也都去了东北，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家里就剩下国登文老两口。解放以后除了老大国恩章以外，其他四个儿子都回来过，是回来结婚的，之后又都回了东北，住在沈阳、长春等地，地址不详。解放后不久，国登文的老伴去世了，他就到长春去投奔儿子，据说活了九十多岁。

国恩周后来调转到北京的一个商业部门工作，文化大革命时曾两次回到过西村，是回来送退休干部，回来时就住在国绍博家里。国绍博只记得他说过是在什么商业单位做人事工作，在北京住的地方叫什么“井”，好像是王府井。后来笔者到北京进行过多方寻访，均没能找到国恩周。另外国绍博还听说老五国恩成后来到内蒙工作，但具体在什么地方不清楚。

经过在黑龙江和山东两省的调查，国恩章的身份、家世等得到了证实，但他的直系亲属却因离开原籍去向不明而难于查找。我们目前一直与国绍博保持联系，期待着有一天国恩章的家人能再回老家或与老家人联系。

三、季兴田的墓碑赫然耸立在季家祖坟

在山东省莱州市（原掖县）的季家村东，紧靠济烟公路旁边，有一块不大的家族墓地。基地的中央有一座新修葺的坟墓很引人注目，墓前耸立着一块大人的白色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醒目的黑字：“祖考兴田季府君、妣季孙氏太君之墓，孙季诺、季评、季详叩立”。墓碑上的“祖考兴田季”，就是黑龙江省档案馆所藏日军细菌战“特别输送”档案第12号记载的被害人季兴田。在被害人的家乡见到其本人的墓和墓碑，确实令我们调查者感到吃惊和心灵震撼。

该档案记载，季兴田出生于明治二十四年，即1891年的4月14日，原籍山东省掖县桂村季家，在家乡读过3年私塾，1913年离开山东老家，经东北出境到苏联远东伏罗希洛夫等地经商；1930年回到东北，在今黑龙江省虎林县虎头镇一带做杂货生意。1934年，季兴田由朋友介绍加入苏联情报组织，然后回到虎林以经商为掩护秘密进行搜集日军情报工作。1941年4月，可能是发现自己已经被日伪特务“侦察”，季兴田悄悄迁移到密山县滴道村金刚路（今鸡西市滴道区），但还是被宪兵队特务发现，于1941年7月在滴道的住所被日军驻滴道宪兵分遣队逮捕，随即被移交给虎林宪兵分队。经过审讯，日本人认为季兴田“性情顽固，无悔改之意，且无逆用之可能”，因而于当年8月将其“特别输送”。被捕时季兴田是独身一人，“父母及妻子均在原籍地，长子在奉天（沈阳）的袜子厂工作”。

我们于2000年10月在滴道区滴道河乡的金刚村多方寻找，最终未能找到季兴田的遗属和知情人。2001年8月4日，我们在季兴田的老家——山东省莱州市（掖县）的桂村季家，找到季兴田的族侄季成文，通过他又得知了季兴田的三个孙子季诺、季评、季详的情况，还在季成文的带领下到季家祖坟拜谒了季兴田的墓和墓碑。

季兴田因为结婚生子之后离家未归，所以只留下一个儿子，名叫季丕文，已在二十几年前去世。季丕文的妻子胡淑琴（82岁）仍健在。季丕文的长子季诺原任莱州市交通局长和三山岛开发办主任，我们调查时他已因病离职，正在济南住院治疗；次子季评在青岛工作；三子季详在济南工作。我们于8月20日专程调青岛访问了季评，并到他家中看望了胡淑琴老人。由于季兴田的妻子季孙氏一直活到八十多岁，胡淑琴与婆婆日夜相伴，所以从她口中听到了很多关于季兴田的事情。

季兴田很年轻的时候就单身离家到东北做生意，快三十岁了

才回家娶媳妇，有了儿子不久又独自重返东北，此后再未回家。妻子领着儿子留在家中照顾老人。后来儿子季丕文长大了，也到沈阳的工厂去做工。季兴田虽然长期不回家，但一直同家人保持着联系，经常往家里捎信、捎钱。家里知道他曾经到苏联去“跑崴子”，走了不少地方，后来长期住在虎林县。后来，季兴田有很长一段时间断了消息，有人传来荒信说季兴田可能出事了，好像是被日本人给抓走了。儿子季丕文当时正在东北的沈阳，曾两次奉母命去虎林寻找父亲，其中一次是与堂弟季成文同去的。但是，由于季兴田离开虎林以后去向不明，季丕文到了虎林以后问谁都不知道，所以两次寻找都一无所获，母子俩伤感至极。直到解放以后的70年代初，有一个当年和季兴田一起去东北的本村的邻居，名字孙元兴，从东北回到老家来了。这个孙元兴说，当年他和季兴田一起到鸡西做小买卖，亲眼看见季兴田被日本人抓走了。他听宪兵队的人说季兴田是“苏联交通员”，后来听说季兴田可能是让日本人给杀了。这个孙元兴回来时已经年迈，不久就去世了。

季兴田的妻子季孙氏一生凄苦。丈夫一去不归，她从二十多岁起就一个人顶家过日子，把儿子养大成人，又为公婆送终，盼望丈夫回家盼了一辈子，一直到死也没如愿。她1984年去世，活了八十多岁。

季丕文也是个极重感情的人，整个后半生一直念念不忘寻找父亲的下落，因此总是郁郁寡欢，导致身体状况也一直不好，1978年刚58岁的时候就因患癌症去世了。孙元兴的说法毕竟只是“听说”，季氏母子并不满足。他们希望孙的说法不是真的，更希望季兴田能侥幸逃过劫难。季丕文更是不死心，一直希望能知道父亲更详细的下落或消息，甚至希望他还活着，还能见着面。季丕文文化水平不低，也很有能力，在工作和职务方面都能有很大发展。但是，他就是一门心思寻找父亲，一有机会就去东

北打听寻找线索，别的心思全都没有，好几次上调和提升的机会都被他放弃了。直到他最后病重的时候还一再嘱咐3个儿子，一定要继续想办法寻找爷爷的下落，就是死了也要把骨殖找回来安葬到祖坟里。

季氏三兄弟也一直记着父亲的话，但直到我们调查者到来之前，他们也没打听到一点消息。2000年春节团聚的时候，季家兄弟三个在老家聚会，老大季诺提议说：“爷爷的下落看来是找不到了，他老人家就是当年没死在日本人手里，今年已经过了110岁，再长寿也该去世了。咱们别忘了父亲的嘱咐，得让爷爷魂归故里，在祖坟地给爷爷立个碑吧！”于是，就在2000年春天清明节的时候，兄弟三个一起重新修整了祖母的墓。没有祖父的骨殖，只能写了个祖父的名讳与祖母合葬，新立了白色大理石的墓碑，在上面刻上祖父的名字。季评在接受我们访问时动情地说：“今天你们来了我才知道确切的消息，原来我爷爷早在60年前就被日本人杀害了，而且是惨死在731细菌部队里。可惜我父亲直到去世也不知道事实真相，还一直幻想着亲人活在世上，想起来真是令人伤心。”

看了季兴田一家七八十年的艰难、不幸与苦苦寻求，有谁能不为之动容？季家祖坟里高耸着的季兴田的墓碑，就是对日军侵华和细菌战罪行的无声而有力的控诉！

四、张荣杰目睹父亲张汝成被日本宪兵队逮捕

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张汝成，字韶九，男，1895年9月3日出生于原籍山东省掖县吕村，读过4年私塾；1912年来东北，在哈尔滨、绥芬河等地的杂货店学徒；1933年到密山县当壁镇开杂货店，1937年移居到虎林县大桥村荒岗屯开杂货店，其间在朋友介绍下加入苏联情报组织；1940年移居密山县黄泥河子安乐屯（今黑龙江省鸡西市恒山区）继续经营杂货

店，妻赵氏与长子张永俊在原籍务农，“妾王氏”与次子张永杰与其同住。张汝成移居黄泥河子之后，因远离边境地区，故已停止从事情报活动。但是，因“苏联谍报员盛桂题”（此人亦在52份档案记录之内）将其供出，1941年8月13日，由平阳镇宪兵分队在黄泥河子居住地将其逮捕，然后移交给虎林宪兵分队。经过审讯，虎林宪兵分队认为张汝成“无逆利用价值，故适合特别输送”。同年9月13日，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签发第919号指令，同意将张汝成特别输送。

我们最初曾经到鸡西市恒山区安乐村反复寻访，均未能找到张汝成的家人和任何线索。2001年8月4日，我们又到了张汝成的原籍地，即莱州市（原掖县）的吕村。按照档案的记载，进村后我们就打听村里有没有叫“张永俊”和“张永杰”的人。村民们当即说有一个“张永杰”，并把我們带到张家。在我们当面把“张永杰”三个字写下来时，主人马上说：“中间的字不对，是‘光荣’的‘荣’，不是‘永远’的‘永’。”但经过核对事实，这个张荣杰就是档案上说的“张永杰”。原来，掖县人说话“荣”和“永”不分，都念成“永”的发音，档案上的错误，一定是由于当时日本宪兵队的审讯者误听误记，把张荣俊、张荣杰兄弟俩名字中的“荣”字写成了“永”字，张汝成即使看见也不会去纠正。

张荣杰1926年出生，在家乡以务农为业。他说，父亲的名字叫张汝成，字“韶九”，这就是档案中的“别名韶九”的来历。他记得父亲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了东北，在那里做生意，但时常回来。张荣杰就是在自己十五、六岁、父亲又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随着父亲去了东北。他记得去的地方是恒山，也叫黄泥河子。当时恒山那个地方住的人不多，大部分人都是煤矿工人。张汝成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百货店，名字叫“东成号。”关于张汝成的“妾王氏”，张荣杰说他“有个继母，是北京人，好像

是我父亲在北京做买卖时和她认识的。她很年轻，比我父亲小十多岁，还有文化，和我父亲一起住在东北，我去了以后就和他们住在一起。我父亲和这个继母没生养孩子。”

张荣杰说，就在他刚到东北以后时间不长，日本宪兵队来人在家里把父亲抓走了。他记得好像是在夏天，因为人们都穿着单衣服。这一点与档案的记载是一致的，因为张荣杰“十五六岁”时应该是1941年，8月中旬也正是夏天。他说，父亲被捕时他就在旁边，记得当时去了两个人，都是日本宪兵队的，好像都是中国人，那个领头的人们都叫他“李宪补”。这个李宪补进屋以后没说几句话，只说张汝成“通苏”，之后就带人带走了。张荣杰说，他当时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还以为父亲过几天就能回来，没想到从此再也没有见到父亲。张汝成被抓走以后，王氏非常着急，到处托人打听消息。为了托人找关系，她把商号的账产都变卖了，最后也没把人救出来，就是连点儿准确消息都没打听到。只听到一点儿传言，说张汝成不是被吊死了就是被绞死了。王氏见救人无望，便悄然离去，从此不知所终，张荣杰再也没见过她。这位“王氏”的身份和去向很有些神秘：很难解释一个有文化又很年轻的北京姑娘为什么背井离乡跟随张汝成到东北的穷乡僻壤生活，她与张汝成两个看起来倒很像是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而事实究竟如何可能永远也无法弄清了。父亲遇害，商号关张，父亲的几个朋友也都四散而去，张荣杰只好卷起铺盖辗转回了老家，与母亲和兄长相依为命。

张荣杰不知道父亲干没干抗日的东西，但他知道父亲很有文化，而且“懂苏联话，不但会说，写的还好呢”。他还知道父亲以前到苏联去做过买卖，在东北也走过很多地方，在外边有很多朋友。被捕以前有朋友来报信，说日本人要抓他，让他躲一躲，但他没有理会，结果不久就出事了。

张荣杰说，张姓是吕村的大姓，全村有500多户姓张的，大

都是本家亲戚，张汝成这一辈是亲兄弟两个，张汝成居次，哥哥的名字叫张汝能，一直在本村居住，早已去世，有个儿子叫张荣山，也住在吕村。

张荣杰的母亲姓赵，她没去过东北，一直在家里带着两个儿子生活，解放后活到七十三、四岁才去世。张荣杰的哥哥张荣俊1921年生，解放前一直在家侍奉母亲，抗日的时候在乡里当过青年团长，还是共产党员。解放后张荣俊移居东北，住在黑龙江的富锦县，1995年75岁时去世。张荣俊有一个儿子，名字叫张礼庆，已经在富锦县成家立业，在炼铁厂工作。还有3个女儿，都在富锦县成家立业。这些儿女们经常与叔叔张荣杰通信。

张荣杰回到老家以后一直务农至今。他有一儿一女，均已成家立业。

张荣杰前些年得了一场重病，现在身体比较衰弱，对往事的回忆也已经有些模糊。但他对父亲的印象却极其深刻，因为他随父出关之时尚未成年，刚到东北就横生变故，一个人失魂落魄地回归故里。这种强烈的情感冲击，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刻骨铭心、永生难忘的。

五、刘文斗的侄孙翘首盼望亲人的消息

根据1941年7月18日虎头日本宪兵分遣队呈送给东安宪兵队的审讯报告记载：刘文斗，现年39岁，原籍山东省莱阳县临个村；1921年离原籍到东北大连做工5年，1926年返乡务农；1930年再到大连做工，1936年5月来〔虎林县〕虎头村西顺街经营饭店，直至被捕，同住者有妻刘杨氏。刘文斗于1939年加入苏联情报组织并且一直活动积极，因其同党段凤楼的供述，于1941年7月15日被秘密逮捕。经审讯，虎头宪兵分遣队认为刘文斗“无逆用价值，对日满方面危害极大，应将其与同党刘元杰、段凤楼（此二人亦在52名被“特别输送”者之列，段凤楼

情况详见下文)等一起“特别输送”。1941年8月6日,东安宪兵队密电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将于8月9日乘18时32分到哈尔滨的火车,将刘文斗等人实施“特别输送”,请哈尔滨宪兵队接收。

2000年春天,我们在虎林县虎头镇找到了两个证人:虎头村老村长姜福顺证实刘文斗确实是当年虎头村西顺街的饭店主,后来失踪了;抗日救国军老战士、地下抗日工作者位成增老人则证明刘文斗“是我们的人”,明里开饭店做掩护,暗中“跟苏联通信,了解日本子的事”。但是,刘文斗的家人却毫无线索。

2001年8月7日,我们在山东省莱阳县经过仔细寻找辨认,弄清刘文斗的老家不叫“临个村”,而是“林各庄”。遗憾的是,林各庄已经没有刘文斗的直系亲属,我们只找到了他的堂侄刘超民和侄孙刘宝芹,他们所知有关刘文斗的情况不多。

刘超民1923年在林各庄出生,一辈子没离开过家。刘文斗是他的本家叔叔。他见过刘文斗,说他是大高个,挺好个人。他知道刘文斗去东北了,最后走的时候有30多岁,已经有家口了,是带着老婆孩子走的,以后再也没回来,听说是出事死了,究竟是什么事不知道。刘文斗家里有兄弟三个,他是老二,两个哥哥分别叫刘文吉和刘文庆。刘文吉和刘文庆也过去东北,刘文吉后来回来了,早已去世;刘文庆也是一去不归,不知所终。

刘宝芹1928年生,父亲的名字叫刘超凡,祖父刘文吉,刘文斗是他祖父的亲兄弟。刘宝芹只知道三爷刘文斗很早就离家去了东北,而且走之前已经结婚成家,但走的时候没带家口,是一个人走的。后来刘文斗回来过两次,就是他第一次回来时,刘宝芹才知道有这个三爷爷。他第二次回来又走的时候把老婆也带走了,从此就再也没回来,也没有消息。这些叙述与档案的记载基本吻合。刘宝芹的二爷爷刘文庆也去东北了,也是一去无消息。刘家人并不知道这两个人的下落和结局如何,还以为只是与老家

断了联系，因为山东人闯关东以后没有音信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刘宝芹说，解放后曾有山东老乡从东北传回口信来，说刘文斗在东北有后人，就是不知道在哪儿。笔者刚到林各庄打听刘文斗家人时，刘宝芹还以为是三爷爷的后人从东北来寻亲的，结果空欢喜一场。

刘文吉闯关东到的是哈尔滨，在一家鞋铺里当鞋匠，解放后回到老家。他不会想到，自己的三弟刘文斗被日本宪兵队押送到自己所在的城市，死在罪恶的731细菌魔窟之中。因为贫穷，刘文吉、刘文庆、刘文斗兄弟三个都背井离乡去闯关东。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三兄弟都在东北却互无联系，最后只有刘文吉一人返回故里。刘文吉只有刘超凡一个儿子，二人均早已去世，而刘宝芹又是刘超凡唯一的儿子。刘文斗兄弟三人的血脉只系于刘宝芹一身。好在刘宝芹的下一代人丁兴旺，共有三个儿子，老大刘全德、老二刘全春、老三刘全宾。老大、老二都在本村务农，老三在莱阳市里工作。刘家人是很看重亲情的。笔者在回到哈尔滨之后，还接到刘宝芹三儿子刘全宾的数次电话，一再嘱托我们，一旦在东北发现刘文斗的后人，一定马上告诉他。

六、董殿全之子珍藏着宝贵的家谱

根据1941年7月31日“虎头宪高第228号”文件记载，董殿全时年55岁，原籍山东省莱阳县后山村，当时住址东安省虎林县虎头村朴实屯；1930年从原籍来到饶河县种植鸦片，1934年移居虎林县桦树林子，1937年被迁移到朴实屯集团部落（今黑龙江省虎林市虎头镇黄泥河子村），以务农、打渔为生，1939年被刘汉生发展为苏联谍报员，虎头宪兵分遣队于1941年7月27日根据刘汉升、张生文（此二人亦在52名被“特别输送”者之列）之供述将其扣留审讯，因其“年老无逆用价值，适合特别输送”。同年8月13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以“关宪高

第815号”指令批准将董殿全“特别输送”。董殿全被捕时独身，“在原籍有妻子李氏、长子高铃、次子珠（此处漏掉一字，应为珠铃）”。

我们在虎林县找到一位曾经与董殿全一起打渔的老人于福善，他说董殿全是“跑腿一个人”，老婆孩子都在老家，要找他的后人就得到山东老家去。

到山东寻找董殿全家人时所费周折最多。笔者起初按照档案记载到莱阳县寻找“后山村”，但走了几处均无线索。经询问当地史志部门才得知，解放后莱阳县西部划归青岛管辖，即现在的莱西市。于是笔者于2001年8月9日转赴莱西，连续走了多个带“后山”和“山后”字样的村子，最后在毛家山后村终于找到了董殿全的次子董喜铃（原名董珠铃）。

董喜铃1924年生，父母给起名“珠铃”，解放后自己改叫“喜铃”。董喜铃记得父亲董殿全“是属猴的，今年要活着有一百一十八、九岁了”。2001年在118岁左右属猴的人应该是1884年（农历甲申年）出生，到1941年应该是虚岁58岁，这与档案上记载的55岁（该档案所记年岁均为虚岁）有些出入。但这并不能说明此董殿全非彼董殿全，因为其他诸项事实及历史过程均能互相印证。而且，当年闯关东的人报户口时瞒上几岁年龄并不奇怪。另外，董喜铃的母亲姓李，哥哥名字叫董高铃，都与档案所记相吻合。

董喜铃说，父亲很早就去东北了，走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后来父亲回来过一次，可那时候他还太小，不记事儿，而且父亲就回来那么一次，以后再也没回来。看来档案所说董殿全1930年到饶河，并非是他初次到东北。董喜铃的哥哥高铃与父亲很熟悉，因为他比弟弟年长15岁，可惜高铃短寿，47岁就去世了。董喜铃与哥哥中间还有两个姐姐，可惜都未能成人，都在三两岁的时候夭折了。

董喜铃说，虽然父亲只回家一次，但一直没断了往家里带信、捎钱。所以家里知道董殿全去的地方是饶河县的团山子（即现在黑龙江省饶河县城所在地），后来又到了虎林县的虎头村。虎头村有个莱阳人开的“万顺祥”商号，这个商号经常有人回山东老家。董殿全就托“万顺祥”的人往家里捎信、捎钱。董喜铃说他父亲在东北只是种地，没听说干别的事。这些叙述与档案也可以互相印证。

董喜铃记得很清楚，到了他十六、七岁的时候，就突然再也没有父亲的消息了，不知道是怎么了。董喜铃十六七岁，正是1941年左右，此时董殿全已经被捕遇害，当然不会再有什么消息了。董家人想打听消息也找不到人，倒是有一个本家兄弟董殿公和董殿全在一起，但这个人也一直没有消息。直到笔者来访之前，董喜铃仍不知道父亲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董殿全常年在外不归，妻子李氏还以为他在外边有了新家，所以就不管老家的人了。李氏因此难免忧愁愤懑，加上生活更加艰难困苦，所以在年仅58岁、山东尚未解放的时候就在贫病之中死去。

董高铃死得早，又没留下后人，所以董喜铃是董殿全唯一的后代根苗。好在董喜铃赶上了新时代，妻子（已去世）为他生了三个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老大董芝堂52岁；老二董芝荀47岁；老三董芝芹34岁。四个孙子当中的年长者也已经结婚成家。

董喜铃也是个很重亲情的人，他一直珍藏着一部董氏家谱，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时候，他也想办法藏起来没烧掉。笔者在老三董芝芹家里看到了这份珍贵的家谱，是宽幅彩绘的倒树型老式家谱，用工整的毛笔正楷书写。从家谱上看到，董殿全的父亲叫董华生，董殿全在兄弟三人中位居第三，大哥董殿吾，二哥董殿双。董喜铃说，两个大伯也都去过东北，后来相继都回来了。这两个大伯家也都有很多后人，都在莱西、莱阳一带。

七、魂归段家祠堂的段凤楼

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段凤楼，时年43岁，原籍山东省牟平县段家村，被捕时住址为东安省虎林县虎头村，职业鞋店主，系由刘文斗发展为苏联谍报员。因其本人发展的谍报员刘元杰被捕后将其供出，虎头宪兵分遣队于1941年7月10日在住所将其逮捕，后于同年8月9日与刘文斗、刘元杰等人一起被“特别输送”。^①

现仍健在的虎林抗日救国军老战士位成增向我们证实：段凤楼是他们地下情报组织里的同志，公开身份是鞋店掌柜的，而且他记得自己的一个亲侄子就在段凤楼的铺子里当学徒。但是，位成增老人不知道段凤楼被捕之事，“就知道他没有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到山东寻访时，我们按照档案的记载先到了牟平县。经过了解得知，段家村现已不归牟平管辖，而属1941年设立的乳山县（现为乳山市）。段凤楼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已划归乳山县，这也证明了他1941年被捕的事实。

我们在2001年8月17日来到山东省乳山市境内的段家村，找到了段凤楼的族侄段文成和亲侄子段锡占。只是由于段凤楼离家太早，又一去未归，他们知道的情况并不多。但段家村的宗族祠堂、段氏家谱和镌刻着段凤楼名字的石碑，却也是非常难得的实物证据。

段文成1924年生，段凤楼是他的本家叔叔，他见过段凤楼，记得段凤楼“长脸儿，170公分以上的高个子”。段文成说，段家村的人是一宗一姓，原来都是一家人。段凤楼所在的“凤”

^① 见《黑龙江省档案馆馆藏侵华日军“特殊输送”档案简介》，该馆油印未刊本，第13—14页。

字辈是段氏家族有家谱以来的第十四代，一共有上百人之多。现在段家村还有不少“凤”字辈的人在世，都是和段凤楼一辈的，就是血缘关系离着远了。

段文成说，段凤楼解放前很早就去了东北，再也没回来。他离家之前已经结婚了，是带着老婆走的，但是没有孩子，是刚结婚不长时间就走的。他走那年大概将近40岁了，他家里穷，得攒够钱才能娶媳妇，所以结婚很晚，找的媳妇得比他小十七八岁。段文成说，段凤楼是个正派人，会做鞋的手艺，走之前在村里主要是种地，也做鞋卖，做的是猪皮底儿的双脸儿布鞋。做好的鞋都等到赶集的时候拿到集上去卖。段家村的人大多数都会做鞋，是家传的手艺，现在村里仍然有很多人以手工制鞋为业。这为段凤楼在虎头村开鞋店做了脚注。

段文成说，段凤楼在家的时候没听说他参加过什么秘密工作，也没参加抗日。“段凤楼走的时候我也就十四五岁，也就是1937年左右。日本人到牟平一带来时已经是1938年或者1939年，那时候他已经走了。”“后来听说段凤楼到东北以后出事了，说是这个人死了，我们是听从东北回来的人说的。”

段锡占1934年生，是段凤楼的亲侄子。他的祖父，也就是段凤楼的父亲，名字叫段阅田。段锡占父亲那一辈是兄弟三个，段凤楼居长，二弟段凤台是段锡占的父亲，最小的段凤跋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因病夭折。段锡占说，伯父段凤楼年轻的时候就离家去了东北，再也没回来，他因为出生较晚，记忆当中根本就没见过伯父的面，至少是在他还不记事儿的时候伯父就走了，有关伯父的事都是听父亲讲述的。

段锡占说，伯父所以离家去东北，是因为家里太穷。那时候他们家自己没有房子住，租人家一间“倒庭”，就是正房对面反着盖的门房，一大家子人挤在一块，又没有自己的土地，日子过得太难了。就是因为这个，段凤楼才一狠心离开家去了东北。段

锡占说：“那时候山东人闯关东的哪个不是因为穷才走的？”

段锡占说，他不知道伯父到东北以后究竟在什么地方，只是听从东北回来的段凤斗说什么“崴子”。这个段凤斗说他在东北时见过段凤楼，还说他们曾经一起“跑崴子”（东北人从前说的“跑崴子”指的是过境到苏联的海参崴等地做生意——笔者）。段凤楼还往家里写过信、寄过钱。段锡占记得家里用伯父寄回来的钱买了三亩来地。但自从那次捎钱以后，段凤楼就再也没消息了，几十年来家里人一直都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段锡占的父亲段凤台在世时说，“这个人看来是早就没有了，要是还在哪能不回来？不回来也能来个信啊。”

段家村的村干部非常支持我们的调查，破例为我们打开了只有春节才开门祭祀的家族祠堂，费数人之力展开了全家族共同的巨幅家谱。面对庄严肃穆的家族祠堂和宏幅巨制的传统家谱，作为东北人的调查者不禁肃然起敬、叹为观止。在家谱上“凤”字辈的一百多个名字当中，我们没有找到段凤楼的名字。段锡占解释说，因为伯父下落不明、死活不知，所以家里人一直没给他“上”名字。现在知道确切下落了，可以把伯父的名字写上家谱了。后来调查者再访段家村的时候，段锡占征得家族长者的同意，终于将伯父段凤楼的名字写上了家谱。这样，段凤楼也算是魂归故里，如果他泉下有知也可安息了。

另外，段锡占还保留着一块石碑，是原来立在他曾祖父坟前的墓碑，坟墓深埋改田以后他将石碑搬回来放在村边。这块墓碑是段闾田兄弟辈率各自长子在民国十一年（1922）刻立的，上面刻着段闾田、段凤楼等人的名字。这块石碑也是段凤楼身份的一个铁证。

段凤楼没留下子嗣，唯一的侄子段锡占算是他最近的亲人了。段锡占只有一个姐姐，叫段锡英，1930年生，多年以前移居东北，住在黑龙江省的富拉尔基。段锡占有三个儿子，老大段

云岐在本村务农；老二段云山在黑龙江省大庆油田工作；老三段云璞在山东省威海市工作。

八、改名易乡的任殿曾——任增殿

根据黑龙江省档案馆所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第22号《佳木斯宪兵队呈报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关于富锦宪兵分队逮捕审讯苏谍任殿曾的情况报告》（1941年7月8日）记载：任殿曾，男，时年38岁，农民，独身，原籍山东省平度县西安村，被捕时住三江省抚远县东安镇下营（现属黑龙江省饶河县）；1933年来东北，一直以种菜为业；1940年8月在乌苏里江上捕鱼时被苏军掠至对岸，被释放回国后开始从事谍报活动，于1941年6月15日被富锦宪兵分队秘密扣留。“该人在原籍读了一年私塾，能简单地阅读，头脑比较灵敏，记忆力强。”“虽然该人基本上直率地供述了事实，并有悔改之意，但鉴于这种谍报活动的危害及时局的关系，拟作特别输送处理。”1941年7月30日，佳木斯宪兵队队长宇津木孟雄以“佳宪高第487号”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原守报告，按照7月15日关宪高第710号等各项指令，已将任殿曾等6人“特别输送”。

为了寻找任殿曾的家人，我们曾经在饶河县询问了多位东安镇下营村的老人，均未找到知情者。2001年8月22日，我们到山东省平度市寻访。经过请教当地史志和地名部门的专家，得知平度县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从来都没有过“西安村”这个地名，他们怀疑是否档案把地名弄错了，并建议我们到发音相近的“辛安村”去看一看。

2001年8月23日，我们在平度县的明村镇辛安村找到了一位78岁（1924年生）、名叫任华文的老人。在我们详细说明了任殿曾的情况之后，任华文一口咬定就是他苦寻多年的叔叔，只是名字前后颠倒了，他的叔叔叫任增殿，而不是任殿曾。经过仔

细核对，我们认同了任华文的意见。理由是：第一，平度县从来没有过西安村，而只有声音相近的辛安村，所以“西安”必定是“辛安”之误，或者是任殿曾故意错报家乡地名。第二，二者年龄一致。任华文说，他父亲是1893年生，比叔叔任增殿大10岁（两兄弟之间有两个姐妹），那么任增殿就是1903年生，1941年正好是38岁，与档案所记任殿曾的岁数完全一致。第三，地点一致。任华文记得叔叔去东北以后住在抚远县，因为叔叔往家里写过信，他自己也给叔叔写过信，只因年深日久，具体的村名忘记了。第四，个人情况一致。任华文说，叔叔是独自一人；上过私塾，有文化，家里曾经有过一本写张作霖、蔡锷的书，是叔叔自己看的，走以后就留在家里了；叔叔离家时任华文七八岁，即1932年左右，这与档案所记的任殿曾1933年到东北也基本一致；任殿曾1941年被捕遇害，任华文也正好在1941年前后与叔叔断了联系。根据以上分析，我们认定任华文的叔叔任增殿就是档案上记载的任殿曾。我们猜测，一定是“头脑比较灵敏”的任增殿到东北以后将自己的名字故意颠倒过来，以防一旦有事而牵连家人。

任华文本人也颇有文化功底，他保存着一份家谱，是他自己用工整漂亮的毛笔字誊写下来的。从家谱上看到，任增殿的祖父叫任天宝，父亲叫任锡田，唯一的兄长，亦即任华文的父亲，叫任增玉。

任华文说，叔叔走的时候他已经记事了，因此记得叔叔的模样：高高的个子，有点浅白麻子，走的原因是家里太困难。“那时候我们一大家子十几口人，有我祖父母、我父母、两个姑姑、我们兄弟两个、姐妹三个，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租人家房子住。租的一间小屋住不下一家人，我叔叔就到邻居、亲戚家去借宿。家里就有4亩地，粮食不够吃，生活太困难，就差没要饭了。”

任华文记得他16岁那年，祖母因病去世，正好这时候叔叔来信了。办完丧事之后，家里给叔叔写了一封信，把老人去世的事情告诉了他。不久叔叔又捎回信来，信里有他的一张照片，穿着白色的孝服照的。当时信皮上写的地址是抚远县，但是信不是邮的，是当时平度县里的一个叫“天和兴”的商号派人给送来的。信里大意是说一时回不了家，穿着孝服照张像就算是尽孝了。随着信还捎回一些钱来，信上说用这些钱供大侄子上学。第二年任华文17岁的时候（约1940年），就用叔叔捎回来的钱到高密县去上学。因为任华文知道叔叔的地址，就在高密给叔叔写信，并且挂号寄出。信邮出去一直没见回信，任华文又写了第二封信，但都没有回音。此后任家就再也没得到任增殿的任何消息。

任华文非常想念自己的叔父，近几年甚至想过登报打广告寻找叔父的下落。从我们口中得知叔叔的下落和悲惨结局之后，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竟激动得痛哭流涕。他动情地说：“我真没想到今天还能知道我叔叔的消息。我一直惦记着这个叔叔，总想着他是不是还在世，是不是有后人在东北。解放以后我就一直想找他，想写信没有地址，我有心登报声明找人，可是我没钱啊。我为啥这么惦记我叔叔呢？因为家里没人了，我父亲早死了，两个姑姑也没有了，我弟弟又在刚解放的时候参军牺牲了，就剩下这个叔叔没有准消息，我就想找他。你们一来，我知道叔叔的下落了，可也断了念头了！”

任华文的爷爷任锡田1948年去世，活了不到80岁。任华文的父亲任增玉没离开过家，1951年58岁时就去世了。任华文的母亲姓王，活了92岁，1988年去世。任华文的兄弟任华昌1949年1月份参军不久就牺牲了，任华文还保留着兄弟的烈士证。

任华文的老伴温秀芳也早已去世，现在他与唯一的儿子共同生活。儿子任松庆1953年生，儿媳李桂香，二人有三女一子，

儿子最小，也已经上中学。

任华文最后对调查者说，因为叔叔一直没有消息，所以没法给他修坟立碑，“祖坟里都没有他的位置啊。今天你们来了，我才知道叔叔早就死了，而且是死在日本鬼子手里，被他们用细菌试验给害死了。才38岁啊。听了这个消息心里难受啊！731部队我听说过，知道日本人搞细菌战害中国人，可我没想到我自己的亲人也死在那里，今天听说以后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听说日本政府现在还赖帐，不承认搞细菌战的事，实在是太可恨了！”

九、携手抗日、同落魔掌的祖孙俩——李怀显与李福林

据日军“特别输送”档案记载：李福林，男，时年23岁；李怀显，男，时年28岁。二人原籍均为山东省郓城县刘行村，被捕时住址均为黑河省（现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嫩江街墨尔根路东11条7号。二人在家乡时原以务农为业，生活贫困，后分别于1939年（李福林）和1941年（李怀显）加入了本地的伪军“孟部队”，不久又先后被当地的八路军策反而离开了伪军部队。1943年3月下旬，二人受八路军第129师第3团驻郓城部队的派遣，乘火车经由山海关赴东北侦察日军军情。因李福林的“养父”李孝谦早已在嫩江县定居，故二李的任务就是投奔李孝谦，搜集嫩江一带的日军情报，并且奉命“返乡前不进行联络”。1944年4月3日，嫩江宪兵分队在进行居民财产检查时发现二李“形迹可疑”，遂将二人逮捕审讯。审讯后孙吴宪兵队认为二人“无悔改之意，且与中共联系中断，适合特别输送”。^①虽然在馆路档案中没有关于二李的“特别输送”指令，但根据

^① 见黑龙江省档案馆藏日军“特别输送”档案第62号，《孙吴宪兵队关于逮捕审讯中共谍报员李福林、李怀显的情况报告》（1944年5月7日）。

笔者对綦宪度（见上文）、刘文秀^①等受害者的调查研究，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对下属各宪兵队的“特别输送”建议是一概照准的，而二李的情况尤其适合“特别输送”的条件。所以，他们已经被“特别输送”这一事实是无庸置疑的。

笔者于2001年8月26日到山东省郛城县刘行村寻访，顺利地找到了李福林和李怀显的亲人——李福林的亲侄李兆江、侄女李秀云和李怀显的亲侄李殿欣及族侄李效惠、李效需等人。笔者根据档案材料估计，二李很可能是同宗的亲戚甚至一家人，调查之后，猜测得到了证实——二李确属一家人，不过两人是爷孙辈的关系，李怀显是李福林的叔祖父，只是两个年纪相差不多而已。

李兆江1957年出生，李秀云1964年出生，二人因年纪太小，只是听祖母说有一个叔叔李福林，解放前十八九岁的时候外出谋生，后来去了东北，再也没回来。李兆江的父辈只有父亲李福臣和叔叔李福林兄弟俩，李福臣早在1973年57岁的时候就因病去世，李兆江的祖母则活了86岁，1985年去世。李兆江经常听祖母说，他还有个叔叔叫李福林，解放前到外边去了，也不知道是死是活。另外，李兆江的祖父也是年轻时候就去了东北，刚有两个儿子就走了，也是一去再无消息。李兆江的祖母一提起这件事来就非常伤心，总是念叨：“两个人都没有了，去了就没有影了，都没回来呀！”

李殿欣1934年生，叔叔李怀显走的时候他已经懂事，所以对叔叔有比较深的印象，了解的情况也多一些。他记得叔叔李怀显长的个子不高，是个矮个。大约在李殿欣七、八岁的时候，李怀显和本家亲戚李福林一起去了东北，“去投奔李福林的老爷爷，就是他父亲的爷爷。”这位“老爷爷”应该就是档案所记李

^① 见《中国近代史资料》第103号笔者发表的相关调查报告。

福林的“养父”李孝谦，也许是李福林没有向日本人透露这个“老爷爷”的真实身份。解放后，李福林的老爷爷自己一个人从东北回来了，当时他已经有七八十岁。他说李福林他俩被日本人抓了，人还在不在也不知道，可能是死了。

李殿欣的父亲叫李怀忠，早在解放前就已因病去世，他只有李怀显一个亲兄弟。李殿欣说，他的祖父是教书先生，他的父亲和叔叔也都因此而有些文化功底，家里曾经有很多祖父留下来的古书。李殿欣的祖母李徐氏 1959 年（84 岁）才去世，在世的时候因为儿子李怀显生死不明，总是手捧着儿子的照片哭泣，最后哭瞎了双眼。另外，李怀显走之前还订了一门亲事，但未成婚。因为李怀显一去不归，那位姑娘苦等了好几年，最后因绝望上吊自尽。

李兆江虽然没有见过自己的叔叔李福林，但却非常重视这份亲情。听说叔叔死在哈尔滨 731 细菌部队，禁不住悲伤流泪，而且立即问笔者，可否去哈尔滨把叔叔的骨灰取回来安葬？在知道不可能时，表示还是要找机会到哈尔滨去，到 731 部队遗址捧一把泥土回来送到祖坟上，以慰藉叔叔和祖父母的在天之灵。

抗战时期的国立八中追忆

徐成龙

编者按：1937年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地向大后方内迁厂矿、学校，以维持国家之物质命脉，以培育国家之后备人才，以为持久抗战之准备。抗战之初，安徽省即沦为兵燹之地，各地中等学校教学工作亦再无法正常开展。旋各校师生几经聚散，于1938年初成立四所省立临时中学。随着战局的延展，各校师生奉当局之命，流亡西迁。并于是年秋于湘西与颍州三校合并组成抗战时期著名的国立第八中学。本文作者青少年时代在作为国立八中前身学校之一的舒城中学、安徽省立第二临时中学和国立八中渡过了整整六年，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安徽省数千名中学师生离乡背井，竹杖芒鞋，跋涉三千余里，流亡大后方，忧国苦读，团结互助的全过程。作者经过认真回忆，查阅参照其当年的笔记、作文，并与多位校友共同回忆、讨论、补充和修正，追忆了自己当年以一名中学生的视角与认识所亲身经历的安徽师生们和国立八中弟子们这段从国土沦陷、军民抗战，到流亡奔波、古庙青灯、贫困交加而孜孜不怠、成绩斐然的青春奋斗历史，同时记述了当年流亡所经的皖、鄂、湘、川等省一些地方的风土人情及风物环境等方面的情况。三亲口碑，或有偏阙，然堪与档案官书互补印证；一人所历，具体而微，亦足为历史丰腴血肉。今本刊特于“口述史料”栏中发表本文，以供治史者研究中国军民抗战

史、战时流亡教育史、战时地方文化教育史及水陆交通建设史之参考。文中所涉及之年月日期、星期节日、道路里程、海拔高度、人口数据及村镇地名等项，作者皆依据其文后附录之《主要参考文献》进行了核实。

八年抗战期间，安徽三千多名中学生，在教师率领下，跋涉3000余华里，流亡到大后方的湘川边境，组成国立第八中学，重整弦歌。他们艰苦奋斗，勤奋学习，立志报国，许多人成为当代建设国家的重要人才。国立八中师生们那段不平凡的时代经历，很有些值得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料记录下来。

国立八中是1938年安徽四所省立临时中学及颍州三校在后方组合建成的，四所临时中学是在安徽战前原有的许多中等学校基础上集中兴办的。因此记述国立八中的历史不能不略为追溯到她的这些前身学校。

笔者是由舒城中学、省二临中进入国立八中就读于初五部及高二部的，本文主要循这条源流进行记述，只是国立八中历史的一部分。国立八中规模不小，共有11个分校及1个校本部，分散在湘西与川东的六七个县内，持续时间长达8年，任何一位师生难以详细了解学校全部历史，这项工作有待于更多校友来共同参与。

一、国立八中之前

1. 舒城中学——省二临中的依托

国难深重的危机感，激发起强烈的爱国心

舒城中学创办于1931年秋，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时舒中校长是王仁峰（1886—1967，舒城首届人大代表及

安徽省文史馆员)字霭吾,是早期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同盟会员,1910年因准备南京武装起义,制造炸弹时受伤,锯去左臂。王先生爱好书法,擅长魏碑,写得一手好字,与安庆杨大沁、寿县张树侯,时称“安徽三大家”^①,舒城人士誉先生为“王一手”。王校长主持校政特别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对当时国难深重,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危亡之秋的形式忧心如焚,常常亲自对学生做报告,作讲解。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学校购置一台矿石收音机,每天由国文教师蔡创泉收录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战况报告,交教务处赶印出来,由同学即时送到城内各处张贴,使舒城民众早于京沪报纸寄到之前2—3天就了解到上海抗日战场的情况。学校阅览室里张贴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誓雪国耻”等标语以及一系列有关战时防御的彩色宣传画,包括防空、战地救护、防止汉奸活动等,都是上海商务、中华及世界书局等出版社印制的。嗣后不久,日本浪人潜入我国内地横行无忌,处处制造事端,要挟中国政府。1935年左右,两名日本浪人将舒城云路街小学墙上的“勿忘九一八”、“收复失地”、“还我河山”的标语拍摄下来,作为中国政府煽动反日情绪、破坏“日中提携邦交”的罪证,而向舒城县政府进行威胁。王校长对此十分愤慨,常利用这类发生在身边的事情对学生进行救亡图存的教育,因此舒城中学的师生们都有国难深重的危机感,从而激发起强烈的爱国心,校园里经常飘荡着爱国歌声,如岳飞的《满江红》以及《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等等。

1937年7月7日抗战军兴,我就在这个暑期考进舒城中学。在国文试题中,王校长主持“听写”,高声朗读一些忧国的警句让我们写,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卧薪尝胆”、“马革裹尸”、“破釜沉舟”、“毋忘国耻”、

^① 《舒城县志》,第603—604页,黄山书社1995年版。

“守土抗战”等等，使我们刚踏进舒中校门就感染到这里强烈的爱国主义气氛。开学后，发给我们的童子军制服，左右肩章上分别织着“收复失地”“在我肩头”8个字，胶木纽扣上则塑着沦陷在日军铁蹄下的东北四省（辽吉黑热）的版图。体操教员桂先生虽然歌唱得不好，仍然在学生早操或列队进城时，带领大家高唱慷慨激昂的救国军歌，如“……还我河山誓把倭奴灭，醒我国魂誓把奇耻雪”（《铁血歌》）。学期中各年级同学纷纷组织起来，利用课余及星期天，或进城，或下乡，作各项抗战宣传。我们一年级初中生，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仍然满腔热情地到农村收集废铜烂铁，献给国家铸造枪炮。有些农村妇女把平日积攒起来的破铜头和屎刮子（收童收集猪狗粪的工具），本来准备给孩子们从货郎担上换点甜食的，也都忍痛割爱把它们捐献出来“打鬼子”。老百姓的这种赤忱之心，使我们受到很大教育，从而更有信心：中国不会亡！高年级同学对战局发展更为关切，有些人萌发了投笔从戎的报国心。

是年12月中旬南京沦陷后，安徽接近战区的各地中等学校相继停课，难民潮及各种名义的京沪流亡青年宣传队相继涌来，大批抗战部队亦往来穿梭，舒城顿时呈现临战的紧张气氛，人心惶惶。许多家长来校把学生接回去（舒中是寄宿制），教师们也纷纷请假回家安顿家庭应急事务，学校无法继续进行教学，只得提前放寒假。王校长乃于一天晚上召集学生讲话，在暗淡的煤油灯光下，他声泪俱下地沉痛宣告学校停课。舒中原有300余名学生，此时只剩下不足百人，站在一间教室里唏嘘不已。这时我想起法国人都德的那篇著名文章，心中悲感交集，认为这个夜晚也是我们舒中同学的“最后一课”了，国文教科书选用这篇世界名著原是作为爱国主义教材的，未料到悲惨的现实真的来到了我们的校园和身边！

舒中虽然停课，仍有几十名年龄较大的同学留在校内，学校

从部队里请来了一位校友任教官，对同学进行军事训练，讲授基本的作战行动，准备在家乡沦陷后对日军打游击。放假回家的同学们则把未用完的膳费捐助军训同学，膳委会把刚刚腌制好的腊肉和咸鱼等全部拿出来，以改善受训同学的伙食，增强他们的体质。

二临中的诞生

1938年春节前后，两件令同学们大为鼓舞的消息相继传来，一是“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在河南潢川成立，二是安徽省立第二临时中学借用舒中校舍招生开学。参加舒中军训的同学及一些社会青年便于春节后去了潢川，后来不久转入广西雒容中央第六军校受训，曾参加过抵御日军进犯广西的昆仑关之役（1939.12.21—28）。军校毕业后，这些同学被分配在鄂西北一带抗战部队中，监视武汉、襄樊、宜昌、沙市等地的日军，并作战多次，直至抗战胜利。

早在1937年9月庐山会议上，国民政府召集全国各党派及社会名流共商抗战建国方针大计，决定将战区及沦陷区的大学校和大中学校学生迁往后方，继续办学，为国家抢救青年和储备建国人才。因此，安徽省教育厅决定在皖西、皖中及皖南分别设立四所省立临时中学，招考或收容附近各地中等学校的学生，借用停课的学校或庙宇祠堂等为校舍，等待时机，迁往后方。一临中设在立煌（今金寨）流波滩，二临中在舒城伏虎寺，三临中在宿松文庙，四临中在至德（今东至）尧渡镇周氏大宅。

二临中于1938年2月举行招生考试，3月开学。舒城中学位于县城西南郊伏虎寺（古庙遗址已不存在），离城2公里。舒城著名的汉代水利工程七门堰的支渠从七里河引来丰沛的流水，在伏虎寺形成一泓清池，当地称为大塘（幽），是舒中取之不尽的水源和美化环城的基础。校园内砖瓦楼房，绿树浓荫，水渠环

抱，还有荷池鱼塘。周围是大片农田，竹林茅舍点缀其中，环境清幽，既是理想的读书地，又便于防空隐蔽。

此前，舒中还没有高中部，全校初中三个年级设八九个班，学生 300 余人，教室宽敞。二临中设高、初中及师范各年级，计有 600 多名男女生。因为教室不够，乃实行大班制，一个年级一班，皆为下学期班，但初中一年级有上、下学期两个班，全校共 10 个班。把礼堂（兼饭厅）分隔成两间教室，各教室的座位也增加一倍。取消了饭厅，同学们在教室内自己的书桌上吃份饭。图书馆及一年前刚建成的雨天体育馆改作寝室，同学们全部睡上下铺。这样，校舍问题基本解决了。

舒城农产品丰富多样，蔬菜以时上市，物美价廉。舒中后勤工作也有良好基础，柴米油盐等皆有大量铺备。当时舒城接到提供军粮和难民救济粮的紧急任务，几家米行疲于奔命，而舒中的丰厚储存保证了二临中数百人一日三餐的需要。

由于近水楼台的关系，原舒中同学约占二临中初中生的三分之一，高中及师范生中也有不少是毕业于舒中的。舒中多数职员、校工及校警继续在二临中服务。校门口并排挂着“舒城县立初级中学校”和“安徽省立第二临时中学”两块牌子。

由于校长顾访白的选址得当，二临中依托舒城中学完整的校舍、数学与生活设施，以及大致齐全的服务人马，得以即时、有效而顺利地进行从招生到开学的一系列繁杂的工作，并使教学工作有序地展开，持续了两个半月之久，这是当时其它三所临时中学所没有的，可以说舒城中学是二临中的重要基础。

2. 二临中——国立八中的前身之一

校园生活紧张活泼

二临中有男女学生 600 多名，以皖中的舒城、合肥人最多，

其次则来自桐城、安庆、巢县、含山、潜山、六安、霍邱等县，还有少数来自邻近省市南京与上海沦陷区。他们原先就读的学校有庐州中学、庐州师范、舒城中学、安庆及桐城几所中学、巢县黄麓师范和池州师范等。学生家庭多在战区，40%名额免费。二临中在招生广告上曾写明学校将迁往后方，美术及劳工教师韦化南在课堂教同学打草鞋，说流亡走路时有用，所以大部分师生皆有去后方的打算。

从3月初到5月中，正值春光明媚的好时光。二临中在伏虎寺基本上还是正规化、按步就班、从从容容地进行教学，这在当时漫天烽火江淮大地上是十分难得的，在国立八中其他6所前身学校之中也不多见。^①二临中师生的整体素质也较高，多数教师是原先各校的高中或高师教员，各年级同学都是在读生通过再一次招生考试择优录取的。可以说，二临中的师生是从原先许多中等学校的师生中选拔出来的，并非收容逃难的。

师生们的较高素质也奠定了二临中良好的校园风气，以庐州中学的勤奋，黄麓及池州师范的质朴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就全校学生而言，庐中同学的社会知识面广、具有政治头脑、活动力强，这种特点一直延续到其后的国立八中。

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男女同学一律灰布军装、扎皮带、打绑腿，女同学剪着齐耳的短发，寝室内被褥洁白平整。清晨早操，跑步锻炼，精神抖擞；课堂上鸦雀无声，静心听课；傍晚，水渠边、大埂上同学们散步吹口琴，谈笑风生；晚自习时，十大教室灯火通明。整个伏虎寺校园是一派既生龙活虎又和平安宁的

① “顾访白原是安徽教育厅督办、厅长杨廉的智囊，故二临中得风气之先，工作进行较为顺利”。这是1954年韦化南对笔者讲的，韦与顾访白、高敬亭皆是舒城同乡、青年时代同学，彼此间有一定友谊。解放后韦在南京九华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任标本室绘图师。

气象。

毕竟是处在抗日战争的大环境中，多数师生家在战区，自然关心战局，特别是战线的转移，家乡的论陷等。以后随着空袭警报逐渐频繁，教学秩序屡屡被打乱，影响了大家的学习心情。舒城正当南京与武汉航空线的中途，日本飞机从南京空袭武汉，往返皆飞经伏虎寺上空。4月29日日本出动200架飞机空袭武汉，妄想以“赫赫战功”来庆祝他们天皇的诞辰天长节，被苏联援华的志愿航空队打得落花流水，被击落21架，击伤多架。有几架受伤的飞机尾部拖着滚滚的浓烟摇摇欲坠地从我们头顶上空向东飞去，这是抗战开始后我们第一次亲眼见到侵略者受到了惩罚，好不痛快！

二临中的课余活动相当繁忙而多姿多采，主要皆以抗战为中心，如办壁报《抗战三日刊》，举行主题为“最后胜利必属于我”的讲演比赛，进城演出慰问抗日战士的话剧，参加舒城各界庆祝台儿庄大捷的数千人火炬游行等。学校还特意组织一次去春秋山的10公里徒步旅行及爬山比赛，作为检验学生体力和流亡行军的锻炼。春秋山是大别山的支脉，海拔337米，山上有宋代画家李龙眠的洗墨池及读书堂、古刹华岳庙、望〔巢〕湖尖等名胜。同学们是初次登高望远，苍茫大地上与春秋山同脉的马鞍山屏列于西，七里河从中蜿蜒穿摇东去，在远方天际注入波光粼粼的巢湖，城镇和村落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如茵的田畴与阡陌之间，真是江山如画。同学们正陶醉于秀美的山川景色中，高中历史教师陶梦庵大声吼出“我大汉河山岂容倭寇践踏！”先生的爱国激情深深地感动了大家。

二临中在伏虎寺大约70—80天的生活特点可以归结为“学习、跑警报、宣传抗战”三头忙，加上军事化管理，这是当时临时中学的共同特点，只因战局影响，各校执行程度不同而已。

5月11日下午，三架日军飞机轰炸舒城，全城大部分房巢

被毁，死伤 160 多人。此时日军正向合肥近逼，敌人采用夷平合肥周边城镇以断绝中国军队后援，为占领合肥扫清障碍的战术。二临中紧急动员师生打点行装，于三天后向大别山中晓天镇转移。行前的头天晚上，师生们在大操场举行“告别舒中”晚会，此时日军压境，大家都深感家乡就要沦陷，所以晚会气氛非常热烈悲壮。“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与抗日救亡的歌声此伏彼起。晚会最后是位女同学独唱《松花江上》，感动得大家泣不成声，泪流满面。次日正式出发前，同学们列队站在水渠堤埂上向舒中校舍行礼、致敬、告别，心中怀着对舒城中学校园命运的悬念默默地离去。

流亡准备工作做得好

晓天镇离舒城城关 55 公里，我们队伍循舒晓公路走了两天。山镇规模不大，只有一条南北走向长约 250 米的小街。同学们分别住在镇外的几家祠堂及庙宇内，我们初中部住在迎水庵。二临中迁到晓天镇，是为流亡西迁做准备，数学工作此时已退居次要地位。因住地分散太远，战局紧怯，大家心情沉重，实际上很少上课。仅三年级同学，准备毕业考试，仍像在伏虎寺时那样，抓紧一切机会，坚持听课做作业。校长则往来奔波于山镇与流波踵之间，参加省教育厅对各校迁往后方的筹划工作。

6 月 9 日舒城县城失守，愁云笼罩，梅雨绵绵。从迎水庵俯瞰舒晓路上难民络绎不绝，大家皆有国破家亡之痛。从此，学校加紧布置出发流亡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按班级组编行军队伍，女生单独编为一队；给高年级同学分配一些重要任务，如担任行军途中及女生住宿地的武装警卫和各中、小队队长；做打前站的工作，头天出发，付钱给沿途村民，请烧好茶水摆在路边，让行军队伍可以随时饮用；向乡镇店铺洽借住房，用粉笔写明住宿的各队番号；请地方人士协助预备粮食蔬菜和编草等等。

厨房天天忙于炒制炒米，学校要同学用衣袖或裤筒缝成干粮袋，每人一升炒米背在身上，以备流亡途中缺粮时应急之需。但学校仍然从晓天镇采购了不少大米，雇用十几名民工逃运，准备万一在途中买不到粮食时才用。后来这批大米直到走出大别山区时尚未动用，因为安徽境内的大别山区每隔 10 ~ 20 公里即有一乡镇，山区物产富饶，粮食不缺。行军途中，各班级皆有学生任膳食委员，带领厨工安排一日两餐的具体工作。

学校还雇了一批民工挑运学生的被子，每名学生限定 2 市斤，不得超重，可以两人合一床 4 斤重的棉被，不足的斤两可用衣服顶替。同学样把字典、地图册、笔记本、衣物等捆成包袱，或背或挑，天天在寝室里走来走去，锻炼腿脚，打好行军基础。

教师们的家属，部分同学的家长和亲人也随校西迁，加上借用的舒中校警以及挑运的民工们，总计二临中的流亡行军队伍约有 700 左右。

初遇新四军

在即将离别家乡的前夕，同学们经常上街看报、取信、打听战局和家庭消息。有天遇到了刚刚成立不久的新四军队伍，男女战士个个体格健壮，面色黝黑透红，精神饱满，目不斜视，步伐整齐地穿过晓天镇大街。这支队伍属于新四军第四支队，支队长高敬亭曾拜访过顾访白，建议二临中师生留在大别山，加入新四军，壮大抗日队伍。顾校长以教育厅指令学校西迁不得违反而婉言拒绝。高敬亭要求将学校军训用的 40 条步枪留给新四军，顾校长又以保护流亡途中师生安全，然后应由军训教官如数交还安庐师管区为由表示难以应允，实在抱歉。顾高两人对抗战时局有过广泛的讨论。当时二临中几名高年级同学参加了新四军，1948 年底舒城和平解放时在皖西军分区任职，曾和舒中老同学们见面，讲解了党在新区的有关政策。

踏上流亡路

经过一个多月的充分准备与周密布置，待到久雨放晴的6月25日，全校师生员工在晓天镇东河滩上集合，顾校长正式宣布根据安徽教育厅指令，二临中师生徒步经大别山去武汉，在武汉等待教育部统筹安排去大后方。接着宣布旅途行军纪律时，东山后边炮声隆隆，偶而还听到机关枪声。师生们满腔悲愤地迈着沉重的步伐，正式开始徒步西迁的迢迢征途，当时未曾意识到，我们由此开始了中国教育史上亘古未有的战时流亡教育的新篇章。队伍穿过晓天镇，街道两旁人们皆含泪默默相送，街上鸦雀无声，空气似乎凝而起来了。只听到我们手中的青竹竿（爬山时作手杖）点在街心石上清脆可闻，令人心碎。我们也是默默地噙着泪珠低头前行。出晓天镇北闸门不远就开始爬山，山高路陡，太阳钻出云层，火辣辣地，同学们多人中暑，队伍走走停停，有人开始丢弃背不动的衣物和书本，路边和山坡上呈现白花地一片，看着既有些舍不得，更是伤心。这天大约走了13公里，在西溪镇的蒋家祠堂里过夜，该地已属霍山县。

次日清晨，同学们再次忍痛丢下许多衣物和书籍，一些居民拎着大苦竹篮子，甚至挑着稻箩走进我们住地捡东西，个个满载而去。队伍出发后，刚走出西溪镇不远，前而山上就响起了土匪示威的枪声，勇敢的警卫队同学们（其中有高三年级唐德刚，现为美籍历史学家）立即荷枪实弹，在教官率领下往前搜索。隐藏在山林中的土匪看到二临中700多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组织严整，又有四五十人的武装警卫队，不是好惹的，大约窥伺30分钟后溜走了，师生们继续前进。而头天晚上，西溪镇也有人对学校领导恐吓说“你们今天走的只是山孙子，前而还有山祖宗哩”！把大别山说成高不可攀的险山峻岭，企图使二临中人心涣散，打退堂鼓，然后他们来趁火打劫。

走出危急的战区

二临中相继从舒城伏虎寺与晓天镇出发，流亡路线经过西溪、东溪、磨子潭、管驾渡（上个世纪50年代初被佛子岭水库淹没）、大化坪、漫水河、上土市、黄栗杪、古佛堂、中界岭、石头咀、金家铺、罗田、团陂、上巴河、团风到武汉，是流亡第一阶段，走出危急的战区。晓天到漫水河一段，在大别山里翻山越岭，其中管驾渡到大化坪则在大雨滂沱中打着雨伞，翻过沿途的最高分水岭，脚下一片云海，云雾从我们身上奔腾而去，十分壮观。山上森林茂密，山路（旧时代大别山区土特产运往武汉的商贾大道）宽约一米多，石英岩等岩浆岩风化的砂土路面不粘不滑，雨中行军毫无炎热之感，几乎是在欣赏变幻万千的巨幅大自然山水画中走出去的，真是天公作美。过了漫水河，山势逐渐和缓。出中界岭的西闸门进入湖北省，在罗田因大雨巴河涨水滞留几天，度过七七抗战一周年。从上巴河乘木船穿过小湖到团风，暂时结束徒步行军的劳累。下午到达团风，吃过晚饭，立即乘轮船星夜上驶武汉，因九江方面战事吃紧。在团风，听说校长致电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请将安徽省原有的一艘巡江军舰，从湘江调到武汉，接运二临中师生。但军舰已在九江江防前线，比事未成。

团风乘轮的翌晨，见到我国空军飞机作品字形编队在上空飞巡，同学们拍手致敬。上午10时许在武昌登岸，停在蛇山上张公祠及奥略楼（两座宫殿式辉宏建筑，50年代修建长江大桥时拆除）旁边休息和吃饭。不久，空袭警报响了，大群敌机飞临上空，炸弹声、高射炮声一齐轰鸣，这是二临中师生流亡途中第一次遭遇险情。我躲进蛇山顶上嵌有“大汉陈友谅之墓”石碑的墓道中，附近几架高射炮对空猛烈射击，声震耳鼓，这是我在八年抗战烽火中最临近对敌作战“前线”的一次机遇，现在细

想起来，颇有点历史自豪感。以后在武汉停留期间，几乎三天两头有空袭。有天夜里敌机来袭，同学们从吕祖阁眺望星空，但见被我探照灯光柱咬住的敌机，遭到我国空军痛歼而拖着长长的火舌栽跟斗，人人拍手欢呼，彻夜兴奋不已。

我们在武昌总共停留十几天，先后住吕祖阁及小朝街安徽旅鄂中学，高三同学参加了毕业考试。在此期间，得知教育部决定把从战区撤退出来的各省中等学校组建国立中学，我们二临中将成为国立安徽中学组成部分，校址在湖南西部山区，至此我们心里踏实了，流亡路线也有了明确的走向。

进入大后方

从武昌出发，经岳阳、常德到沅陵，是二临中流亡的第二阶段，进入安定的大后方。由于轮船吨位不大，师生们分两批先后从武昌乘轮溯长江而上，过岳阳入洞庭湖到常德。我是第一批乘船的，过君山时曾瞥见浩荡的湖面，不久即天黑。次日清晨，轮船已在狭窄的港汊中行驶，岸边水牛对着我们咩咩叫，因未看到“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的壮观，难免有些失望，当时不知道“围湖垦殖”这码事。当天下午船抵常德。第二批乘船经过岳阳时，碰上日机三架轰炸岳阳，城内大火，敌机在船上盘旋，大家十分恐慌，人人自危，幸有江中军舰高射炮向敌机射击，敌机飞去，这是流亡途中部分师生第二次遭遇险情。在常德西门外大街米行等店铺里住了约3个星期，没有空袭之扰，安静地休息，恢复体力。同学们进城看电影，和伤兵一同享受免票优待。抗战新闻记录片没有声音，但目睹南京紫金山山坡上抗日战士与日军白刃战、我高射炮手沉着地击落敌机的雄壮场面，兴奋不已。

由常德循京黔国道（当时公路牌作此称呼，是京滇公路的一段）西南行，第一站在桃源县住下，第二站是水溪镇，参观了附近的桃源洞。该地按陶渊民的《桃花源记》所述布置景点

多处，有问津亭、桃花林、渔人从人处、豁然亭、渔人辞出处等等，有古碑和靖節先生塑像等，附近还有内外八景，山水清奇。以后经郑家驿、茶庵铺、新店驿、官庄、楠木铺、芙蓉关、界亭驿、马底驿、松溪铺、凉水井，经望圣坡盘旋下山，过河抵沅陵。走近沅陵，大多数同学是初次见到山城，房屋高低错落，层迭有序，青山屏障，大河（沅江）萦绕，而酉水汇入沅江处，碧流与混水泾渭分明。正在欣赏壮丽的山城美景时，来迎接我们的工友说，顾校长已去四川秀山另觅校址，原定在凤凰县的校址不去了。大家是第一次听说要去四川，高兴极了，未想到竟然从安徽走到四川！那时四川对我们来说好似天边，从未敢想进川。

在沅陵城内，我们住教会学校朝阳中学。一天顾校长带邵华来和同学们见面，宣布二临中和其他几所流亡来湘的安徽兄弟学校共同组成国立安徽中学，校本部设在乾城县的所里镇（今古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学校设高中、师范、初中、高女及初女共11个分校，散布在湘西及川东的六七个县内，借用庙宇、祠堂或民间大宅为校舍。二临中的高中部并入国立安中的高中第二分校，校址设河溪；高师部并入安中高师分校，校址在乾城鸦溪；初中部及简师班改为安中初五分校，校址在四川秀山坪垅镇护国寺；女生分别归入高女、高师及初女分校，校址在所里、乾城等地。国立安徽中学以后相继易名为国立安徽第一中学及国立第八中学，各分校改称分部。所以说，二临中是国立八中的前身学校之一。

分道借鑒，重整弦歌

二临中流亡的第三阶段即最后一段，是从沅陵出发，分别走向河溪、鸦溪、所里、乾城与坪垅。我们初中部师生的路线最远，由沅陵循川湘公路，经过泸溪、能滩吊桥、潭溪、大坡流、松柏潭、河溪、鸦溪、所里、平浪、矮寨、排碧、麻栗场、尖

岩、永绥、吉峒坪、茶洞（以上属湖南省）、也架（亦作迓驾，属贵州省），过“三不管”，进入四川秀山县境，经中寨、毛坪、青龙村、石耶司到坪壅护国寺。这段路程是以十几人为一组，分小组各自走完的。因为高初中各部分要各自走向不同的分校，而沿途村镇不大，也容不下一二百人的队伍宿食。同学们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锻炼，十几名青年患难与共，走向深山峻岭的苗乡，学会“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我们自己买米烧饭，获得独立生活的本领。而带队的王祥瑞同学，每到一地，访问居停主人及附近人家，了解当地及次日行程中乡镇情况，查核苗汉语地名读写法等等，开始学习社会调查。我们小组的成员们颇有兴趣地分享着这些新鲜的社会调查成果。

川湘公路穿行于武陵山区，山势峻拔，河谷深切，公路曲折蜿蜒，多“之”字形弯道，工程艰巨，尤以能滩吊桥及矮寨盘山公路为最。能滩（或名龙滩）河两岸高达20米，水流湍急，吊桥长80米，宽5米，以铁链悬于两岸石壁间，桥面承重10吨，为当时湖南省第二大工程。矮寨山顶海拔1350米，山麓海拔约700米，相对高度650米。公路盘旋上山，计有十四、五道弯，总长6公里，有的大弯伸进山腹，有山穷水尽之慨。在山顶下边的山坡上耸立着“川湘公路死难员工纪念碑”，碑上刻着筑路死难员工的数目和姓名，总数约有200多人。总计从山麓到纪念碑，水平直线距离不到1000米，相对高差440米。山上还有旧的石板大道，与盘山公路相互穿插，我们为减少路程，取道坡度更为陡峭，有时几乎是直上直下的石板大道。同行的挑盐巴的民工说石板大道全长也有“一跑里”（10华里），可见矮寨山势高峻。

从纪念碑文得知川湘公路是国家为准备抗战而修的，1936年3月开工，同年12月末即竣工，能滩吊桥亦于1937年建成。当时华北日军处处寻衅，国家民族处在生死危亡之秋，广大筑路员工在短短一二年间，就在地形崎岖，人烟稀少，给养困难的川

湘边境地带，迅速完成这条当时号称为“中国公路建设的空前大工程”、“湘西第一险道”的战略公路，抗战大后方的交通大动脉。我们这批从沦陷区来的莘莘学子们，也因有了这条平整坚实的碎石公路才得以安全抵达后方，因此我们从心坎里产生对死难员工的肃然起敬。后来我们得知，在纪念碑正下方第四个弯道上那座横跨公路的桥梁，还是中国工程师们的创造，当时外国工程师们束手无策，中国工程师巧妙地设计出螺旋式（ ∞ ）的路桥方案，简单而便捷地克服了坡度陡峻，工程没有多少迴旋余地的困难，又节约了大量财力、人力和时间，这是中国人爱国主义加智慧的结晶，我们为此而感到钦佩和骄傲！

为避免8月份炎夏的日晒之苦，我们曾有几晚夜行军，月上中天，万籁俱寂，我们在睡寐中迷迷糊糊地跟着身边的同学前进，常常彼此碰醒了，坐下来小憩一会儿再走。那种睡觉走路的有趣经历，大概称得上是人生中的难得机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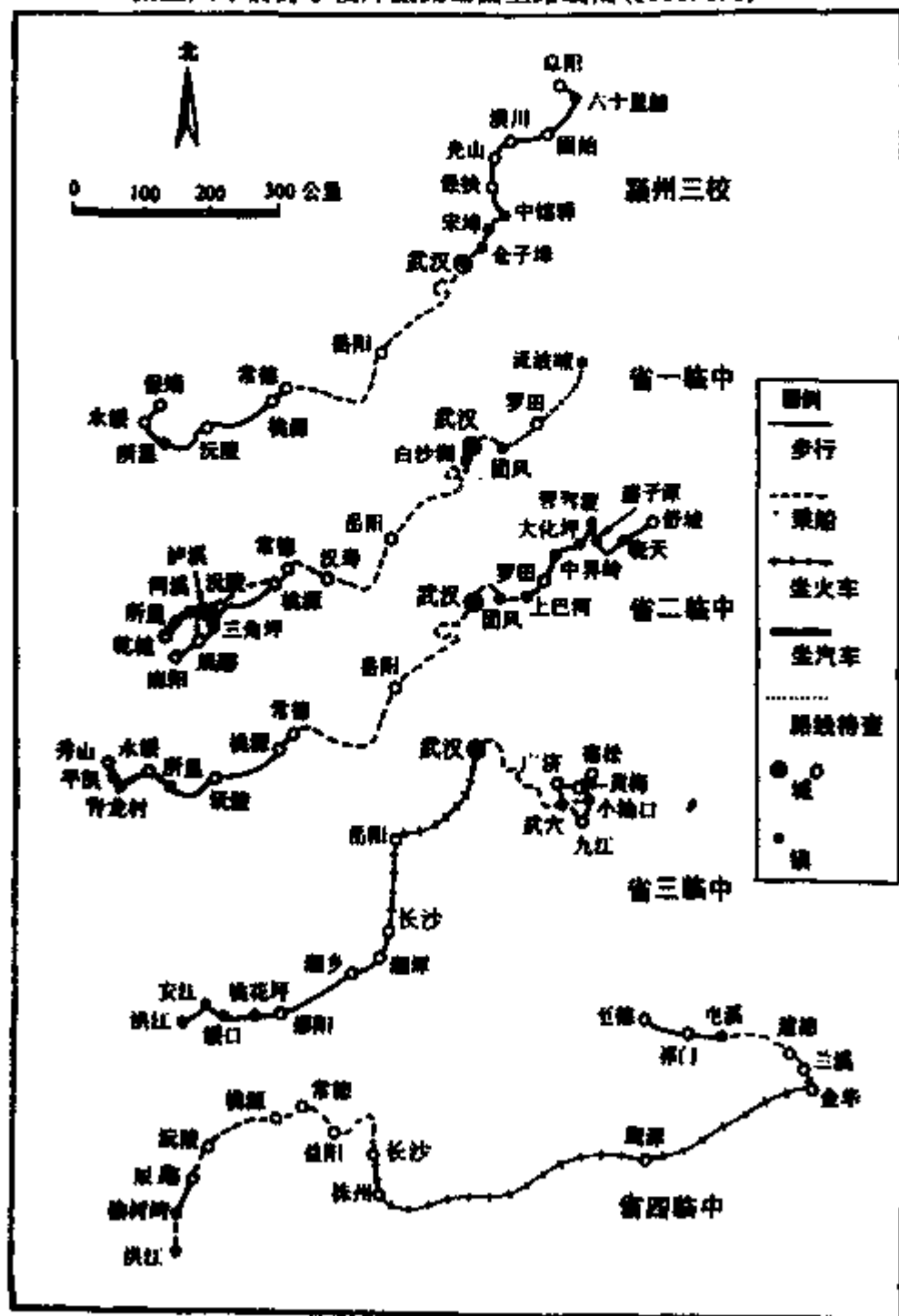
从沅陵出发的当天，我们小组在公路岔道口走错了方向，步入沅江岸边，越走行人越少，茅草越深，一片凄凉。遇到两三名背篓农民，惊讶地看着我们，好心地关照说：这一带小路走不得，你们人地生疏，遇上“老二”（土匪）就麻烦啦。以后在八中的几年，我们假期里往来于各分部之间，都是平安无事。这不能不归功于深明大义的当地头面人物“湘西王”陈渠珍，他应湘省主席张治中的嘱托，在全民抗战的大局下，毅然担当起保护国立八中的责任，关照各地不得侵犯安徽师生。

二临中秉承安徽教育厅之命，受几百户家庭之托，肩负重担，力排艰阻，精心安排六七百名男女生的队伍（年龄最小的初中一年毅学生，仅12~13岁），走出危急的战区，跋山涉水，流亡三千多华里。又时值炎辰，多次遇到敌机轰炸，但组织得很周到，秩序井然，途中没有一人死伤失散，全部安全到达目的地，得以重整弦歌，续完学业，为乡梓和国家抢救出一批未来的

人才，为他们日后参加国家各项事业的建设打下基础。这样的周密组织、庞大规模、有效措施和显著成绩，在当时各流亡中学中是比较突出的，这是二临中对安徽抗战时期教育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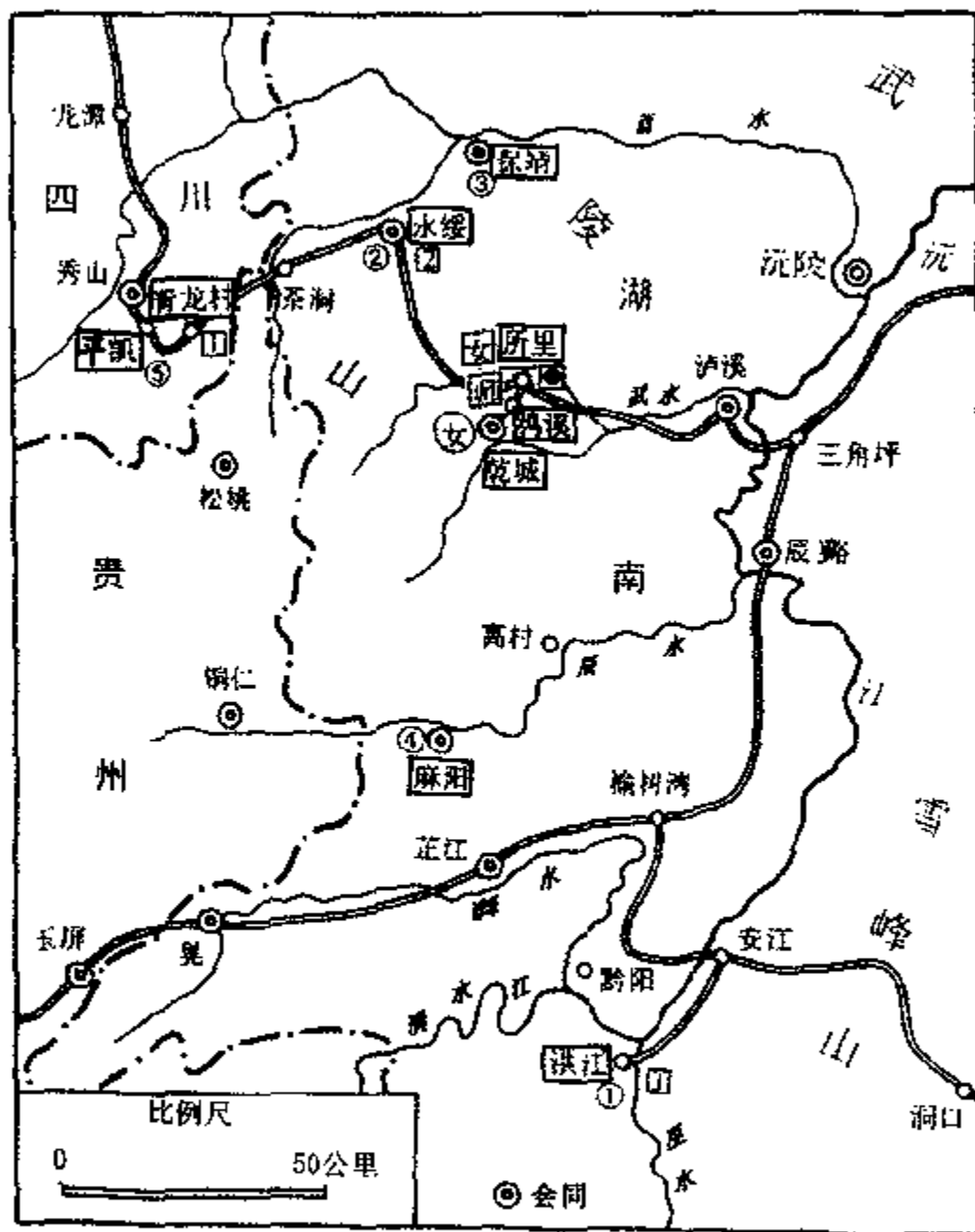
总计6月25日从晓天出发，9月5日前后次第到达坪坎，

国立八年前身学校师生流亡西上路线图(1938.5.9)



国立八中最盛时（1938.9—1940.8）各部在湘川地区分布图

徐成龙 制图



图例：省界 公路 县城 镇
 例：校本部 高中、师范部 初中部 (数字 为分部序列)

两幅地图根据校友的回忆资料绘制，表现当年历史。50年代以来，地方行政建制、交通线、水系及地名变动很多，可参阅当代出版的正式地图。这里交代与八中关系密切的地名变动：所里—吉首（湘西自治州首府），乾城—乾州镇，永绥—花垣。秀山属于1997.3.14新设的重庆直辖市。

历时约 70 天，行程 3000 余华里^①，其中徒步将近 2000 华里，乘船 1000 多华里。

二、国立八中及其两个分部

1. 国立八中简介

国立八中于 1938 年秋成立，由从安徽流亡到后方的四所省立临时中学及颍州三校（颍州中学、女中及师范，皆在阜阳，旧时阜阳称颍州）组成，其师生来自战前安徽原有 20 多所省县立中等学校，约占此时安徽中等学校师生总数的 70%。其中小部分师生是自己逃难到后方，中途加入学校流亡队伍的，更有少数人是走到所里登记入校的。

在国立八中成立的最初两年，规模最大，计有 11 个分部（起初称分校）及 1 个校本部。各部所在地如下：

校本部在所里张家大屋，初中第一部在洪江校场坪，初中第二部在永绥显王宫，初中第三部在保靖禹王宫，初中第四部在麻阳县书院，初中第五部在秀山坪塊护国寺，初中女子部在乾城文庙，高中第一部在秀山青龙村黄家大屋，高中第二部在永绥文庙，高中第三部在洪江嵩云寺，高中女子部在乾城狮子衙门，师范部在乾城鸦溪罗家祠堂。师范部男女同校，初一至初五部及前期高三部兼收少数女生。

国立八中前身学校的 5 条 3000 里流亡行军路线，11 个分部路越湘川边区 6~7 个县、纵横 170×80 公里的地域分布，在当时 33 所国立中学中可说是规模最大的。笔者为此绘制两模地图，

① 根据笔者当时的笔记本与日记本记录核算，全部里程皆为华里。旧时代，各地华里长度相当悬殊，尤以山区及少数民族地区为甚。这里仍按当时当地民间说法统计，不换算成公制。

让读者获得清晰的概念，并补充文字叙述之不足^①。

由于学校设在后方，安徽生源后继乏人，毕业生陆续离校，当地学生考入者不多，从1940年开始，学生人数逐步减少，11个分部相应地进行合并，陆续减少，分布地也有移动。到1945年抗战胜利，国立八中结束前夕，除校本部外仅剩6个分部，即高中、高女、师范、初一、初二及初女部，分布于4个地方，即所里、乾城、永绥和青龙村。

校本部始终在所里，设教育、训导、总务三处及秘书、校刊（《安徽学生》）编辑两室。

国立八中存在8年（1938年秋至1946年夏），其中前5年（1938年至1943年）校长为邵华（安徽颍上人），这个阶段是学校开创与巩固的关键时期，此时邵华也是中国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抗战前夕的1937年5月，邵华曾为国民党派往延安的考察团三名成员之一，并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合影，这帧六人合影的巨幅放大照，现在陈列于北京卢沟桥附近宛平城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东展厅墙上^②。邵华的社会地位及其作为给国立八中带来一定方便，也留下不少历史包袱。

1946年夏，国立八中师生复员回皖，分别在皖北及皖南长江沿岸成立4所安徽省立中等学校：即太和中学、贵池中学、芜湖女中和当涂师范。至此，国立八中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国立八中的分部较多，各部之间有分有合。为了让读者容易了解，特编制“国文八中来龙去脉变迁表”供参改。

以下详细报导笔者就读的国立八中两个分部（初五部与高二部）的情况。

① 两幅图见前第178、179页。

② 笔者1992年亲身所见

附:

国立八中来龙去脉变迁表

1938

颍州三校

安徽省立四所临时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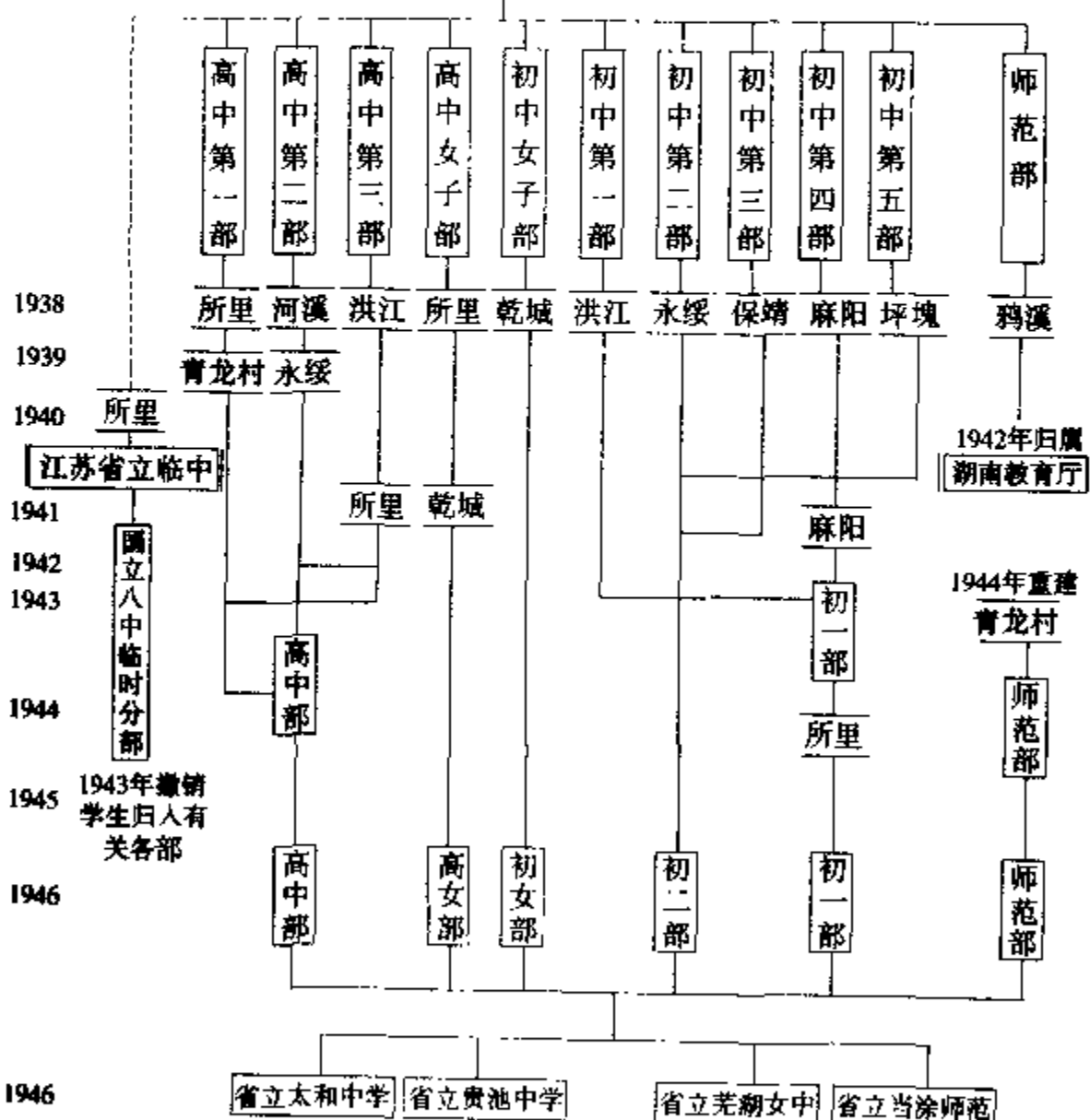
徐成龙编制

2001年1月

国立安徽中学

国立安徽第一中学

国立第八中学



2. 初五部始末

川东名邑秀山城

国立八中初五部位于秀山县城东南约3公里的坪壩镇。秀山是当时所谓四川省“东南屏障”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大名邑中位置最南的一县，西邻贵州，东连湖南，东北摇接湖北，处于川湘黔鄂四省边塞之地，是兄弟民族（土家族、苗族）聚居的山区，形势重要。抗战前夕已有川湘公路贯通，县城南门外有30年代初开辟的旧机场，听说抗战后期扩建为供美军B-29重型轰炸机对日本作战的备用基地。

秀山城及坪壩镇座落在肥沃的盆地中，附近岗丘环抱，邑梅水（秀山河，酉水上源之一）从中缓缓流过，气候温和湿润，农林畜产品多样。城廓不大，但块石砌的城墙坚固整齐。城内两条十字街，有三合土锤打的平整路面，街房约1000多栋，除具有一般小城市的工商业外，有经营本地著名特产秀〔山桐〕油的商行，还拥有一般小县城难以具备的公共图书馆。

坪壩镇因位于盆地的一块平地上而得名，镇上的邮戳即用这个地名，使用率远远高于一般文献中的“平戩”。坪壩镇只有一条河卵石与青石板铺砌的小街，有豆腐坊、杂货摊、中药铺（兼邮政代办所）及小饭馆等，平时街上比较清静。街镇与邻近一些乡镇每3~5天轮流举行一次集市，各地的农林畜产品赶来，进行露天买卖，称作“赶场”。一时间，人头攒动，鸡猪牛羊鸣叫不绝，苗族男女（当时我们还未听说过“土家族”）缠着包头帕，身穿无领阔边大襟长衫和筒裤，背着背篓，在场上穿梭往返。都会讲汉语。那种每场大半天的喧哗景象是当地经济生活、民族风情与文化的博览会，对我们初来乍到的远方游子们来说颇为新奇。

秀山人说话不俗气，没有写不出字的土语，学校挑水的苗族工人说“莫吼！〔日本〕飞机在脑壳上打转转，奈何不得，”真有点文绉绉的味道。当时仅有1.5万人口的秀山城，就住着一位退休的四川大学王校长，他的四个女儿中有三个来初五部就读。

栖身护国寺

初五部的校址护国寺座落在坪城镇西侧的小河边（邑梅水支流），河上有座西南民族风格的风雨桥（廊桥）。古庙范围广大，东西宽约100米，南北纵深150至200米，大致呈矩形，其东南部分的四分之一面积为庙宇主体所在，有20至30间房屋，布局严整，有厅堂、厢房、过道和三进庭院，梁柱都是粗大的楠木，灰瓦顶、黑漆木板墙、青石台阶。大门朝南，遥对川湘公路。后院有大片树林，多是贵重的楠木和樟树，还有桂花树。树龄古老，树干笔直粗壮，高一二十米，林冠郁闭，林冠上栖息着成群的白鹭，秋去春来，启示我们季节递换的信息。在此生活两年，感到冬无严寒，夏不酷热，除秋冬多雨雾外，一般天气对我们衣单被薄的下江人倒是很适合的。邑梅水来自贵州松桃，流经坪壩、秀山城而北去，注入酉水，平常水深1米上下，清澈得可以看见活泼的小鱼和平坦的鹅卵石河床，是良好的天然游泳池。

1938年9~10月间，初五部正式开学，三个年级共有六七十个班，学生约250人左右，绝大多数是二临中同学，少数人是在后方入学的。以皖中同学最多，皖北次之，另有小部分来自安徽以外的沦陷区及当地的四川、湖南人。各班皆有少数女生。

教育部规定，家在战区的国立中学学生除免交一切费用外，还给予国家贷金每人每月6元，其中膳食4元，书籍文具2元。另外还有置装费，由学校做制服及棉被等发给学生。

护国寺的房屋，一部分由庙内女尼们留用，大部分借给初五部。开学伊始，学校忙于多方面的基本建设，请来一些木工和裁

缝师傅住在学校里加紧工作，改造寺里一部分厢房，在较高深的厢房中段加层楼板，楼下做教室，楼上作寝室。但房屋仍不够用，一、二年级的三个班借住在护国寺与秀山城之间的秀山中学，待到第二年，三年级同学毕业离校后才搬回护国寺。林前空地开辟篮球场和排球场，还有一些空地可供课外活动。工人们制作桌、凳、门窗和盆桶，弹棉花，缝制衣服。学校发给同学每人一只木脸盆，一个窑碟碗带一双竹筷，一只油灯盏，一床薄棉被带几斤稻草，两套粗布单制服，一件棉背心配一件棉大衣。同学们用木工房的零碎木料制做木屐代替雨鞋。这样，我们彷彿又回到了原始的生活时代。感谢校方精打细算的安排，让我们应付了流亡异乡凄苦的第一个秋冬。

大家睡统铺，三间楼板和一长排高脚屋的地板上铺着新稻草倒也暖和，又避免了地上湿气侵袭。照明起先用秀山桐油，因是出口物资，后来换用乌柏油，俗称“白油”（低温时凝固呈白色）。晚间自习，每间教室四五十盏灯的油烟袅袅，鼻子里吸满了黑灰，清晨洗漱时，增加一项挖鼻孔的程序。

一日三餐，通常是大米粥饭，青菜萝卜，豆腐、黄豆之类，打牙祭时还吃到非常细嫩的沅水大白菜烧猪肉或牛肉丝炒茭白等。炒菜用本地土产茶油，味道不错。食盐是不远处郁山镇的井盐，煤则产自附近山间小煤窑或邻近的松桃县。

校训、校歌、师长们

旧时代，一般比较有地位的学校都有校训和校歌。校训是培育学生素质的准则，字数不多，简明扼要，是校歌的中心内容。学校根据各自的情况，制定自己的校训，谱出自己的校歌。学校集会时，师生同唱，显示学校的特色和精神。国立八中的校训最初是“诚毅”两字，校歌歌词是“八皖父母邦，弦歌重整在沅湘，诚与毅立身立国本，念念慎勿忘……”大约在1939年，教

育部颁令全国各校统一校训为“礼义廉耻”四字，八中校歌歌词也随之改为“弦歌交响在山谷，国旗飘扬在高空，荒岗辟操场，古庙做学宫，这是我们革命的八中。明礼义，知廉耻，建国责任重；菜根香，布衣暖，读书乐无穷……”。在初五部时，同学们都喜欢唱这两首校歌，特别在野外散步时总要放声高唱一下，放松精神。升入高中后，有点思想觉悟，对当时社会黑暗开始不满，认为“礼义廉耻”已被破坏殆尽，特别是歌词中有句“为党国尽忠”，同学们很反感。而统一校训失去各校的特色，学校对它也不重视^①。因此，第二首校歌已被许多校友淡忘了。

初五部教师有十五六位。部主任顾访白社会交际及组织力强，注意搞好学校与地方的关系，给学生创造多方面活动机会，开拓视界。教导主任共黄彦平喜欢聪明勤奋的学生，注重学生的品德教育和主动精神，在英文课上介绍西方大学的“荣誉制”，说考试时教授在黑板上写个“Honor”大字就走开，学生们自尊自重，不作弊。我们大考时，黄先生也在黑板上写个“Honor”就回到房里，并将此举告诉了训导主任金义莲，说“我相信二甲班同学”。的确，我们都感到真是一字千钧，不单自己不作弊，全班同学还相互监督，以维护班级的荣誉。同学们和黄先生从此也建立了自尊与互尊的师生之谊。金义莲先生愤世疾俗，用他家乡合肥土话讲述一个故事，抨击某三爷对“冬瓜舂米”的答问，对随风倒，前后自相矛盾的圆滑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金先生的意思是要我们为人正派。他自编的提纲式地理教材，石印后发给同学，学习方便，易懂易记。贺础卿先生教物理、化学

① 抗战前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把“礼义廉耻”作为全国的“精神教育”规范，这是对国人思想的禁锢，当时就受到知识界的冷遇。抗战爆发后，他更进一步把“礼义廉耻”作为全国大中学校的统一校训，自然得不到教育界的响应。

及几何，讲得条理清晰，教学经验丰富，针对各班学生接受能力，娓娓叙述，效率高，在同学中享有很高威望。朱悦民教自然和生物，针对我们的穷苦生活联系教材，指导我们一些保健知识和方法。他擅长装修无线电收音机，经常告诉我们许多抗战和世界新闻，也是他首先贴出“汪精卫终于做了汉奸”的收录新闻。万次夏及夫人孙宝如分别教国文和地理，顾慕莲（国文）、龚仁模（女，历史、英文）、王干（卫生、校医）诸位也都尽职尽责。李巨波先生的国画和油画很有根底，可惜在抗战大后方的物质缺乏条件下，只能教我们用毛笔在草纸上作简单的练习。他贺赠王干与柏家玠新婚的一轴水彩画上，一对交颈鸳鸯情意绵绵，画中李先生的题词也是书法猷劲，意境隽永：“天寒地冻两相伴，唯有温情能解冰”。音乐教师瞿安华先生仅二十几岁，精力充沛，乐曲指挥有力，姿势壮美，令人精神振奋，在二临中就很受同学欢迎。流亡途中，带领同学大唱爱国歌曲，鼓舞行军队伍。在初五部的第一年，几乎教遍了当时新问世的抗战歌曲与30年代初期的进步电影插曲，第二年逐渐增加乐理讲授及艺术性歌曲如《海韵》、《佛曲》等。

初五部教师中至少有三位，解放后到高等院校执教，即贺础卿先生在安徽师大讲授基本物理、核子物理，兼任物理科系主任。金义莲先生任重庆西南政法学院教授。瞿安华先生离开初五部曾去江津国立九中执教，后任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教授，中国乐坛上有他的高足。上述教师除朱、王两位江苏籍外，皆为安徽人。

生活倒退几十年

武汉沦陷后，敌人加紧封锁，后方物资匮乏及物价波动逐渐显露，我们的生活开始苦起来。伙食质量明显降低。上海出版和生产的课本、笔墨与纸张几乎绝迹。学校用草纸印讲义，我们拿

毛笔写英文，做数学作业，物理和化学课作不了试验，只能纸上谈兵，美术课则用毛笔简单地练习中国画。医务室的药品也日益短缺。内地出版的报刊因纸质粗劣而字迹模糊。侵略者给我们的伤害已经从战区深入到切身生活的各个方面，使我们的物质生活倒退了几十年！

第二年春暖花开时，统铺的稻草里出现了跳蚤，接踵而至的是繁殖力极强而又无缝不钻的臭虫“坦克部队”。这批吸血鬼在我们睡觉、听课、自习或开会时，都会从桌、凳、墙壁隙缝里爬出来，甚至从楼板缝里对着我们身体，准确无误地“俯冲”下来，偷偷地叮咬着。夏天夜晚，同学们发动“抓坦克”战役，一声号令，迅速掀开被单，不是一个个地捉，而是大把大把地抓，把它们看作日本鬼子，抛到油灯火焰上，听着噼噼啪啪地炸得“血流成河”，真解恨。

思乡、忧国、奋斗、师生情

初到秀山的那个学期，秋风秋雨中度过了远离家人的第一个中秋节（10月8日），接着就是大武汉的失守（10月25日），年底又是汉奸汪精卫的叛国投敌，处处是一片凄凉。各班第一堂音乐课，瞿先生都是教唱“流亡三部曲”的第一部《松花江上》，大家都唱过好几年，此时以真正流亡者的身份来唱，感触更深了，未唱几句就哽咽起来，课堂冷了好一会。不仅师生们，连工友们的思乡忧国之情也很浓，厨工们都唱起“流亡三部曲”；理发员请我画张题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国画贴在墙上，我亲眼看到一位待人和蔼、平时脸上常露笑容的女职员张某对这幅画擦眼泪，面庶务主任则喃喃地低吟着诗句唏嘘不已。并非那幅画有多大功夫，而是触景生情，痛失家园的游子们对家国危难的深情忧思。

同学们经常很自然地吟诵着一些古人伤离别、思故乡的词

句，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等等。

同学们的思乡之情和爱国心结合起来，成了艰苦奋斗，勤奋求学的动力，大家主动苦学的精神，让老师们深为感动。每天课余，附近田野里，甚至稍远的山坡上油桐与油茶林中，河边草地上及巨轮水车旁，都有三三两两的同学在读英文或国文，或温习数理化等功课，当地知识人士看到都赞叹说是“国家民族复兴的希望”。老师们说“现在不怕同学不用功，只担心你们太刻苦，有碍健康”，体现出爱护学生的真情。当时我们的学习环境也相当好，城内秀山图书馆收藏堪称丰富，充实了我们的知识府库。学校用社会人士捐赠的几百元，从沅陵买来许多书刊，办了一间小小的图书馆（文艺为主），又用行政经费订了重庆、桂林及沅陵出版的一些主要报刊放在阅览室。

在远离家庭照料的情况下，同学们特别感到自觉保护健康及相互关照的重要性。大家都从秀山图书馆借阅一些有关生理卫生和医药保健的书。各人都有自己的锻炼方式，最普遍的是冷水洗脸，用手摩挲皮肤，晚饭后到郊野散步，节假日走得更远，晚上就寝前在树林或操场上走一会，常到河里洗澡游泳，喜欢户外生活，多晒太阳（秀山秋冬阳光少），如此等等，都是不花钱的穷办法，养成了生活习惯。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粗茶淡饭，站着就餐，勤洗涤，多走动，蔬菜新鲜，山乡环境优美而无污染，真是享受大自然的健康生活。

但也由于衣食不周，免不了营养不良和传染病的侵袭，很多同学患过夜盲症，有些人得了痢疾，甚至有一位患肺结核的皖北同学吐血身亡。

虽然物质生活苦，但师生们感情融洽。春节时部主任倡议每位教师拿出几块钱和同学聚餐，一时间同学们忙得不亦乐乎，吃

着红烧肉美味无比，老师们仅稍微动下筷子，不肯多吃，给同学留下许多菜。在联欢会上，老师出灯谜让同学猜，猜中有奖。他们讲故事，拉二胡，唱京剧，同学们吹口琴，演双簧，还演出部主任夫人的笑话“顾太太大闹凤凰山”，逗得全场师生和工友们鼓掌叫好。

社会活动

学校多方创造条件，鼓励同学参加社会活动。如办壁报《皖声》周刊，付稿费以资奖励。郊游凤凰山，组织歌咏队，举行校内外篮球比赛，邀请社会高层人士来校演讲或做报告，同从抗战前线回来的部队举行慰问联欢等等，以开拓同学的视野，加强爱国心，也为学校创造有利的环境，寻找资助，提高社会地位与知名度，扩大影响。而活动主要内容皆以抗战为中心。

武汉失守后，国内外及世界反法西斯的战线扩大，形势错综复杂。我们身在后方，生活比较安定，有时间仔细阅读报章杂志，师生相互传递信息，学会分析讨论，对抗战形势的认识逐渐深化，理性认识大于二临中时期的感情冲动了。护国寺大门两侧斜壁上，李巨波先生用油漆写下斗大字的标语“还我河山”与“抗战到底”（或“抗战必胜”）。进入校门，前院，抬头即见走廊屏风上面并排挂着6~8块高可1米的彩色宣传画板，各板分别写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到前线去吧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等歌句，板上并有按歌词内容绘成的生动画面，这些画板是二临中时韦化南与李巨波两先生的力作，用于庆祝台儿庄大捷的游行，以后随校西迁带来的。大门传达室墙上是《皖声》的固定园地（主要编辑之一沈克勤同学，今台湾《孙立人传》作者），借住在秀山中学的班级也有刘昌平（今台湾《联合报》系副董事长）同学主办的壁报。同学们用文章、诗歌或漫画抒发同仇敌忾的情怀或对故乡亲人的

眷恋，也有对世界形势的评述。部主任在编辑会上提倡“报告文学”，鼓励我们写出纪实性、有血有肉的文章，切忌空口说白话或无病呻吟。瞿安华先生组织男女同学成立八中初五部歌咏队，在秀山城内多次演出，颇受各界重视。爱好话剧的同学，演出反敌谍的《人约黄昏》等抗日话剧，也很有水平。

两湖监察使高一涵（安徽六安人，抗战前安徽大学教授）路过秀山，被请来校作抗战形势的报告，他以当时欧洲战场上名噪一时的磁性水雷为例，勉励同学努力读书，发展科学，报效国家。他说“我们狭窄的长江，假若投下磁性水雷，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军舰能够进入南京、九江以至武汉吗”？！”几句话声如洪钟，深深震动着同学们的心。香港《大公报》的记者卜少夫曾来采访并拍照。孙立人（舒城人）任团长的财政部税警总团官兵（多皖籍），在“八一三”淞沪战场上英勇杀敌之后，去西南大后方整编途中，在秀山驻留一段时间，和我们师生相会，患难中他乡遇故人，彼此都倍感亲切。清华大学出身的贾参谋长来校访问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官兵们邀请师生在坪垅镇外邑梅水河滩上聚餐，列队拍手高呼“欢迎安徽大同乡”，气氛热烈，引起居民对我们刮目相看，称羡“大安堂不简单”！当时川湘一带称呼国立八中为“安徽大学堂”，简称“大安堂”，不明底细的人以为是中药店。同学们写家信，为了迷惑敌占区日本人的检查，就用“大安堂”作为学校的化名。

跑警报，田野自习忙

1939年10月10日，敌机6架轰炸秀山，城内房屋大部分被毁。那天上午，旧机场上举行各界庆祝双十节大会，初五部师生参加大会归来，返校刚刚坐下，警报号声吹响，大家奔向周围田野。敌机采用狡猾而残酷的手法，先从秀山上空迳直飞过直到无影无踪，空中也听不到飞机马达声，让城内居民以为飞机是飞往

别处而放松警惕，然后又突然迅速低飞回来，投下多枚烧夷弹和杀伤弹，以致全城大火，伤亡不轻。我们伏在小山头松树下，远眺秀山城方向浓烟滚滚，听到炸弹爆炸声与机枪扫射声。同学们已有多次跑警报的经验，距离秀山城也较远，因此比较镇静，学校也未被波及。敌机藐视我们没有防空武器，低飞示威，同学刘昌平竟然看到了机舱里的飞行员，敌人真是欺我太甚！

这次遭到空袭的秀山是八中各分部所在地唯一遭到敌机轰炸的城市。原来，不久前日本飞机曾来秀山城上空，投下汉奸汪精卫写给当地驻军首长第二军军长李延年的策反信，劝他倒戈反蒋以动摇抗战大后方的根基，李延年立即通电公开声讨汪逆，因此日本人进行报复与恐吓。

这次空袭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学习生活秩序。学校从此将每天上午10时至下午2时定为跑警报的时间，一日三餐改成两餐提早上课。吃完早饭，同学们带着讲义纸笔到附近田野或农家去做作业，下午2点再回校上课。因为山区早晨多雾，敌机多从武汉起飞，空袭时间大致在10时至14时之间。除了阴雨天外，学校规定我们应按时离开护国寺，以策安全。这时，每天教室听4节课，田野作业4小时，室内外学习时间对等分配的日程表，一直维持到初五部结束，前后长达10来个月。把作业带到田野里去做，两三个同学在一起，共同切磋，气氛轻松，比晚上在油烟缭绕中的自习，效率离得多。我们三年级同学准备初中毕业考试，田野自习认真忙碌，但也忘不了享受田野生活的乐趣，欣赏大轮滚筒水车戽水与牵动水磨的情形，听着它吱吱呀呀催人欲睡的声音，观察和了解秀山民俗和农村生活情况，获得不少课外知识。

3. 高二部岁月

国立八中自1940年秋开始减缩规模，次第裁撤和合并各分

部。但高二部一直没有变动，她与八中共始终（1938 年秋至 1946 年夏），是持续时间最长而学生积累人数最多的分部。只在最后年月，八中分部减少，高二部相应地易名为八中高中部而已。笔者 1940 年夏毕业于初五部，随之考入高二部，就读于此至 1943 年夏，此间正值高二部稳定发展的中期，本文所述以这个阶段为主，兼及前后时期若干情况。

文庙做学宫

高二部原先设在湖南乾城河溪镇，因地方条件太差，教学与生活诸多不便，于 1939 年迁到酉水之滨的永绥（今花恒）县城西门外街后的文庙，与其相对称的永绥东门外的显王宫则是八中初二部的所在，两校校门皆面对城墙，城墙用整齐的块石砌成。县城只有一条长约 4 华里的东西行大街，全城居民约 3000 户，人口可 1.3 至 1.5 万人，其中西门外大街占 700 户，约 3000 人。街道与房屋建筑比较整齐，多为石板路而、砖瓦房与木板墙，市面工商业较为活跃。东门外酉水之上有座石拱桥，西门外长街遥接川湘公路，分别是永绥对外交通的水陆咽喉。县城附近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除酉水河谷深切构成槽状陡岸外，周围多 50 至 100 米高的浅丘，城度缓和，地形开阔，多旱田。

永绥文庙建于 1804 年，规模在一般县级文庙中堪称宏大，它按曲阜孔庙格式进行具体而微的布局。全庙范围呈矩形，坐西朝东，三进院落，院内古柏佳荫。由前往后是南北并列的两座大门，“金声玉振”石牌坊、泮池和石拱桥，奎文阁（学校用作庶务室、阅览室等），南北两斋（4~6 间教室），大成殿（教务处与训导处），崇圣祠（学生寝室）与两北两庑（养病同学寝室及理发室）等。文庙右（南）侧还有先贤祠，用作师生寝室及办公室（医务室、膳食委员会、厨房等）；左（北）侧空地辟为大操场。学校在两庑外边建了两排长形大草房，南草房是三间教

室，外边就是西门外大街民居，北草房是大礼堂兼饭厅，外边是乡间绿篱夹道和村舍。后来又在大门南侧建幢两层楼，木板墙和瓦顶，楼下教室，楼上阅览室及文娱室。

非凡的教师阵容

高二部历时最长，部主任、教导主任与训导主任几度更迭，教职员工也有进有出。笔者在校时部主任为王贤敏，教导主任先后为沈兰渠及欧阳茨寰，训导主任为胡松岩及沈沅湘。高二部教师阵容比较整齐，拥有一批安徽著名教师，其中包括由因抗战军兴而停办的安徽大学转来的四五位教师，而抗战胜利及解放后去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任职的达到10多位。国立八中创建之初，由安大转入高二部的教师有杨大铤（后去国立礼乐馆，专研历史地理学，大书法家，有强烈的爱国心，民族大义凛然，晚年回永绥退休）、施佩璋（驻英公使施肇基之子，在英国长大，牛津大学毕业，英语语音及语法纯正。杨大铤先生之婿，教英语，后去重庆。抗战胜利，复员东下，乘木船在川江遇难）及鲍哲文三位。鲍先生原是安大中文系讲师，讲授《春秋左氏传》，在高二部讲授《左传五十凡》。他是著名经典学家刘文典的弟子，精研文字学。他教三年级时，选题侧重于人生哲理，如庄子《逍遥游》、屈原《离骚》等，其意义不限于文学知识。每篇文章讲授最后，鲍先生皆要朗读一遍，真是声振屋瓦，余音绕梁，引得别班同学也站立窗外聆听。他朗读《离骚》时，我感动得几乎掉泪。他对庄子的“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寓意阐明得很深刻，对我以后的人生观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另一位张渡（汝舟）先生，读东南大学中文系时，师事黄侃与王伯沆两先生，治学涉猎很广，于语法、训诂、音韵等都有一定的造诣，甚至对古代天文历法也有研究。著有《国文文法》、《简明语法》、《汉语语法发展史纲要》、《二母室论学杂著》、《二母室古代天文曆法论丛》

等书。他在课堂上随时要求学生背诵前一两年读过的文章，因此同学们把一些古文背得滚瓜烂熟，至今还能朗朗上口，得益匪浅。张先生为人正直，生活简朴，经常用课外时间在家中给同学讲授宋明理学与做人之道，虽口乾舌苦，犹谆谆不已。张师离开八中后去蓝田（今涟源市）师院任教，后任贵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最后回皖任教于滁州师院。张涤华先生193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是高二部最年轻的教师，解放后任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目录学、语言文字学概论、现代汉语语法等，著有《类书流别》、《现代汉语语法》、《毛主席诗词小笺》、《张涤华论文选集》等，参与编审《汉语大词典》，为语言界知名人物。徐家齐（心逸）先生也是高二部同学乐于称道的国文教师，后去湖北师院任教。郭叔平老师自学成才，喜爱诗词和骈文，在一次国耻纪念会上，慷慨陈辞，即席吟联曰“易水尚含波，国仇未报壮士老；汉家宜用武，白日不动青天高”，足见先生的国学功底。历史教师陶梦庵历任庐州中学及高二部教导主任，先后在高二部及高一部教历史，解放后在安师大讲授中国通史及中国经济史。刘荫圃治学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准则。刘毓璜先生任职于高二部及高一部，讲授国文、英文、中外史地及公民，中国共产党永绥支部的始建人，解放后执教于安徽学院及南京大学历史系，深研诸子之学，有著作。数学教师沈沅湘及化学教师沈兰渠拥有长期教学经验，沅湘先生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随手而就，圆直端正，毋需规尺。抗战胜利后二沈先生均任安徽大学教授。英文教师单涤凡，原是大学外文系讲师，在课堂上不仅说文解字，且讲授弥尔顿、王尔德、麦考勒等人的作品，把同学们带入英国文学领域。王道平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和曹禺（万家宝）同班，二人同时考取庚款留美，王先生因体格检查没有过关未能出国。他终身安于中学英语教学，为安徽著名的老教师。在高二部，道平老师从人格修养上爱护和教导我们，他告诫

同学说“做人要有起码的诚实。你们流亡在外，考试不及格、留级、退学，生活就没有着落，我是不愿意你们遭到这步田地的。假若考不好，只要老老实实说明原因，不弄虚作假，我可以给你60分，或者补考的机会。但假若作弊，即使考得再好，我也给你一个零蛋！”真是语重心长。物理教师杨光熊，杨大铨先生之子，中央大学物理系首届毕业，博学多闻，有“百科全书”之誉，讲课深入浅出，很有吸引力。1943年他讲到原子能，说将来只用一把黄土，若能进行原子分裂，释出的巨大能量可以让我们乘巨轮横渡太平洋，当时还有同学表示怀疑，但两年后，广岛爆炸原子弹的消息震动世界，我们佩服杨先生的学识随着时代科技的步伐而前进，非一般固步自封的中学理化教师所能及。以后先生任重庆中央工专教授及成都四川大学物理系主任。施孟胥，学识根底深厚，高二部早期物理教师，解放后在安师大讲授基本物理，参与注释《戴震全集》。生物教师李森（木三）解放后在安师大主讲动物学与植物学。地理教师萧廷奎及盛福尧，是二三十年代中国北方地学中心北师大地理系毕业。萧先生治学严谨，备课认真，把新地学讲得头头是道，妙趣横生，令人敬佩，同学们称赞他为“萧大嘴”。盛先生教材扎实，广泛搜集报刊上的新鲜资料和信息，使它们和地理教材结合起来，将冷门的地理课用形势教育来润色，把课程讲活了。如苏联迁都古比雪夫、蒋氏夫妇应邀访问印度（1942年2—3月）视察开伯尔山口^①、我国开辟滇缅公路、报刊上经常出现的警句“一滴汽油一滴血”等问题，讲解都很有深度。萧、盛两位解放后在开封河南地理所任研究员，萧先生翻译出版有《世界气候学》。

^① 当时印、巴还未分治。开伯尔山口是印度次大陆与中亚阿富汗之间的重要战略通道，为预防德国东进和日本联手，盟年方面重视开伯尔山口的防卫问题。

良好的读书环境与学风

高二部同学读书风气浓厚在国立八中是被肯定的，这是前身学校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高二部初期学生中有许多原是庐州中学和颍州中学学生，教师亦多为庐中的，两校在安徽皆以学风醇厚被称道于教育界。另外，在当时国立八中“就近升学”的不成文原则下，慕名而远道来考的学生自然是用功的。最后一个有利条件，颍中带出来的图书仪器放在永绥北门外翠云山傅壮肃祠内，设为国立八中唯一的图书馆。该馆座落在田野之间，下临酉水。祠的下边河岸半山腰有个宽广的溶洞，冬暖夏凉，可以躲警报。对岸堡垒式塔峰兀立，此处风景绝佳，青山碧水，环境异常幽静。同学们既可在此借书、浏览报刊，又可休息，饱览山河景色。而学校周边的田园与山岗更是我们就近温习功课的好地方。由于远离故乡，无家可归，寒暑假也不完全休息，大多数同学每天都会自习两三个小时，这已成为高二部同学的传统习惯，不学习反而觉得无事可做感到不自在。

安徽曾以文风威而著名。高二部同学接受历史与环境的熏陶，国文教师的卓越讲授，普遍重视国文课的学习。在郊野自习时，期诵古文之声飘荡在田间地头，虽在假期亦不例外。具有文学秉赋的同学获得鲍张二师的格外辅导，学习成绩突出，好多人成了现居海内外的有名语言或文字学家，文学家、诗人及文艺理论研究专家。爱好新文艺的同学，在校内出版壁报，有次为纪念“五一”和“五四”出了《拓荒》特刊，纵论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有文章、诗歌和木刻板画，刊头画是大红彩色的风云下，隐约中漫卷着如林的红旗，我也应约写了一篇稿子。不久，编辑同学受到校本部派来的教官迫害，另有同学事前得到风声去了解放区。

自然科学的物理、化学与生物课，缺乏电源、器械及药品，

无法做实验，难免影响学习成绩。但每到三年级分文理科时，总是文科一班，理科两班，毕业后投致高校，以及今天服务于社会，也是理工农医的人员多于文史哲，这是“抗战建国”的时代要求促成的，因为预计抗战胜利后，国家医治战争创伤，物质部门建设需要大量理工人才，老师们当时就是这样鼓励同学的，如盛福尧先生劝我学气象，说军事、交通、电讯、农业、水利等诸多方面都需要气象提供服务；金义莲先生建议我学化工，他以当时后方军火，烧碱以至日用消费品肥皂的供应紧张来论证，指出化学工业是军民两用、天天不可或缺的重要产业。我们毕业时，校长邵华来班上点名，逐一询问同学们毕业后去向，对大家准备报致的一些专业进行了解和指导。有位同学答覆考水利，邵华大加鼓励，并就淮河水患问题讲了水利专业的重要。文科同学也是以学习和弘扬祖国及人类文化为己任。反映出我们苦学生涯锻炼出来的青年们纯朴意识。

读书不忘宣传抗战

高二部同学尽管勤奋读书，但也未忘宣传抗战。仅就笔者回忆，在我就读的三年期间，主要的抗战宣传活动即有三项。（一）发生重大战役时办壁报特利，张贴到永绥街上。笔者参加过两次，即长沙会战与珍珠港事件时，除抄录新闻外，还绘出战场攻守形势地图，让群众易于了解战局变化。（二）在永绥城里上演反映东江游击队抗日活动的话剧，剧中“梅娘曲”的动人歌声在社会青年中迅速广泛地流传开。（三）最令我难忘的一次是1942年暑假，应当地政府的要求，学校指派我们十几名同学和贞信女中的师生，到永绥乡下宣传抗战救国，历时大约三星期，行经路线为永绥——吉峒坪——茅沟寨——卫城——中寨——排碧——尖岩——永绥。县里派一名女干部陪同，任苗语翻译及同乡镇方面联络。两校男女同学合演话剧，内容是拿起武器

上前线”的故事，一些关键性台词由女干部译成苗语，如 Weano——打，Nonni——吃饭。贞信女中同学把《延水谣》改作《酉水谣》，歌词只改一字，更贴近本地风情，苗族青年们学起来更有劲，收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歌词是“酉水浊，酉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当兵要当抗日军，不是好铁不打钉……”我和冯鹤山同学专门画漫画，没有钱买颜料和纸笔，用粉笔在店铺门板或墙上画，每到一地就画起来，我们两个最忙了。这是我毕生难得的一次深入兄弟民族山乡的机会，获得珍贵的发现和对该地的正确认识，包括自然和人文，当时我庆幸走进了现实的桃花源。

高二部的社会地位、同学们的社会责任感

国立八中与湖南大学（设在辰溪，学生 1500 余人）被誉为抗战时期湘西地区的两个文化重心。湖大师生人数远不及八中，他们也不像八中师生的活跃，国立八中乃成为当时湘西社会文化的主流，在地方上拥有相当高的声望和地位。高二部则以师生素质较高，学生思想活跃，社会活动力强，所在的地理位置又较其他几个高中部为优，交通方便，因而受到八中学校当局的重视和社会人士的注目。学校当局常把来访的贵宾带到高二部和师生们见面。

1940 年 9 月 24，农历 8 月 27，孔子诞辰纪念日。永绥县长率领一批地方人士来文庙大成殿前举行多年来少有的一次祭孔典礼，张汝舟老师应邀发表演讲，不料他借题发挥，大骂官场上丧尽礼义廉耻，有违孔子教诲，参加祭孔的官僚士绅们皆垂首不作正视，场面一片尴尬。

1942—1943 年间，有两次中央官员途经湘西，邵华陪同他们访问了高二部，官员们的来访和讲话都以报告抗战形势和慰勉师生为内容。一次是陈诚来访，一次是 1942 年战地慰问团正副

团长居正（司法院院长）和于斌主教（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讲话。居正的来到引起一阵“谭佛心怒斥土军官”的故事。谭先生是高二部教师，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的同盟会员。居正夫归来到，一下汽车见到谭先生便热烈握手和问候：“三十年未见了，老兄可好？”那天晚上，在筹备翌日欢迎大会时，永绥地方部队一名军官请谭先生通知永绥中学和贞信女中也参加欢迎会，惹起老先生顿时火冒三丈，骂他“狗眼望人低，不识泰山，竟敢吩咐我！”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冒失鬼，在永绥一群头面人物前丢尽了面子。

上述张谭两先生骂人后，未受到打击报复，表明当时当地的社会还有些“尊师重道”，高二部也毕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高二部同学的社会责任感相当强，突出表现有两年事。一件是永绥中学学生吴某兄弟，返家途中被乡保甲长策划杀害。高二部同学在疾恶如仇的鲍哲文先生鼓励下，并向寓居城内的柏文蔚老先生（安徽寿县人，民国初年任安徽督军，北伐时任33军军长，国民政府委员。对八中学生关怀备至，同学们计划什么行动时，先向柏老打招呼，取得“保护伞”的作用）报告情况，多方活动，揭穿他们的阴谋，为死者申冤，迫使县政府终于判处了保长“伍大王”及其爪牙三人死刑，为永绥除了一霸，永绥中学师生们得以扬眉吐气。另一件事是永绥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战区难童及抗日战士遗孤）院长（据说是湖南省主席薛岳的表妹）虐待儿童，难童们吃不饱，常来我们饭厅拾剩饭吃，几乎要流落街头。同学们义愤填膺，直接向院长交涉，扬言要向她的上级重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反映，终于制止了她的虐待，保护了难童孤儿们的生活与生命安全。

贫病交加，事情难办

日本侵略战争广泛地破坏了中国的国民经济，特别是战区的

所有家庭皆无法倖免，抗战大后方物价不断上涨，致使国立八中学生绝大多数经济拮据。还有一部分人原本家境贫寒，无钱上中学，只缘特殊机遇，由临时中学的40%免费到国立中学的全部贷金，才得以入学的，这类同学生活很苦，衣履不周，经常赤脚穿草鞋，有时连三角钱一双的草鞋也买不起，只得趿着自己凑合做的木屐。有人写点文章投给沅陵的《抗战日报》（田汉主编）得点稿费做零用；有人干脆休学一学期或一年，去乡下当小学教师，以解救生活困难和养息身体；多数人在亲戚友好同学之间临时相互接济一点，笔者就是经常受到黄开诚同学的帮助。

由于营养不良，同学们患病的很多，以致学校特辟几间房屋为常年专用的学生养病房。肺结核和痢疾不断传播，夺走了好几名同学的生命，更有不少同学从此落下了病根，影响日后的健康。1940年初秋的痢疾大流行，当时同学们人人自危，至今犹谈虎色变。

学校曾多方设法减少同学们的困难，其中向校外争取的往往获得成功，而在校内事情偏偏时有难办。贷金制实行不久，因物价上涨，每月6元不够用，国家改用粮食计价，每人每月按大米45市斤折价报销。高二部上报教育部的粮价比永绥市面实价略高，让同学得点额外补助；而永绥粮食局上报粮食部的粮价则低于市价，以表示他们平抑物价有功，两者之间差额明显，粮食局不满。另外，战时食盐实行管制，每人每天0.25市两，学校每年给永绥食盐专卖处造册报告学生人数，只报增加的新生人数，不减去毕业离校人数，以致高二部学生食盐数量大多超过国家的定额。永绥粮盐两部门向学校提出疑问，学校把问题推给学生膳食委员会（每月改选一次），粮盐部门无可奈何，同学们享受点实惠。

部主任王贤敏重庆受训归来，在校务会议上提出恢复学生一日三餐，说教育部指示，强调一日三餐是保障学生健康的基本条

件，并说重庆附近几所国立中学因不执行教育部指示而被通报批评（此时已经很少空袭警报），但建议遭到个别教师的反对未能实行。为改善学生伙食，部主任指派一位职员，雇用6名工人，在学校附近空地上种菜，但这名职员竟用工人替自己干活，跑单帮挣钱，菜园荒芜，膳委会建议辞退工人和职员，部主任表示为难。学校后来雇用一对当地夫妇，在大操场边一间房子里，磨制菜豆腐，两人毫不偷懒，整天劳动，同学们吃到了豆腐很满意，但未过多久，这对工人干不下去，走了，是什么原因，同学们议论纷纷。高二部长期缺乏医药，同学们病亡者接连不断，部主任向校本部争取到经费，从重庆、衡阳、桂林等地购办一些药品，正式成立医务室。但校医很少上班，来医务室时便把门锁起来在里边偷药，然后应付一下同学，开点药，便急匆匆地溜回城里，原来他在城里开了私人诊所，所用的医药器材大部分都是偷我们医务室的。同学们对他恨之人骨，骂他：“兽〔无人性〕医”，也纷纷向学校反映，同样得不到处理。同学们对校内种种不合理现象，深感无力解决，加上其他一些困难和痛苦，难免发发牢骚，说些过激的话，其中有句口头禅是“此路不通，去找毛泽东”，后来的确有些人去了解放区。

1943年夏，校长来高二部毕业班上讲话，了解同学报考大学的志向之后，告诉我们学校已向川湘联运处接洽妥当，请联运处凭国立八中介绍信给我们签发免费搭乘车船证，取道川湘公路、郁江和乌江，去重庆考大学，这是学校对我们的最后一次照顾了。当时行驶在川湘公路和乌江上的民营汽车和木船均归交通部的川湘联运处管制，每隻车船要留出一定吨位，无偿地接受国家的货运。校长邵华通过教育部与交通部的关系，替毕业同学申请到免费证，车船主凭我们的免费证，可以减少承运国家的货物。

患难与共八中情

1943年暑期，教育部恢复高中毕业考试，我们再次徒步去校本部所在地所里镇，参加抗战以来湖南省的第一次中学会考，然后带着学校发的各种介绍信及八中毕业纪念章，分赴各地报考高校。

毕业后，国家贷金发到8月份止，那点钱除用于参加会考的往返路费及伙食外，所剩无几，更谈不上考大学的用费了。这段暑期，同学们之间的患难与共、相互帮助、亲密无间的友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流亡外乡几年艰苦奋斗培养起来的一段人生特殊的宝贵经历，可以称之为“八中情”，实在令人毕生难忘。

在校湖间，高一部同学邹道长（铜陵六中校长），说我是八中舒城同学中最苦的，因为家贫毫无接济，我也因此染上肺结核，身体瘦弱。会考期间，道长主动提出把他家即将汇来的1000元，托同学汤光霖（北京矿大研究生院教授）代领后交给我作路费，道长先去重庆替我找工作，积攒点钱上大学，同时也好养息身体。我和光霖一道回青龙村住几天，等邹家汇款一到，光霖马上领来如数交给我。而光霖那时也没有路费去昆明上西南联大，留在学校刻蜡板，推迟了一年才上大学。

我从青龙村乘汽车到龙潭镇，去川湘联运处领免费车船证。签证人是龙潭中学体育教员，他把车船证尽先发给自己的学生，八中同学都要等待5~6天，以致陆续到达在此聚集的越来越多，大家路费都很少，很想尽快走。第二天，我幸好遇见在龙中兼职的金义莲先生，他又给我写了介绍信，这样我还是再等两天才拿到车船证。

按规定一车搭乘4人，同阵出发4~5辆，一看20来人胸前都别着八中毕业纪念章，倍感亲切，以后一直在行程中团结互

助。

当时汽油缺乏，民营汽车是以木炭燃气发动的敞篷卡车，马力小，喘气般地在山区公路上爬行，从龙潭到郁山镇，三天才走240公里。白天烈日当空，夜间燥热无风，一身臭汗，实在难受。郁山镇边有条郁江流过，是乌江的支流。我们在此告别木炭车，换乘郁江小船顺流而下67公里抵彭水。

在彭水又住了三四天，因为乌江滩多、流急，水位一天涨落多次，变动不定。川湘联运处在沿岸各处设置水位标尺和信号台，整天有人密切观测水位，只在水位到达“适航”标尺时，信号台立即挂出“放行”球，工作人员吹起哨子，等待在江面上的船只立即起锚开航，稍有滞缓，水位超过或低于“适航”标尺时，就停航，否则很不安全。

为适应乌江航道的特殊情况，木船的构造也颇为特别：船尾向右歪，没有桨。用一根粗长的圆木，前头钉着铁钉，放在船中央直指船头前方，作舵用，也有防止撞礁的作用。航行时，老舵工全神贯注，直视前方，用手抓紧长舵，随时号令守在前面的船工们左右推拉长舵。因为水急催船速，掌稳舵最重要。歪尾船在巨石丛中。惊涛骇浪前，左歪右斜地风驰电掣般地奔泻而去，场面实在惊险。同学们后来都说乌江之航壮观无比，但这辈子再也不敢坐第二次了，那时几乎每天都发生船毁人亡的惨祸。

彭水至涪陵的乌江航程140里，大约般行了1至2天。到了涪陵，川湘联运处的免费车船票就完成了使命。

从所里到郁山镇，公路行程436公里，郁山镇到涪陵的水程208公里，合计644公里。因为走走停停，费了不少天。到达涪陵时，我们同船的七八名高二部同学，路费所剩无几，大家拿出来凑到一起，吃顿晚饭（大饼、米粥），买了去重庆的轮船票，付了小旅店的住宿费，剩下的钱只买到两斤大饼作为明天的伙食。

涪陵去重庆，长江水程 120 公里，轮船溯流而上，从早晨驶到晚上 8 点多才到。两斤大饼上午就吃光了，以后只能喝船上免费供应的白开水，同学们饿得发慌，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上岸后，幸好找到一位先来重庆的王同学^①，他住在做银行小职员哥哥家。王同学带我们到江边经济食堂填饱肚皮，给了明天去沙坪坝的船票钱，领我们住到社会服务处的接待站（象征性地收点费）。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小轮溯嘉陵江去沙坪坝，这里有中央大学及重庆大学等高校，八中校友在此很多，每年暑假他们布置几间教室，接待来考的同学住宿，这几间教室年年都是固定的，中央大学是小龙坎的 13 教室。我们也就分头去找各自熟悉的校友，至此结束了千里迢迢的湘川水陆旅程。

住进 13 教室的第二天，我正为身无分文而忧悉时，李宪云校友来找我，原来邹道长到了重庆就多方奔走，最后托宪云替我找到了工作，是在陆大出版社编译处描绘地图。报到时，我向编译处长说明，我打算工作一年后上大学，处长很理解。这样，我的生活安定了，9 月份开始领薪水。在同学中，我这名最穷的学生，毕业后吃的苦居然没有他们的长，这完全是邹、李两位舒城校友兄长般的关怀所致，当然也得益于上述几位老师及同学们的帮助，是我终身不能忘怀的。

这个暑期，同学们参加了高中毕业会考与大学招生考试，在炎热的天气下，奔波千余里，四五十天没有一点安静时间拿起书本温习，有些同学甚至还是在四五个人共吃一张饭票的半饥饿状态中度日。但结果，通过毕业会考被保送上大学的同学很多，被大学录取的也不少。至于未录取的同学可去教育部设在江津白沙的大学先修班补习，一年后再考，所以高二部同学多数都能上大学。但考取的当年没能上大学而请假休学的也不少，主要都是经

^① 可惜忘记了这位“及时雨”的大名。

济困难，先找个工作（小学教师或机关小职员）缓解一下。

艰苦磨练出人才

据2000年出版的《1938—1946 国立八中校友录增补订正本》记载，1500余位在世校友，分布于全国32个大行政区，仅海南、澳门未见入录，而台湾校友达100多位，美国日本也近30位。入录的这1500余位仅居八中校友总数5000余人的26%左右。作为一所仅存在8年的中学，校友的地区分布如此之广，实属罕见。

就高二部同学来说，在海内外的学者专家不少，有大学校长、院长，有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编审、学术刊物主编，有中专校长及特级教师，有著名文史学家，有地区大报主管，也有其它部门的高职人员，甚至政府的高层领导。总的看来，以文教科科技界最多，职业文化层次高。

专业人才有赖于大学培养，但人才的基础培育于中学。由于流亡苦学的特殊历史磨练，经风雨，见世面，扩大了国立八中学生的视野与胸怀，坚强了他们自立奋斗、不畏艰难、努力上进的信心，从而构成他们事业成就强有力的基础。

附录：

主要参考文献

- 一、《舒城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5年。
- 二、舒宗侨、曹聚仁编著：《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1947年版，中国书店1988年影印。
- 三、屠思聪编纂：《袖珍中国分省图》，世界舆地学社1946年版。
- 四、安徽省测绘局编制：《安徽省地图册》，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4年版。

五、施雅风、陈述彭：《大别山区一剖面》（自安徽霍山至湖北罗田的路线考察资料），北京，《地理学报》第20卷第3期，1954年。

六、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编：《1901—2000 一百年日历表》，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七、〔日〕川俣方平著：《川湘公路》，日本东京生活社，昭和16年（1941年）。

张发奎回忆录选译

胡志伟 译注

说明：《张发奎回忆录》系由美国夏莲荫（Julie How）女士访问笔录，整理成文多达 1044 页，摄成缩微胶卷存放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其中第 20 章《创建第三势力（1950—1954）的努力以及类似的牵连（至 1962 年）》是张发奎回忆上个世纪 50 年代他在香港参与组建第三势力的实况，由于内容涉及其对当时尚健在的一些政治人物的看法与评价，更由于内容涉及朝鲜战争时美国中央情报局招募香港流亡青年去塞班岛受训后空投大陆各省搜集军事情报、组织“敌后游击战”等细节，牵扯个人恩怨、政坛是非甚多，故张氏在第 20 章脚注中声明：“在我有生之年，本章内容不得公开”。

现张将军作古已 20 余年，第 20 章中论及的第三势力人士绝大多数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感谢张学良口述历史的访问者之一张之丙教授大力协助，经层层审核，哥大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慨允影印第 20 章，在加注的前提下翻译发表。今由译者将其译成中文，与《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记》之前言、第八章《战况沉寂时期》之第六节《政治开始腐政》以及第九章《桂柳会战》之部分内容合并发表，藉使读者了解相关史事，以及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亡后张发奎及其他政治人物在海外的活动等。译者并参照数十种名人回忆录、五十年代报刊以及两岸出版的史传等，加插注释，俾便读者

知晓各该当事人物之背景及结局等，以供治史者参照。文中人名系音译者，皆以脚注明之。括弧内文字凡未注明系原注者，均系译者加注。

前 言

我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帝国主义向我争夺侵略的历史，自十八世纪中叶开始，满清末年的中国，连续发生了五次对外战争：中英鸦片战争（1840—42年）、英法联军战争（1858—60年）、中法安南战争（1884—85年）、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八国联军战争（1900年）。

上次五次战争的结果，均遭失败，割地赔款，在不平等条约的桎梏之下，中华民族蒙受空前未有之大灾难，国家经济濒于破产状态。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革命，虽将满清王朝推翻，创立了中华民国，但南北分裂，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未能统一，其原因都是列强帝国主义从中作祟，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内争权夺利的军阀政客，拥兵自立，以致岁无宁日，民不聊生。

我是粤北始兴县清化乡一个农村里的农民子弟，幼年在乡间接受初等教育，家庭生活虽可温饱，但非富有。十六岁时（宣统三年）即离开双亲，只身跑到广州去谋生，因无特殊技能，生活甚为困难，曾经一度入广州增步工艺局当学徒。第二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但不久便辞职，由袁世凯把持中央政府，例行逆施，而地方的军阀，复割据专横，抢劫掳掠，时有所闻。同时听到一般青年学生谈论，国父领导国民党再革命的消息，内心砰砰欲动，遂设法加入国民党部队，献身革命，当一名小卒。后得部队长官帮助，考入黄埔陆军小学（当时校长为翁式亮），接受军事训练，继入湖北武昌之陆军预备学校。在

该校训练期满毕业，原可升入保定陆军学校，因我参加革命，派在士敏土厂任职，未能前往深造，复以负担家庭生活及弟妹教育经费，无法他去，直至民国九年始赴漳州粤军归队。

我自民国三年，加入国民党，后来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我都一直参加，从未间断。在这时期中之民六年，因党部经费困难，曾特别在每党员之月薪中，加征百分之四十来维持。其时所有革命党员，莫不乐从，毫无怨言，而且益加奋发，战志高昂，皆国父人格与革命的精神所感召也。

民国十年，国父回粤就任非常总统，主张全国统一，亲自率师北伐，取道桂林向湖南推进。我当时充任国父总统府警卫团之营长职，随国父驻节广东曲江。民国十一年，陈逆炯明密谋叛变，国父亲自返穗处理。叛兵围攻观音山总统府，粤北交通亦被陈部遮断，无法南下护驾。国父失败离粤后，陈逆不断派员前来本营，威迫利诱，促我投降，我誓死不屈。其中陈逆炯明并利用前陆军小学校长翁式亮派我的同学丘兆琛携函诱我投降，函中有“师生之情，爱护之心始终如一，希迅速来归，免貽后悔”等语。我即席回复一函：“生投笔从戎，束发受书，师恩难忘，但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言犹在耳，岂能忘心，恕难从命。”而回绝后，我即设法于夜间率部入山，据以相抗，为时半年，所以有“大王”之绰号。及民国十二年陈逆失败，国父再由上海加粤，我所率的部队亦得与粤军第一师梁鸿楷联络，编入该部，我担任营长。不久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将陈逆炯明救平后，升任团长。民国十五年，粤军第一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我担任该军第十二师师长，出兵北伐，大小战役，无役不从，尤以汀泗桥一役，名闻中外，赢得第四军“铁军”之荣誉，遂以功升任军长（详《第四军纪实》一书）。可是北伐虽然成功，但赤焰未平，中国共产党在各地暴动，日本军阀又不断制造事件，企图侵略，致有“九一八”、“一二八”事件发生，不胜

愤慨。随后我于民二十一年奉派赴欧美各国考察，为时将近三年，于民国二十四年返国。初任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总指挥，后调苏浙边区主任，兼负苏浙边境的国防工事重任，时政府已有对日抗战之初步准备矣。

回忆我奉派赴欧美考察的时期，于民国二十三年间，到达美国，住在芝加哥，由朋友介绍，结识一位美国医生，名叫雅伦。一日邀请我到他家中吃饭，他端起一个大约可容酒量半磅的玻璃杯，据说是他的传家之宝，他斟满了白兰地，站起来高声的对我说：“张将军，我最恨日本人，相信你也和我一样，如果你能将这杯酒一饮而尽，在我有生之年，你能将日本人打败，我就将这个传家之宝的酒杯子送给你作纪念。”我聆听之下，毫不犹豫地将这杯酒接过来，如牛饮一样的饮尽，饮后，互道珍重而别。当时政府的对日政策，还是极度容忍的，未有抗日的迹象，何时才能将日本人打败，真是一点也没有把握，而我却毫不犹豫地接受这个美国人——医生的挑战，大概是一时豪气的冲动吧。

我回国不久，政府已开始准备抗日。及民国二十六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我即担任抗日战争的高级指挥官——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官等职。为时八年，终将日本军阀打败，回到我的故乡——广东，出任广州行营主任职。上述闹酒的事，我早已遗忘。战后我的四弟张勇斌，担任广东陆军总医院院长职，奉派赴美国芝加哥开国际医务会议，那位美国医生雅伦亦出席参加开会。渠当时四处访查我的消息，适巧询及我弟，知道被询者，就是我的胞弟，至为高兴，马上邀请我弟到他家将这—个杯子交我弟带回给我留念。时隔多年，异国朋友仍能记忆犹新，而且重视言诺，当然值得钦佩。但我觉得此事颇为巧合，好像冥中早有安排，因为饮酒当时，完全没有抗日战争这回事，（虽然民间舆论被动或主动主张抗日有的）而抗日战争的指挥官，谁能预会由我来担任一方面呢？同

时，这一场战争，谁能预料会必定胜利呢？至于我当时接受饮酒的挑战，可以解释是一种一时好胜的豪举，而事实上果然获得后的胜利，却非好胜的豪举所能决定的。尤其巧合的是那位美国医生竟能见到我弟，并将那杯子交给我弟带回给我留念，完成诺言。现在我来记述抗日战争回忆，想起这一故事，无论怎样解释，都是很有趣的。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愿望，我亦不能例外。我追随国父参加革命的志愿，就是扫除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尤其日本帝国主义。其中扫除军阀，我已经尽了不少力量，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也悉力以赴，与敌人周旋到底。当抗日战争得到最后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我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接受日军第二十三军团司令田中久一中将及其参谋长富田少将与海南岛日军指挥官肥后大佐等三人卸除武装，步入礼堂签署降书。同时田中久一并以其本人的佩剑、手枪、望远镜、军马及皮绑腿长鞭等呈献时的那一刹那间，内心快慰，非我的笔墨所能形容，确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日子。当晚我即将保存了八年的白兰地酒取出，与我的同僚痛饮。该酒乃我在上海作战时，当地闻人杜月笙送来，因我正与日敌对峙中，无心享受，即将该酒保存，并曾有“打倒日本军阀再饮”的豪语。我对于酒之为物，亦特有爱好，多饮不醉，成为军中话柄。其实我平时并不饮酒，不过遇有良朋知己或参加宴会时，酒兴即起，相互交杯，从不后人。现在夙愿终于实现，具快乐之表，可想而知。

“七七”抗战全面开始，我适逢其会，得以参加杀敌，达到我早期献身革命立志打倒帝国主义之宿愿，内心极为兴奋。在我担任苏浙边区主任的时候，负责自车浦一半湖—嘉善—西塘镇这一线的国防工事，也是我最乐于的工作，经年余之惨淡经营，恰好上海“八一三”爆发前夕完成。满以为对日作战时，即可利用该线之既设工事，大显效能，奈因战略战术之不协调，未能

适时適切运用，致伤亡惨重，淞沪会战经三个月苦战，终于不能固守，上海及国都—南京相继陷落，诚堪浩叹。

南京陷落后，中央决定迁都重庆，并定长期抗战的国策，战局渐趋稳定。当时敌人的“三月亡华”的狂言，至此亦不能不改弦易辙，作长期侵略之打算矣。在此八年长期抗战期间，幸而能够全始全终的领导一方面，甚至最危险之一方面的战争指挥重任，且能忍受一切痛苦，排除万难，配合各友军与盟军联合作战到底，赢得最后胜利，此无他，皆我全体军民热爱国家，不甘奴役，因而全民团结奋斗所奉献的伟大力量的成果。古人云：“前事不忘，后事不师。”爰将我个人在抗日战争中所历次参加之各战役，分别以实地经历之追述，痛苦而深刻的回忆，笔之于书，与国人见面。写至此，我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于德国无条件投降后应邀到莫斯科举行庆祝大会时，在胜利致词中的一段话：

“现在这里代表每一个国家的男女，皆凭其能力在岗位上出过力，且由于每一个人的努力，才争取到现在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对每一座光荣的坟墓致敬，并对不能生而看见今天的光荣之同志们家属，寄以慰望。”他这种胜不居功，而以谦虚、友善、仁爱为怀的德性，深得我心，所以引述出来，作为写这一篇抗日战争回忆记前言的结语。自愿顾学术譾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望海内外军事先进及邦人君子，惠予指正。

第八章 战况沉寂时期

第6节 政治开始腐败

我国在这个长期抗战中的敌人南进期间所带来的平静的空气中，一度一度的在旋转，历史的罪恶与灾难，却也和时间一天一天在中国社会里发生。人民当时对于国家可能尽的力量逐渐趋于枯竭。贫困、饥馑，蹂躏了整个后方人民的生活，疾病与死亡对

农村作了普遍的袭击，通货膨胀非常可怕，物价的高涨，有如飞机上升的迅速，所有的公务人员，都受着生活的威胁，连最低生活都无法维持，一切战争情绪都低落了。政府虽仍然继续努力争取战争的胜利，但对于社会不安的一切现象，好像不太明瞭和忽视，而且有许多可以改善或避免的事，都没有人去做。

罪恶增加在许多特殊阶级的身上，眼见当时把握特权的政府官吏、豪门显要勾结巨商大贾，运用了官僚资本及其职权的地位，大发其国难财，屯积操纵，走私漏税，无所不为。飞机、铁路、汽车、轮船，变成了特殊阶级发财的交通工具。大官的生活特别腐化，骄奢淫佚，较战前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有“前方流血，后方流油”、“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流行讥嘲。但他们说起话来，仍是满口仁义道德。

当时政府的行政效率，异常低微，表现十足的官僚作风，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大官要送礼，小官要请酒，接洽公务，都在讲交情。金钱是当时行政和法律的基准。我想当时政治之腐败，是中国历史以来所仅见。

走私漏税钻营，成为大部分人民唯一的生计。昆明、广州湾和广东西江的芦苞、三水等地，都是商人走私汇凑地点。外货可以从这些地方偷运进来，内地的产品，也可以从这些地方偷运出去，不过附带有个条件，大量的走私营谋，必须有权力的背景或有特权者才行。政府宣布经济统制，并设立检查机构，但是犯法的人，大多是银行的人或政治大员。

原本就不健全的征兵制度，后来都愈弄愈坏了。应征的壮丁，有如囚徒，需用绳线索捆，押赴前方。政府规定的士兵待遇，既已少得可怜，但还要经过办理兵役人员层层剥削，所征来的新兵，根本没有当作人看待。重庆有一个兵役机关，为防止应征新兵的逃亡，他把士兵的头发，难得仅留有顶上的一小束，这样在消极上可以看作为逃兵的标志而便于捕获，在积极上可以防

止新兵不敢作轻易逃亡的尝试，这确是一个妙不可言的方法。但我想创造这个方法的人，一定是个极无人性的家伙。因此人民对于兵役，视同赴十八层地狱，穷苦者逃避，富豪者则用金钱买人顶替。

士兵的生活，苦不堪言，除了每日可得到二十五两的食米外（有时还要短缺），副食费甚少，营养不足，病患没有药品（当时每人每月的医药仅有二元，但一颗奎宁丸的价格就需要近百元），草鞋费每人六元，买不到一束稻草，服装鞋袜缺乏。到了严冬，不能及时发下棉衣，时序初夏，他们始能穿到补发的棉衣。好的部队长有时会顾虑士兵的生活，种菜、养猪、砍柴，以驮马车辆代运货物，利用士兵的劳工去工作，米换取副食津贴。这固然可以补助士兵生活之不足，但还能谈到作战与训练吗？我的特务团就陷入这个状态，我责备他们：“特务团可改作生产团了。”但又有什么办法来维持他们的生活问题呢？饥饿、疾病、死亡普遍的成了当时部队最大的威胁。

这一切现象，都在这平静的时候暴露了。史迪威将军当时视察到，曾有如下的结论：“腐化、玩忽、混乱、爱钱，重征暴敛，囤积居奇，进行黑市，与敌人通商。”我不过是一个军事大员，除了伤感之外，还能说什么？做什么事呢？

第九章 桂柳会战

十一月十一日，柳州据点被敌突破，守备两团被围，蒙受重大的损失。同日我桂林据点的守军发出了悲伤的呼声，敌人已由漓江的东岸渡河，突破了核心工事，第一三一师长阚维雍将军自杀。东岸各独立据点的守军，成千成百的被敌人的毒气窒息于岩石的洞内。城防司令韦云淞在电话中同我说了一句“桂林已无法支持了”之后，一切电讯经已中断。事后才知这远东的列日要塞已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埃尔本要塞一样，不到两周的时

间，就被敌人的铁蹄踏破了。这是守军战力的关系呢？还是要塞在现代兵器威力下，失却了它本身的价值呢？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

桂柳两大据点的命运业已告终，战事的一切条件已临尾声。但在这个失败已成定局之下，我还没有悲观消极。战斗的进行虽必须变更，然时间与空间的争取，仍属我应有的最后努力。十一月十一日我将各兵团的主力撤退于黔桂铁路的宜山正面，并于怀远、南丹部署数道抵抗线，以迟滞敌人之行动，高度发挥这些疲惫部队最后的战力。这数道的抵抗战斗经过都十分激烈，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战术上的运用，虽是在交换掩护撤退行动，但由于有整个计划的步骤来实施，在二百公里的距离，换取敌人三周的时间，面疲惫不堪的部队，亦没有陷于率乱溃败之景象，稍堪告慰！

十二月一日，战区北面的地区，已因南丹的失陷而告终结。汤恩伯集团在黔境的独山开始接替了敌人的攻击，贵阳的市面如同柳州撤退时惊乱。最高统帅部已准备由贵阳退守乌江，而且后方的一切部署都在忙乱中，我当时对于最高统帅部的指导，起了异常的疑虑，为什么对桂柳会战不注放生力的兵团，面取被动挨打的态度呢？为什么不争取时间空间上着眼，面将汤集团和第九十七军停留黔境达月余之久，而不允我的请求推进于柳州方面呢？又为什么在桂柳会战达三个月之久，面后方尚无周全的准备呢？更使我愤怒的，当战区在黔桂路上作逐次抵抗，面地域即将告终的时候，最高统帅部对战区以后的行动，竟没有一个明了的指示，使我如战败国的军队退入邻国境内之一样的待遇。

这里穿插着两个悲伤的遭遇，在我生命史上是一种创伤最深的印象，我现在作这个回忆，内心仍不免辛酸万分。战争原是一场灾难，战争所造成的死亡、灾难和一切形式的破坏。但这样的

遭遇，都是仅有战争失败者所蒙受的厄运。这是当我由怀远前线撤退时的经历，和在六寨看见的一幕悲剧。

大概是十一月十七日，怀远敌我的炮战正在猛烈的进行，我亲自在怀远的桥头，在炮兵阵地观察彼我的战况。逃避战祸的难民络绎不绝的向后方逃亡，时间与他们的负累限制了他们的行动。当太阳西沉的时候，他们不顾一切敌情和空中飞奔的炮弹，一群群的在部队直后的分路两旁躺下来，准备露宿以恢复他们一日的疲劳。痛哭、惨叫、离散和人世间一切的悲哀景象，活生生的映入我的眼帘，使我坐在车中如看一部悲剧电影，一幕一幕的过去，在一处凄凉的弯曲路上，一团蠕蠕欲动的黑影伴住了我的汽车，俄而发出了“妈妈”的叫声，我叫司机紧急刹车。当我下车来查的时候，原来是一个被母亲遗弃下的约三四岁的女孩，她不知道她的家乡和姓名，她只知道不见了母亲。战争的灾难，波及了这个无知的小孩，而她的父母家人竟为了逃生而忍痛抛弃了她亲爱的女儿。一个战争失败者的罪过，使我感受异常的痛楚。我把这个女孩带回交与我的妻子抚养，并即取名“怀远”以纪念我在怀远心情的创伤。但不幸在数月后，这个怀远的小生命与那个怀远的清风明月都一样消逝了。

六寨是黔桂公路上一个市镇，数万的难民和很多后方机关的人员，麇集在这个广阔不及三公里的街市。为指挥南丹部队作战，我的指挥所亦设立于此。十一月二十七日两翼上有明显五角星徽的盟机十七架，低飞掠过市空散发传单，大家都以近来盟国的优势空军，并认明是自己的飞机，而毫无空袭的顾虑，不期而挤在水泄不通的市街里，和马尾的铁路车站，目击着盟机的翱翔。但奇怪的这些飞机突向我们投掷下大量的炸弹，顿时烟火弥天，血肉横飞，哀号遍野。未死伤的人像疯狂似的向四郊狂奔。事后调查据说是由于无线电译音中“六甲”被译为“六寨”之误，但这个误会造成了战争以来最大的悲剧。其死亡人数当时无

法统计，所有一切后方的物资，都毁于火海中，我自己历年来所有的日记和在战争期间的一切资料，亦在这里毁灭了。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往事，对于盟机的作战史上亦是荒唐愚昧的一幕。部队里的一个中将、两个少将、八个上校和很多员官长、八百多名士兵都葬身于盟机的炸弹下，其他民众的死亡最少在五千以上的人。每个部下死亡的噩耗传来的时候，我悲痛流泪满面，伤感不已。这些久经征战的官兵和义民没有战死沙场，谁想到会被盟机夺去他们的生命，能不为之哀悼吗？

这一次会战，经历了三个月的时间，是我在军人生活中最难忘的一战，我为了它而兴奋、忧虑、悲痛和愤恨。

第二十章 创建第三势力（1950—1954）的努力以及类似的牵连（至1962年）^①

1950年，我接到台湾方面通知，说国民党党员要重新登记。我探询孙科的意见，他是当时滞留香港的国民党党员中地位（I）最高的。我问他有否收到这类的通知，他住在浅水湾畔，他回答说收到了，但已扔进字纸篓里去了。于是，我也把这一纸“指令”扔进了字纸篓。

我们一些反蒋的朋友打算组建一个新的国民党，孙科以前的亲信傅汝霖（II）建议组建一个类似李济深（III）的组织，他认为孙科是最合适的领袖人选。他期望顾孟余（IV）一伙以及所有既反共又对台湾当局心怀不满的人都能加入这个新颖的国民党组织。傅手里有几个钱，愿意为新的组织承担经费，我便同意了 this 建议。

（I）孙科：系国父哲嗣，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1947年4

^① 此下为《张发奎回忆录》之第20章

月出任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1948年5月出任行宪后首任立法院长，12月任行政院长，拒与中共和谈，称“决不轻言妥协”。1948年12月25日被中共列名43名“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之一，排名第十三。1949年2月18日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对战争责任问题的几种答案》一文指出：“孙科之所以成为战犯，是因为他一向赞助蒋介石发动战争并坚持战争”。同年3月辞职赴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游历。1952年12月定居美国加州，被举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1965年返台参加国父百年诞辰庆典，旋受聘为总统府资政，次年出任考试院长。1973年9月13日因心脏病逝世台北。自1924年起直是国民党中央执委，1945年任中央常委，故1950年是香港国民党党民地位最高的。

（Ⅱ）傅汝霖：黑龙江安达人，1895年生。五四运动后与王昆仑等北大学生组成九人小组，口号是“读书自由，政治自由”。1922年护校（校长蔡元培）一役，组织民治主义同志会，以东北四川老乡关系，与国民党建立政治关系，创办《民生周刊》。是年王昆仑南下见孙中山后，民治会加入国民党，1924年孙中山北上，傅常去铁狮子胡同中山临时住宅协助工作，由孙科出钱策动邹鲁、谢持秘密组织国民委员会，傅加入，充当反共核心。1926年3月在西山会议派二大当选中执委。1930年7月当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会宣传部委员。1931年5月任陈济棠广州国民政府委员金委员，12月回任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执委、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1934年1月出任内政部常务次长。1935年12月任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委员长。1945年5月任国民党第六届中执委。46年11月当选制宪国大代表，翌年当选立法委员，5月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949年冬到香港主持中国实业银行。1985年3月7日病故美国。

（Ⅲ）李济深，字任潮，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早年毕业于北京陆军大学，曾留学于日本。1926年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北伐期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留守广州。1933年策动闽变，在福建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兵败后逃亡香港。次年在香港主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35年任桂系军政府主席。1948年一月和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再次在香港组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自任主席。12月自香港返回内地。1949年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

员副委员会会长等。1959年10月病故北京。

(IV) 顾孟余：1888生于北京，原籍浙江。清末赴德国柏林留学，思想上崇拜梁启超的改良主义，反对孙中山、黄兴，反对革命，尤其反对同盟会。1922年回国，任北大经济系主任及德文系主任，投机转变，加入国民党。时北京国民党市党部分裂为左右两大集团，其中翠花胡同派由顾与徐谦主持，号称左派，言行皆与广州中央党部常委汪兆铭一致，初则主张联俄亲共，继则反对西山会议，拥戴汪精卫排斥胡汉民、张继等元老。1925年初李大钊向孙中山荐贤名单中的第一名即是顾孟余。当时汪精卫在孙中山身边担任秘书，所以顾颇受汪青睐。1926年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以“假藉共产学说，煽聚群众，率暴徒闯袭国务院”罪名通缉李大钊、顾孟余、徐谦等五人，顾遂离北京南下，由汪提携出任国民党中央执委兼中宣部长。1927年任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之一、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奉汪令赴武汉联络唐生智，1929年秋汪精卫在香港跑马地组织国民党地下中央反蒋时，顾是汪的主要策士，同年12月参与广州兵变。1931年与汪精卫在上海大世界娱乐场共和厅召集分裂的“全代会”自封为中委，成为汪记“改组派”骨干。1932年蒋汪合流，汪长行政院，即任顾为铁道部长以示酬庸。1936年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1938年拒绝参加汪伪政府，蒋嘉其深明大义，乃任之为中央大学校长。斯时童冠贤是中大教务长，何义均则在中央大学执教，日后童、何热心捧顾出掌第三势力，固非偶然。孙科辞职后，李宗仁邀顾组阁，顾坚决拒绝，还曾主张与中共谈判，以免百姓遭受战祸以及上百万国民党人逃亡流离之苦。1949年来港创办《前途》杂志，倡述民主，内容空乏，系统学院派作品，无宣传力量，故销路闭塞，不到五期即停刊。顾待人深闭固拒，道貌岸然，架子十足，拒人于里，故在港搞第三势力，犹如当年在汪精卫改组派中背“取消派”之名，很多事由他去办，都是“大事变为小事，小事变为没有”。顾孟余退出战斗同盟后离日赴美，卜居加州柏克莱，担任美国国务院中国研究中心和加州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顾问。1961年春吟七律云：“清明海外值良辰，一片乡心一介身。吴郡旧游常入梦，燕京小苑几回春。徒传草泽能兴汉，何处桃源可避秦。屈指中原终奠定，苍生犹待起荆榛。”哥伦比亚大学曾邀其作口述历史，但未应允。1969年7月赴台定居，聘为“总统府”资政。1972年6月病故台北。

傅汝霖不常接近孙科，他是满族，从前是汪精卫的改组派。还有哪些人同我们联络呢？梁寒操（I），陈其瑗，刘维炽（II），他们都是太子系的人马。

我们游说孙科，被拒绝了。他说：“我们国民党员不可为此！”既然事不可为，傅汝霖就离开了香港。

我们有没有同顾孟余接洽呢？自从孙科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就未再接洽。

顾孟余一伙是什么时候组织起来的呢？他的自由民主同盟是1949年在广州成立的，其核心是立法院院长单冠贤（III）、黄宇人（IV）以及一些立法委员。李宗仁给了顾孟余20万港币组织这个团体。诚然，我对顾孟余熟稔已久（V）。胜利后我每逢在上海见到他时，他总是叫我勿告诉别人我俩曾晤面，还叫我勿将他地址透露给别人，此人一贯小心谨慎。

我同顾孟余一伙合作过吗？没有，我没加入他的团体，因为1949年我担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顾孟余认为薛岳（VI）与我不宜加人民主同盟，这个小组织最好不吸纳官方人士。

（I）梁寒操：1899年生于广东三水，1923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加入国民党，起初任汪精卫秘书。1926年5月汪下野，将梁介绍给孙科任秘书，渐成太子系核心人物。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后历任国民政府财政部参事，武汉国民政府铁道部主任秘书、铁道部参事、总务司长。1931年任国民党中央执委，1933年任立法委员兼立法院秘书长。1939年任委员长桂林行营政治部主任。1940年改任军委会总政治部副部长。1943年任国民党中央宣部长。1949年赴港，1951年去塞班岛“自由中国运动军政干部学校”任政治教官。1954年回台湾，任中广公司董事长。1975年病逝台北，著有《三民主义理论之探讨》等。

（II）刘维炽：太子派形成于1923年，同以胡汉民为首之元老派对立。孙科就职后，任用刘维炽为市政厅秘书。刘别字季生，长期追随孙科，官至实业部长，宦囊最丰。

（III）单冠贤：河北省宣化县人，1894年5月16日生。天津南开大学

专科毕业后，公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及德、法等国立大学研究所研究政治学与经济学。1925年返国后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暨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央大学教务长。早年随顾孟余赴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工作，嗣衔命北返，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华北分会委员，故其政治上属于改组派。1929年南京举行国民党“三大”时反对开除汪精卫党籍，返出党务工作，抗战期间才复出担任国民参政员、监察委员、晋陕区监察使。胜利后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冀热平津分署署长，除运送美国衣物食品分发各地难民、致力清华、南开、北大校舍修复外，还兴建永定河上游官厅水库。1948年当选“行宪”后立委，嗣在派系斗争中获桂系支持当选立法院院长。1949年8月，李宗仁让顾孟余组织“自由民主大同盟”，童任书记，李拨付港币20万作开办费，即由单冠贤转交。抗战时顾任中大校长，童任教务长，加上改组派与桂系本有渊源，所以十月初“自由民主大同盟”迁香港后，童冠贤热心捧顾固非偶然。“自大同盟”、“民主中国座谈会”到“战盟”，核心成员中，张君勱常在海外，顾孟余影踪无定，张发奎是虚位元首，仅因众人借重港英对他的钦敬，而实质上的决策人物都是童冠贤。李徽尘加入决策是后期的事，战盟组织纲要是童、李二人起草的。海峡两岸的中华民国史均未将童冠贤立传，仅台北《传记文学》1987年10月号刊了一篇于四百字小传，称“39年大陆变色后避居香港，任教于宗基学院，后拟创办中文大学，香港政府受某财团怂恿，多方阻挠，未克如愿”。对其领导第三势力情形只字不提。1965年退休后，由儿女迎养至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定居。1981年8月7日逝世于加拿大。

(IV) 黄字人：1905年6月22日生于贵州省黔西县中和乡，中学未读到一半就跟随同乡的北京朝阳大学学生尹述离开家乡，投奔黄埔军校。1926年10月毕业，分发北伐军补充师，在团长陈诚麾下任连指导员，旋奉中组部长陈果夫之命回贵州筹备党务，因贵州军阀周西成专横暴虐而逃回南京。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后，由陈果夫吸纳到中组部普通组织科指导股任干事，三全大会后升股总干事。1930年8月任江苏省党务整理委员兼组织部长。1933年由中组部长陈立夫选派赴英国留学，翌年春入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选读政治学、比较政府和地方政治。七七事变后，提前回国参加抗战，先后出任军委会第六部留日归国学生训练班训育组副组长、国

民参政员、三青团中央社会服务处代处长、军风纪巡察团委员、三青团贵州支团筹备主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三青团贵州筹备主任、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三青团贵州支团干事长、青年管理处处长、国民党中常委等职。

1948年11月，徐蚌会战失利，孙科继翁文灏任行政院长，立法院院长出缺，黄宇人主导的立委反CC系联合阵线推举吴铁城竞选立法院院长，不巧吴铁城被孙科邀请入阁，黄宇人转而循北方籍立委武和轩提名，支持北伐前在北平入党的童冠贤。童原已准备举家迁台湾，闻讯即回南京参加选举。黄迅即促使立法院补选正副院长，使CC系立委来不及赶回南京，12月24日童以简单多数当选院长，整个过程仅四日。

1949年6月1日黄移居澳门，1950年10月因不出席会议被立法院取消“立委”资格。旋应顾孟余、童冠贤之邀，以桂系人员退出为条件，加入“自由民主大同盟”，又规劝童冠贤辞去“立法院”院长职。1951年4月任《独立论坛》督印人，化名黄如延。同年5月任“反共抗俄联合阵线”25人核心之一，10月任中国之声社编辑政策委员会委员。旋与童冠贤、张国焘、彭昭贤、李微尘起草“战盟”组织法，又因与李微尘意见不合以及顾孟余受港英政治部警告，而力主张顾联盟25人核心解散。1952年10月10日张君勱在美国发表《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宣言》，《独立论坛》被迫停刊。1958年8月任《联合评论》督印人，又与张发奎合办兴中出版社。1964年10月因罗永扬等人欲提名张发奎、黄宇人等参加台湾的“反共救国联盟”，一怒之下将《联合评论》停刊。1965年6月在胡木兰、冷静斋支持下创办《中国民主论坛》。1967年7月因原资助印刷费的建筑商与胡木兰减少资助以及海外经销遭受抵制，不得不停刊。

1972年移居加拿大依亲，自1971年起因胡越的劝勉开始撰写回忆录，至1981年4月写成《我的小故事——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原因》上、下两册，计50万言。

(V)：1931年张发奎与陈铭枢、蔡廷锴大战衡阳后，第四军只剩700余官兵，为蒋介石收编。1932年张流寓沪上，第四军军官几十人流落在南京、上海，乃找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安置，汪一味敷衍。情急之下，张找汪，以率部上门请愿威胁。最后由陈璧君建议交铁道部长顾孟余安插，特地设置路政管理局，下设四处，编制近200人，安置了第四军十名中上

级军官。这是张发奎对顾孟余产生好感的主因。

(VI): 薛岳: 字伯陵, 广东乐昌人, 保定军校毕业。早年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营营长。1934年任第二路军总指挥时, 率追击红军二万余里。1946年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1947年调任总统府参军长, 1948年12月25日被中共列为43名“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之一, 排名第廿七。1949年一月任广东省政府主席, 兼任海南防卫总司令, 赴台后任“总统府”一级上将战略顾问、“行政院”政务委员, 后转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主委。1998年5月3日病故台北。

我在香港加入这个组织吗? 没, 因为我考虑到这个组织太狭隘了, 它的内部情形欠佳, 我的朋友们似乎也不想加入这个组织。

我也未同香港的其它同类组织或党派接触。我以游泳打发时光。

美方的倡议

有一天, 尤金·王告诉我, 广州岭南大学原校长香雅格想见我。我认识这个美国人已久, 算是老友了。广州陷共前他离穗, 我在香港见过他, 但未深谈。他回美国去了, 现在又来到香港, 尤金·王是我的老友王肃之子, 也是岭南校友。他是一个出色的职业赛马骑师。我在香港一家旅馆会见了香雅格, 他能操流利的粤语, 故我们不必通过译员便可直接交谈。

我和香雅格单独会面吗? 不, 尤金·王在旁作陪。香雅格博士问我是否愿意出来领导大陆的反共游击战争? 他说: “许多中外人士都认为, 如果你肯出山, 必能在华南地区重整旗鼓。”你也知道, 人们都说我是“南天王”(I), 而游击战就要扎根华南。我告诉香雅格: “你错了, 我本人一贯反对偶像崇拜。是的, 我曾对国军与若干战役作出了一定贡献, 可是我不能凝聚百姓。”我继续说: “我不仅不能唤起民众、领导百姓, 而且认为组织游击战争是绝对办不到的。首先, 共产党已得到人民的拥护, 而游击战是要依靠民众支持的。任何人一踏上大陆国土就会被围捕; 第二, 中共是以游击战起家而壮大的, 我们在这方而远远不如中共; 第三, 要成功地从事游击战争, 必须由富有经验的机构

来指挥。”

(I) 张发奎签署文件只草书一奎字，骤视之，颇似“大王”二字。张氏闻呼，不以为忤。又，张任护法大总统府警卫团营长时，力抗陈炯明叛军，誓不投逆，乃率部上山，以待反攻，粤人遂多以大王称之。

香雅格问我是否认为蒋先生能重回大陆？我告诉他，我总认为，一旦一个政权被推翻，它就很难东山再起了。这类复辟的事中国并非未出现过，曾有过下台的统治者重新掌权的先例，但那是十分罕见的例子。在民国成立后，这是千真万确的，哪一个下野的军阀武人能卷上重来？香雅格博士对蒋先生是抱着负面态度的，他也反蒋的，他认为蒋先生太独裁了！

香雅格博士问我能做些什么？我说，有信誉讲原则的人应该创建一个新的秘密的政治组织以及一支新军。香雅格问我，这件事怎样才能办成。我告诉他，为了开拓未来，我们必须组训青年群众。他问我在这方面我们应如何去做。我说，我们在香港必须凝聚一批人作为重新振作的核心力量。我提到顾孟余、童冠贤、张国焘（I）、李璜（II）、李微尘（III）、和伍宪子（IV）。我提的只是重要人物的姓名。我钦佩顾孟余。童冠贤隶属于顾的自由民主大同盟，然我对童不甚了解。

我对张国焘持什么态度呢？我原来不认识他，但我尊重他。我知道他曾在中共高层任过要职。我一直钦敬中共党员的学识与艰苦奋斗精神。譬如，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精神是值得钦敬的，对张国焘也可作如是观。我不清楚他脱离中共的原因。

青年党党魁李璜是同台湾当局对立的。我没有提及青年党另一位领袖左舜生（VI），因为他当时靠拢台湾当局。此前我仅同左舜生见过一面，那时他在南京担任农林部部长。

(I)：张国焘：江西萍乡人，1897年生，1918年入北大理学院，翌年任北京学生联合会总干事，是五四运动骨干成员之一。1921年7月出席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任大会主席，1922年底代理中共中央书记。1931

年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到鄂豫皖根据地掀起大规模“肃反”，捕杀排以上官兵两千五百多人。1932年建立川陕根据地，三年后将红四方面军扩大至八万多人。1935年10月在四川马尔康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37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撤其红军总政委职。1938年4月，藉赴陕西祭黄帝陵之机，投奔国民党政府，遂被中共开除党籍。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还一度在戴笠手下一个游击训练班讲授中共的游击战术。胜利后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在任内亏空公款法币4亿余元。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执委兼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会委员。1948年11月赴台，次年冬迁居香港，化名“凯音”参加第三势力，任《中国之声》周刊社长。朝鲜战后，以全部积蓄五千美金炒金失败，生活困顿。1956年曾写信向中共中央呻穷，由毛泽东批示予以接济。1960年代初接受美国亚洲基金会资助六万美元，在涂公遂协助下，撰写《我的回忆》，历时四年，攒成三厚册1351页。其妻杨子烈也撰写回忆录《往事如烟》，哀叹“我们做共产党廿年，反共四十年，一生未享到半点幸福，天道真不平呀！”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7年中风后入住多伦多一所免费的老人病院。1979年12月3日因院方照顾不周，冻毙于老人院。

（Ⅱ）李璜：四川成都人，1895年生，18岁入上海震旦大学，23岁入巴黎大学修历史学与社会学，获文科硕士衔。1924年回国，历任武昌大学、社会大学、成都大学教授。1923年13月在巴黎与曾琦等同学创立中国青年党，以国家主义反对国际主义，以全民政治对抗阶级斗争，故回国后发展党务同联俄容共之国民党势成水火。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被聘为国防最高会议下设之国防参议会参议员，继被遴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连任主席团主席四年。1946年被特派为赴美国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中国代表团代表之一。1954年李璜随刘德潜赴北婆罗洲亚庇城开创中国建设公司，任监察人兼总稽核，此后廿年潜心研究学术，汇成《学钝室论政选集》。

（Ⅲ）李微尘：系李大明胞弟，原是民社党党员，第一届国大在南京召开时张君勱囑他急草份文件赶会。李即向张索取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民社党加入政府后，张未续以此职，却特地在民社党内设立政务委员会，自任主席，命李为委员，由此李对张君勱产生芥蒂。李氏中英文俱佳，工

于心计。李于抗战时做过西南运输局局长顾问，胜利后又在陈伯庄主持的京沪杭铁路管理局任过局长顾问。然其在香港自夸从未做过官，常常谴责流亡官员：“难道他们不该负过去的责任吗？”“大陆搞丢了逃到海隅还能同我们争长短论高下吗？”因其手脚勤快，擅长计谋，故很快取得张发奎信任，以秘书身份跻身“战盟”最高决策层。张国焘退盟、谢澄平另起山头争美援等，都是李微尘纵横捭阖的恶果。二战期间李在香港曾任《中国晚报》主笔，日占时任陈友仁秘书，胜利后还主编《京沪周刊》。“战盟”散摊后主持创垦出版社，主编《热风》半月刊。1956年应邀南下新加坡，主持《南洋商报》笔政及电视广播新闻部门。1966年出任新加坡总理公署新闻秘书，1975年退休。1977年11月18日病故新加坡。

（IV）伍宪子：广东顺德人，名庄，清光绪七年（1881年）5月初七生。16岁入万木草堂听康有为讲课，17岁后为香港《中外新报》、广州《时敏报》、《博闻》撰写评论。24岁奉康命助徐君勉办《香港商报》，主商报笔政7年。1913年到北京，办《国民公报》，回粤任省内务司长，翌年入都任财政部顾问。1916年5月5日，梁启超组军务院，伍任政务委员长，后应冯国璋聘任副总统咨议。1918年办《唯一日报》，1922年任国务院参议，1928年主《世界日报》笔政。1946年8月国社党与民宪党开联席大会于沪，合并称中国民主社会党，张君勱任主席，伍宪子副主席。1947年8月民宪党退出民社党，民社党之革新委员会选伍为主席。1947年冬在香港创办《人道》周刊，翌夏停办。1951年冬应台湾当局邀请赴台，留住。自1956年起任教于香港联合书院中国文学系，1959年10月7日病故香港。著有《孟子读法》、《论语读法》、《国家概论》、《中国最近百年史纲》、《辛亥革命信史》、《留美笔记》等。

（V）左舜生：湖南长沙人，上海复旦大学毕业。1930年7月与陈启天等人创办《铲共》半月刊，1935年7月当选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抗战期间三次连任国民参政员。1946年1月自渝返沪，创办《中华时报》，复刊《青年生活》，与中共论战。翌年5月出任农林部长。1948年12月25日被中共列为43名“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之一，排名第41。1949年4月携眷迁台，9月赴港创办《自由阵线》周刊，宣传反共，并先后在新亚书院、清华书院讲授中国近代史。1969年10月16日病逝台北。著有《中国近代史话》、《黄兴评传》、《近三十年闻杂记》等。

李微尘宣称他是无党派人士，但被人当作民社党党员。许多人说他是党员，他都否认。他中英文俱佳。

伍宪子是民宪党主席。

香雅格博士问我：“卡逊·张会不会来”，我说：“我相信他会加入”，当时张君勱（Ⅰ）在印度。

香博士问我对许崇智评价如何，许是他的老相识。我说许崇智是个好人，上海陷共前许氏离沪来港。许也有个组织（Ⅱ），名律师赵平是主要成员，那也是反共又反蒋的团体。曾任国民党中央执委的湖北人方觉慧（Ⅲ）是这个团体的智囊。

香博士提议让许崇智来一起商谈，我说这是个好主意。

我想，香博士原本只是来香港探望我的，虽然我直率地拒绝了组织游击战的建议，作为一个军人，我仍然坚持要组建新生力量，此后外界称之为“第三势力”。我认为，美国人挑中了我，是因为我身份地位超过一般的流亡人士，港英当局对我相当礼遇。

遵照香博士的建议，许崇智与我在尤金·王的寓所共进午餐，顺便聊天。香博士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他说：“回到美国后，我会走访华府。也许我能见到一些要人，如果他们问我在香港有没有见到你俩，我不能说我没见过。他们会问我，既然中共便取了整个大陆，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倘若反共大业开展有望，我会写信给你便。”香博士回国述职去了。

我有没有把同香雅格的会晤情形告诉顾孟余等人呢？没有，在尘埃落定前我不想讲出去。一段时间过去了，香博士杳无音讯。许崇智一次又一次问我美国人有没有联络我，我答：没有。

有没有任何别的美国人就大陆问题接触过我呢？有个美国要人来香港，他想在酒店会晤我和顾孟余。我俩拒绝了，因为俩店里记者云集、不易保密。我俩提议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会面，不巧那个美国人再也排不出时间，然而顾孟余还是在周安聪家里同他见了面，我知道谢澄平等人也在场。

此时，我得知美国人正在资助蔡文治的活动。一天，我的故乡青化乡的邻村远亲华平业来看我，抗战时在柳州（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他做过我的副官。

他告诉我，他参加了游击队。我问，他和谁一起打游击，他说，我是涂思宗委派的。我问他，游击活动由何方资助？他说由美国人出钱。我问他，美国人的财政援助交付给谁，他答：蔡文治。（IV）

我猜测香雅格博士回美国后见到了一些政府要员，因为他离港几个月后，有个美国人（V）上门拜访我，还带来了香博士一封信。此人我从未见过，他说他并不代表美国政府但他代表美国人民。他能讲几句国语。他在中国住过很久，来香港也有段日子了。

他是个生意人吗？是的，但我认为他在香港还负有其它重要使命。我估计他有斯堪得纳维亚（北欧）血统，他大约五十岁左右。

（I）张君勱：江苏宝山人，前清翰林院庶吉士，南京高等学校肄业，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学士，曾任冯国璋之总统府秘书。1924年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院长时讲授《唯物史观之批判》，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次年改名政治大学。以后张组织的国社党、民社党骨干多系政大师生；教授中，张东荪、吴经熊、吴国桢、甘介侯、潘光旦、岑德彰、蒋百里等尽皆一时俊彦。张还协助梁启超创办研学社，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英国哲学家罗素、德国经济学家兰德荣等来华讲学，故张在青年学生与学术界声望日隆。然其赋性固执，好出风头，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1933年4月与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在天津组织国家社会党，当选中央总务委员兼总秘书。1938年12月发表致毛泽东公开信，指责中共封建割据。1946年1月参与起草宪法，8月国社党与民宪党在上海合并为民主社会党，举张君勱为主席，主张“政争决于选举，不决于战场”，反对共产党的“人民战争”。1946年11月代表民社党出席“制宪”国民大会。1948年12月25日被中共列为43名“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之一，排名第43。1949年4月避居澳门，

11月赴印度讲学，历时两年。此后遍游印度尼西亚、澳洲、美、德、日、意、英、越、星等国讲学，并著书立说攻击中共，如《辩论唯物主义驳论》、《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等。1955年应史丹福大学之聘赴美定居潜心学术研究，1969年2月患肺炎死于旧金山。

(II) 指太平洋政论会，由许崇智挂名，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前主委方觉慧经营。太平洋政论会与张发奎领导的英武学会在五十年代初期吸引了不少流亡香港的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蔡文治为了拉拢方觉慧，曾把方的孙儿派到塞班岛受训。许崇智，字汝为，广东番禺人，光绪十三年(1887)出生于广州。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于第三期步科，历任粤军总司令、国民政府委员、军事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监察院副院长等。1948年7月3日受聘为“总统府”资政，1965年1月25日病逝香港。

(III) 方觉慧：曾参加辛亥武昌首义。民国成立后，历任军政分府顾问、鄂军总部主秘、大本营咨议、东路讨逆军军饷局帮办等职。北伐时任第十一军党代表、军委会总政治部副主任代行部务。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第3—6届中执委、湖北省政府代主席、中央训练部部长、河南省党部主委、香豫区监察使、华北九省市党务指导专员、广东省党部主委、湖北省党部主委等。1947年当选“国大”代表。1958年11月10日以肺癌逝世于台大附属医院。著有《明太祖革命武功记》、《孔子编年记》、《国父开国史稿》、《周秦学案》、《孔子论礼辑要》等。

(IV) 蔡文治：湖北黄冈人。微时在唐生智部师长夏斗寅麾下任文书，因精明灵活取得夏氏宠信，遂奉派陪夏公子读书远赴东瀛。他俩入士官学校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所有留日学生均被遣返回国。那时政府为优待归国留日生，特准不经考试便可入读刚开学不久的军校九期。1934年5月军校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师连长、少校参谋。后伪造云南讲武堂证书混入陆军大学正则班十三期，从此青云直上。抗战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一厅上校科长、少将科长。1938年夏任军令部第一厅第二处(作战计划处)处长，参与全国各战区作战计划的制定与军队编配调遣。1942年初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成员、代理团长。1943年以随员身份跟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会后经蒋特许赴美国参谋大学第廿三期研习作战学。1944年春参与中英美法四国联合参谋部在华盛顿召开的军事会议，制定盟军亚洲作战计划。同年秋任陆军总司令部第三处(作战)处长，不久升任

陆总中将副参谋长。1945年8月随何应钦赴南京主持日军受降事宜。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委员、参谋长。1948年任陆总徐州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国防部主管美援装备的洽谈与分配的厅长，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翌年调任第三厅（作战）厅长。解放军渡江后，在参谋总部作战会议上曾与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大吵，会后弃国防部三厅厅长职南下组建游击部队。詎料计划刚获美方批准，解放军已席卷华南，蔡乃流亡香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战略情报部拟在部内设立一个临时性质的“敌后工作委员会”，物色一个中国有为军人协助其事，训练中国军人在“敌后”与美军配合，开展游击战争与搜集情报。此案由美国新任国务卿艾奇逊批准，由卸任国务卿马歇尔推荐起用其西点门生蔡文治。所需经费在陆军战略情报部临时费项目下支給，用“敌后工作委员会”名义签署。这一临时性秘密机构，被国务院与国防部称作“亚洲抵抗运动”，以免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因“中国”字眼而引起纷争。而蔡文治膺承其事，竟将“亚洲抵抗运动”改名为“自由中国运动”。然而本质上蔡文治不过系美军华裔顾问性质，但在形态上，蔡文治俨然成为美援下反共反蒋的第三势力领袖人物。“自由中国”运动历时三年，美方共支付近一亿美元，其中包括美国顾问的薪俸、保险、眷属福利费用等等。

蔡文治的“自由中国运动海陆空军总司令部”组织与人事表

名称	基地	负责人	训练科目	绩效
总部	茅崎	总司令蔡文治（化名吴定），副总司令黄秉衡（孙复刚），参谋长杨子余（黎东明），第一处主管训练，处长谭彼德，第二处主管通讯，处长林湛，第三处主管敌后，处长陈伟连；第四处主管事务，处长贝健白。		训练了千余名极端不满台湾而钦慕蔡文治的军人，做了一些“敌后”情报与策反工作。

名称	基地	负责人	训练科目	绩 效
军政干部训练学校	塞班岛	校长贾克逊海军上校，副校长西门氏中校与王之（石心）。办公厅主任陈应鸣，政治部主任朱立克，教官 20 人，译员 8 人。	马克思主义批判、爆破、射击、空投知识、游击战术。	先后办两期，第一期学员 127 人，第二期 182 人，
作战学校	茅崎	校长林湛（文鼎贵），副校长丁一明，教育长威士第少校。	游击战，地下战，政治战，心理战，战车驾驶、跳伞	共办三期，共学员 305 人。
通讯学校	茅崎	校长刘永昆（柳元），教育长彼得史少校。	电学基本原理、机务、收发报、明密码、实地通讯。	共办三期，学员共 202 人。
仓库与劳动学校	冲绳岛		仓库系储存物资，劳动学校系犯规学员集中营。	曾囚禁二百人
香港工作站	办事处设于九龙西洋菜街一书局和白加士街 X 号三楼	站长赵万邦，副站长马戴维，总联络员丁孝元，第一组管总务，组长欧阳康；第二组管人事，组长张兴华；第三组管军事，组长温靖，第四组管情报，组长徐富嘉。		组织庞大，干部罗致千人以上，在大陆设六个游击军区，共计三个纵队及八个直隶大队的游击武力，西北区司令蔡雨时，华南区司令黄秉衡兼，华中区赖少堂，东北李刚，西南区司令雷默然，东南区温靖兼

(V) 据程思远所著《政海秘辛》透露，此人名叫哈德曼。

他说他想带两位刚来自美国的客人来见我，他俩将长期负责同我联络，他俩同样不代表美国政府，而是代表美国人民。总之，没有一个美国人会承认他代表着美国政府。

我拒绝单独会见那两个美国人，我说我必须偕同许崇智一起见客，他说：“您是我们的联络对象，香博士的信写明由您独自收启。如果我们会见许崇智，我们将会做错事情。”我说：“香博士上次是同时会见我与许崇智的，如果我单独会见你们，岂不是出卖了许崇智？”许崇智在北伐时曾是我的长官（I）。我坚持要让许崇智加入我们的讨论，那个美国人最后同意了。

（I）：中山先生北上后，1925年春广州革命政府为巩固后方，由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下令东征，讨伐盘踞惠州的叛逆陈炯明，左翼滇军与中路桂军都屯兵不进，胡汉民深恐右翼孤军深入发生危险，乃调粤军第一师第一旅及警卫团吴铁城部增援东江，当时张发奎任第一旅第一团团团长，一举攻占五华、兴宁。节制各路东征军队的正是粤军总司令许崇智。

我找了尤金·王做翻译，许崇智也是他父亲的朋友。我俩赴王公馆的午宴会见那两个美国人。我们选择王公馆是因为地处乡间的寿臣山。

那两个美国人是何方神圣呢？其中之一我是认识的，战时驻扎在昆明，是陈纳德将军麾下志愿援华抗日的飞虎队空军上校，后来是南宁空军基地的主官。要知道，对美国人来说，上校军衔是很高的。他此行负责同我们联络，有决策权。另一位是个年轻人，才三十来岁。

许崇智与我开始同这两个美国人谈话。他俩问我俩，谁是香港的民主人士？应该做些什么？美国人民应该怎样帮助我们？我说，我们必须把（反共）活动扩展到海外去。我把上次同香博士提到的人名重新讲了一遍。他俩问：“你能否邀请上述人上聚会座谈？”我答应了。他俩似乎疑云满腹，问我：“你能请来顾

孟余和张君勱吗？我说除了张君勱，其余人现都在香港，我告诉他俩，张君勱一定会来香港的。我要求他俩会见顾孟余等人。他俩说不必了。许崇智说，他会拟订一份工作计划书。

筹备工作

这次晤面之后，我告诉顾孟余，美国方面派了两个人来见我和许崇智。我建议召集筹备会议，他同意了。于是我们开了一张与会者名单。我着重那些已向美方推荐的人。没人同意左舜生加入。

我们不知道美国哪一个部门在支持我们。我现在知道吗？不，因为美国人只是说他们代表美国人民。我们对他们的认识仅限于此（战盟与自由中国运动都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东京盟军总部的背景），所以我们宣称我们代表中国人民。我同顾孟余等人讨论过这一点，决定以后不再穷根究底。我猜想我们是同民主党打交道，因为那几个美国人不喜欢支持台湾当局的人。他们喜欢反共的民主人士，至少不是蒋先生的支持者。设若我们扯出反蒋的旗帜，他们会更为满意。

那两个美国人不想会见顾孟余等人。另一方面，顾先生等人也认为他们没有必要去会晤美国人。他们认为，在组织正式成立前，不宜暴露自己，仅我与许崇智去会晤美国人就够了。刘震寰（I）常来拜访我，也见许崇智。刘的叔叔是老同盟会员（刘古香）。他想同我们合作，常常谈及如何致力于救国。有鉴于1923—1925年刘震寰、杨希闵统治广东那段时期的劣迹；我和许崇智都很鄙视他。

许崇智和我第二次会晤那两个美国人仍安排在尤金。王寓所。许崇智递交了我们拟订的计划，美国人说他们会加以研究，称他无权对此作出决定，必须提请美国人民核准。最后，他俩要付钱支持我们的活动。（II）

我表示抗议。我说我们不需要从他们手里拿钱，我必须为了

国家表白我们的立场。我说：“坦白讲，我们有能力筹集款项资助反共活动”。那是正确的——我们自己有本事在香港募集 30 万港币。我告诉美国人，俟将来我们的团体站定脚跟，我们会向美方告贷，到那时银码不小。

会后许崇智对我大发雷霆。他问：“你从哪里、用什么方法可以筹到 30 万港币？”我是秉持国家民族的观点，而许只是持着实用主义的观点（Ⅲ）。于是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他倚老卖老仗势欺人，因为他与蒋先生同年。他用粗口辱骂我。他说既然美国人肯出钱，为什么我们不收钱。我再次向他耐心解释此中原因。从此以后，我不再是他的下属了！

（I）刘震寰：广西柳州郊区基隆村人，生于大地主家庭，在柳州置有巨大房产。1909 年考入广西优级师范学堂，1911 年由堂叔刘古香介绍在广州秘密加入同盟会。回柳州后变卖田产挹注革命经费。同年 11 月 10 日率领民军冲入柳州军政机关，迎刘古香为右江军政分府总长兼统领，奉委为帮统。1913 年 9 月 12 日起兵讨袁，兵败后逃亡香港。1916 年 6 月回广西，拍卖家产用以招抚民军绿林，被军政司司长陈炳规任为游击副司令。1921 年 6 月驻梧州时，暗中联络粤军，夹击军阀陆荣廷、陈炳规，被护法政府委为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翌年奉委为广西绥靖督办。1922 年 1 月滇军旅长龙云擅自脱离滇军总司令朱培德返回云南，孙中山电令刘震寰在河池阻击，勒令滇军回桂参加北伐。刘震寰违令放纵滇军回滇，又赠银洋 30 万元给唐继尧作为从香港回滇路费。同年 12 月奉中山令讨伐叛徒陈炯明。1923 年 1 月 15 日以讨贼军粤桂联军总司令进占广州，逼陈炯明通电下野，迎中山回德。4 月，奉中山令，与滇军杨希闵部击溃广东督理沈鸿英。1924 年 1 月大元帅府讨论政府名称，刘提议定名“国民政府”，下旬由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案。刘震寰、杨希闵部二万余众围攻惠州陈炯明部四五十人，历时一年未下，被疑为“美寇自重，保存实力”。此滇桂两部在粤大开烟赌、横征暴敛，鱼肉人民，且无止境地向上大元帅府索饷索械。因此引起中山震怒，传召二人申斥：“你们戴了我的帽子，却来蹂躏我的家乡”。1925 年孙中山在北京病重，陈炯明命林虎、洪兆麟入犯广州，刘、杨二人意志动摇。黄埔军校组成东征军击溃叛军，陈逆逃往闽南，刘、

杨二人均按兵不动。1924年12月，大元帅府特任李宗仁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刘垂涎之职落空，遂与莫帝、段祺瑞、唐继尧、陈炯明等勾结，意欲推翻大元帅府。6月4日，大元帅府罢免二人职务，6月12日刘、杨两部兵败，刘携200万巨款乘外轮逃往香港。复又派人秘密去两粤联络绿林、土匪企图死灰复燃。然刘在港两三年嫖赌抽大烟挥霍殆尽，被迫去云南依傍龙云作食客。抗战时，经龙云推荐，刘震寰得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又在昆明出任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亲近左翼人士罗隆基、李公朴、潘光旦等，还多次以中苏友协保护中共地下党员、抵制军统抓捕共产党员。1945年10月，龙云被免除云南省主席，内调中央，刘震寰迁居香港。1950年代初亲撰《第三势力宗旨》小册子派发于流亡人之中。晚年仍嫖赌鸦片不绝，1972年病故香港。

(Ⅱ) 据刘震寰说“对于工作的开展，美国愿意暂尽棉薄，先以五十万美元做开办费用。以后的经费，他们希望港方同仁提供预算。这位美国朋友说毕之后，立即从皮包里面拿出来一张由美国国务院签署的美金支票来，要交给张发奎。但对于这笔钱，经过大家的一致见解，认为在工作未开展以前，没有使用该款的必要，并未接受。”

(Ⅲ)：据李璜回忆：“许崇智在石塘咀开厅大宴群雄，酒酣耳热，一面高谈其反共大有办法，一面命女侍为之捶腿，意在令美国人闻声而至；或者因其开口甚大，志不在小，而美金终未到手”。

那时我们每天召开筹备会议。有一次，许崇智解释说，他有困难，因为他背着包袱，意谓他原来的小组织（太平洋政论会）。他说他不能不服从他的组织，他需要钱。其它人认为他反动，会议就不欢而散了。

整个事情是复杂的。许崇智的观点是太老旧了。他以为他凭年龄与资历有足够资格来统驭我们。这个老军头的头脑里充斥了陈腐的观点，导致在座的德高望重人士对他鄙夷不屑。顾孟余表示，如果许崇智加入这个团体他就要离开。许崇智想开倒车，他还想当我们的领袖。我问顾先生，倘若让许崇智走开，他肯不肯留下。他同意了。

许崇智与李璜之间的观念分歧是很尖锐的，李璜也表示倘若

许崇智留在团体内，他就不加入。李璜说，许崇智的思想停留在五十年前，他不认为许能同我们合作，他开玩笑说：“我们的观念已经落后了，许崇智的观念则大大落后了”。张国焘与其它人都认为我们不可能与许崇智合作。于是，许被我们斥退了。

我告诉美国人，我们不缺少许崇智这个人。他们说：“第一次会面时，是你提出让他加入的，这不是我们的主意。我们坦率告诉你，你也可以查阅一下香博士的信，只有你，而非许崇智才是我们联络的对象。第三势力是你的婴儿，如何抚育他长大同我们无涉。从今以后，我们将直接找您谈”。我说：“好吧，我们继续合作”。

早期的重要成员

可以说，香港的自由民主人士加入了第三势力。顾孟余不顾他从李宗仁手中拿过20万港币开办费（I），毅然解散了自由民主大同盟。他撂挑子了，因为他发现大同盟中的成员不是为革命工作，而是专营私利，他发现那伙人行为不检，他把自己认为品行端正的成员带到了我们的组织。

在我们努力下，有哪些群体加入了组织呢？有国民党的前党员，如我本人，顾孟余、童冠贤、周天贤（II）、黄如今（III）和任国荣。然后又加入了民社党的王厚生（IV）、罗永扬（V）、刘裕略（VI）和伍藻池（VII）；青年党有李璜、刘子鹏（VIII）、谢澄平（IX）等。青年党的何鲁之（X）有没有加入？他仅出席过一次会议，然后他说他太老了不能再出席，也不能做什么事。此外，他想访问台湾。我和他谈过三次，此后再也未见到他。

（I）根据程思远回忆，1949年8月，顾孟余来到广州，住沙面陈伯庄（孔祥熙时代的财政部秘书，曾任京沪铁路管理局长，1960年9月5日死于香港）家中，同李宗仁长谈三日，顾卒答应出来领导自由民主同盟，张发奎也愿意予以支持，并建议把这一组织加一个大字，这样就变成了

“自由民主大同盟”。9月初在广州秘密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顾孟余为主席，童冠贤、程思远、邱昌渭、黄宇人、甘家馨、李永懋、尹述贤等为干事。并推童冠贤为书记，程思远为副书记，周天贤为组织组长，涂公谨为宣传组长，何义均均为政治组长（未到职），陈克文为财务组长。李宗仁援助港币20万元作为开办费；李还给顾孟余港币3万元。一年以后又补助他美金6千元；此外，干事、组长每人港币5千元。这些钱都在中央银行总裁刘攻芸于离职时拨给李宗仁的一笔专款项内开支的。刘后到新加坡经营金融事业。

（Ⅱ）周天贤：湖南临沅县人，1908年1月20日生。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1937年7月，毅然中止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学业，回国参加抗战。历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湖南支团组训组长、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省参议员、三青团中央干事、国民党中央执委、立法委员等。据黄宇人在《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的原因》一书中回忆，1948年底，周曾秘密邀约三青团省市亲信人员去汉口开会，要他们回去发动所谓局部和平运动，逼蒋早日下野。1949年9月初，李宗仁授意顾孟余纠集桂系立委组织自由民主同盟。推举顾为主席，童冠贤为书记，周天贤为组织组副组长。避居香港后，他又处处以代表桂系的姿态自居。战盟解散后，蒋介石召周回台湾继续担任立法委员。1989年8月17日心肌梗塞逝世于台北中山医院。著有《刑法条文解说》、《民法大意》等。

（Ⅲ）黄如今：曾任东北大学校长、中国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此处英译为 Huang Ju-Chin，疑译错——与另一黄宇人（Huang Yu Jen）混淆，然此处人名似应系黄宇人。

（Ⅳ）王厚生：著有《中国之路》（又名《第三势力与中国前途》）。

（Ⅴ）罗永扬：四川威远人，1912年3月5日生，四川陆军讲武堂步兵科毕业，历任七战区长官公署中校参谋，廿三集团军军法处处长，新编十一军第三师少将师长等，是张发奎旧部。胜利后加入民社党，当选国大代表。1950年避往香港。在张君勱支持创办香港宇宙出版社，刊行《再生》、《自由钟》杂志，历十年之久。1962年秋，左舜生领取台湾两千美金赴美讲学，罗永扬主张开除左出联合评论，张发奎未允，罗则扬言“我们也可以自己去美”，遂开始与台湾驻港特工联络。此举促成《联合评论》提前结束。1969年当选民社党中常委，1988年2月病故台北。

(VI) 刘裕略：1950年代任《联合评论》执行编辑。

(VII) 伍藻池：旅美华侨。

(VIII) 刘子鹏：浙江龙泉人，立法委员，青年党中执委，在港任自由出版社总经理，主编《自由阵线》，周刊。

(IX) 谢澄平：1905年8月17日生于安徽当涂县采石矶。18岁考取上海自治学院而未读，但得院长张君劢许其拜之为师，并承张氏介绍为梁启超弟子。翌年考取北京大学，受教于胡适之、王国维、梁漱溟等大师。1925年初，与各大学社组织标榜国家主义的团体国魂社，发行《国魂》周刊，国魂社为以后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团部的骨干。1932年正式加入青年党。193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1936年获东京帝大史学博士。自1930年起先后任教于成都大学（识何鲁之）、广东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中央大学、珞珈山特训班、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立东北大学、四川大学。1935年主编青年党的《青年生活》半月刊，1944年兼《新中国日报》总主笔。翌年随李璜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1947年4月青年党参加政府，由左舜生延揽为农林部政务次长，同年11月在安徽当涂以高票当选“国大”代表。1949年底至九龙。12月3日左舜生创办之《自由阵线》周刊创刊于钻石山456号，因经营不易，由澄平接办。他增加《自由阵线》篇幅，继则成立自由出版社，发行“自由丛书”，接着创办英文版《自由阵线》双周刊，又设立平安书店、福利书店、田风印刷厂、《中声晚报》、中共问题研究所等。1950年，澄平在美方支持下，与张发奎、顾孟余等人搞第三势力，标榜反共反蒋，以中间力量不作左右袒的立场出现，5月18日与美国国务院巡回大使杰赛普晤面。杰氏答应透过亚洲基金金给予每月两万元的补助，协议由《自由阵线》周刊与美方合作，朱从文化方面做起，建立据点，再由文化运动发展到政治运动，最后及于军事运动，形成第三势力整体架构，以达成“反共复国”使命。翌年在美方支援下成立“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创办《中国之声》、《独立论坛》、《大道》等刊物，积极鼓吹第三势力理论。又与马义、齐星士等人合办自联出版社，延请徐东滨、丘然徐速、侯北人、关颖仁、余英时等人加入自由阵线编辑部。1953年在港策动成立两个外国组织：独立民主运动与中国青年民主同盟，后者骨干为胡越、许冠三、陈濯生、丘然、徐东滨、创办《祖国》杂志，组成友联出版社。1959年因人事与财务问题（据香港《展

望》月刊 1961 年 4 月号披露，自由出版社十年接受各类美援共港币 2800 万元，其中 1/7 耗于赌马；6 月号称：美援正式入账仅 800 万港币）离港，远走东京，《自由阵线》与自由出版社亦告落幕。1960 年执教于东京上智大学，1969 年任加州大学史学荣誉教授，历 16 年撰写《中国文化史新编》，1985 年由台北青城出版社付梓。1992 年 8 月 7 日病逝加州。

（X）何鲁之（1891—1968）：青年党创办人之一，四川华阳人，留法学生，曾任成都华西大学教授，1947 年任国府委员。1949 年冬与杜鲁门的远东巡回大使杰赛普在港晤谈，决定发展第三势力，于是参与创办自由出版社，创刊中英文《自由阵线》等。回台湾后任“总统”国策顾问，1968 年卒于香港。

青年党的翁照垣有没有加入呢？是的，但他要求我们为他保密，他要求别告诉青年党。翁照垣是青年党的英雄（I）。他在从事情报工作吗？他告诉顾孟余和我们中的一些人，他正协助美国政府从事情报工作。我对他颇了解，他是个可靠的人。虽然我不知道他具体做些什么，但绝不是以在大陆打游击招摇撞骗的人。我们团体有没有分配他做什么工作呢？没有，后来他去北婆罗洲经商。等他因病回到香港时，我们的组织已经解散了。

我们的组织也包容了曾是中共高干的张国焘与龚楚（II）。还有其它人吗？有，但都属于中共等级制中的低层次人员。张国焘是唯一的中共最高层干部，龚楚属于次高层。

第三党（又称农工党）的代表是丘燮顺^①、李林，民宪党的代表是伍宪子。

我们同李宗仁的关系又如何呢？我们知道李宗仁有他自己的组织，但内情不详。我们没有要求李宗仁加入我们的组织（III）我们没有一位领袖。在民主运动中，人们不能坚持要自己充当领袖，他必须在众人拥戴下才能成为领袖。我们决定同李宗仁仅仅是保持联络，这种个人之间的联络由我出面，因为他常与我通

^① 音译。

信。每当我收到他的来信，我就给成员们传阅，阅后收回。我们想邀请李宗仁去东京开会，黄旭初（Ⅳ）正在那儿。

黄旭初是我们组织的成员吗？他从未加入，但我同他保持私人的通信联络。他去日本是为了避免他往昔部属的无度需索。

程思远有没有加入？他是我们中间最早的反共者之一，他本来是立法委员，所以一直同童冠贤院长联系。他属于顾孟余的派系。我们推举他为团体的秘书。

桂系还有哪些人加入？广西省政府原民政厅厅长张威遐（Ⅴ）、林茂（Ⅵ），还有李新俊虽不是广西籍人氏，但在省政府做过事（1948年10月—1949年任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

我们同友联那帮子人有何联系呢？友联派其创始人之一陈濯生（Ⅶ）同我们合作。我们每月补助友联机构一千元。顾孟余认识友联那帮子人，陈濯生敬重顾孟余。我们都知道支援友联这回事。

（Ⅰ）翁照垣（1892—1972），潮州人，1925年参加中国青年党，1929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1931年自法国航空学校毕业后回国，出任十九路军156旅旅长。1932年淞沪战事爆发，翁率部奋起抵抗，同日寇的铁甲车、炮兵战斗34日之久。日寇三易主帅，增兵至十万人。1933年参加闽变，出任闽南民军司令。1937年任一战区前敌总指挥，1938年任七战区东江游击司令。胜利后解甲归田，1949年移居香港。著有《一二八淞沪血战史》、《淞沪血战回忆录》及《翁照垣阵中日记》等。

（Ⅱ）龚楚：1901年出生于广东省乐昌县长村，十六岁在中学念了一年就投入粤军当兵，遂入韶关滇军讲武分校，历任粤军连长、鄂（程潜）军少校参谋。1925年被反帝反军阀宣传所吸引，加入了中共组织到北江一带从事农运工作。宁汉分裂后，龚任北路农军指挥，率一千一百人进入湘境，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陈嘉佑第十三军麾下补充团，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后，龚率部脱离十三军，奉贺龙、叶挺之命参加了八一南昌暴动。翌年1月23日在湖南宜章与朱德、陈毅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担任团党代

表。4月，红四军在酃县与毛泽东所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会合，后历经五次反围剿、广西百色暴动诸役；历任红军四前敌委员会常委、中共长沙市委书记、广西省政府（俞作伯）办公室机要秘书、省府船务处长、南宁公安局长、红军第七军（张云逸军长、邓小平政委）参谋长兼19师师长、红十二军卅四师师长，红七军军长兼政委、东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东路军总指挥、粤赣军区怀念员兼政委、红军总部代总参谋长、中央军区参谋长、汀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等职。1935年5月，脱离中共投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参加国军，转战南北。抗战胜利后退役，出任广东省参议员。全面内战爆发后，出任地方行政及绥靖工作。1949年移居香港，1971年在明报月刊发表《龚楚将军回忆录》，都三十万言。

（Ⅲ）从张发奎、李宗仁来往函件知，张发奎主张李自动辞去代总统，以在野身份推动第三势力运动。1950年1月16日李复黄旭初电云：“组党尚非其时”。于是香港的第三势力运动遂以顾孟余、张发奎两人为中心分途发展。顾孟余和童冠贤倾力邀诸黄字人加入“自由民主大同盟”。黄则提出条件：大同盟必须和桂系撇清关系，与桂系分手。黄说：“我认为国民党的失败，主要由于自私与无知，而尤以无知为甚……现在李先生代理总统，就他个人来说，平易近人，没有蒋先生那种自以为神圣的态度……但就这几个月的事实表现，他对当前的危局毫无办法，不但不能转败为胜，即想守住西南半壁亦不可能；桂系的人也多只顾争权夺利，不顾政府的安危，大局必将每下愈况。我们如果对李先生尚存希望，无异是自掘坟墓。”黄建议以李宗仁所补助的这一笔钱作基金，先在香港办一个中学，并出版一份杂志，一方面培育下一代，一方面潜心研究重建国家的各种基本问题。后来黄字人力劝李宗仁，李终于同意桂系退出大同盟。从此“自由民主大同盟”解体。

（Ⅳ）黄旭初：广西容县人，陆军大学四期，在桂系中从排长升到军长，晋陆军上将。自1930年至1949年入主广西省政府兼国民党中央委员近20年。七七事变前夕，桂系利用民气，主北上抗日。可黄旭初在梧州秘密接受大批日援军械，易装的日本人在梧州招摇过市。

抗战军兴，李、白在国民党中央与战区担任要职，无暇兼顾广西，黄旭初权力逐步膨胀。解放军渡江对，黄旭初在广西“减租限田”，还派出土地改革督导团，以笼络人心。然黄旭初大哥、大地主黄晓初在家乡容县

带头违抗，广西土改不了了之。1949年12月3日黄离南宁到海口，转飞香港，住九龙梳斯巴利道。1950年春，奉李宗仁指示，在蓝塘道张发奎公馆开秘密会议，在九龙青山酒店碰头筹组第三势力。黄本人秘密收购了香港《中声日报》，每月津贴一万港币，要该报成为第三势力反共反蒋的喉舌。同年秋，蒋介石派雷震、洪兰友来港，邀黄赴台，被黄婉拒。此时广西财政厅长韦贇唐已将广西库存大批黄金、美钞、银元运到香港，黄旭初原拟以此作为新桂系东山再起的本钱，不料韦氏将此公帑全部据为己有，不愿交公。黄自海口抵港，闻讯十分震怒。正值广西逃港中下级官员由于生活无着常去黄旭初寓所需索，黄乃示意机要秘书梁学基、林茂等将这些落难官弁带到九龙漆咸道韦贇唐住所曰：“广西的钱都被这位财政厅长霸为己有，你们没饭吃就向他要！”此后韦宅门庭若市，还有人以炸弹同归于尽。韦氏不胜其扰，迁至香港半山坚邀隐居。1950年夏，香港《华侨日报》刊登一则黄旭初贪污的新闻，黄出五千元港币聘律师关学林入禀法院控告该报诽谤名誉罪。《华侨日报》总司理岑维休自知理亏，在香港各大报显要位置连登三日向黄旭初赔礼道歉的启事，并赔偿1万元讼费，又将涉案记者开除，始获与黄庭外和解。1951年移居日本，几年后返回香港，在香港春秋杂志连载《治邕回忆录》，历十一年半，计215篇，都130万言。旋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75年11月18日病故于九龙，台湾方面拨出一笔治丧费和抚恤金，给予“国葬”。

（V）英文原为 Chang Wei—，缺字。译者自《广西通志》之《民政志》分册查明系张威遐，1947年1月22日接陈良佐广西省民政厅厅长，1948年10月转任桂林绥靖公署秘书长。

（VI）林茂：黄旭初的亲信，郑介民的表弟，曾在国防部二厅任职，还做过柳州专区行政专员。

（VII）陈濯生：张发奎、顾孟余利用美援资助陈濯生开办友联出版社、友联研究所，出版了不少高素质的学术性书刊。后者专门搜集与分析大陆资料，提供美国方面参考。据美国《亚洲研究学术评论》1947—1975年第4卷第1—2期会刊所载《廿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香港资料来源》一文披露：“友联研究所是香港藏有研究当代中国最完整的研究材料的研究所，它是香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最老和最大的研究组织之一，它拥有五十名工作人员，从事广泛的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美国，欧洲和

亚洲的一些大学和研究中心已经从友联研究所获得它所收藏的所有缩微胶卷的复制品，约达两千五百页之多。”友联成立于1951年，创始人为陈濯生、胡越，核心人物有史诚之、徐东宾、邱然、萧辉楷、刘圃林等。陈、胡二人原参与黄宇人的《独立论坛》，后加入谢澄平《自由阵线》，由依附而独立。由韩战期间友联出版《论细菌战》一书，引起美方重视，予以长期支援，并委托搜集大陆情报且派遣人员赴大陆活动。因经费充裕，友联集团发展速度极快，其分支机构遍布新、马、泰、婆罗州等地，完全活动以香港、新、马为主。

友联表面上系文化出版机构，实质上是政治性集团，设有不公开的政治组织“中国青年民主同盟”，该同盟由胡越任主席，徐东滨任秘书长，下设组织、宣传、文教、财政等部，盟员划编为小组，每两周秘密集会一次。该盟以《祖国》周刊为喉舌，报导大陆动向，探讨反共策略，又以《大学生活》与《中国学生周报》争取大、中学生。友联经费来自香港美新处、美国之青、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以及天主教会。其中美新处与友联签约，按期收购该社出版之书刊；亚洲基金会则分类签约补助，如《祖国》周刊每月津贴3000美元，《中国学生周报》与《儿童乐园》每月各津贴2000美元，友联研究所每月津贴4000美元。另该社每周将大陆重要新闻整理汇译成英文资料，并收购中共书报影印副本售予美国各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机构。然而自1959年起，台湾当局抗议美方支持友联的反蒋政治活动，致使主要支援者亚洲基金会逐年削减补助。1964年《祖国》改版为月刊，此后逐渐萎缩；友联出版社则转为出版大中学教学参考书与学术论著，于1980年代中期停止，所存资料全部售予浸会学院图书馆。

陈濯生是否出席我们的会议呢？不，他还不是我们的正式成员。我们感到友联那批人值得我们崇敬与支持，那是一群非常勤奋的青年。他们在新界地区运作，搜集大陆情报。他们掌握的许多数据是我们需要的。可以说，友联机构起了我们的“视野计”的作用。

我们同友联在哪些原则上形成了共识呢？很简单：自由与民主，反对独裁统治。

我们常常召集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人们通常在我的寓所聚

会，因为英当局对我十分礼遇。在香港，建立政治组织是犯法的。但是我认识香港警务处处长麦金托，当年他正式访问广州时，我是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主任。在那段时期，我本身也访港三次。麦金托非常敬重我。1949年他特准我携枪迁居香港。

我对美国人说，我希望他们会见核心成员，因为我只是个军人，在组织工作方面并非内行。此外，设若美国人不肯会见他们，人们可能以为我一手遮天。我说，如果他们拒绝会见核心成员，我不能再干下去了。我也告诉美国人，我不希望尤金·王继续担任我们之间的传译工作，我察觉他对这份工作不大满意。他们同意了。我指定梅国成^①上校——我在四战区当司令长官时的英文秘书之一——继任译员。

我们的团体遴选了九位成员去会见美国人：顾孟余、童冠贤、张国焘、李璜、李微尘、伍宪子、黄如今、张君勱（还在印度）以及周天贤。在我寓所中，我把他们一一介绍给美国人。美国人说，他们代表美国人民请教各位，怎样才能有效地帮助我们？还是鼓励我们组织起来，勇往直前。

张君勱仍滞留国外，但他同我保持联系。他说他同马歇尔元帅有深交（I），并欲透过马歇尔同美国政府达成更佳协议。我们期望马歇尔会帮助我们。我们请教美国人，我们是否可以直接派人去美国洽谈。美国人说，倘若我们能直接同美国政府接触，那可是个好主意。我们召唤张君勱回香港，言明我们要派他去美国。他同意了。换言之，我们期望他去美国从事外交工作。

（I）：1945年夏，张君勱应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之邀前往讲学，但他提前于1944年年底赴美，在国会图书馆取得一个专用阅览室，准备有关中国哲学史的讲稿。国民政府通过教育部汇美金3000元，作为张在美国的生活费。张君勱藉博士学者与国社党党魁的名义，频频走访美国国会议员、

① 音译

政界闻人以及著名科学家，1945年5月，他又被国府指派为中国出席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代表团团员（共八人，宋子文任团长），凭借此一街头，张君劢的交际层次更为提高，会晤马歇尔即在这一段时期。

组织方面的困难

1952年3月中旬，张君劢回到香港。如前所述，美国人不相信他会回来，然而他来了。我带他去陆先生的浅水湾寓所会见美国人。

张君劢在香港逗留了两星期，期间我们经常召集会议，修订与润色我们组织的文件，组织名称叫“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我们通过了同盟的宣言与组织纲要，这个同盟自然是政治性的组织。

张国焘为同盟草拟了不少组织规章，因为我们需要共产党的组织精神。在筹备阶段，童冠贤与李微尘草拟了同盟的组织大纲。张君劢是起草同盟宣言最有力者（原注：《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宣言》原件由张君劢用毛笔写成并签署，有25页），他在草案上签了名。既然我们同张君劢一起签署了《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筹备期间之组织纲要》（原注：签署者有张君劢、张发奎、童冠贤、顾孟余、张国焘、李微尘，原用钢笔写成，有6页）、《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公约》（原注：同样由六人签署，原件用钢笔写成，4页）。

为什么童冠贤、顾孟余、张国焘、李微尘和我没有签署这份宣言呢？张君劢签了那份宣言就走了，我们仅仅是忘了签署。张君劢立即离开是因为急于赴美，他参加了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的中华民国代表团。

张君劢有没有建议在他抵达美国之前就发表这份同盟宣言呢？是的，张君劢对美国之行的成果深具信心，但我们觉得准备工作尚未就绪，发表这篇宣言的时机尚未成熟。

顾孟余是否认为，以建立组织与鼓吹（反共反蒋）来代替

少数可靠同志之间的精神合作尚为时过早呢？是的，顾孟余是最谨慎小心的。

是否从一开始，顾孟余同张君勱就意见不合了？是的，他俩情绪化地成为对立面，顾孟余在存疑的细节惯常是小心翼翼的，他对条件成熟之前成立正式组织抱有戒心。在另一个极端，张君勱则过于自信。最重要的分歧原因是张君勱甩不掉他的包袱，那就是民社党。当孙宝刚等民社党员出走并且反对张君勱时，他提出了“毁党组党”的口号。他说他要解散民社党，重组一个新党，但他一事无成。他绝不甘心断绝自己同民社党的联系，他说人们都知道民社党主要是由他的学生们和亲戚们所组成的。

顾孟余和我都是国民党党员，但只能算是失联党员。在1950年，我们同盟中没有任何人遵命办理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张国焘被中共开除后也算是无党派人士了。第三党（农工党）的党员也是如此。仅剩下民社党还存在着党组织。顾先生认为这一现象拖慢了我们建盟的进度。

张君勱同顾孟余早先有没有交往呢？没有，美国人对顾孟余的重视远甚于张君勱。他俩都是学者，然美国人似乎不太看重张国焘。

李璜突然退盟，理由是“家庭责任”。

那时他为香港油地小轮公司总经理刘德谱服务，月薪有一千港元之多，他还在其它公司兼职。他说，他同情我们但他害怕加盟，因为香港政府的管治十分苛严，他只是为稻粱谋。

我告诉其它人不要担心。我告诉他们，对英国人要顽强些。我说，我会对一切后果负责。要知道，我们已经同美国人作了一项秘密安排，一旦形势危急，我们中间的八九个人可以避居菲律宾。

美国人想在文化宣传活动方面援助我们。顾孟余是从事这一类合作的最佳人选。他的小组织早（1950年4月1日）已开始

出刊《独立论坛》。美国人要求我通知顾孟余扩大他的活动，还允诺给予财政援助。我告诉顾，他同意了。我们每月津贴《独立论坛》八千元港币。

张君勱要求我们支持他办的刊物《再生》，该刊由王厚生负责。我们同意每月津贴港币6000元。

我们计划在香港创办一份报纸，但美国人认为行不通。他们认为将资源集中在几份期刊更适宜。所以我们创办了《中国之声》周刊，由张国焘负责。这本刊物的预算高达每月一万八千港元，创刊于1951年10月11日。

我们还创办了期刊《华侨通讯》，由罗吟圃^①负责，每月预算是港币8000元。

我们耗费港币5万元收购了嘉罗印刷公司。美国人问我们每月需要多少经费。我们答道每月约需美金一万元。这笔钱我们可以自行分配。他们怎样付款呢？用美金现款支付，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办法。他们把钱交给我，我交给顾先生，让他开具收据。顾先生很谨慎，决定让不同的人分管现金与账簿。周安聪被指定负责账目，陆毓明^②负责管理现款，由他出具收据交付美国人，然而我们不必向美国人说明怎样支配这些金钱。

陆毓明的背景如何？他是一个生意人，住在浅水湾。一开始就由顾先生介绍加盟，顾先生隐居在他那九龙塘寓所，他有两个住所，一个在香港，另一在九龙。

不久，谢澄平退盟了。他是《自由阵线》半月刊的负责人。他开出条款，要担任同盟的秘书长。顾孟余说我们不能接受任何需索，于是谢澄平离开了。我们感到人才济济、财力丰沛，所以不在乎。

① 音译

② 音译

我们设立了一个执行委员会，由张国焘、顾孟余、张君勱、童冠贤、李微尘、伍宪子、伍藻池、任国荣、周天贤、黄如今和我组成。其中三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伍宪子、顾孟余和我。会议决定，今后同美国人接触限于中央常委会三名常委。美国人认为此事有助于保密。换言之，我们三人可将其他人的意见转达美方。当讨论一些特别事项时，其它成员偶尔有机会见到美国人。例如，李微尘会晤美国人讨论过文化宣传方面的事。我们三位常委每周至少在我寓所会见美国人一次，有时两次。

是不是两人都见到？通常是。有时我们只能见到一个美国人。有时他们离开市区或者正好休假。回忆起来我们卷入此事不止几个月，长达两年多。

我会见退役上校的次数是否多于那个年轻人？是的。

常委委员是经选举产生的吗？不，谁可以出任中央常委，谁可以主管一部门，通常是顾孟余说了算数。

为什么同盟的组织纲要中没有规定设立中央常委会这一核心机构？那是在会议记录中敲定的。

会议记录有几份呢？只有一份，当然，不需要多份！我们都签了名。

谁负责保管会议记录呢？我负责保存，所有的文件都保存在我寓所，因为警察不敢进入我的居所，那就是他们要我担任中央常委的原因之一。

每一位中央执行委员每月可以领取津贴港币1200元，“中国之声”负责人张国焘领得特别津贴，顾孟余、张君勱和我三人分文不取。虽然张君勱本人不受薪，但有人为他治装以及支领赴美的旅费。

我们设立了以下部门：组织部，部长任国荣；财政部，部长周安聪；政治部，部长周天贤；军事部，部长邓龙光（I）；华侨事务部，部长韩汉藩（II）；宣传部部长黄如今。李微尘出任

同盟的秘书长。

(I) 邓龙光：“国大”代表，曾任广州行辕副主任。

(II) 韩汉藩：曾任国民参政员。

各部门的部长月俸为 600 港元，副部长 400 元。同盟的秘书当然也受薪。总计同盟每月支出要 8 万港元，相当于一万四千美元。这个预算金额是同盟中执行委员会议定的。

有一天，美国人告诉我，伍宪子去了台湾。他们说，从情报系统得悉此事，问我们是否晓得。我十分惊讶，乃询问伍宪子的家人。对方说，他去了澳门。后来，台湾报纸披露了他的行踪。

我将此事告诉顾孟余，他对我们三位最高负责人中有人出此下策感到失望，伍宪子在台湾逗留了两星期。回港后，他打电话探询我是否有时间去看他，因为他有要事告诉我。见面后，他问我是否知道他去了台湾。我说当然知道。他解释道，他去台湾原本只想逗留一日，旨在请蒋先生给他签发赴美国的护照。到了台湾，蒋先生说他要到台南，要伍找（行政院前院长）张群、（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和（中央改选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蒋先生说他几天之内就会回台北，所以伍宪子就等着，然后台湾方面有人要他留下过双十节（I）。我们觉得伍宪子背叛了我们，便把他开除了（II）。

(I)：据程思远说：“台湾当局知道顾、张联盟有美国中央情报局作后台，不好公开出面破坏，便从收买伍宪子入手。伍宪子在重金引诱下秘密去了台湾。事前曾相约双方严守秘密。但台湾当局敦促他参加一个庆祝双十的纪念大会，并故意介绍给美国大使馆的官员见面。随后台湾当局就向美方提出抗议，说华府正在支持台湾，另外又支持张、顾在香港搞第三势力来破坏台湾。美国当局不得已把那个哈德曼调回去加以申斥。几个月他又回到香港，对张、顾发牢骚说：‘你们说没有钱不好办事，但有了钱又闹纠纷！’从此，去菲律宾小岛建立基地的宏伟计划就被束之高阁了”（《政海秘辛》，第 238 页）。

(II)：据伍宪子门生胡应汉说：1952 年 9 月 19 日侍坐，吾云：“先生

由台回，外面流言先生得了台湾三万美元，又说先生应台湾当局之请，将游美国，俾此间反蒋者减少一个领导人物，吾则不信先生坚卓平生，肯改变于一旦！”先生云：“吾于民 37 年即将游美国，今仍有此打算；此何关台湾事？吾认为共产党、共产国际要彻底摧毁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实绝不容宽恕它。故认定凡反共者即是朋友，即须合作。台湾当局几度相邀，台湾是中国反共基地，我何故不去？我平日虽不满意国民党之一党专政，然为了反共，何必理它！事实尽可以答复它！”（引自胡应汉辑著《伍宪子先生传记》，香港四强印刷公司发行，1953 年 2 月初版，第 96 页）

我们需要守秘

同盟有多少成员呢？大约二三百人。

入盟的手续如何？必须有两位盟员介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完成审查批准申请后，新盟员要签名。

我是否会见那么多盟员？不，但是我查看盟员名单。

他们的职业与背景如何？他们多数是知识分子，许多人是教师，其中还有些学生。我们从大陆（流亡者中）吸收青年。其中有些人本系军校学生，他们渴望打回老家去。其中也有些工人。

在商界有多少盟员呢？有一些生意人。多数盟员是自立自给，不需补助。大多数人在大陆时任职于国民政府或从事教育工作。

我们有没有遵照组织纲要第 11、12 条规定建立小组呢？是的，我们在工人和学生中建立了小组。他们是同盟的基层干部。

小组是不是按照地区来组织的吗？是的，在新界居住的人们不方便来市区开会。会议通常在夜间举行，因为多数盟员在工厂做工、在学校教书或上学。如果在一个特殊地区有三个盟员，他们可以申请成立一个小组，其中有一人任组长。小组成员不超过十人，当或员增加时，一个小组可以成两个小组。

曾经编过多少小组呢？光是香港一地就有十多个小组。小组开会时，盟员们会畅谈他们的抱负以及工作进展。

我们组建基层细胞吗？不，我们本来就是从最低最基层开始的。我们原来计划在同盟达到一定发展阶段时布建细胞，但达成这一阶段前，同盟已经解散了。

同盟的成员对内部组织了解到什么程度呢？小组成员只知道组长是谁，连上级的负责人姓名都不知。组长只知道他所隶属的地区负责人，地区负责人则是向组织部部长负责。同理，从事军事工作的人仅仅向军事部部长负责。换言之，组织是垂直单线的，在较低层次的不同部门并无横向的联系。这样，一旦有人被捕，他不可能暴露整个组织。人们必须牢记，同盟是一个地下的秘密组织。同盟的成员只知道同盟的名称以及最高领导人姓名。

我举出一个我们欠缺保密观念的例子。张君勱在香港时，港府警务处政治部向他下达三张传票应讯。通常第一张传票是在被传人应讯前一日颁下的，设若不理它，第二张传票会在次日下达。我劝告张君勱别理它了，反正他快要去美国了。第三次传票下达也不应讯后，港英当局搜查了张君勱居住的妹妹家。我打电话给警务处处长麦金托，保证张君勱那天早上就已离开香港了。那时谁见了我都要按规定向政治部报告。陈济棠的哥哥陈维周（I）在香港住了十多年，一直毋需向政治部报到。有一天他来看望我，我们聊了一下。第三天他收到传票，要他向政治部报告谈话内容。有人告诉我，我住宅的电话被官方窃听了，我不相信。麦金托对我发誓，那是谣言。

（I）陈维周：陈济棠五兄，热衷于占卜算命星象象堪舆之术，性格贪婪，长期承办广东多种捐税，从中牟取暴利。陈维周、陈济棠兄弟主政广东八年，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仅据陈济棠随员章董朋和陈妻莫委英挚友何予珍所记，陈济棠在1936年7月兵败时带去香港的港币就有3000万元之巨（值今日15亿元以上）；1949年由广州赴海南任职又带走黄金三千多两和一批美元、港币。此外还拥有数量可以同观的房地产、工商企业及金融股份，仅茂名、钦县、防城田契就装满4皮箱，光是茂名一地就有良田几百顷；在香港有98处铺租收入，九龙界限街的7栋带有汽车间的花园

洋房使此街有“秀英街”之称；为子女日后留学美国在存入美国银行的美金达200万元。莫秀英一人的钻石逾两千粒，在省港澳还设有大量工厂、银楼、渔业公司、轮船公司，又在婆罗洲设厂。

政治部曾经同我（直接）接触过吗？它不敢！政治部的侦察部门有次派一个探员找我，通知翌日上午十点半应讯。这名探员竟是我昔日的下属，他解释道，他不能抗命不来我家。我致电麦金托，他马上电告侦察部门声称，即使他本人也不敢贸然传讯我。侦察部门负责人说，他仅仅是问问我10：30这个时间对我是否方便。这些内情都是孟世光告诉我的，这位警务督察奉麦金托之命，在麦与我之间担任联络官。麦金托对我说，如果发生不顺心的事可以立即找孟世光解套。我确实未去过警务处政治部。毕竟，他们若想见我，可以上门或者打电话来。

我们的影响力逐渐扩散

我们想在海外华侨中开展我们的运动。我们派遣了李新俊去北婆罗州推展活动。他伪装成新教的传教士，我们付酬给他家人协助他工作。他在中华中学执教，还经营山打根日报。他现已退休。伍藻池被派去澳洲。他要求我们派他去那儿，因为在彼邦有亲友。民社党党员周向光那时在印度，张君勱推荐他为同盟驻印代表。顾孟余的追随者黄天石被派去曼谷。黄是潮州人，去时独身，后来他带了新婚妻子回港。

在海外华侨中推展同盟的活动有困难吗？是困难的。同盟起初在华侨学生中积极开展活动，周向光在印度任教时，盟务发展甚好。

同盟对社会产生任何影响力吗？在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统治后，香港人的头脑已变得麻木了。同盟没有能力对此辈施加很大影响。但是我们能够对来自大陆的人们产生影响。从大陆来的年轻知识分子确实对我们寄托很大希望。他们希望我们催生第三势力。从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对国民党已失望了，因为国民党兵败如

山倒，迅速失去了大陆。在另一方面，他们中许多人害怕在大陆上厉行的清洗运动。他们自然转向能领导第三势力的人们，这正如我年轻时转向国民党一样。

我为何肯定我们对大陆来的年轻知识分子产生影响呢？非常简单！购阅民主刊物的人全是从大陆出来的。我还会向你提供另一证明：凡刊登顾孟余或张君勱文章的刊物，销售量都特别高。我们津贴或出版的四种刊物，平均销量为每期约两千份。哪一期《中国之声》杂志若刊有顾孟余或张君勱的文章，我们会印 300 本。

每期 2000 本中，有多少是在香港出售的呢？大约 1200 本，其余则销往海外。我们刊物的读者对同盟了解很多吗？是吗，他们不知道同盟的组织情况，但他们知道有组织存在，他们尊敬同盟的领导人。张国焘与张君勱没有做过大官，所以没有被国民政府的贪污丑闻牵累。就顾孟余而言，虽然他做过铁道部长，但他未贪污过。

渗透大陆的努力

军事部从事哪些工作呢？它负责组训同盟中的一些成员。我们有些年轻人被派遣到大陆做地下工作，他们都是志愿者。他们相信自己有本事得到自由进出大陆的旅行证件。

在那时，人们已经需要旅行证件了（在 1950 年前，华人出入香港是毋须持有官方凭证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华人去日本、欧洲都不携护照）。有些人回到大陆投考中学或大学，我们提供经费。

他们从事什么样的地下工作呢？从事情报工作。

派遣了多少青年去大陆呢？统计数字各异。我相信，不管我们第三势力能否搞出些名堂，美国人最重视的是搜集大陆情报。我相信，我们从美国人手中得到的钱是编列在特务经费预算项目上的。

有些青年忠诚地执行了他们的工作任务，另一些人则相反，他们根本没有返回大陆，而是滞留在新界。他们简直是捏造情报报告。事情终究要露馅，因为有人看见他们在新界（I）。

（I）李璜说：“此时在香港，如此品类不齐、穷极无聊者众。美国人竟遣派两三浮薄少年前来，立谈之顷，莫明其妙，便乱散美钞，或三五万，或十万八万，并无整个计划，而姑以试试看的心情，令一些手中已无寸铁之过时人物，为之入大陆觅情报，或打游击。美钞这样花法，只有被骗而在闹笑话。因是传闻有刘震寰骗得六万美元，声言拿去广东打游击，而本人先在九龙新界来动，于是有在新界打游击的笑话流传。”（《学钝室回忆录》，第723页）

究竟诚实的人多，抑弄虚作假的人多呢？后者较多。例如，美国人希望广了解广九铁路沿线共军的部队序列、人数、番号以及指挥官姓名。我把任务下达给军事部。该部派进大陆侦察，不料此人呆在香港胡乱编写情报。他经我们把情报交给美国人后，对方说全是假的，因为他们早已知悉，报告中所提到的一支特种部队那时正驻扎在东北。

还有一个例子，有个无线电报报务员被派去广东省侦察。美国人相当聪敏，他们自己经营一个电台，同我们的报务员交换信号，于是美国人发现，此人正在香港水域蒲台岛附近的渔船上发报。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涉足情报工作。那时我见过一位姓吴的华侨，我想他是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任副领事，从事政治工作的。他对我比较坦率，他说，希望我帮他物色一些人从事情报工作。我未曾答应这一请求。我感觉百分之九十的情报是假的。如果我接受假情报，我必然会发出假情报。这就是美国人一直对我印象良好的原因。我从来不对情报工作怀抱信心，也从不声言在大陆拥有游击部队。抗战时我统率四战区，早就见过情报人员炮制情报的事，这一诡计竟沿袭到了香港。

龚楚从大陆搜集情报吗？是的，我初次会见那两个美国人后不久，他们问我是否能派20—30名无线电报务员去日本冲绳受训？他们说，最好是单身人上，但如果够格，年轻的已婚者也可以吸纳。在香港有许多受过训练的无线电报务员，其中有些人在大陆上当过通讯兵，有些人一直失业，还有些人在渔船上充当报务员。我们化了些时间去组建这支通讯队伍，我们派出卅多人去冲绳岛，其中有些人已婚。他们被高薪所吸引——大约月薪150美元。许多年轻人流亡到香港，深感前途渺茫。

这伙人随后被派往日本茅崎（I），当时仍在美军占领之下。

（I）茅崎镇：在东京神奈川县。1951年春，美国中央情报局透过盟军总部第二处拨出东京神奈川县茅崎镇上一座兵营的几幢木屋充作“自由中国运动”的总部。美方派一名少校和几名助手协助蔡文治筹办来自香港的受训人员之接待工作。流亡香港初期予蔡以经济援助的陆大十三期老同学刘昆黄缘出任“自由中国运动”通讯学校校长，迅即率领一批通讯技术人员由香港经冲绳来东京。刘永昆曾在程潜麾下任华中补给区司令。后，刘携带巨额美金并把大批军用物资运港，换成港币后便成了富翁。刘在台湾被通缉在案，所以成为蔡文治的核心，蔡夫人吴佩琪出任通讯学校英文教官。

然后，我发觉，这两个美国人同蔡文治有着联系。虽然我已知晓蔡文治在美方支持下正在对大陆开展游击战争，但这一切对我来说是新奇的事。事情是这样曝光的：一天，美国人问我是否认识蔡文治，我说我当然认识他，他是陆军大学毕业生，当过何应钦任陆军总司令时的陆军总部第三处处长，当时我在第二方面军任司令官，他的地位比我低得多了。美国人说蔡有一位驻港代表。他们问我是否愿意见一见他，问题便是这样提出来的。我感到很困惑。美国人正在帮我们搞组织，为他们他们又突然扶植蔡文治？最后我答应了，我说愿意见他。他们告诉我，此人将会在某个夜晚来拜访我，我说好吧！

一天晚上，那人出现了，他竟是我熟识的黄秉衡（I）。我说：“你此着错极，我们相互很了解嘛，为什么需要美国人出面向我介绍你？为什么你不敢独自来见我？事态已发展到黄秉衡出任蔡文治驻港代表，正准备在大陆开展游击战争。他给蔡文治驻港人员发薪，出任这个团队的主官。蔡本人在冲绳岛，业已吩咐黄秉衡同我们建立联系。黄秉衡告诉我，他们同这些美国人已经挂上了钩，我感到我们蔡方是一鼻孔出气的。”

（I）黄秉衡：1901年生，浙江余姚人。毕业于山东烟台海军小学，曾去美国学习飞行技术。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航空顾问。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处长。1933年任全国航空建设委员会会员、中国航空协会理事，翌年任航空委员会总务处长。1939年任空军第一军区司令官，次年任航空委员会参事室首席参事，次年任中国驻美大使馆空军武官。1949年任国民政府参军。1949年挟巨资来港，由上海富商王晓籁之子介绍，结识蔡文治。1951年被蔡文治任命为“自由中国运动”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兼香港工作站站长，化名孙复刚。1968年5月自港返台（以向张群拜寿名义），1979年冬自港赴美定居。1989年1月16日病故于洛杉矶。

蔡文治去过美国，他的英语甚佳，他能直接同美国人交谈。

黄秉衡有没有来拜访我们同盟的其它人呢？没有，他不想见其他人。他很胆怯，当我在电影院中撞见他拍他脊背时，他只是露出平静的微笑，马上走开。他常常戴墨镜。自然，我由于在香港地位优越，我能够随心所欲。

蔡文治想微什么？他很有礼貌，他说，派黄秉衡来拜访我是要告诉我，他正在做什么，而且他十分希望我们站出来领导他们。

美国人很希望我们同蔡文治合作，蔡既反共又反蒋；我们则既反共又不支持蒋。杜鲁门政府的政策是支持反蒋反共的人士，也支持反共而至少不支持蒋的人士。

我们同蔡文治合作，因为他反共反蒋。我们对台湾当局不满，我们反对独裁统治与极权主义。蔡文治要求我们派人去冲绳

担任他的秘书。顾孟余派了胡越（I），他是友联机构成员。

（I）胡越：原名胡灵雨，笔名司马长风、高节等，辽宁沈阳人，1922年4月12日生于哈尔滨。1946年夏毕业于国立西北大学。1949年4月从北平至广州，6月至台北，与殷海光、许冠三、劳思光等举行学术座谈会，每两周一次，提倡自由民主；12月至香港，助丁文渊（同济大学前校长）筹办《前途》半月刊，参加第三势力活动。1951年奉顾孟余派遣至塞班任海外联络员。蔡与顾、张二人分裂后，胡在蔡文治压力下脱离“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宣誓参加“自由中国运动”。嗣蒙塞班训练学校校长王之赏识，出任政治教官，给学员讲授《马克思主义批判》，为王之撰写《我们的基本信念》一书。1953年向王之出谋献策，向美方建议摘除“自由中国运动”的招牌，由王之取代蔡文治领导这个500人的华人团体，给美国国防部当雇员，支取高薪，且绩优者予加入美籍。东窗事发后，分裂活动被蔡文治救平，王之被蔡逐走，张发奎系统人员遭受整肃，胡越险些入狱。1954年遣散返港，与陈濯生等人合办友联出版社，出版《祖国》周刊、《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杂志、《大学生活》月刊等。1956年任《联合评论》周刊编辑。此时张君勱在美国注册设立自由中国委员会，由谢扶雅推荐赴美主理，未果。嗣又由谢在美国筹款与胡合办小报型刊物《自由中华》在纽约印刷，寄至香港经胡分投寄大陆，策动倒戈。胡又暗结港澳青年组织“中华自由军”潜入大陆历数年之久。1970年后历任树仁学院、浸会学院中国现代史、现代文学教授、友联出版社社长等。1980年5月旅游美国时在纽约机场中风，6月25日因胃出血逝世。著有《中国新文学史》、《历史唯物论批判》、《马克思经济学说批判》、《中国现代史纲》、《毛泽东评传》、《周恩来评传》、《现代人物丛谈》、《司马长风散文选》等。

我向美国人建议，除了无线电报务员，我们应该派遣优秀的青年军人与知识分子去冲绳岛受训。有些从大陆逃出来的中学毕业生不想去台湾。我向美国人解释，美国在远东地区是需要帮助的。当一支部队训练完竣后，倘若我们要反攻大陆，那就能派上用场；倘若不能反攻，只要这支部队维护下去，它仍然能在东南亚地区协助美国。那里有许多华侨居住。美国人接受我的建议，

同意提供政治训练。在训练期间，每位成员可以支领月薪一百美元以上。美国人规定受训者必须是未婚人上。

童冠贤负责考核盟内其他人士推荐来的年轻知识分子。廖平凡负责对青年军人的考核。他俩审查对方的思想以确信来者不是共产党渗人的特务。大约八十名青年被送去冲绳岛，其中包括邓龙光的侄儿和我以前的英秘林挺玉^①。其中有一些是技术人员。有一个我过去的卫士被派去接受驾驶训练。

多数年轻人来自哪个省份？全国各地都有。

到达冲绳之后，林挺玉见到了我任广州行辕主任时的副官之一于明卓^②，他正辅佐蔡文治。虽然名义上由蔡文治负责整个冲绳训练项目，但实际上财政、训练等一切都是由美国人主宰。

美国人要在香港寻找一批东北籍青年，以便训练后空投东北从事情报工作。蔡文治叫黄秉衡在香港招聘志愿者。许多青年被优厚的待遇所吸引，冒充是东北籍人士同意受训后空降回乡。其中没有一个是招募的，我深信其中甚至没有十个人真系东北籍，他们多数是南方人。这批人被送去冲绳岛受空降训练。

黄秉衡告诉我，在大陆潜伏的游击队将响应他们的登陆行动。他不仅提出此类主张，还向我出示大陆游击单位的组织图表及首领名单。于是我知悉涂思宗（Ⅰ）负责广东省的游击作战，刘震寰（Ⅱ）负责广西，廖国齐与华平业皆隶属于涂将军。

（Ⅰ）涂思宗：毕业于陆军大学一期，早在国民革命军东征时，即历任连营长。北伐初，出任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第三师第七团上校团长。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之周荫人军激战于闽浙线，由闽东福安直捣杭州，晋升第22师少将师长。抗战军兴，奉委为福建汀龙师管区司令；不久调任第九集团军中将参谋长。之后返回重庆，服务于军令部。1937年2月，涂氏奉派率领中央视察团前往陕北延安作实地视察，以为尔后处理该区军政问

① 音译

② 音译

题之参考。涂成为最先进入共区且军队最高之国军将领。抗战胜利前，盟军陆空部队进入中国战区，涂奉命在桂林设立军政部办事处专司联络。国民党政权大陆败溃后，蛰居九龙，与张发奎、蔡文治等流亡军人图谋“恢复”，任华南游击军区副司令。1981年4月20日病逝九龙玛嘉烈医院。

(Ⅱ)：然而刘震寰本人压根不承认自己加入过第三势力，遽论骗取六万美金，刘自称托病不见美国人哈德曼，且对张发奎说：“我和你们的意见完全不同，我主张团结台湾，你们主张由自己来干。如果我去出席，我们两个先就有两种意见，叫美国人看来不是笑话吗？我不出席并不是表示消极，你就告诉美国朋友说我病重就得了！”

他们给予美国人一种印象：地下工作已经在广东全省布建。美国人认为，既然确有其事，他们将派遣空降部队与无线电装备去获取情报。美国人太天真了！在我心目中，我知道蔡文治所声言的一切都是虚假的，但我不想说穿它。我对黄秉衡或美国人都没说什么。

涂思宗来看我。他要求我吩咐黄秉衡给他增加经费，他知道我说话管用。涂有些下属原来是我率领北伐第四军（铁军）时的老部下，涂也知道华平业在我麾下做过副官，他说有三百多个游击队员在青化乡作战，我知道实无其事，华没有一兵一卒在那儿作战，我记得国军撤离广州前，我拨给华一百多支枪，多数是来复枪（步枪），要他在我故乡组织游击队。华领了枪械，组织了农民游击队。当共军进驻我家乡时，他干不下去了，就将枪支埋藏地下，同他哥哥一起逃到香港。但我不能说穿这事，因为涂会沙华鱿鱼！故我假装不知情。接着，华平业告诉我，涂正要派遣他与其它游击队领袖去冲绳岛接受美国人的空降训练。

涂思宗口中的其它游击队又如何呢？那都是不存在的单位。我也知道，刘震寰所称尽皆虚妄，他在广西没有一兵一卒。涂思宗欺骗蔡文治，蔡又欺骗美国人。涂思宗仅仅是想混饭吃，黄秉衡也是如此。他们只是想骗过美国人。在每一级都存在着欺诈行为。天真的美国人竟认为那一切都是真的呢！他们说，他们会支

持的。于是，他些家伙编出各式各样的谎话以骗取美金，那是一个大骗局。

由于美国人过份天真，我们的年轻人空降到大陆去打游击了。这当然是他们自己作出了错误的抉择，他们志愿空降大陆打游击战。为了谋生，他们什么也敢答应。但当空降行动启行前，他们逃跑了，他们心里明白：末日来临了！例如，有一个原在中央政大求学的山东人，攀越训练营的电网。很幸运，他会讲广东话。逃到横滨后他去一家中国餐厅吃饭，讲广东话，慢慢向人打听怎样能回到香港。他回香港后来看我。于是我知道了，秘密是怎么泄露的。他告诉我，美机从茅崎基地起飞。受训者必须出发，因为他们拿了人家的钱。

正如我已说的，美国人对我的军事才能深具信心，相信我有本事在华南地区凝聚民众支持。然我告诉美国人，别相信那些人的话，那都是谎话。如果我想做，我一定已经骗了美国人好多钱。证据是，蔡文治事实上已经从美国人手里拿到好多钱。我的处境与蔡文治不同，因为我拥有国际知名度。许多人知道张发奎的大名。他们知道我为国家效劳，永远不会无视国家利益。但蔡文治不同，他做的一切事都是为了美元。

我们的同盟有过任何直接的军事行动吗？邓龙光介绍他的粤西南同乡陈深来见我。此人行伍出身，一直升到邓龙光的三十五军师长高职，一直跟随邓龙光。陈深是30多名青年的领袖。他声称只要他和他的手足能回到粤西南，他一定能成功地发动游击战争。他说，他能征召三四十个粤西南的流亡军人。这些人原本都是他的旧部。这个诚实的陈深坦白告诉我，与其饿死在香港，他宁可回老家战死。

我向美国人报告了陈深的事。我说，陈深愿意回乡打游击，苦无武器与船只。美国人说：“我们会援助他的。”雇一艘帆船载邓偷度回大陆，在当时谈何容易！最后，我们买了一艘船，又

租了一艘。陈深召集了不少粤西南同乡，他的游击队终于扩大到了七十多人。他们住在一所牧场，小规模地接受训练。教官教会他们，一旦船沉了如何自救。

军事部成立后，陈深隶属于它。他与部众一致认为准备就绪，但缺乏军事装备，美国人说他们会在适当时候交付武器。他们会派一艘船在国际水域同陈深的部下碰头，陈深的部下接收武器后就向粤西南进发。

战士们集合在蒲台岛，领取了食物与大陆钞票，其中有些是假钞。在一场暴风雨中，他们出发了，但是美国船没有按照约定时间在公海出现，他们不得不返回。

他们作了第二次尝试，但其中一艘船在抵达国际水域前被香港水上警察截捕，另一艘得以逃脱。陈深在另一艘船上，那是租来的。他在新界西贡上岸，即向我报告。

港英当局想把俘获船只上的人们递解出境。我们担心他们会被遣送到台湾去。于是我们同港府谈判，表示倘要驱逐出境，就撑到澳门去。英国人给我面子，释放了所有的战士，也归还了他们的装备。

那是麦金托从中帮忙吗？是的。

美国人吩咐我们卖掉那艘船——那船价钱并不昂贵——用卖船所得充作这支部队的遣散费。这艘船卖了两三万元钱。

除了陈深的流产远征，同盟有否发动任何其它军事行动？没有。

竞争美援

我同蔡文治联系，我建议他解散他的组织，加入我们的同盟。盟内其它人也赞同这个主意。我告诉蔡文治，对他们说来，光有军事行动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成为政治行动的一部份。军人必须接受政治家的领导。既然我们已经组建了同盟，他就应该加入进来与我们并肩战斗。

此时，蔡文治告诉我，他已建立政治组织，那是完全仿效“自由法国运动”而为。在政治组织下，他组建了军事部门，叫做军事委员会；在军委会之下，设立海陆空军总司令部。未征求当事人同意，他就拟定了军事委员会成员名单，由香港与大陆的著名军人组成。有些人甚至是在台湾的。这张名单是油印的。

我的姓名被列为海陆空军总部总司令，蔡文治自己位居副总司令兼总部参谋长与陆军总司令。邓瓿——邓龙光的弟弟，刻正在香港——被列为海军总司令，黄秉衡列为空军总司令。请注意，他做这些事从不同人商量。

我说，这样办事是错误的。我叫黄秉衡同我一起到厨房里把这张名单烧了。由于这是油印的，无疑还有复印本。我本人在香港不必担心害怕，我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倘若港府拿到这张名单，其它人就会有麻烦了。我问黄秉衡，他住所有没有复制品。他说没有，他刚收到这份给我的。接着他去厨房烧掉了这张纸。

蔡文治的政治组织里有些什么人呢？我不知道他的团体里的任何文官，我只见到这张名单，上面写的都是军人。

我们的美国朋友也帮助蔡文治，他们已经把他送去冲绳。事情已很清楚了。但他们只能做不能说。他们说，援助是来自美国人民，但事到这一地步，很明显，是美国政府所为。否则，那些美国人怎能确信每月这笔津贴能按时发放呢？

我问美国人，他们对蔡文治的组织是否了解，倘若了解，他的后台老板是谁？他们说，他们不清楚这事，组织“自由中国运动”不是他们的主意，但他们退一步承认，美国人民已经派人去援助冲绳岛上的蔡文治。

我特别反对组织军事委员会与海陆空军总部。美国人问我，是否愿意去冲绳岛参观访问？如我愿意，他们会送我去那儿住三天左右然后送我回港。很明显，美国人已经同港英当局达成谅解，因为当我们派青年去冲绳岛受训时，他们毋须经过出入境部

门办理任何离境手续，蔡文治在香港征募的人员也是如此。

我说：“对不起，我不去！”他们希望我走一趟，因为蔡文治不能来香港（I）。同一时间，蔡的党羽在冲绳散布消息称我很快会去那小岛就任总司令职。他们挂出了欢迎我去就任总司令的标语牌。当然，他们也希望顾孟余去冲绳。

（I）雷啸岑在《忧患余生之自述》一书（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78页）中说，1952年10月5日上午十时左右“忽有香港（警务处）政治部的洋帮办率领武装警察八名，驰来高士威道廿号四楼《自由人》社搜查，经一小时翻箱倒篋工夫后，把我办公桌上的所有公私函件一概取去。又在助理员顾君的房内搜出正在冲绳岛搞第三势力的中国军人蔡文治给顾氏的密电本，还有蔡氏署名委派军职的空白委任状与关防私章等等，即将顾君捉将官里去。顾系前任主编（刘百闵）所用的助理员，我素不相识，更不知道他给蔡文治在香港搞招兵买马工作……次晨如约前往政治部报到，一洋帮办大声诘询在顾君房里抄出各项违禁品是否我教他干的？我声明顾君非我所雇用的人，彼此素昧平生，他跟蔡文治往来，我更不知道。但那洋帮办并不满意我的解释，反问我知不知道犯了相当严重的罪行？……那位私通蔡文治搞第三势力运动的顾君，不久由港府通解到台湾去了”。

当时我有否感觉到英国人已侦悉事态的进展呢？他们当然知道。英国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但他们未插手干涉，因为自日本投降起，我已同他们建立了联系，他们尊敬我。但是，说到底，蔡文治那伙人与我不同！

蔡文治拒绝解散他的组织加入我们同盟。我们盟内的老先生们认为他错了，拒绝出任总部总司令这个职位。

不仅如此，我反对海陆空军总部这一组织。为此，我同蔡文治分手了。他认为既然他有美国人支持，就不需要加入我们这个组织。

蔡文治想控制“战盟”在港的老先生们，以便让他们加入他的“自由中国运动”。他写信给张国焘说：“这个时代的革命

目标是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中共暴政，而张发奎是个军阀，是蒋介石第二。”他期望老先生们同他合作。收到此信后，张国焘向我出示。张国焘回信说：“你说张发奎是军阀，所以你反对他。你根本错了！他手下并无一兵一卒，所以没有必要去反对他。即使他掌握军权时，他也不是军阀，何况在今日香港他一个兵也没有，怎能成为军阀？”张国焘把蔡文治痛斥了一顿。蔡文治不仅写信给张国焘，也写信给顾孟余。我想，他给同盟内所有的老先生们都写了信。

同盟与蔡文治的组织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鉴于我们不能走到一块儿，美国人对我们与蔡文治们是分别予以援助的。可以说，美国人对与香港的文化运动和蔡文治的军事行动的支持是同步进行的。

突然间，蔡文治逮捕了胡越等 20 多位我们派去冲绳协助训练工作的干部。他抓的都是他认为不可靠的人。事实上，他甚至逮捕了于明卓（I）——是他自己招募于去冲绳的——原因只是于从前与我有过联络。是的，他还拘捕了我从前的英文秘书林挺玉以及我从前的卫士。蔡辱骂他们是“反革命份子”。

（I）整肃的矛头指向张发奎派去的人以及参与王之倒蔡的人，以塞班学校教官为主。在东京茅崎镇先由第一处参谋李庄裁赃，替蔡文治模仿了别人笔迹造了一份民主宣言，向东京 A 班学员中有威信的丁惕吾身上栽。蔡文治的爪牙据这个捏造的罪证先逮捕了丁惕吾，又株连东京总部职员于洛克与牙科医生徐立仁以及学员中宋克明等人。这一批人被蔡文治视为捣乱份子，经四十小时以上的审讯与强光灯下的军法会审，判宋克明死刑，丁惕吾终身放逐，于洛克终身监禁，徐立仁隔离一年。蔡文治原想乘机囚禁张发奎派来的胡越，但结果未能如愿。

张发奎口述一概提冲绳岛，其实他对蔡文治的机构部署茫无所知——冲绳仅仅是“自由中国运动”属下仓库与监狱的所在地，其军政干部训练学校设于塞班岛，总部与作战学校、通讯学校设于东东神奈川的茅崎镇。塞班岛是太平洋西部马里安纳群岛之主岛，邻近关岛，面积比香港岛略小，

战前由日本统治，人口有三万。1944年美军攻占塞岛。战后名义上由联合国托管，实际归美国管治。韩战爆发后，美国中央情报局与驻日盟军总部寻求在中国大陆重建其情报网，于是便选择在塞班组建亚洲抵抗运动学校，训练韩国、越南的反共人士。

他们被关押在一间房子。我怎么知晓这些事情的呢？从冲绳岛回香港的人们向我报告此事。他们告诉我，被捕者未受到虐待，只是丧失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被捕者可以集体外出，譬如饭后出外运动与游戏，然而他们老是有美国兵或蔡文治的亲信尾随监视。

被拘留的有没有无线电报务员呢？没有，因为美国人不允许蔡文治拘押报务员，美国人亟需报务员效力。

我闻讯后向美国人提出抗议。我说，他俩应该记得，当我们派盟员去冲绳时，美方没有告诉我们，这批人是去加入蔡文治的“自由中国运动”的，也没说是蔡文治要求派人去的。如今我们探悉其中有些人已被蔡文治囚禁，我希望，把我的盟员全部送回来，否则我要将事情真相向全世界宣布。美国人说，既然事态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设若有一个被囚禁的盟员回不到香港，他们都会承担全部责任。结果，他们全都回到香港。

同盟领导成员之间的歧异

顾孟余决心去日本。他启行（1952年5月）前三天，才通知我们。他的太太也通知了我太太，因为我俩过去都是汪精卫的追随者。我俩之间互相都很了解，当我太太告诉我时，我说我对此事一无所知。我问顾，他说他再也不能忍受港英政治部的折磨了，他想去日本。

顾孟余很胆小。那时他住在坚尼地道。他不想去政治部应讯，但又不能不去，因为这儿的政府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政治部的便衣警察并不是那么彬彬有礼，对外国人的态度迥异于对待中国人。通常他们让客人坐着应讯，有时还礼貌性地端出一杯咖

啡。顾孟余却感到对方很不礼貌，自始至终不让他坐下来谈，好像审问犯人一样（I）。按照常规，便衣警察未让你坐下，你可以自己坐下来。然而我们中国人有自尊心。在另一方面，英国人告诉我，顾孟余对华籍督察态度倨傲，他一再托词拒绝应讯。

（I）警务处政治部一再通知顾孟余应讯，然他置之不理；最后乃出传票，限期到案，且声明若再抗命，即以拘票从事。顾只得如约而至。进入办公室后，站立许久，不得就座，然后由一洋人厉色云：“我们知道你在中国政府作过部长，可是这儿并非中国大陆地区。你来到此地，就得接受本地政府的约束。虽然允许你在此搞政治活动，却不能允许你有违背法令之自由，否则驱逐出境！”洋人对顾申斥一通后，挥手叫他“回去吧！以后随传随到，不得违误”。顾孟余遭此凌辱，遂萌离港之意。事见雷啸岑（时任香港时报总主笔，曾任安徽省教育厅长）撰《政海人物面面观之顾孟余》（原载香港《大成》月刊，1974年11月1日，第26页）。

是同盟方面派遣顾孟余去日本的吗？不是。是他自己决定去日本的。我们认为，既然事已如此，我们最好让他去日本开展我们的盟务。他没说过同意与否。

顾孟余秘密搭乘一艘日轮赴日。他的朋友李先生——一名归国的留日学生，为他安排一切，此人是汪伪政权成员，战后移居日本的。日本人向顾孟余提供一臂之助。你要知道，顾孟余进入日本是豁免使用护照的。一开始，他停留别府（Beppu，日本九州岛岛东北部城市，在大分市之西）。

顾孟余手中的同盟财权办了移交吗？没有变化，周安聪仍然负责同盟的财务部，陆先生仍旧管现金，美国人仍然付钱给我。

同盟决定迁往日本吗？当顾孟余离港时，我们期望同盟总部迁往日本，但这项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甘友兰（家馨）、周安聪、刘汉文（原任童冠贤秘书）以及黄如今去日本协助顾孟余吗？顾孟余希望他们去日本协助工作，但谁也没有去。

我们同日本副首相（首相吉田茂）绪方竹虎（I）的关系

属于什么性质呢？他出任副首相前住在香港，日本政府派他代表吉田首相出访东南亚。他想会见我与顾孟余。我们不想去旅馆会见他。他的一位旧同学认识陈维周，乃建议陈氏设宴，让那个日本人同我和顾孟余在宴席上晤面。我在陈维周家里见到他，顾孟余未去，因顾不认识陈维周。

(1) 据香港《星岛周报》1952年7月10日出版的第35期报导，绪方竹虎是记者出身，由吉田茂提携入政界发展。中日和约签订前，吉田欲派绪方访台，藉此探听中国内部政情，顺便遍访东南亚寻求政经情报。启行前会见了经日赴美的张君勱，始知香港第三势力概况。绪、张会晤消息传到台湾，使他抵台时受到隆重欢迎，蒋介石接见绪方三次。何应钦告诉他：“蒋很关心张发奎的态度，如果他不存异心，政府是希望他来台湾派他一些用场的。绪方抵港后与张会见时，张对张君勱指摘尤多，曰：“我是军人出身，原不懂得政治，但他们称为政治家的又何尝懂得政治呢？”更使绪方头疼的是李微尘。此人久坐不去，攻击他人不遗余力，又吹嘘自己号召力如何之大，门下信徒有多少云云。绪方本为了解中国政情，但只闻得众人诉苦。梁友衡、何正卓、毛以亨、程思远等十多人齐集他下榻的酒店，尽皆希望谋求了出路赴日，还有汉奸鲍文樾等，甚至提出要日本提携共存共荣，以致于绪方拒绝出席许崇智特设的一个酒会，认为彼辈理论多于实际，虚有其表。绪方及其随员对第三势力人士都有莫测高深之感，仅向其中一、二人寄语“亟盼中国政界人士多多团结，为来来中日两国谋幸福”。此后程思远、黄旭初赴日都找过绪方，均无成果。

陈维周的同学充任译员，绪方竹虎说他对未见到顾先生感到惋惜。我建议俟他回程路经香港时由我请他便饭，但他说回程在香港机场只能停留一小时。故我说我们以后再谈吧！

绪方竹虎想做什么呢？他希望我们建立一支军队。日本人是古怪的。他们像美国人一样，他们想同多种政治力量保持联系。

我们交谈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谈到了反共，仅仅是泛泛而谈。

有没有谈到我们的同盟？没有。

1952年5月14日张君勱绕道日本去美国有何建树呢？张君勱以前见过马歇尔将军一两次。张君勱对马歇尔存有幻想，他以为老朋友会帮他忙。他在华府碰了一鼻子灰，他太天真了！

在美国，张君勱同李宗仁合作愉快吗？张君勱对李宗仁印象欠佳。李宗仁有些什么美国官方联系呢？李宗仁同共和党有何接触呢？张君勱发现，李宗仁耽于空谈。

1952年9月李微尘从张国焘手中接办“中国之声”的情况如何呢？我在团体成立后才认识张国焘。

行前我认识他吗？没有。他说他以前见过我，但我想不起了。我有否同他讨论过他在南昌暴动中所起的作用？没！我们怎会谈那些！如果我们不是作这部回忆录，南昌暴动这个题目永远不会想起来。不，我不知道他在那场暴动中起过什么作用。

可以作出结论，张国焘事实上不适合当领导人。为什么呢？他的私生活是腐化的。他喜欢打麻将，不关心其它的事。他说话不负责。他把家里女佣都列到中国之声的员工薪酬册中。谁也分得清这是他的私人开支，不属于公费。我们都在为同盟效力，他应该把时间用到政务上去。张国焘希望把中国之声的每月预算从2万港元增加至2万2千元，他无视同类杂志的每月预算已减至6000港元。顾孟余先生对此感到头疼，感到难以对付张国焘。我生气了，我说我来搞掂他，乃把预算减至万八。张国焘问我：“中国之声的钱是属于谁的？”意谓我无权削减预算。我说，既然其它刊物预算都减少了，他也得跟着减。张不答应。李微尘说，他想做恶人，接办中国之声，因为没人敢得罪那个老人。1952年9月4日至18日，李微尘夺了张的权，月开支进一步减至一万七。林伯雅又接管了李微尘那摊子。

张国焘不再出席同盟中央执委会的任何会议，但他也不辞职，因为他不想失去那份生活津贴。同盟已经实施两种纪律：个

人纪律与集体纪律。张国焘自己起草的《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公约》规定，不出席会议必须请假。可张国焘倚老卖老，从不请假。

你知道，当同盟派宣铁吾（I）——蒋先生昔日的追随者，曾任淞沪警备司令——与我去他家里探望时，他是怎样为破坏纪律行为辩护的吗？当我们要求他申述缺席的理由时，他直言他不想去开会。问他为何不请假，他说：“有必要吗？”然后我们问：“不是你自己起草同盟公约的吗？”他说“是的。”所以我们说：“如果你自己不遵守公约，你怎能指望其它盟友去遵守呢？”他的答复是非常有趣的，他说：“向华，为什么你把政治弄得这么严肃呢？”最后我说：“如果你不满意现状，你为什么不辞职呢？”他不想辞职，也不想请假。我再次提醒他，公约是他自己的作品。

（I）宣铁吾：浙江诸暨人，1897年10月13日生。1924年入黄埔一期。1945年入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二期受训。自1924—49年历任排、连长、国民政府警卫旅参谋长、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陆军第八十八师参谋长、军委会委员长侍卫长、浙江省保安处长、陆军第九十一军军长、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淞沪警备司令、中训团上海分团主任、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浙江省政府委员、京沪杭警察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曾参加一二八抗战与淞沪会战。党政职务任过南京中央军校特别党部筹委、三民主义青年团浙江支团筹备主任、中央训练团上海分团主任等。彭昭贤任内政部长时赴沪视察，时任上海警察总局局长的宣铁吾对彭说：“天下的都市当以上海为最乱：上海七百万人口中，顶多只有一百万人有正当职业，其余六百万人除开妇女和小孩，人人都是天天乱动脑筋，时时刻刻打算浑水摸鱼！至少这些人需要依靠扰乱社会来维持生存。如此这般，上海市面哪有不乱之理！”流亡香港后，无论“民主中国”座谈会与“战盟”，宣铁吾都在核心地位，内部纷争常仰赖宣从中奔走调解。然其携港财物均被妻妾卷逃，晚年穷蹙潦倒，1964年2月6日病逝台北。

向张国焘告别时，我对宣铁吾说：“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成

为毛泽东，而张国焘成为张国焘了。很明显，张国焘是不适合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的。”

我怎样评论那篇说我飞往日本于1952年10月15日同顾孟余、张君勱一起发表同盟宣言的报导呢？（原注：乔治·泰勒文章《台湾新貌》4月发表于大西洋杂志，区平节译后刊于《中国之声》第七卷第6期第8项，1953年1953年5月11日出版）不，我没有去日本，张君勱也没去。宣言是1952年10月10日发布的，见1952年10月10日出版的《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宣言》15页的小册子。

改变环境与扩散成果

麦金托称我是第三势力的领袖，但我不想成为领袖。在我一生中，我从未有过任何领袖欲。他问我，同盟的总部设在哪里？我回答设在东京。实际上是设在香港。他问我同盟拥有多少会员？我答香港有两三百人，海外有一二百人，总共四五百人。他告诉我，他不喜欢蒋介石、毛泽东以及李宗仁，他最喜欢我。我说“非常感谢你”，且断然告诉他，我们的活动只涉及中国政局，对他的职位绝对无害，而且也不会扰乱香港的安宁。我向他出示了同盟的政纲。

我对1952年11月共和党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有何反应？我感觉我们的前途将变得更为艰难，因为共和党是支持蒋先生的。

我们对张君勱派金侯成（I）到香港充任他的驻盟代表有何反应呢？张君勱说，他离香港太远了，所以派遣民社党的重要成员金侯成代表他出席会议，同我们讨论同盟存在的问题。

金侯成是同盟成员吗？不，他想倚仗年龄施加影响力。我们不要他，我们拒绝他出席会议，因为他不是盟员。最终，我们决定让李微尘寄送会议记录副本给张君勱与顾孟余，候他俩知悉会议情况。是的，我们一直这样做的。我们也将会议记录的副本送

交同盟的各部门与各支部。我们现在也这么做吗？是的。

(I)：金侯成：江苏宝山人，1881年生，1900年被江苏省选派赴日留学，1912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后，回国主持宝山县议会。1913年入中国银行襄理金融。1936年后历任国民政府铁道部简任秘书。民社党秘书长、国大代表、民社党最高顾问等。1968年元月15日病故台北。

中央执委会根据同盟组织纲要第十条，在一年内召开代表大会显示同盟的正式成立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国民党倒是根据时间表定期召集代表大会的。这里牵涉到会议地点、费用、旅费等种种问题。

张国焘宣布退出。那次见面后我见过他一两次，但此后再也未见过他。他不出门，保持安静。

顾孟余想在日本创办什么类型的学校呢？我们想在日本创立一所学校训练第三势力的青年与干部。顾孟余的友人李先生想帮助第三势力。李先生拥有一幢房子可充当校舍。张君勱同美国国务院讨论过这个问题，但无下文。

顾孟余在同社团、作家、工商界领袖建立联系方面有所进展吗？他有所建树，他创办了一所商业学校。

顾孟余的翻译计划属于什么性质呢？顾孟余草拟了一个计划，设立编辑委员会从事翻译工作，由李圣五负责。他是同盟成员吗？不是，他协助顾孟余。该项计划自顾孟余离港赴日本后执行，英文、法文、德文都译，童冠贤也承揽部份翻译工作。

顾孟余争取日本政府资助中国学生去日本读书一事成功吗？顾孟余同旅居日本的彭昭贤（I）接洽这一安排，但毫无进展。彭昭贤是同盟的成员吗？他同我们有联络，但不是成员。后来他同来自台湾的中正中学校长韩云甫谈妥，由韩招收香港学生到日本念书。依据这一计划，有成百名流亡学生去了日本。

(I) 彭昭贤：1893年生于山东登州府牟平县，1921年协助熊希龄筹划赈灾，护送五列车粮油抵俄，旋考入莫斯科大学进修社会科学。1925年

秋毕业回国，任教燕大、华北大学。旋南下，奉命与钮永建赴沪联络工人、学生、帮会以行动配合北伐军攻占上海。蒋抵沪后，委彭出任第四纵队政治部少将主任。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后，回任国府简任秘书，复调钮永建内政部任司长五年，1930年荐参谋总部上校科长盛世才赴新疆，造就盛世才三年后出任新疆边防督办，雄踞西陲十一年半。1933年夏，奉蒋命赴新疆调解内争，劝盛世才释放汪精卫所派宣慰使黄慕松回京。彭氏留疆十个月，游说苏俄驻迪化代表，促成俄方以三百万金卢布的军火援盛，击败马仲英、张培元，巩固了盛世才在新地位。又向盛进言用俄援武器装备绕道西伯利亚归国的十万多东北抗日义勇军，新疆局面遂告稳定。1934年夏调任陕西民政厅长，历十年。期间1942年接盛世才密电转呈中枢，乃有盛世才驱逐苏俄特务、归顺中央之举。胜利后，出任行宪后第一任内政部长。蒋下野后，李宗仁决定与中共和谈，彭被委为北上五代表之一，中共即表示反对。1949年8月携眷抵港，居半山罗便臣道75号二楼，彭被委加入第三势力由该团体决策人董冠贤推荐，一度任“中国民主战斗同盟”青年部副部长。不久，感内部情况复杂，乃举家迁居日本，在港时热心为创办新亚书院集资，赴日后担任亚细亚大学中国留学生部一个荣誉职务。1979年5月9日病故纽约。

顾孟余对盟务持消极态度。他感到同盟变得腐败不洁，认为我们应该解散它，重新来过。什么时候他提出重组建议的呢？是他去日本后不久，他草拟了一个新组织的计划，名称是“中华大同盟”。这一新组织的政纲与“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类似。可是只设三人出任新组织的负责人，稍后增至五人，暂时不再吸纳新成员。原来我们同盟的盟员中，被顾孟余等视作好人的，将被指派工作，但不吸纳入新组织。我在同盟中央执委会上提出这个主意，但未讲明是顾孟余的主意。会议讨论了这个主意。

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动

共和党上台执政后，蔡文治还继续派人空降大陆吗？是的，他还继续了一段时期，倘若有人声称他的故乡有几百人准备迎接

空降者，他就会被派遣空降登陆那村庄。就这样，鉴于华平业声言我的故乡始兴县青化乡有一支游击队，他被派空降那个地区，还配备了我们送去受训的无线员报务员之一。那位报务员以为华平业不会说谎，因为他在我部下当过副官。他愿意追随华。美国飞机还载着其他人飞去大陆，但我不知道其他人降落在哪儿。华平业和报务员降落在青化乡附近。他俩被农民们抓住，村民已效忠中共政权。两人被押解到广州，案件由中共传媒报导出来。华平业被控以台湾特务罪名而处决，报务员宣判入狱。他说他什么也不知，他唯一的任务是照看发报机。我想，此人仍在广州监狱服刑。他的姐姐去广州探监，把情况写信告诉在香港的父亲。他父亲接着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在这宗惨败中，蔡文治确实欺骗了美国人。他在大陆上根本没有潜伏人马。

我们有多少人被派遣空降大陆？除了我刚才提到的报务员，我不清楚其它空降人员的下落，我相信许多人都牺牲了，没有人成功地完成任务。中共的社会组织是如此严密，他们全部被捕了。后来我从共产党报纸所刊出的在华南被捕空降人员名单，才洞悉详情。

最大的惨剧发生在三十多人空降海南岛之时，他们全部被俘处决。其中有没有我们的盟员？我相信有。

共和党政府改变了民主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但美国新政府不能立即废弃冲绳训练营以及正同我们一起进行的建军事宜。共和党人说，他们将支持反共不反蒋的人，不再支持反共又反蒋的。他们不容许蔡文治继续反蒋。

美国人同蔡文治磋商，叫他去台湾，把他的部众并入国军。蔡文治接受了美方的政策更易，他去台湾同当局会商。蒋先生派军统局（当时职务为国防部参谋次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及负责对中共情报作战的国民党中央第二组组长）郑介民充当与蔡之间的联络官。当郑介民担任北平军调部三人小组国军代表时，蔡

文治在郑麾下做过参谋长。当局希望蔡文治解散他的部众，承诺根据各人特长分配工作，而蔡本人可获委相当的官职。蔡文治不肯，他还想完整地保持这支部队，也即保存他自己的实力。那时蔡拥有多少官兵呢？大约二百多人。郑介民拒绝了蔡提出的条件，蔡文治回到了冲绳，美国人送他去了华盛顿特区，他还呆在那儿（I）。美国人太天真了！

（I）蔡文治去美国后受聘担任美国国防部顾问，负责研究国防军备，直至1978年退休，并加入美国国籍。1980年9月应叶剑英邀请回大陆访问，参与筹建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任理事（会长徐向前，顾问聂荣臻、许德珩）。还联络海外黄埔同学及其家属，成立黄埔同学海外联谊会，任副会长。1984年2月1日与李默庵、宋希濂、侯镜如在美国《华侨日报》发表《旅美黄埔同学及其家属促进中国统一筹备会宣言》，称欲“为促进中国统一而奋斗”，还向宋美龄发表公开信。同年应邀回大陆出席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会，发表演说《融化冰霜为甘露》，称要“发动世界舆论以促醒台湾当局和其它尚未醒觉者”，1994年1月9日死于美国华盛顿。

蔡文治的部下被遣送台湾。我认为，对于那些想去台湾的盟员，我们无话可说，他们应该去那儿。然而，我们盟员中任何人想要回香港的，应该让他们回来。就此事与美方谈判后，我们盟员中的一部份人被送回了香港，是美国人送他们回来的。在港府方面，有没有刁难呢？没有，既然这些人无须签证离开了香港，自然也无须签证返因香港。我们同盟中有部份人自愿遣送台湾。

究竟回香港的人多还是去台湾的人多？去台湾的比较多。我们的盟员中，是否多数人回到香港？是的，但有些人已经牺牲，这是令人十分沮丧的！报务员中间极少数人回来。青年军人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回来了。

美国外交政策的改变对同盟的影响又如何呢？对我们没有影响，因为我们没有反对蒋介石（I），我们没有攻击台湾，我们只是批评它而已。

(I) 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病逝香港，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即发唁电给“张向华将军家属”，称“乡情旧谊，时所萦怀”；台湾方面蒋经国特颁褒扬令，赞扬张“安内攘外，屡着勋劳”，对他居港30年的评价乃是“执节怀忠，拥护国策”。张发奎早年有三次反蒋纪录：（一）1927年11月发动政变，驱逐中央军黄绍竑。12月，时任第四军参谋长的中共党员叶剑英发动广州暴动。（二）1928年9月通电拥护汪精卫，并要求改组党务，自任“护党救国第三路总司令”，联合桂军攻击广东。（三）1931年与李宗仁、白崇禧合流，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两广联合反抗中央。

据顾维钧回忆，1970年他在香港一次午宴上同张发奎谈起国民党败亡大陆的情形及其原因，张说：“主要原因是（1）国民党的弊政，包括发行金圆券进行币制改革和恶性通货膨胀；（2）军事上无能；（3）委员长任命的军事长官贪污成风。委员长总以为自己的主张和指示是正确的，过份自信，在具体问题上不能容忍或不够耐心地听取别人意见。阎锡山在广州任行政院长时，何应钦是国防部长，但连中央嫡系部队的驻地也不知通；任参谋次长的黄杰，也不知道这些情况。实际上，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是委员长自己，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控制的政府军驻在何处。他还常常越过国防部或参谋总部，直接向前线部队发号施令。黄伯韬和邱清泉互不合作，互相嫉妒，这仅仅是徐蚌会战溃败的近因。根本问题是毛泽东对国军在战场上的一举一动、南京周围的防守据点等重要情况始终是一清二楚。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一直把国军的作战计划、部队的配备和驻地等种种重要情报，通过秘密途径通给毛泽东。甚至连国军打算在什么时候向共军某一据点发动进攻，毛泽东也都了如指掌。因此徐州战役结局如此毫不足怪。”顾维钧问，胡宗南军队装备着美国军援的最精良武器，何以1949年仍未能战胜共军。张发奎说，胡宗南过份热衷于政治活动，怀有政治野心，忽视了军队的士气，不关心下属，结果大家离心离德，都不愿意为他拼命打仗。他为了部队免受共军袭击，率军奔向重庆。当时委员长正在该地，亲自指挥他与共军作战，但还是节节败退，结果五十万人马连同武器装备几乎全军覆没。张发奎后来同李宗仁合作，任海南行政长官、陆军总司令，到香港搞第三势力，都是出于这一心态。张虽在政治上反蒋，但在私谊上对蒋十分怀念。据胡越回忆（载1980年3月15日《明报》副刊《忆张发奎将

军》)，有一次在酒宴上，他率直说道：“我今天能在香港做寓公，安度晚年，都得感激蒋公介石。我今天所有的财产都是蒋先生给的。记得第一次见面，就赏了20万，第二次十万，第三次……蒋先生给我的钱当时没有用处，都存在香港的银行里。1949年以后脱离军职来到香港，才发觉要靠这些钱生活了！”张发奎第一次赴台是1972年8月，由苏浙旅同乡会理事长徐季良陪同，参观了金门防卫。蒋夫妇特在士林官邸以茶会招待，1975年4月蒋逝世，张曾赴台吊唁，此后又曾多次赴台谒陵。

在中共方面，1950年代初，广东省省长叶剑英即通过原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副党代表李朗如和李章达两人转告张发奎，望张到广州叙晤。其后，何香凝、李济深也先后去信，后者强调张“童年即兵，革命精神屈指有几人哉”，又赞他昔年“同情革命”，还动员他公开声明“不赞成蒋介石反革命，赞成今日毛主席领导的革命”；1956年11月蔡廷锴受周恩来委托，让儿子绍昌带信给张“请兄回祖国观察一下，并请兄有所指教”，又传口信云：“尽管彼此的政治观点不同，但私人关系不应该改变”。接着，程思远也转达了周恩来的问候。

直至张发奎去世前不久，叶剑英还托人捎信邀请他北上参访。据张发奎的军部秘书李大光的回忆：中原反蒋战事失败后，彭德怀、黄公略部占领长沙，师长吴奇伟问张发奎：“蒋介石打不倒，而共产党逐渐壮大，将来中国的政权，你愿意给蒋介石呢抑或给共产党？”张答：“到那时我愿给蒋介石，因为他是国民党人，他会实施三民主义。”吴奇伟又问：“假如日本人来了，要侵占我们整个中国，蒋介石担负不了抵抗的责任，你愿意把中国给日本人呢抑或给共产党？”张发奎大声答：“那时我愿意给共产党，因为共产党还是中国人，谁愿意给日本而当亡国奴哟！”张发奎曾听命于汪精卫，率二方面军进攻南京，又同李济深部打得只剩下几个疲残之师。汪精卫与蒋妥协后出任行政院长，他求见数次均被挡驾，此后对汪完全断绝了关系。1938年汪精卫在香港发出艳电降日后，张发奎即令梁寒操起草一封反对电稿，遍征在粤北的国民党中上层人士签名发出，蒋介石接电后，即日汇给张发奎20万元、梁寒操5万元，以示奖掖。

张发奎个人对中共并无深仇大恨，且曾多次掩护过中共党员的地下活动，诸如1927年广州暴动的主力本是他麾下第四军教导团学员、宪兵团以及新编警卫团官兵；八一三淞沪抗战时，他在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部之下组

织战地服务队，任中共党员钱亦石为队长，杜国庠、林默涵、左洪涛、何家槐、王亚平、杨石彬等廿多名中共党员分任各级要职；张先后调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和四战区司令长官时，都把战地服务队随身带走，直至抗战胜利，左洪涛、何家槐仍随张在广州行营任职。1946年，广州市党部查禁中共党员张铁生主办的《自由论坛》，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求执行党纪惩办李章达、许崇清等五人，另电张发奎将左洪涛、何家槐扣解重庆讯办，张发奎将左、何二人资送香港。5月4日，军警搜捕学运领袖中山大学教授梅龚彬，张示意另一中共党员、曾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麦朝枢以广州行营汽车将梅接在沙面张公馆，且保护梅上船赴香港。在九战区时，他任命李章达为军法执行监，荐王昆仑为政治部主任，麦朝枢为副主任。长官部成立后，所有以前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部战地服务队的人员都转任秘书职务，由张发奎直接指挥工作，故意绕开陈诚委派的秘书长丘誉；左洪涛、何家槐分别为张起草演说词和对外发表的文告，同样指定麦朝枢代阅，不送丘誉审核。

是不是美国人停止支援同盟了？不，鉴于美国的政策已变，我们决定不给美国人留下停止援助的机会。我们自动放弃美援。我们决定同美国人定下了一个停止美援的日期。美国人想继续支持我们，问询顾先生是否可以在日本继续从事文化活动——反共宣传活动？顾先生说：对不起，他不想再在日本从事任何活动。李微尘建议我要求美国人从文化上支持我们，而非政治上支持。我向美国人建议让李微尘、张国焘或童冠贤在香港继续进行文化活动。他们三人都擅长写作。美国人拒绝了这项建议，他们说，如果顾孟余肯负责任，他们才愿意继续支持。这两个美国人回到美国去了，从此我再也没见过他俩。

我们决定放弃美援的主要原因乃是同盟内部出现了复杂的局面。正如我所说，顾孟余成了同盟的核心，却态度消极。

同盟开始分裂

我们减少了活动。我们停止了海外活动，还把干部们的生活津贴减少到原来的三分之一。我们不想使美国人觉得，一旦我们

停止接受美援，我们就完全瘫痪了，这是挽回面子的作法。

同盟向我和其它几位成员借过钱。当我们存放在香港政府的四万元港币押金——我们出版或津贴的四份期刊每份要付一万元——因停刊而退回时，这笔借款都归还了。这笔钱要在杂志停刊一年后才能取回。此外，我们以4万元卖掉了嘉罗印刷公司。同盟亏欠二万多元翻译费，可当时付不出现款，就只好分期拨还了。

我们自1953年11月起就停止支付干部们的生活津贴吗？是的，我们停止津贴《再生》杂志，我们停止出版《华侨通讯》，但《中国之声》延续了一个短短的时期（原注：停刊号于1953年12月28日出版）。

我们先后派童冠贤和周安聪去日本见顾孟余，商讨同盟的重建问题。我们期望他别退盟。

顾孟余怀疑同盟已被敌人渗透到什么程度了呢？我已经说过伍宪子访问台湾的事。张君勱指出，台湾已派特务混入我们的同盟。我不承认。有人怀疑宣铁吾，他的家眷在台湾。他是黄埔一期，曾是蒋先生的“太保”（I）之一，又是蒋的小同乡，还在委员长大本营做过事。我不相信宣铁吾是奸细，我不认为同盟已被台湾特务渗透了。

（I）：“太保”是指蒋介石的黄埔门生在北伐胜利后组织的锄奸团体复兴社骨干，但宣铁吾未成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之一，只是复兴社中央干事。

当张君勱鼓吹强硬态度时，顾孟余是否主张对台湾采取温和态度呢？是的，顾孟余不相信“战盟”会像张君勱的文章那样赤裸裸地攻击台湾。当顾孟余看到那些文章，他很不高兴，我们其它人的意见呢？我同意顾孟余的观点，童冠贤也是。但事实上要确定哪些文章构成攻击，哪些文章只是批评，那是不容易的。顾孟余宣布，他不再为同盟承担任何责任，以后他和同盟之间只能是互相支持而已。顾孟余的建议就是要解散同盟。然张君勱反

对解散。于是同盟决定暂停活动几个月。

1954年8月18日和27日，同盟决定改组，这总比解散好。我们决定保留同盟的名称，但组织应该采用政治组织的联盟这一形式，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组织。

大家都认为战盟改组成为联盟是必要的。事实上，张君勱已经打算只派一名代表驻盟。于是，改组委员会成立了。

此时，顾孟余正式退盟。他是我们组织的重要核心，接着张君勱也在美国宣称退盟。当时同盟的三位领袖是顾、张和我。由于其中两位退盟，我也得退出。坦白说，我是个军人。既然别人退出了，我不想再继续了。

我们解散了同盟，焚毁了它的文件，其中包括与蔡文治有关的文件。

战盟解散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呢？是顾孟余的退出。这次失败后，我认识到，组织团体终究是一步错棋。同盟受挫于内部矛盾。张君勱保留了他自己的组织——民社党，他不能与它断绝关系。

当盟方的决议交付基层讨论时，民社党的盟员征询张君勱的意见。虽然我们不必请教任何人，我们通常还是咨询顾孟余的。我们的口号是“自由与民主”，所以意见分歧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办法可以把战盟发展成为一股力量了。当战盟有点钱的时候，人们还可以为钱做点事；但当不再有钱时，人们问我们：“你的力量在哪儿？”

我们流产的努力

离开国民党后，我第一次加入一个复杂的政治组织。早先一切都很简单，我一直认为只要追随孙中山的信徒汪精卫，我不会走错路。从青年时代起，我一直是孙逸仙博士的追随者。

在同盟组织起来时，我崇拜偶像，认为我们必须拥戴一些名人，如顾孟余、张君勱、张国焘、李璜、童冠贤来担任我们的领

袖，因我尊敬他们。我甚至认为，许崇智往昔位高权重，理应成为领袖。陷入如此的偶像崇拜，我根本上错了。我把这些领袖当作了庙宇中的佛像或教堂中的耶稣受难像。我认为，我们要有领袖，他们能筹集经费。我以为，同那些人合作，我们就可以发展一个组织，催生一支真正的力量。

抱着这种目的，我决心专心致志促成他们的合作。然而，我发现，所有这些人同常人无异。我的理想幻灭了。

为什么张君勱使我失望呢？当然，张君勱从来未做过官，他的私生活和道德品质，是最值得崇敬的。但他性格上不够有力。他说到做不到。我知道君子应责人宽，但在政治领域，不约束部众是行不通的。我想张君勱不适宜担任政党的领袖，虽然他是一个好人，我钦佩他的不屈不挠精神。

为什么我也对顾孟余失望呢？顾孟余具有良好的品格，但他同样不够有力。我原先就知道这一点，那么为什么我仍指望他成为一个出色的领袖呢？请看我们周围是些什么人呢？当我们一来到香港时，我们能寻找谁来充当领袖呢？我已经告诉你，我崇拜偶像。如果汪精卫不投敌叛变，我会继续追随他的。

同盟内的其它负责人下落如何呢？许多人去了台湾，例如宣铁吾，他找不到事情做。这一点加强了 my 信念——他不是渗入我们内部的特务。周天贤去了台湾，韩汉藩去了日本，黄如今去了巴西，伍藻池去了美国。李微尘从澳洲回来后，去了新加坡从事广播工作。

有人去大陆吗？没有！我敢说，盟员没人去大陆。

有些人留在香港从事教职。例如，任国荣、周安聪在新亚书院执教。

童冠贤要求我为他荐一个教席，他说他不想再搞政治了。我介绍他去崇基学院教书。李应林那时是崇基校长，我同他私交甚笃。他不止是一位教育家，也十分关心政治。

我有没有同那位为香雅格博士带信的美国人作进一步接触呢？当他把责任转移给另外两个美国人后，我未再同他有过接触。他考虑到他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

他仍留在香港吗？事实上，他多数时间在香港度过。以前每年遇见他几次。有一次我见他作为贵宾出席英军辅助团的会议，我们彼此瞥了对方一眼。但近几年我未曾见过他。

我同其它组织的联系

张君勱同中国民宪党代表李大明（I）和洪门致公总堂代表在美国联络得怎么样？谭护和李大明希望同盟加入他们的组织。张君勱同意这个主意。然后他希望美国成为第三势力运动的中心。我们不想加入这个被推荐的组织。李大明强烈反蒋，我们绝对不支持他。长期以来李大明与谭护一直都反对国民党。

（I）李大明：宪政党前身是康、梁保皇党，张君勱早年在日本师从梁启超。在革命浪潮冲击下，保皇党改名宪政党，在檀香山办了一家小报，由李大明主持；该党又在旧金山办了一家《世界日报》，由伍宪子主持。抗战前伍宪子离美返港，该报遂由李大明接管，任社长，聘留学生黄伯英任编辑。社论每日一篇，由李大明与黄伯英轮流执笔。1946年11月，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民社党在“行宪”后第一任政府分得一个部长席位，此系李大明所垂涎欲得的，但张君勱却给了别人，只给李大明一个副部长职位。李对张君勱大为不满，拂袖回美国去了。五十年代初，张去美国拉拢宪政党入，李大明积愤未消，在《世界日报》上扬言要张君勱向宪政党公开道歉。

同盟有没有加入“自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54年8月20日由中国国民党复兴同志会、民宪党、致公党、自由阵线社、中国民主大同盟等组成，推李宗仁为主席，李大明为秘书长，吴尚鹰为驻华府代表。九个月后因李宗仁主张国共恢复谈判，与纲领相违，形同解体）呢？（原注：参见《自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言》，1954年8月20日发表，印刷品，一页，由李宗仁、李大明、谭护、谢澄平、陈中孚签署，副本寄给张发奎、董冠贤、

李微尘，后有张君劢手写的附言，声称他已收到李大明寄来的宣言。哥大藏有此宣言的缩微胶卷）顾孟余对此从来不感兴趣，我也同样。我们对谢澄平都抱着否定态度。

“中国自由民主战斗同盟”于1954年秋天解散后，我有没有人“中华民国反共复国同盟”会呢？没有，同盟解散后，基层盟员希望我出任该会的领袖，但我没加入。那个组织也没有成形。

我有没有加入“中国自由民主联盟”呢？王同荣、林茂、罗永扬等人希望组织这个团体，但它一直没有成立。许多伙人计划成立一个又一个的组织，我哪一个团体也不加入。为什么不？首先，我不想做领袖；第二，即使同顾孟余、张君劢在一起，我们也缺乏凝聚力。同盟内的其它人我都不佩服。谁能成为新组织的领袖呢？简言之，自从同盟失败后，我不想再搞任何政治组织了。然而，《联合评论》是一份政治刊物。

我同1958年创刊的《联合评论》周刊的关系如何呢？她是由下列团体组成的：（1）无党派的黄宇人、王同荣（I）与我，原先是国民党员；（2）民社党党员：梁友衡、罗永扬、刘裕略；（3）青年党党员：左舜生、李璜；（4）自由阵线集团：谢澄平、刘子鹏，后者也是青年党党员；（5）友联机构：胡越、史诚之。

（I）王同荣：安徽人，国民党籍国大代表，《联合评论》周刊社务委员。《联合评论》于1958年8月创刊，不久成舍我由台北赴港，对左舜生和黄宇人说，他从台湾动身时，雷震特别嘱咐他转告左、黄二人，《联合评论》中的王同荣乃是国民党特务，要加以小心。国民党中六组驻港特派员孙家麒亦经香港自力出版社推出《我为什么脱离台湾国民党》一书透露，王同荣属于调查局特工，台北情治机关每次开联席会时，调查局常有《联合评论》提供的小报告，而陈建中主持的第六组则无，陈乃雇用王同荣，王即“一稿两投”，详细的报告交给调查局，较不重要的寄给国民党中央第六组（典出《五十年代香港第三势力运动兴亡始末》，《历史的暗流》第117页，台北元尊文化公司1999年1月出版）。《中国党派资料辑要》中集

——关于海内外重要政团部份称：“有人称王同荣系国民党所派出之工作人员，王愤而辞职”，被列入“政战资料汇编之二”（此书编印者系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62年7月出版。译者摘自台北《传记文学》第71卷第4期第46页）。另据黄宇人著《一个失败的民主斗士杂记》第廿八章《惩办贪污县长》一节记载，1940年黄氏任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时，普定县党部书记长到省检举该县县长王同荣贪污，经调查证据确凿，由省主席吴鼎昌下令撤职，省保安处以军法审讯，依战时惩治贪污条例判处死刑。案由军委会发回重审，因中央社会部出面关说，省保安处改判十年徒刑。三年后，王同荣忽然做了国民参政会的总务科主任。事缘早年王同荣曾在邵力子主陕时任职于省府，与邵颇有渊源，遂援引狱犯服役条例，服满三分之一刑期保释外出易服兵役，而国民参政会的职务竟成了“替代役”。

人们希望在我家聚会，但我坚持第一次会议应在左先生家召集，虽然左宅小且狭窄，我还是要表示我并非领袖。但是此后的会议可在我家举行。在左家开第一次会时，我问左舜生将来还想去台湾吗？他说他绝不去台湾了。我说，既然如此，我绝对支持他担任总编辑。我们讨论了是否需要组织一个团体，然后出版一份刊物或者先出刊物后搞组织。我们决定从办刊物开始，然后讨论了成立组织的事。于是，这就不是政治组织了。我们中间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加入其它政党了。一切都依靠思想与政治立场的一致。

我们的政策是鼓励民主，反对共产主义。在1958年8月15日创刊号上，我们表示宗旨是善意地批评台湾，毫无保留地抨击共产主义。

左舜生估计，刊物每月需要友联机构、自由阵线集团和我提供两千多元经费。到付款时，我付了我的一份，港币700元，自由阵线集团给了500元，友联也付500元，港币缺400元，由其它人分担。

自由阵线很快退出了。《联合评论》出版第2期后，它就不肯付款了。我们短缺500元，友联以在《联合评论》登载广告

的形式付这笔钱。自由阵线的退出，再次肇因于谢澄平想当领袖。

台湾方面知道了我支持这份刊物，有人问我支持的原因。答案很简单：没有这份刊物，人们无法了解台湾发生了什么事，不论好事抑坏事。至少，这份刊物有勇气批评台湾。

友联集团与《联合评论》采取同样立场吗？是的，这就是友联同我们能够合作的原因。可是，产生了小的分歧。《联合评论》的宗旨是无条件抨击中共和建设性地批评台湾。偶然批评过了头是难免的，于是刊物被禁止进口台湾。友联机构的另一出版物《祖国》同样被禁入台。后来，由于亚洲基金会的影响力，《联合评论》不再批评台湾了，刊物又恢复运销台湾。亚洲基金会当时是支持台湾的。

1962年5月，友联机构撤出《联合评论》，为什么？因为友联接受了美援，亚洲基金会对友联说：“如果你们继续同《联合评论》混在一起，我们不再援助你们。”友联的代表在会议上解释了他们退出的原因。

许多人批评友联的退出，但我说友联做好了。我们必须谅解而且原有他们。他们依赖美援，所以不能独立自主。《中国学生周援》是友联唯一赚钱的出版物，其它部门都是亏蚀的。

为什么亚洲基金会先前不予干涉呢？你提出这个问题是对的，我相信真正的原因出在内部——亚洲基金会被推诿成撤离的借口。《联合评论》已经经营了几年了，亚洲基金会不可能不了解形势。为什么亚洲基金会先前不干涉呢？根据我所了解，友联内部有一批人，包括玛丽亚·燕（I），主张同我们分手。后来，友联有两人以个人身份留下了。

（I）燕云：原名邱然，另有笔名燕归来，北大文学院毕业。1955年3月受国际笔会秘书长戴维·卡佛儿委托，在香港组织国际笔会香港中国笔会，选出黄天石为会长，燕云为义务秘书，会员有易君左、左舜生、罗吟

圖、黃思聰、徐東濱、徐速、孫述憲、胡越、陳濯生等近四百人，盛極一時。1950年代后期移居新加坡。1960年代赴德修讀哲學博士，嗣任教于瑞士蘇黎世大學。1950年代曾在香港自由出版社印行《新民主在北大》等反共作品多種。

當友聯撤走后，刊物剩下了三伙人：無黨派人士，民社黨和青年黨。我把捐獻額增加到每月一千元（I）。

（I）1927年尾張發奎引咎辭職時，將中央銀行廣州庫存的800萬銀元席卷而去，在香港與南洋開廠買地（事見邵仲池《收購白銀前後回憶錄》，《南天歲月》第313—314頁，廣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後來，刊物每月開支增至3000元，我不能再增加我的捐款額度了。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要我增加捐助。我們想辦法填補差額。於是稿費減低了。朋友們被勸說捐錢，這是一場很艱難的鬥爭。我真佩服左先生的精神，那實在值得欽佩。

《聯合評論》創刊後，幾年過去了，仍然沒有建立組織。為什麼？“只听樓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原因很简单。民社黨和青年黨有他們自己的組織，而其餘人不屬於任何黨派。設若我們新創一個政治組織，他們勢必離開他們已建立長期聯系的政黨。

為什麼《聯合評論》在1964年10月停刊？缺乏經費。刊物只依靠我每月提供的一千元，以及吳敬敷經營紐約版所賺的些少利潤——從那兒我們总共收到3500美元。當這些錢花完之後，我們無法再繼續下去了。

由於編印《聯合評論》，我現在同左舜生、李璜比較接近。

組織第三勢力我有否取得任何利益？沒有。《聯合評論》集團組織政團失敗以及刊物結束，使我感到氣餒。當我初次來此時，我是满怀熱情的。

第三勢力的現況如何？除了張君勱所著的《第三勢力》一書外，人們在哪里能找到第三勢力呢？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近代史资料 总107号

作者=

页数= 286

S S 号= 1 1 3 0 5 0 1 7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